

Title

Author


Title
Author

杜明 Jean-Luc Domenach

法國知名漢學家、中國研究專家、歷史學者。曾任法國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s, CERI）研究員、北京清華大學法中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負責人。

譯者 | 何啟仁

畢業於中正國防幹部預備學校72年班、海軍官校76年班、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後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CECMC）取得高等研究文憑（DEA, Diplôme d'études approfondies），並為該中心博士生。譯作有：《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

COVER DESIGN ———— 許晉維 hsujinwei.design@gmail.com

Les fils de princes

Une génération au pouvoir en Chine

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杜明 | 著　何啟仁 | 譯

JEAN-LUC DOMENACH

目次

前言

向上攀升的足跡／三世代的「太子」

主要家族簡介

薄一波（一九○八—二○○七）

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

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

鄧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

賀龍（一八九六—一九六九）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

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

劉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彭真（一九○二—一九九七）

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

溫家寶（一九四三—）的個案

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曾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

沒有子嗣的能者：周恩來

第一章　烽火幼雛（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毛岸英，第一位太子／繼承人之死／悲劇的一代／崎嶇重聚路／也應屬於孩子們的勝利／莫斯科的庇護和培養／延安的

女權革命 / 李敏和李訥

第二章　權貴集團中的驕子（一九四九—一九五七）
權貴集團的誕生 / 紅牆之內 / 終於盼來的美好時光 / 學校—打造未來的工廠 / 中學教育 / 雨後春筍 / 人妻、人母 / 家庭 / 嚴父 / 人子 / 小同志們

第三章　是無知還是不能理解？（一九五七—一九六五）
顛沛與悲劇 / 從蘇聯歸來 / 往後數年..... / 孩子長大了！ / 家庭包辦式的學業與工作　 / 屬於權貴子弟的學院 / 青少年太子黨 / 提供自我肯定的新場域 / 山雨欲來

第四章　危機四伏（一九六六—一九七一）
一馬當先的太子黨 / 父母們在做什麼？ / 矛盾 / 紅牆內的冬天 / 驅逐、追捕高幹子弟 / 放逐 / 林彪的末路

第五章　重整旗鼓（一九七一—一九七六）
新風向 / 重建家庭 / 返回北京 / 孩子們的新境遇 / 太子黨間的通婚 / 鋼索上的政變 / 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第六章　邁向接班（一九七七—一九八九）
有以待之 / 改變將至？ / 權貴再起 / 政治回春 / 空降部隊 / 平步青雲 / 一家兩制 / 屬於家庭的年代 / 塞翁失馬

第七章　權力在望（一九八九—二○一二）
改變歷史屬性／從鄧小平到江澤民／打開新局／著魔的權貴集團／政治領域中的太子黨／胡錦濤、江澤民及太子黨（二○○二—二○一二）／習近平的勝利

第八章　習近平和習派人馬
習近平為什麼能上位？／傳奇家庭／英雄留名／模範家庭／勤懇、耐心且幸運的接班人／習氏王朝（二○一二—二○一六）？

第九章　權貴集團
位處邊緣／家族光環／家族的等級／英雄和烈士之後／仍在世的家人／改變／接班／下海經商／真正的富豪／海角天涯—國際商貿操作／既得利益的愛國者還是無祖國的金融家？

結論

注釋

參考資料

前言

向上攀升的足跡

一個國家號稱共產主義卻演變為資本主義的異形，且由一群當年號稱革命分子的子嗣，挾家族血源之名領導、治理。要理解這種奇特的現象，首先要了解、梳理它的歷史，才能掌握這個權貴集團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和過程。

當共產政權藉游擊武力在一九四九年獲勝那一刻起，答案就開始成形。勝利讓領導游擊武力的指揮者得以保留他們的龐大權力，隨後逐步形成一個社會集團，進而成為政治集團。其中許多人在「紅牆」內的共同生活，以及由毛澤東和這個集團各派系間縱橫交錯的決裂、齟齬所構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就成為理解這份足以延續三代的凝聚力的開端。坊間一些有關當代中國的經典著作都曾經寫過，我個人也在二○一二年時出版過一本書，詳細分析了這問題。[01]在那本書中，我並沒有把權貴集團的子嗣當成主要研究對象，因為當時他們在政治上還未成氣候，只是執行家族野心的代理人。而現在，該到了特別關注他們的時候了。

有關隨後的發展以及這三代「太子們」兒時和青少年成長背景，一般人都多有聽聞，在本書中，我們也為了分析解讀需要偶有引用，然而他們在毛澤東死後數年甚至於數十年間逐步攀升的經過更為重要，卻反而少有記錄。這批「太子們」得益於父母在正式體制中地位的庇蔭和一些高層保護者——像是鄧小平和陳雲等——的關照。不過在專制和威權政體要攀登至權力頂峰，重要的是需要兩項不太容易預期的因素配合：首先是這群權貴子弟間要形成一個小而緊密的團體，其次是其他競爭者

要相對平庸。

了解權貴集團得以成就的這兩項因素的有些資訊，得來於以下兩個來源：一個是從主要參與者的自傳中發掘，另一個是研究這些太子黨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從事的經濟活動。這些資訊見證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如何逐步坐大，且一步步朝權力前進的重要、具決定性的過程。所引用的資料中，時日愈是新近的反而愈不可靠，因為長久以來資料來源始終有問題，原因不止是執政者實施的系統性審查和中國境內歷史研究的薄弱，更由於受害者發生的悲劇太令人痛苦，幾乎沒有受害者的家人願意和盤托出，[02]只有一些發表在報章上的文章和媒體的報導上有出自當事者的真實證詞。

有篇僅在香港刊出，關於一位官二代的報導，這篇報導所提供的看法相當有價值卻不完整，特別是它挑明了有關鄧小平在文革後的動作，對於像是羅瑞卿等在鄧小平之前遭整肅者的家族間所引發的爭議。關於這點，還應該要看到鄧小平的兒子放棄仕途轉而「下海」經商的經過，以及直接將毛澤東治下造成的毀滅性破壞對比希特勒的情形……我採納的是所有資料來源提供的資訊，不僅止於中共官方釋出、經捏造的假話。中共的官方說法，要和來自香港及國際知名媒體的訊息連結，並作交叉比對才行。

二○○七年我曾在北京小作停留，在較不受限制的情況下所作的一些訪談對我頗有幫助，此外還有艾格妮絲．昂德萊西（Agnès Andrésy）有關這個主題的一些撰述，[03]以及和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同時也是中國政治史傑出專家蕭小紅之間交換的意見，都讓我獲益良多。

三世代的「太子」

所謂的「太子」們可以分為三個世代。

第一個世代可以稱為「革命之子」，他們均出生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年間，父母不是在革命中擔任高階幹部就是已經為革命犧牲的「烈士」。他們有的是在混亂的大都市，有的是在像是延安等的主要紅色根據地度過童年，當中也有人曾有過艱困的生活。其中最高階的幾位領導人的小孩，還在一九三○年代末期開始被送到莫斯科讀書。這些艱困年代，在這世代的成員身上落下了生理和心理的後遺症，還有人甚至因此必須接受治療。

一些傳奇和所謂的見證將這些人的形象描述成勇敢、堅定、謹守是非，並且熱切地表現出共產主義和偉大的黨的守護者的形象。一般人認為不具鮮明特色的這一代，發展領域相當廣泛。除了大家印象中一批表現普通的「史達林—毛澤東主義」幹部（例如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曾擔任過重要職位的鄒家華、李鐵映，以及對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場屠殺應該要負責的李鵬）外，還有幾個特別但卻低調的人物也應該要知道，像是蔡博和彭士祿，一個是在工業領域上值得景仰，一個是核工專家；其他有一些成員在省級或中央任職，像是葉劍英的幾個兒子中，就至少有一個曾擔任省級領導；還有唯一在中國擔任女將軍的聶力。這批人之中較特別的是兩位政治手段高超的人物：繼承鄧小平權力並從中得利的江澤民，以及中國當代最受矚目的官員曾慶紅。

第二個世代出生於一九四○年代，當時在內戰中的中共正準備對國民黨發起最後一擊。這個世代有著符合權貴子弟典型的成員，雖然其中部分成員仍留有當年艱困生活的後遺症，或是帶著出生頭幾年染上的疾病，但所有人都得到盡心的教養和良好培育，因為能照顧他們的母親那時候都還年輕。他們大部分都受過很好的初級和中級教育，讓他們能接

著進入大學學習，像是北大、清華和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後於一九九四年改制成為哈爾濱工程大學）；許多人在文革期間也曾積極參與，然而隨後即被鎮壓並下放至農村，在農村度過數年痛苦歲月。從一九七八年始，他們終能歸隊，承繼他們父母的資產，不過接著他們就在晉升的階梯上奮力攀爬。這可能也說明了為什麼這個世代沒人能登上權力的頂峰，因為他們最多只是幫下一個世代鋪路罷了……。

在這些人之中有主要領導人的孩子，其中幾位十分知名：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因為截肢而成為殘疾；王震的兒子，曾擔任中國中信集團董事長，在引資本主義為共產主義所用上有著重要作用。還有本身也是銀行家的陳元，是左右中國經濟的陳雲之子。此外也有元帥賀龍的兒子賀鵬飛、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

第三代人則是有部分人攀上了權力頂峰，或是為媒體矚目。當中有一定數量的人來自於和第二代太子黨相同的權貴家族。他們的求學過程被文化大革命中斷，而後不得不在一九七八年後重新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也因此推遲了開展個人事業的時間。實際上，那幾年的困頓使得他們能夠有時間思考其兄長們遭遇的體制弊病和滯礙，得以醞釀政治上的解決之道，而他們青春歲月的遭遇，還讓部分人有到世界其他地方遊歷的機會。

在這一代人中堪稱領袖人物的，顯然是中國現任最高領導習近平。出生於一九五三年的他，在習仲勛的子女中既非最年長，也非最突出，但卻懂得精心經營他的個人事業，並且從二○一二年取得權力後，將中國帶向一個政治的新方向。除了習近平，還有另外三個有著相當顯著稟賦的人物：薄熙來，薄一波的兒子，是這一代太子中最聰明但也最沉不

住氣的，在二○一二年與習近平競逐權力中敗下陣來；王岐山，是習近平身邊重要的角色；李克強，他父親雖只是個相對較中階的幹部，他仍然得以任職國務院總理。除了他們，這一代中也有些人後來能成功突破困境、嶄露頭角：劉源是劉少奇的兒子，任職解放軍上將，但在政治上難受控制；鄧英淘是意識形態保守分子鄧力群之子；潘岳則是相當出色的演說家。

主要家族簡介

以下是本書中各太子黨的家族簡介。

毛澤東的戰友們雖然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漸行漸遠，但卻以戰功和政治影響打造了這些家族王朝、扶植大部分的子弟。本書中也會提及他們身邊那扮演特殊要角的妻子。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家庭會有一位男孩成為這個家庭的代表，女孩們則不會承擔太重要的責任，不過其中有些男孩子的發展和表現卻不是很好。至於他們的孫輩，我們僅在這簡略地幾筆帶過。

薄一波（一九○八—二○○七）

薄一波曾為華北地區游擊武力的重要負責人，一九四九年後成為經濟方面掌權的領導人。他第一段婚姻有一個女兒，後來和胡明共育有六個孩子。胡明曾任第二輕工業部工藝美術局局長，在文革中遭毆打致死。薄一波對所有孩子的教養都相對開放，他的三位女兒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對子女中的其中兩位要求特別嚴格，他們後來也擔任過重要工作；一個是在商界的薄熙永，一個是人所熟知，在政界的薄熙來。薄熙來在獲取鉅額財富和在政治上愈來愈有影響力後，開始覬覦最高領導大位，但被習近平搶先一步，接著在二○一二年被捕，二○一三年遭判刑。

陳毅（一九○一—一九七二）

陳毅家族的名氣在他這位大家長在世時為人周知，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對他的重用，另方面則是由於他妻子張茜的出眾美貌。他家是妻管

嚴，這對夫妻對教養也十分重視。陳毅本人為元帥，又曾任外交部長，還是一位嗜酒的詩人。

夫妻倆雖早逝，他們孩子在權貴子弟圈中卻還是眾人熟知，然而沒有一個攀上高位。長子陳昊蘇在一九八○年代曾想問鼎北京市長失利；二兒子陳丹淮是唯一擔任軍職的，曾在總裝備部擔任高階軍官；老三經商小有所成；小女兒陳珊珊，曾是第一批送往西方國家學習的留學生，在外交工作上有著令人尊敬的成就。不過真正接下陳毅傳承的，卻是陳珊珊的丈夫王光亞，他在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時表現出色，更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

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

經過早期豐富的政治歷練，陳雲在一九四九年成為經濟工作大總管，更在一九七九年後躍升成為整個政權的第二號人物，更是共產主義主要教條的捍衛者。他的長壽*[01]要歸功於護士出身妻子于若木的照顧，于若木也是少數在文革期間敢反抗江青的高幹夫人之一。

他們非常注重五個孩子的教育，不過其子女後來的社會地位，卻是仰仗他們的大哥陳元而來。陳元生於一九四五年，早期在政界發展無成，之後轉入銀行界卻相當有成就：一九八八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隨後於一九九八年任中國開發銀行行長，二○一三年起名義上掌管著好幾個基金會。雖然陳雲被認為是左派的領袖，陳元卻毫不猶豫的將他兒子送往美國讀大學。

鄧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

外界對於鄧小平家族有很多看法，主要是因為他和其他親戚少有聯

繫，卻對自己一手建立的家庭花費不少心力。在家事處理上，他一貫支持妻子卓琳，而一旦出了真正的大事（例如，他半癱的兒子碰到麻煩事），他就會親自出手，甚至連他的五個孩子在事業上出了問題亦然，也因此造成許多議論。

還有一個原因是由於他最聰明的長子重度殘疾，另一個又表現平平，這使得鄧小平的女兒和她們的丈夫成為他最主要依靠。鄧琳（她主要對藝術和文學感興趣）以及對財富和政治有著特別敏銳度的鄧楠和鄧榕，原本都可能成為重要領導人，但她們卻安於一些相對還不錯的職位，在協助她們父親改造中國上扮演具關鍵影響力的角色。在過程中，她們也沒有忽略自己經營的事業。鄧小平在擇婿上也相當注意篩選。三個女婿中，有兩個成為商界重要人士，而第三個，也就是鄧榕的丈夫賀平，曾在軍方總裝備部一個油水很多的職位上任職。

賀龍（一八九六—一九六九）

在紅軍最初的領導人中，最精采的要算是賀龍。他出生於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地區，*[02]但在幹部裡，他對男女關係較為隨意，甚至記不太起究竟有過多少老婆和生下多少子女。*[03]早年參加中共游擊武力，一九五四年獲授元帥的賀龍，先後任妻子一共給他生了四個孩子。他對孩子都付出感情，還注重學業、熱愛運動，並時時保持幽默，這讓他成為紅牆內最受歡迎的父親。

可是毛澤東卻不放過他對意識形態的輕忽，於文化大革命中放任紅衛兵迫害他致死。他的子女固然相當聰穎，但也還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在一九八○年代得到中共當局的特別照顧。賀龍的三個女兒中有兩位經商，另外一位成為少見的女少將。*[04]其中他的獨子賀鵬飛，特立獨行

的性格讓他有著倔強脾氣和領導天分，進大學就讀時歷經波折，也曾成為眾所矚目的紅衛兵，而後在鄧小平和王震的大力支持下在一九九二年成為海軍副司令員，再歷任幾個皆有厚利可圖的職位，於二○○六年逝世。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

這個家族享有的是男主人在共產黨領導人中，最能給人切切實實的信任感和道德形象，但就整體而言，仍不脫權貴集團成員作為。胡耀邦的子女（三個男孩從父姓，一個女孩從母姓）*[05]人緣很好，再加上胡耀邦在每個週日都會歡迎大家到他家吃飯，更讓他們受歡迎。更加難得的是，他仍然和當年收養他次子的農民家庭保持往來。當胡耀邦在世的最後幾年受到黨內元老批評時，他的孩子都站在支持父親的一方。其中兩個兒子，胡德平和胡德華，一個在黨內，一個在黨外，至今都還是令人注目的知識分子……他的孩子都在很好的學校或是大學就讀，嫁娶的對象也都是權貴集團成員——胡耀邦的女婿還曾是海軍政委，在中國也並非泛泛之輩。在結束這塊圖譜前，還必須提一下胡耀邦的孫輩，其中有一位已在商界相當知名！*[06]

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

李先念和胡耀邦一樣，都沒什麼偏好，是一個為人信任且具道德形象的領導人。但是他的子女（一個兒子、三個女兒，其中一個女兒是第一段婚姻所出）卻利用權貴集團獲取利益，但也不是完全靠著權貴集團行事。李先念曾嚴格要求其子女在起步時都不能涉足經商，但他們卻充分利用這點；特別是其中最小的李小林，她曾往美國留學（常被老布希

請去作客），之後在「中國對外友好協會」發展；另兩個女兒則進入醫界。李先念的兒子和女兒相較之下較平庸，不過這缺憾被女婿劉亞洲填補了。劉亞洲也非一般家庭出身，曾出版過不少以重要人物為主題的文章、論文和軍事小說，並歷任許多軍中要職。

劉少奇（一八九八—一九六九）

劉少奇無疑是最具道德修養的領導人的其中一員，他的顛沛流離和拗執個性讓他在第一次農村包辦婚姻後，又經歷了五段關係：從蘇聯回國後認識的何葆貞、在黨務上共事的謝飛，以及之後的兩任妻子王前和王健，幾乎每一段都為他留下子女。一九三四年末參加長征而死於獄中的何葆貞為他生了三個孩子；王前則為他生下兩個孩子；王健因為健康問題，在一九四七年被送往療養院，但這件事至今還留下一些疑問。王健離開後，王光美才得以成為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出身非常好，生長於天津開明的資產階級，她在拒絕接受一份前往美國讀書的獎學金後，轉而投向中國共產黨。王光美陪著劉少奇走向事業發展的後半段，並在一九六九年以悲劇告終。

中文資料呈現出由劉少奇和王光美經營的家庭是個典範，實際上這個家的確運作得相當好：父親負責要求思想、品德和在校成績，母親負責行為規範和對外交往，而使他們家在紅牆內人人稱羨。劉少奇五個前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都曾惹出一些麻煩，其中年齡最長的三個是劉愛琴、劉允斌和劉允若，他們的問題多起因於曾在蘇聯生活過一段時間；排行中間的兩個，劉濤和劉允真，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犯下的事，則是因為受到生母挑唆。年紀最小的四個，平平、源源、亭亭、瀟瀟，三個女孩一個男孩，都就學接受嚴謹教育，雖然於文革期間受到不少磨難，但

由於父親的影響，都能很快的再站起來。四個最小的女子中，有兩個到西方國家留學（平平和亭亭，平平是唯一一個擔任高階公務員的，而亭亭則進入商界發展），其中唯一的一個男孩則在政界升任高位；劉源在文官體系裡發展不順後進入軍中，居然升至總後勤部政委，但讓人側目的是他持續發表一些大膽的爭議言論。

彭真（一九○二—一九九七）

彭真（原名傅懋恭）是毛澤東時代最令人注目的政治人物，又是最具權力的北京市市委書記，妻子張潔清出身於具影響力的革命知識分子家庭，他們在權貴集團中是令人嫉羨的結合。但與這對夫妻的成就相反，他們的五個孩子成就卻是平平。女兒早年離婚引發議論，後來經商；長子從事核工業買賣，另一個兒子則投資經營離岸公司。最後只有三子傅洋在事業上較有成績，他在全國律師協會和法律制定上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王震（一九○八—一九九三）

王震這號人物和他的家族較為另類。首先，他不屬於中國共產黨聰穎睿智的上等人之列。身為貧農之子，王震憑藉作戰時的英勇和戰鬥的天分為人注意，更因為在一九四九年占領新疆後大開殺戒、砲擊平民，弄得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將他調動到一些不重要的職位。由於他清楚知道毛澤東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局勢，便在文革中孤注一擲，幫助往日同僚恢復工作，讓權貴集團重新凝聚。同樣的，他也讓自己成為鄧小平施行改革的助力，特別是在經濟和財政方面。

實際上，他的家族在過程中扮演著要角。他的三個兒子，王兵、王

軍、王之，在身為中學教師的母親培養下，藉由與鄧小平子女的關係和形同王震義子的賀敬之一塊雞犬升天：他們仗恃著有豁免權，成立一些具資本主義特質但又服從政治控制的企業，走出一條新路。這些企業中包括最有名的中信集團。接下來他們很快的聚斂大量財富，也因此躲不掉醜聞纏身，引發重重議論。

溫家寶（一九四二—）的個案

這位二○○三至二○一三年在位的國務院前總理是一個獨特的案例。他的出身鮮少為人知，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位在天津的工作幹部之子，因為他曾在那受過良好教育。在政治上和財富上，溫家寶的發展都很好。在政治上，他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就一路攀升，而財富上則是其妻子在他協助下，掌握了鑽石市場交易，此外還加上了親戚們的一番作為：在銀行界（包括外資圈）、高科技領域都可以看到他的兄弟、姊妹、子女以及親家的身影。依據《紐約時報》報導，他家積累的財富超過二十億歐元，和他國務院總理的勤政形象和多次表現出對良善改革和道德發展的期許相較，讓人滿心疑惑。

葉劍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

葉劍英在中共歷史上是集特立獨行和傳統於一身的人物。他的家族在中國南方扎下根基，並和海外有所接觸。早年擔任紅軍中央參謀工作的資歷，讓他在一九四九年後得以在政治方面快速升遷。

他接著在高層工作中展露靈活手段；因為家人不在身邊，他不會有所羈絆。也由於如此，已再婚的他還曾經在廣東收容、安頓過一位在延安離棄的前妻。即使後來在一九七六年和四人幫的鬥爭中取得全面性的

勝利，他仍然謹慎小心的將子女留在具有優勢的廣東。根據資料，他大約有六個或七個孩子。較年長的葉選平和葉選寧婚姻對象都不錯，也都在北京和廣東任過一些政治上的職務，許多的姪娚也都發展得很好。

葉劍英的其他孩子也都有亮眼的事業。其中一個女兒在電影和藝文界發展，當然不免招惹一些是非。另一個女兒嫁給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八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鄒家華也是第一代太子黨，兩人是在莫斯科認識的。至於義女戴晴，則是由於葉劍英的庇護才能在針對共產黨鎮壓和對生態的破壞議題上從事抗爭活動。

曾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

這個家庭的特色因父母和長子的性格而凸顯。曾山和鄧六金都是早期參加游擊武力的戰士，也曾參與過建立江西紅色根據地的事業。這些資歷讓他們在權貴集團中有著較高的地位並受到尊重。鄧六金普遍被公認在許多由婦女擔任的職務上表現出色，相較之下只歷任過一些次要職務的曾山就被比了下去。這兩人在延安結婚時，曾山已經有兩個孩子，之後鄧六金又給他生了四個兒子、一個女兒。鄧六金在婦女工作上成效卓著，創辦了幾所名校，照顧許多人的孩子。

他們的孩子在軍中都發展得很好，而生於一九三九年的長子曾慶紅更是家裡的翹楚。他先是躲開了文革的下放，又在一九七○年代末當了優秀的領導人秘書。在上海工作則是他際遇的轉捩點，很快的因其天分被上司江澤民重用。當江澤民步上權力的頂峰時，他也跟著到了北京，協助清除不同派系的威脅，在一九九○到二○○○年間成為中國重要的政治人物。

因為父親早逝，曾慶紅取代父親一家之主的位置，除了安排探訪老

革命根據地，也負責管理兄弟姊妹和自己孩子的事。他的兒子（曾偉）還曾在澳洲投資過生意。這個眾所矚目的家族的長子，日後也搖身成為黨的主要統治者之一。

沒有子嗣的能者：周恩來

地位遠低於毛澤東但卻高於劉少奇和其他人的周恩來，在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是第二號重要人物，然而他的發展也是最難捉摸的。早期由於政治資歷，讓他在一九三○代中期還曾有過在毛澤東之上的地位，但隨後就低對方一等、受到箝制；一九四九年後，他擔任國務院總理。直到死前，他都還在這個職位上，死亡原因卻是毛澤東一直不讓他好好治療膀胱癌。在這期任職期間，治理國家一事皆由他負責，也多虧他，中國才能有較好的發展、少受些折騰。

對於擁有這種成就的人而言，在當時中國的環境裡最為人不能理解的是家庭生活的闕如，更因為他的妻子鄧穎超也相當優秀，這就更讓人不解，也因為兩人幾乎是紅牆中唯一沒有孩子的夫婦，總使人覺得遺憾。他們夫妻間的關係不是很好，因為鄧穎超聰明、好強，但周恩來卻處處限制、不讓她發展自己的事業。鄧穎超被認為在剛結婚後不久要求動手術拿掉腹中的孩子，然而根據大部分的證人和歷史研究者解釋，選擇不要孩子的原因，是夫婦倆不想在那個時候因為孩子加重同僚們的負擔——也是因為周恩來想，如此他就可以專注在工作上了。上述說法是最經常被提及的，而歷史研究者也沒有隱瞞鄧穎超在這件事上所承受的痛苦；交給她的都是些簡單的工作——一九五○年代時，她多數時間都不太和人接觸。最近一些來自於香港的資料透露了一個還算合理的解釋：周恩來從年輕時就有一些同性戀傾向，這些傾向就是兩人不和的主

要原因。*[07]

此刻要評斷這個說法或許還太早。與相關資料的欠缺相比，關於這對夫婦在如此情況下（身居高位，能抒發的對象只有彭德懷）所承受的挫折和磨難，可供評價和議論的資料卻是連篇累牘。一九三○年代時，他們收養、照顧一些過世同僚的孩子，也就是「烈士遺孤」；他們收養的孩子很多，其中包括李鵬，但當中他們最疼愛的還是孫維世——她曾以「中國最漂亮的女子」稱號而聞名，但不幸在文革期間遭江青殺害。

周恩來掌權後，曾迂迴的私下提供他出身的大家族援助，這個家族原本是江蘇的舊地主。剛開始時一切都小心翼翼，後來援助得愈來愈大方，對象包括對他的五個兄弟姊妹及眾多堂表兄弟。此外，他也曾照料過許多娚姪，其中周秉德被視若己出。

第一章
烽火幼雛（1921－1949）

在描述這段歷史之前，要清楚界定掌權的這一代太子黨，首先必須先描述更早於他們之前那批中共領導人的子女們。這批人誕生於意外、危險和孤獨，而後得益於一場不屬於他們的勝利，幾乎沒能有穩定的感情生活，通常心中也沒抱持什麼期待，他們曾在顛沛流離、飢寒交迫中求生，多數人都體會過父母經歷過的悲劇。

在感情領域，毛澤東就曾有過極不好的經驗。他和一些同志們（諸如劉少奇）不同，其他人因為早慧而受到父母的關愛、呵護，毛澤東卻有一個權威又粗暴的父親，在兒子還極年輕時就安排了一樁婚事，強迫他娶一個早就決定好了的妻子，而這個妻子在婚後三年離世，至於他的母親則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毛澤東的幾個孩子也似乎承繼走向悲劇的命運。[01]

不知是不是因為他兒時經歷埋下的遠因，毛澤東在第二次婚姻前就是一個感情不專一的革命分子，他第二次婚姻對象楊開慧是他欣賞的老師之女，但隨後她和三個孩子卻被遺棄並為國民政府警察逮捕，最後遭處決。

當毛澤東投身於革命，爾後成為游擊武力首領的同時，他孩子們的傳奇故事也就此開展。這些孩子首先要面對的是現實世界的殘酷，之後再面對毛澤東於他們存在的驚異。毛澤東到底有多少個孩子？八個、九個，或是十個？他多數孩子都未被確認，或未曾受討論。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後，有關於他曾於一九三五年託付給農民照顧的兒子「毛毛」的傳聞甚囂塵上，於是有支隊伍被派出尋找相關線索，但就在其中一輛

車摔進山溝後，尋找工作戛然而止。一九五三年有個小孩被認為是毛毛，但隨後卻又有其他人宣稱自己是毛澤東的孩子。相關傳聞至今還在流傳：二○○三年時，曾有一位六十八歲的雲南農婦據稱是毛澤東和他當時的伴侶賀子珍所生，但卻在長征途中被遺棄的女兒。[02]

在諸多毛澤東的孩子中，只有少數是被確認身分的，像是和楊開慧所生的三個最年長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毛岸龍後來在上海街頭失蹤），還有賀子珍所生的女兒李敏。他們經歷過監獄的嚴酷、寄養家庭的苛待和漫無所終的流浪。[03]一九三五或一九三六年，毛岸英和毛岸青被中共黨機關尋獲時，時局對黨或是身為領導的毛澤東而言都不太好，兩人便經由法國送往蘇聯，雖然身家就此安全，但卻無法享有家庭親情。[04]

毛岸英，第一位太子

抵達莫斯科後，毛岸英和毛岸青兩兄弟的境遇完全不同。弟弟毛岸青被史達林的心理學專家判定無論是生理、心理或是對藝術的品味都不佳。相反的，被蘇聯當局取名為謝爾蓋（Serguei）的毛岸英在包括智識上等各方面，都盡力表現得像未來領導者。蘇聯那方清楚地識別著他的出身；他曾在一九三七或是一九三八年在知名的莫尼諾（Monerot）國際學院被選為「外國兒童協會」主席，該學院是史達林用來接待國際共產組織領導人子女的學校。他在莫斯科期間取得蘇聯國籍，曾毫無所懼的寫信給史達林，並因為聽說要減少中國學生的「本國」課程而帶頭向他抗議。[05]隨後毛岸英在一九四三年加入蘇聯共產黨，任軍官，進入坦克部隊（但沒有太過張揚）參與對抗納粹入侵的防衛戰爭。[06]

毛岸英持續的傑出表現，像個名副其實的「第一太子」，也切合中國傳統中一位新帝王應該要有一位傑出嫡子的觀念。[07]毛澤東剛開始時並未對於這些流亡在外的孩子們表現出太大興趣，只寫了幾封正式的信函給他們而已。然而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僚向他報告毛岸英的人品和他為眾人喜愛的情況後，他才相信他的長子在政治上確實有些天分，隨後便將毛岸英召至延安，但對毛岸青仍是不聞不問。

我們不知道毛澤東是不是在那時突然明白他可以，或是應該為自己立一個繼承人，但他確實幫毛岸英打造了一套相當不錯的培植計畫。從他於一九四六年抵達延安開始，毛澤東讓毛岸英跟著他最欣賞的秘書陳伯達，並因此認識一批和陳伯達共同工作的年輕知識分子；隨後送他到農村工作，接受農村勞動模範吳滿有的指導。毛澤東曾對這位大兒子表示：「你在蘇聯大學讀書，是洋學堂，但你還沒有進過中國的農業大

學……不了解農業，我們就無法取得中國革命的成功。」[08]接著，毛澤東將兒子託付給康生，康生既是他忠心的追隨者，也曾協助他在延安推動整風運動。[09]毛岸英相當欣賞康生的知識和才華，很快的和與他共事者結交，然而他卻對康生整黨的做法有所批評；毛岸英認為康生的做法不利於即將成為大國執政黨的中共，因此與他逐漸疏遠。[10]

於此同時，毛岸英也因為一件事，成功打入漸漸成形的權貴集團，成為黨內菁英階層的一員。他看出和權貴集團中的成員聯姻是個規則，也是他必須完成的義務。毛岸英順從接受父親頗為自得的安排，和他也一見鍾情的劉思齊成婚。在這次聯姻中，毛澤東看到的不止是作為家族血源延續的婚姻，也是將毛岸英視為權力的接班人。隨著婚禮的籌辦，毛岸英認識更多父親的同僚，他更加毫不懷疑的接受安排。婚禮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舉行，因為組織階層的考量，毛澤東邀請了黨內幾位主要的同仁，其中包括可能成為他競爭對手者，像是劉少奇、朱德和周恩來，[11]除此之外，出席的都是和他有交情或是受賞識之人。此後，毛澤東更加速對岸英的培植，將他託付給當時自己最信任的秘書田家英；毛岸英與田家英畢竟都是年輕人，兩人很快就打成一片。隨後，毛澤東更有計畫地將他送到兩個中央委員會中主要的部門，中宣部和中央情報委員會學習，並送他到北京機器總廠工作。[12]

繼承人之死

根據一些主要資料所述，毛岸英是個承擔起身為毛澤東長子責任而毫無所懼的人，對於他每週末都要探視的父親是如此，對他從蘇聯回國但卻經歷坎坷的弟弟更是如此。比方說，他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因為要赴莫斯科執行公務而必須離開北京時，還商請他的岳母照顧他的弟弟毛岸青，因為「爸爸太忙，而江青媽媽連爸爸都照顧不了」。[13]

讓毛岸英喪命的禍端起自朝鮮半島，當時正值一九五○年韓戰爆發之際。毛澤東確定要將毛岸英送往韓國戰場，因為身為接班人，他必須藉此證明他的資格。當時所有人一面倒地不贊成這決定，尤其是總理劉少奇，更是帶頭反對。但對毛澤東這樣生性猜疑的人來說，這些反對意見不可能改變他的決定，因為在他看來，這些人都只是要阻止他讓兒子證明自己具有戰士資格的機會而已。只有一種方式在政治上可以平息這些反對聲浪，那就是安排他兒子直接效力於個性剛烈的部隊司令員彭德懷麾下，而彭德懷也在毛澤東好說歹說後，終於接受這項調動。[14]

約在戰爭爆發後一個月左右，悲劇發生了。蘇聯警示美軍即將發動新一輪攻勢，彭德懷卻未加重視，拒絕轉移指揮所，結果就在一九五○年的十一月，當毛岸英離開掩體去找吃食時，遇上了沒人預料到的美軍最後一輪轟炸，當場死亡。周恩來直到悲劇發生的隔年一月，才敢將這件事告訴毛澤東。事件過後，毛澤東將情緒深埋，只於一次正式場合中，略顯蹣跚地以顫抖的聲音表示：「他是體現國際主義的烈士。」[15]

毛岸英的忌日成為毛澤東生平中的重要銘印，但對於身世坎坷的另一個兒子毛岸青，他卻依舊未加聞問。毛岸青飽受精神疾病折磨，曾多

次讓人難堪地叫囂喧鬧。某一天，他甚至攔下父親的護衛，向他們高聲表示：「你們都說毛澤東偉大，我是他兒子，那我也很偉大不是嗎？」在與毛岸英遺孀的妹妹邵華結婚之前，毛岸青往返於中國和蘇聯的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16]

長子死亡後，毛澤東一直無法擺脫權位岌岌可危的不安全感，而且不再信任任何人。他的繼承人離世也讓糾結的接班問題浮現，並將這個問題轉到其他領導人子嗣的身上，但這些領導人卻也是毛澤東在中國政治上潛在的對手。部分領導人的後代，包括現任掌權者習近平在內，緊接著開始盤算如何拿下毛岸英拋下的權力大纛。

悲劇的一代

毛澤東的前幾個子女雖然有過苦難的經歷，不過之後的境遇逐漸有所改善。相對於他們，毛澤東其他革命夥伴們的子女，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勝利前一直都要面對各種可能的遭遇，其中包括生活中最不堪的情況。這也造成這批取得政治權力世代的共同特點：他們多數人之前都曾被迫擔心自己的子女可能會遭遇惡劣情況，而且還可能不斷反覆發生；其中除了少數人因具備一些醫學知識，或是認識一些醫生朋友而可以獲得少量的醫療照護外，大部分人的子女在出生後都會不可預期的夭折。

這些革命分子事實上很少人結婚，一方面是信念使然（婚姻在共產黨觀念中大部分被認為是反動的），另方面也因為不得已（他們被一個不認為家庭是必要的政黨不停調動而安定不下來，尤其是職位在政治局以下層級的人）。但他們並沒有因此放棄性或是愛情，只是剛好從一些世俗觀念中解脫出來而已。這也是為什麼有些夫妻的分分合合已是常態；一些領導人對異性的喜好改變得很快。有些中國歷史研究者也承認這點，像是後來成為元帥的賀龍，就很難算清他到底有幾個「老婆」。[17]

這些領導人要如何才能保護他們的子女？這個難題可以解釋為什麼周恩來和他的妻子鄧穎超，會做出不要子嗣這個造成周恩來一輩子遺憾的決定。其他人也為孩子們將會遭逢的命運而憂心忡忡，甚至於得面對不得不以殘酷的方法處理孩子時那種摧心裂腑的痛苦；比方說，後來成為陶鑄（之後擔任廣東省主政者）妻子，也是活躍於中國南方省份的著名女戰士的曾志，她就曾經在一九三○年代為籌集中國共產黨活動經費而賣掉她的頭兩個孩子。[18]

即便和孩子分離不是那麼悲傷，有時也還可以依靠家族和組織在地方單位的協助，他們偶爾還是得忍下心中的痛苦，放棄孩子或交託給他人。而當敵人威脅要抓捕他們的孩子以勒索金錢或是換取供述出其父母的工作，甚至直接要脅孩子們的性命時，就更讓他們惶惶不安。共產黨人十分了解情況，一旦發生狀況就會立即採取斷然措施。例如，為懲戒被國民黨情報單位「策反」的高級幹部顧順章，也為了對那些可能想跟他一樣的反叛者殺一儆百，周恩來在一九三一年毫不猶豫滿門殺害其家人，[19]連小孩也不放過。*[01]

在由男性主導的社會中，只要是女人，即便身為戰士，都必須求助於一些不太有用的藥方避孕。一旦懷孕，她們就會尋求各種方法保住孩子，並設法靠著她們男人在黨內的地位，來取得黨還在初步發展時的照顧措施，像是派個照護人員或護衛人員之類，有時候甚至有可能是粗略的托育安排，但在最初那幾年，這類設施仍然少見。一直要到一九三○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才開始在延安，以及後來在一些解放區設立一些托兒所、育兒園，甚至是中學等。這些設施只有一些知名人士的家屬才能使用或就讀，比方說一些「烈士」的遺孤或是重要領導人的子女，如後來曾任總理的李鵬，就因為父親是李維漢，所以有入校的資格。

除了託付給黨，黨員最常見的方式是將小孩託付給較親近的親屬。像是父母、祖母、姊妹、姨嬸等，同一個家庭的當然值得信任。[20]但在戰時要維持聯繫不太容易，因此當劉少奇的父親被殺後，*[02]他的三個子女就流離失散，大兒子成了工人，次子當學徒，排行第三的小女兒則成為童養媳。[21]其中一些孩子們確實因此而受到照顧和保護；像是陳賡大將的長子是由其祖父撫養的，而毛澤東初發展時的親密戰友曾山鄧六金的長子（曾慶紅），則曾有過一段藏在江西的山區裡的歲月。[22]

在這樣的託付關係中，親屬關係常被認為較親近、較可靠，不過也有些人認為將小孩託付給同事、朋友或鄰居較讓人放心，因為這些交託不論是要致謝或是責難，都在可及範圍內，而且往往很有用。例如陶鑄，他就將女兒託付給一個長征的老戰友，而這位受託的戰友在往後幾個月的長征途中，就將他女兒背在背上帶著走。[23]另外有些父母在這種情況下斷了和子女的聯繫；後來擔任中宣部部長的陸定一就是這樣，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才找回流落在外的子女。[24]

此外也有好些孩童不幸受虐待的例子。寄養家庭苛待受託付的孩子，賣掉他們或是讓他們去打工的例子屢見不鮮：男孩子被嫌不夠強壯，女孩子則先是被當成女傭，之後再被賣到農村當「小媳婦」。[25]在這些令人心碎又牽扯不清的境遇裡，很少有讓人欣喜的發展，甚至有些孩子在一九四九年後拒絕承認親生父母，也不願意回到他們身邊。一些生身父母（如胡耀邦）*[03]願意和照顧他們孩子的人共同分享對孩子們的愛，像是讓孩子認他們作父母或是讓孩子與他們保持聯繫。

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共產黨的領導人們也會動用全黨力量協助。如果不是這樣，後來擔任元帥的聶榮臻，又怎能只憑一張極舊的照片，[26]就能高興的宣稱被帶到他跟前的那個女孩是他的女兒呢？*[04]再看鄧小平，只有當他把司令部重新安置好後，才能將他原先託付給中國北部太行山區農民的三個子女[27]帶回團聚。*[05]然而，即便父母後來掌權，仍有少部分孩子不知所終，像是楊成武的兩個孩子，肯定不是被賣掉，就是病死了。[28]

崎嶇重聚路

在黨內高層中是由周恩來主持尋找領導人子女的任務，而這也讓他得以藉由這項工作贏得眾望，令其得以有在各派系中折衝、協調的影響力。經過多年的分離，重新找到這些人子女困難度極高，而且往往結果不如人意，進展也很慢，像是任弼時夫婦，他們在一九三一年出生的女兒，*[06]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回到他們的身邊。[29]被找回來的孩子們，不論是生活照顧或是情感依歸當然就此安定無虞，但多年的分離和折磨能彌補得了嗎？在許多領導人家中，這是一個難以癒合的傷口，時不時仍會流膿淌血，一直要等到文化大革命時才有機會將這些帳一次結清。

我們可以從劉少奇的例子，窺知大部分領導人第一次婚姻所出子女會遭遇的問題。劉少奇兒女們在他是一位重要領導人條件下，應該已經受到相當不錯的待遇，卻仍然面臨社會化障礙，更何況他們的父親還有過多次的婚姻。這些孩子很難再融入他們出身的環境，當中有許多人被送往莫斯科；像是劉少奇出生於一九二七年的長子劉允斌、出生於一九二八年的女兒劉愛琴，以及出生於一九三○年但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在上海街頭尋到的毛毛（劉允若），後來都被送到莫斯科。[30]

這些孩子們不佳的身體狀況，似乎表達著無言的抗議。他們多數人長時間缺乏營養，健康亮紅燈。這情況可由有些家族成員的身材高大，這些孩子卻身形瘦小看出。此外，最後被找到的孩子總是會受到特別矚目，也因此會引發其他兄弟姊妹的嫉妒。比方說在鄧小平家裡，長女鄧林出生不過一週就被送給農民撫養，但當時糧食缺乏，她因此被接回後就受到了特別照顧。[31]往後幾年，在專門為領導人子女設立的學校就讀時，每有醫生訪視，這些發展較慢的孩子也往往比其他人受到更多關

心。不只在健康方面，有些孩子的學業表現也差人一截，這更讓部分父母擔心。[32]

這些在領導人們未預期情況下出生的第一代孩子堅強度過困阨。當我們審視這些故事時，不得不為他們面對磨難的卓絕勇氣頓筆側目。當中許多人受到寄養家庭剝奪吃食或是羞辱仍忍氣吞聲，有的人則因為共產黨的先遣隊不認得他們而流落街頭，直到回到自己父母身邊後，他們才能在新「媽媽」為他們安頓好的地方，和其他兄弟姊妹共同生活而稍感欣慰。

也應屬於孩子們的勝利

隨著解放區的擴大，給予養父母們的津貼開始變得充裕。當一個孩子在最大的幾個紅色根據地中受照料時，不論是食物、衣服，甚至就學和醫療待遇都完全不一樣了，他們被認為是黨未來的希望。從一九三○年代末開始，不論是在農村根據地或是仍在戰鬥中的部隊總部，只要情勢穩定，就會採取一些措施協助安頓領導幹部的家人和孩子，甚至還可以提供奶媽以滿足需求。[33]在延安，新的氣象逐漸蓬勃，那兒為孩子們保留了一方以後難以企求的淨土。

為此，黨高層領導開始將尋找「烈士和領導人子女」一事當成官方的宣揚內容，周恩來在這件事情上尤其表現突出。[34]那時的周恩來自一九三八年毛澤東逐漸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後，政治地位岌岌可危。他憑藉著以往在黨內、解放區和蘇聯培養的各方面關係，使尋找黨員子女的工作成效卓著。由於周恩來在尋找黨內幹部走失子女一事上的投入，使得他認了上百個孩子作為養子女的傳言甚囂塵上。實際上，雖然在他妻子的協助下，周恩來的確曾關照過十幾個孩子，但一直持續密切照顧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眾所周知的有後來成為知名女演員的孫維世，以及父親不幸於一九三八年遭殺害、曾為共產黨員（李碩勛），後來成為總理的李鵬。李鵬後來在一九四八年被送往蘇聯，回國後在幾個大工廠工作過。[35]

在一些根據地，大家的目光都放在孩子們的身上，甚至有些士兵還會以領導人如何教育他們的子女為依據來評論這些領導人。[36]有些托兒所或育兒園設置在像是與山東等較大的解放區內，一些主要的部隊中也有，這些設施也成了社交生活的主要集散處。[37]

延安的中央托兒所成立於一九四○年，初期只有六個窯洞，到一九四二年，已經發展為二十多個，這些窯洞都是在山谷的石灰岩山壁挖鑿出來的。該托兒所照顧的孩子有鄧小平、劉伯承、任弼時及其他重要領導人的子女。由於中央托兒所辦得很好，後來由成為元帥朱德的妻子康克清負責，在一九四五年成立第二保育院。[38]同樣在一九四一年，曾山他那位活動力甚強，同時也曾經是游擊戰場上女戰士的妻子鄧六金，在華東地區成立了保育園，收容上百位解放區知名黨政軍幹部的子女，例如陳毅、粟裕、譚震林等這些流傳許多故事（縱情飲宴、明爭暗鬥，當然還有干雲豪氣）的獨特人物之子。[39]一些學校也陸續開辦，這些學校接收的學生通常都來自在黨或軍隊中任職幹部的家庭。[40]

另外，當時的氛圍傾向讓學校為黨內領導人的子女預留更多名額，這些領導人家庭生養眾多，而且以此沾沾自喜，[41]一群又一群白胖寶寶開始出現在共產黨用來宣傳的漫畫和海報中。在延安，孩子們在主要幹部居住區域的街上活動，不但可以看到劉少奇的孩子和其他同志的孩子玩在一塊，也可以看到黨內知識分子胡喬木的女兒忙不迭的跑到毛澤東的跟前向他敬禮，這些孩子的未來安排很清楚，就以整風運動時，特務機關中第二號人物李克農的長女李寧為例。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三年整風運動發生時，李寧是當時那一代孩子中最年長的，她被安排參與協助審訊工作時，[42]沒有人反對。*[07]

莫斯科的庇護和培養

中共領導層決定要培養年輕人——他們自己的子女——一事，可由將人員送往莫斯科管道的建立獲得佐證。一九三○年代末，通過新疆前往蘇聯的管道就已逐步建立。而一九三八年時，一些飛機可以在延安的機場起降，這個決定也更便利事情進行。[43]一些領導人、機要秘書、烈士的兒子，不論年紀多大，從一九三八年開始便慢慢開始往蘇聯去，並和已經在那裡的其他小孩會合，這其中當然包括毛澤東的孩子。

這件事被當成極為重要的事情處理，因為這不只是庇護和培養革命的後代，也是為了這些黨內菁英的未來。這些前往蘇聯的名單由毛澤東親自核定，第一批遠行的人當中就有他女兒李敏、他的秘書陳伯達和那時剛開始獲得他信任的高崗[44]等人的兒子。隨後送出的幾批人裡面，女孩子的人數開始增加。[45]

約四十多個中國籍的年輕孩子中，有相當高層領導人的小孩（所謂相當高層的領導人，指的是除了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博古、任弼時、李富春、林彪之外的其他人），也有在前幾年鎮壓時遇害烈士的子女。當他們到達莫斯科後，就和一些位在東北相對自主共黨機關送來的人會合。[46]蘇聯共黨設立了兩個機構專門收容各國共黨領導人送來的孩子們，所有的孩子都會被送往這兩個機構：一個是一九三八年在莫尼諾（Monnerot）設立的國際兒童院，另一個是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在伊萬諾沃（Ivanovo）市郊設立的國際兒童院。[47]

那時的蘇聯還處於二戰期間，雖然多數孩子經歷了相當艱苦的生活，也有些人未能存活，但大部分都生存下來了，不但身體狀況不錯，有的甚至加入了蘇聯軍隊。說到生活困難，不得不提到一些更悲慘的遭

遇；像是朱德的女兒朱敏，戰爭期間她被關在烏克蘭的德軍集中營內，後來自行徒步逃回莫斯科。[48]又比如戰後大規模實施食品和物資管制，後來成為元帥的羅榮桓一九四六年到莫斯科接受治療時，曾努力省下一些金子給那些餓壞了的年輕後輩們。[49]

在學業上，雖然有些孩子並未能在蘇聯教育制度下學得很好，也因為受到限制無法深入先進的科技領域學習，但當中國共產黨對取得權力已成功在望時，他們大部分的學習經驗仍被認為是有用的。中共高層菁英和他們的子女們明白，中國一定會建設它的工業基礎。完成國際兒童學院的教育後，許多領導人的子女繼續投入工業領域學習，例如鋼鐵學院。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就是如此，另外還有蔡和森的兒子蔡博，他後來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重要成果之一的鞍山鋼鐵廠擔任副廠長。[50]

當許多原先蘇聯收容的領導人子女返國，或是正準備回國之際，一批新人在一九四八年又被送來。中共中央東北局的領導高崗和林彪，同莫斯科簽下另一筆約定，同意選送一批人專門進入大學學習，同時也為往後雙方的合作項目作準備。這批人之中，就包括李鵬和鄒家華。[51]

在蘇聯留學的這批中國菁英見聞了不少事情：從許多新穎科技中了解中國與蘇聯間科技能力的差距、對西方文化的初步理解、什麼是「布爾什維克」組織，還有看到一個不讓任何人遭漠視的國家和文化。當然，在過程中中國學生也會批評蘇聯科技中存在的權威主義和不足處，尤其是在他們的學習逐漸有進步，了解更多之後。有許多人利用他們在這段實習歲月學到不少，像是農民英雄彭湃的兒子彭士祿，後來成為為中國催生出原子彈功臣之一，另一個例子則是從蘇聯那學到了如何製造汽車。[52]

有些人甚至用蘇聯共產黨黨員身分生活了一段相當時日，並在戰時

加入蘇聯軍隊到前線作戰，甚至參與蘇聯情報工作：他們明白這才是蘇聯的優勢所在。[53]蘇聯擁有的優勢還不止這些。一些年輕女孩子還仰慕這國家的藝術和文學，孫維世就是其中之一；男孩子則欣賞俄國人的勇武，許多人仿效俄國人豪邁的氣魄，也喜歡上伏特加的味道，以及在那認識的朋友們聚會時的氣氛。在一九五○年後半，這些曾經留蘇的學生們仍然會定期聚會，喝他們喜歡的酒，一起觀賞電影。[54]另外有些人則不想離開他的第二個祖國；劉少奇就曾經在一九四九年經過莫斯科時，極力勸服蔡博回中國，後來蔡博抵達北京時，還曾一度怕得不敢下火車。[55]

在中蘇關係開展初期的這些歷史，讓前往蘇聯學習的受益者身分，在他們往後個人事業發展上成為推動的助力。這同時使得在一九五○年代兩國的合作相當密切，也讓這些太子黨成員如魚得水。後來成為鄧小平繼承者的江澤民，原是一位游擊英雄（江上青）的姪子，後來過繼給他的遺孀（吳月卿），他就曾經於一九五○年中期，在蘇聯經歷過一段長時間的工廠實習。他的仕途發展就像其他選送留蘇的人一樣，因為這段經歷而開始扶搖直上。這當然不意外，因為在那個時候，擔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帥孟奇對這些領導人的子女們特別關照，加上東北和其他地區的工業發展需求正殷，也提供他們許多重要機會和快速晉升的可能。[56]然而即便雙方合作的成功，也阻止不了從一九五九年起中國領導人開始在雙方關係上退卻的作為：雙方關係交惡，也帶動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57]

延安的女權革命

事實上從一九三○年末開始，第一批太子們就受到相當不錯的待遇，他們的父親們也對他有所幫助。在許多原本自由結合的關係朝不保夕後，導致另一個重要後果開始浮現：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九年間，中共黨內出現許多再婚現象。當時，「組織」還對一些同志們尋找替代伴侶而形成的結合，語帶模糊的睜隻眼閉隻眼，雖然中共重要領導人們可能能夠和孤寂共處，但是「中央」還是給他們分配了臨時夫人。[58]不管如何，即便在他們這樣的階級，由於慘烈的戰鬥、不斷的轉移和偏向陽剛的環境，男女伴侶關係很難長久維持：舉例而言，一般所知獲選加入長征隊伍[59]的大約僅有三十位女性。*[08]在這些領導人一生中相繼發生的政治鬥爭裡，這些女性即便遠離權力，也難逃被整肅的命運。以位列元帥具重要軍職的徐向前曾有過的四任「配偶」為例：一九二二年他曾按傳統婚約娶了一名鄉村姑娘；一九二九年與一位紅軍女戰士結婚，但她卻遭到所屬的游擊武力領導殺害；*[09]一九四○年他又娶了一位女戰士，但後來兩人離異；一九四六年，他再娶中共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女性後，終於安定下來，而這任妻子的前夫*[10]也是在一場內部鬥爭中遭遇不測。[60]

對於不是那麼重要的領導人，維持一段婚姻或是感情就更加困難，但總要找到一些解決的方法。一位日後成為官員的幹部，就曾經因此先後失去三任妻子：一個是在一九二○年依傳統婚約娶進門的妻子；接著是一位女戰士，後來這位女戰士因為另一段感情導致兩人離異；第三任妻子在婚後第三天就遭難。當他和第二任妻子再度相見後，兩人又再次結婚，然而由於這位第二任妻子*[11]曾被敵人俘虜又釋放乙事被黨質

疑，為了不妨害丈夫的前途，她選擇了與其離婚。[61]

最後總結來看，這些中共幹部們彼此的婚姻經歷竟然都相當類似。不論是毛澤東或是其他人，剛開始的第一段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安排的：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之前出生的領導人中，這似乎是常見的情況——常見到幾乎人人如此——而他們第一段婚姻的結局都不好。[62]他們因「革命」結合的伴侶們，在鎮壓中犧牲的例子比比皆是：像是在法國和蔡和森結婚的向警予，一九二八年被國民黨處決，還有大家都知道的毛澤東第二任妻子也是。[63]在不同的紅色根據地，或是之後中國的建政初期，由於配偶過於單純或曾經有過反革命的社會背景，許多夫妻的婚姻岌岌可危，甚至因此勞燕分飛。[64]中共菁英圈中的婚姻大都飽受威脅，在早期除了一些極少見的例外或一些枝節外，像是周恩來和鄧穎超，李富春和蔡暢也是這些例外之一，其他人則大體命運雷同。許多在早年快速結合的夫妻們都經歷過分離和考驗，而在那個時代，許多主要領導人並不掩飾他們想更換女伴的念頭。

一九三○年代末，有一批特殊人員被秘密送往莫斯科，她們是毛澤東、博古、李維漢、賀龍的妻子，原因是男人們都有了新歡，她們成了被送走的棄婦。這些可憐的女人在蘇聯流亡的日子，要蒙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困頓。她們在中國曾經是「領導人夫人」，現在卻要忍受俄國人的輕蔑，被安置在遠離莫斯科之處，其中幾位後來亦不知所終。這段傳聞可說是人盡皆知。[65]

於此同時，一個挑選新婚姻對象的機會突然間對中共領導人開放了。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的爆發，引發一陣對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民族陣線有利的風潮，吸引一批批年輕人——當然也包括年輕女孩——投向延安。這些中共領導人們不是聖人，他們馬上看到了這批新血所意味著

的好處——這些女孩們約莫剛滿二十，漂亮、有知識、滿懷熱情。這批中國優秀女青年抵達延安後，為解放區帶來清新的氣氛。女生們有的剛從學院畢業，有的還是大學生，氣質優雅，代表著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其中有些人在專業項目上表現優秀，像是在演說比賽中表現突出，有的則在運動項目中獲得過優勝。特別是在延安，從一九三八年起，一批漂亮女孩子燎起領導幹部們心頭蠢動的那把火，毛澤東當然也注意到了。[66]在長征途中，一直在毛澤東身邊的妻子賀子珍，在看到這些情形時自然毫不放過機會地吵鬧，卻讓丈夫決定將她驅離，而她離開幾個月後，毛澤東墜入江青的情網，她是一位在上海時以生活放蕩聞名的女演員。

當初來乍到的女青年看到當地的實際生活條件並受到相當的衝擊時，身為領導幹部的毛澤東和同僚，正掌握著相對好的生活資源。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看上了卓琳。卓琳曾被選為全國運動會的選手，後來進入知名中學，更是雲南第一個被北京大學錄取的女學生，其父則是宣威火腿大王。一九三六年她被北京大學錄取，隔年就前往延安了。她天生的文采讓她進入公安部工作，並完成數篇報告。[67]一旦生活在這個圍城，卓琳馬上發現在這裡漂亮女生們被當成了獵物般追逐，而她的同僚們也說，她遲早逃不過結婚這件事。依照她同事的說法，在結婚前要先和對方好好談談，確認追求她的人擁有理想和抱負，最起碼要能尊重她，盡量避免馬上就生小孩。當然，仍需要忍受許多難以承受之事，[68]但當一個年輕女性希望以參加革命報效國家時，她還能怎麼做？她還有其他可能的選擇嗎？

雖然卓琳和大多數女性同僚也都努力協商爭取，但能獲得平等待遇婚姻的仍是極少數。只有嫁給毛澤東年輕秘書田家英的董邊，是唯一和

丈夫約法三章獲得平等「夫妻公約」的人，她在其中第二條要求的就是「兩個人的事，由女方作主」。[69]在一般情況下，女性會遭受追求者同僚、支持者勸服的壓力。高崗在追求一位他所愛慕的年輕漂亮女青年時，就有包括毛澤東在內將近六個領導人去幫他說項，要求對方妥協接受。[70]其他許多追求者先是低調退讓，好讓女方能在她朋友面前保住面子，一旦結婚便馬上恢復強勢作風。這當中有個例子，該位黨員婚後家就像是旅館一樣，某一次晚歸，他還能大言不慚地說：「我是個性不好，但要沒這個性，我們怎麼能堅持抗日？」[71]

這些女青年們總歸還是要向現實妥協，而最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孩子。她們從原本一開始不願意到最後認命地懷上孩子，而除了醫生或護理人員的親人對這種問題有辦法「自行處理」之外，她們能有什麼辦法？[72]在那個缺乏育幼資源的年代，她們被迫放棄追求自由和投身反抗侵略者的理想，成為只能專門為她們丈夫處理家事的人。

有些人可能因此覺得被騙或失望。但到最後，當勝利逐步在望，大部分黨員的妻子也都漸漸適應她們的新身分，以及其丈夫們權威式的個性，她們多數後來也成為了擁有一大群孩子圍繞的家庭婦女。

這些女青年曾被認為擁有熱情和能力；曾經意識到生命剛剛起步，她們可以在不同歲月的沉澱下創造一番事業。其中一些人後來還是闖出一些名氣，例如：聰明但脆弱的胡明，她為薄一波留下相當優秀的子女。薄一波後來則成為黨內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優雅的張茜，讓元帥陳毅對她一見傾心；于若木，陳雲的痼疾後來在她的堅持看護下痊癒；王光美，劉少奇遲來卻無可挑剔的妻子；葉群，林彪野心勃勃的另一半；浦安修，向來不聽從她先生元帥彭德懷的話的女戰士；當然還有江青，為了確保她權力繼承的機會，她沒給毛澤東生下兒子，之後的發展也幾

乎要遂了她所願。

這些亮麗且有企圖心的女性到延安後有時也會製造一些傷害。一些孩子們就對於這些新來的女生搶去其親生母親的地位相當反感。[73]更常見的是，一些新妻子們不一定有著能容納繼子女的寬廣胸襟，例如江青，她就始終厭惡跟在毛澤東身邊的其他孩子，而林彪的妻子葉群，則是用盡一切方法陷害她的繼女。同樣的，新妻子們對親生孩子的關心總是多於繼子女，尤其是婚後剛開始的那幾年，生活不再像以前那麼自在的時候。這些下堂妻所生的子女，比起在一九五○年代才出生的下一批孩子們，不僅體格上沒那麼好，教育程度也差，運氣更糟。他們之中不少有嚴重的心理問題，一些成為孤兒的人則更糟，而由領導人新妻子生下的孩子卻相反，體格強壯、身心健全，尤其在中共取得政權後，他們受到的培養更是完善。這些因素成為了他們各自隨後發展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

李敏和李訥

中共政治菁英圈中為人注目的還有他們努力想要維持的表象，在這當中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家庭狀況，像是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就是大家關注的對象。這兩個人的命運也對照出在一九三○年代「婚姻革命」之前和之後世代的不同，雖然這個變化並非陡然巨變，但也是能從中逐步見到改變的軌跡。

這兩位女子出生的日子相差四年（李敏生於一九三六年，李訥生於一九四○年），所在的家庭有著一個極強的威權印記，這個威權來自於一個如同君王般的家長，但他卻又很少出現；她們對於自我表現有著極大困難，兩個人給人的印象都是體弱多病。年少時，她們並未攝取充足的營養，之後又經過幾段消沉的時光，在情感更無所依恃。毛澤東雖然大權在握，但在家庭關係中似乎是缺席的，也不敢在她們面對極糟的母女關係時給予幫助。李敏在莫斯科生活時，母親賀子珍精神上受的折磨感染了她；李訥的母親江青對她的照顧逐日遞減，但壓迫卻是與日俱增，這樣的關係一直持續到江青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捕為止。[74]

這兩姊妹在個性上和命運上的不同，也許有部分來自於她們各自母親的天地之差——一個從一九三八年抵達莫斯科開始，精神上就已經如同槁木死灰；另一個在丈夫愈來愈疏離她時變得愈來愈好鬥。此外，她們也一同親眼見證母親受精神折磨。

李敏於一九五○年自蘇聯返國時，甚至連自己的母語都不太熟悉，在遠離母親又看不到父親情況下，生活對她而言即便在精神上都是苦不堪言；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她才主動對陳伯達的兒子提出分手，而陳伯達的兒子隨後便自殺身亡。[75]一般人對她的描述是「坦誠且教養很好的

女孩子，但不是特別聰明」。[76]在家中，江青從未停止對她的羞辱，而另一方面，她的生母愈來愈孤僻，精神狀況也愈來愈不佳，常抱怨李敏的疏遠。[77]

李敏藉由婚姻而離開令她難堪的家庭狀況。她一九五九年時嫁給一位身心健全且出身自軍人家庭的年輕人，選擇了一份相對單純的工作，並在一個次要且不會有太多問題的行政職位上任職：她以這種方式融入社會。江青在一九六三年逼她離開家裡，也讓她從此能專注於她的工作、丈夫和兩個孩子，但也讓她不得不按捺住對父親身體狀況每下愈況的擔心。[78]近來傳出李敏對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緒逐步褪色有所抱怨的說法，而這些說法讓人想到，其實她並沒能從曾經歷過的種種事件中理解多少，但這些傳言也彰顯了，最終她在父親傳奇的人生情節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李訥在出生之初就被大家看好會擁有亮麗的未來。雖然也曾經歷過一些動盪（像是一九四六年為躲避國民黨圍剿，毛澤東下令暫時撤離延安），她仍比姊姊享有更好的照顧並攝取更充足的營養。就算對姊姊的到來有些嫉妒，她還是能愉悅地生活在為領導人保留的特殊待遇中，並順利完成學業；在一九五八年她曾接受兩次痛苦的手術，後來又因饑荒而休學一年，儘管如此，她依然在一九六五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知名的北京大學歷史系。[79]

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足以撼動改變她的命運，使她的人生趨向破滅呢？事情看來似乎發生在這段混亂時日之前，當時這個原本個性靦腆、繼承父志的女兒，開始爭取各種發言、發達和讓眾人注目的機會，或許也是藉機會看看自己的父母會支持自己到什麼地步，也想惦量看看自己的資質吧。結果，父母空洞的支持和自己

的羸弱辜負了她。紅衛兵印發的資料中，顯示李訥被文化大革命激起熱情，隨後在母親的安排下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或許有也或許沒有）在林彪支持下，她進入《解放軍報》成為造反派領導成員。就這樣，到了一九六八年一月，她成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負責人，曾經放言：「誰不聽話，我就把誰送到監獄去，秦城（關押政治犯的地方）的大門是敞開著的！」[80]感覺上她似乎想藉文革，在她父親的政治接班上有所表現。直到一九六九年春天之前，李訥在她的兩個主要機構的激進派中維持著相當的影響力，也積極的一再拋出煽動性言論。

只是，後來她在政治上的投入不知為什麼戛然而止，原因想當然和毛澤東與江青兩人間矛盾的意見有關；兩夫妻一個太放手，一個卻又太直接干涉得讓人受不了。李訥決定，也或許是不得不然，前往中共幹部訓練場所「五七幹校」，在那裡她認識了一個低階小幹部，後來一九七○年在父親同意下嫁給了他。婚後隔年，在江青設計將她丈夫調走，並讓他識趣地結束這段婚姻前，[81]李訥生下了一個孩子。她回到北京後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其實也就是在周邊的幾個地方轉著走走。其父死後，她掛名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實際上是照顧被關押著的母親。在江青死前，她做了最後一件讓她媽媽高興的事，那便是嫁給一個比她大十歲的軍職幹部，繼續照顧她的兒子——她兒子後來並沒有進入大學讀書，努力從事著一份普通的工作。[82]

江青死於一九九一年，李訥替她辦完後事，在往後的日子裡被准許和幾位以往曾照顧過她父親的老服務人員和警衛戰士見上幾次面。二○○六年時的李訥，靠著一份微薄的退休金過生活，而且據說還曾拒絕過幾次別人的捐贈。[83]

這一批在戰火下出生的孩子也不盡然和李敏及李訥一樣，有著那麼

不幸的遭遇。有些人在各自的領域中有著不錯的表現，但他們大多數仍從事較不重要的工作，目瞪口呆的看著下一輩的兄弟姊妹們致力推動改變。的確，當這些菁英家庭一旦在北京安定下來後，新生的孩子陸續報到：吃得好、養得好也教得好，他們很快的就成為那個時代的寵兒，先招來的是敵對者的嫉恨，後來卻贏得最重要的職位。這批太子在孩提時不幸的人生軌跡中，開創出了一條道路。

第二章
權貴集團中的驕子（1949－1957）

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不論在食物供給或是家庭照顧上，這批領導菁英的孩子們生活日漸改善。在政權的政治考量、領導集團的迴護和家族的滿心期待下，這些孩子更進一步地被納入一定的培養規畫當中。他們的父母非常明白境遇改變了，也都盡量爭取這些變化帶來的好處：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大夥開始生養更多的孩子。楊成武和他太太在原有的三個孩子外，又增加四個新生成員；劉少奇和陳雲也各自再生添了兩個，彭真則是三個。這些新任領導成員的家庭，突然間被幼兒圍繞。[01] 新生的這一代前景清晰，且備受眾人期待。

權貴集團的誕生

當時的所有軍政領導機關幾乎都安置在中南海，也是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紅牆」的一大片園區，位於紫禁城西側的一些遺址，後來被慢慢的恢復並擴建。大部分的重要中央領導（一九五七年時約有一百六十個領導人家庭）依照他們相應的職等，在中南海中配給到帶院落的房子或套間。其他不想集中居住的領導，就在鄰近地區找個寬敞的居所住下。原本由一些豪門家族或外國使節占有的豪華宅院，就保留給黨內最高層的幾位。[02]在各省省會，省級領導也同樣集中居住並享有寬廣的住所。[03]

一時之間，對重要領導人（當時有好幾百人）、領導人的家庭、妻子和子女的高規格待遇確定了下來。這使得這些人不只是政治上的領導階層而已，更造就他們為安置在北京和各省省會中心的權貴團體，由層疊的圍欄和常人沒有的特供*[01]凸顯出其身分；設立高牆、布置警衛、提供服務，他們享有服務員、托兒所、幼兒園、餐飲、後勤、機要、醫療保健……等等。[04]

最初這些人的待遇是按照中共領導人的習慣與需求打造的。其實，在戰時的部隊或是紅色根據地生活的領導，或多或少都曾經設置過類似的機構，提供他們一些物質上相當好的特殊待遇。不同的是，因為內戰造成領導集團成員與家人被迫分離和對家庭關係的層層顧忌，卻成為這些權貴集團的共同經歷，而讓彼此更形緊密。

在中國，家庭傳統是長久以來根深柢固的，對家族親人的向心力更成為人們在掙扎奮鬥的艱困時刻依憑的重要力量。同樣的，許多家族當時也懷抱著對那位當年被認定的孽子，未來可能會取得權力，爾後便能

分得一杯羹的期待。然而，黨領導層卻想要維持對領導成員的控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部分領導可以照看自己的家族，但需置於某些同僚的監控之下，而所謂的某些同僚，就是居坐北京大位的掌權者。他們可以在自家接待一些親戚，特別是可以接待、照顧較多孩子，只是不要太張揚。江青就曾經至少幾次讓她母親和姊姊住在她那裡。[05]但是這些所謂被接受的親屬，都被要求對新政權表態。鄧小平就曾經要求他的姊姊：「妳應該首先……改造妳的思想！」[06]潘漢年在上海擔任領導職務時，也曾因為其弟曾有過「歷史問題」而拒絕協助他。[07]

家族關照所衍生的其中一個方面，黨可以較輕鬆應對、掌握，那就是為讀書而接待留宿。實際上，許多家長都希望能將孩子們送到領導子女所在的學校就讀，而黨也沒特別反對這種事。因此許多在北京落戶的領導們家中有一些外地來讀書的孩子，有時候數量還不少。有位將領就曾經在自家照顧超過二十個孩子，而另一位領導，陳賡，曾收留過三十多個，其中一位還曾是他好友，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送過來請他短暫照顧的。[08]很快的，在紅牆內的大院，成為領導人孩子和小驕客們流連往來的地方。[09]權貴集團太子黨間的連結，就這樣在孩提和求學時期種下發展的根苗。

這種收留照顧的關係，是親戚或是朋友之間才會有的，但有時界線又很鬆散彈性。朱德和他太太因為年紀而無法再生育，在照顧自己女兒朱敏所生的外孫之前，就曾因為一些「緣分」照顧過任弼時的兒子；聶榮臻只有一個女兒，但他經常照顧農民英雄彭湃的兒子彭士祿。[10]

戰爭的勝利也讓這種同袍間的彼此支援更形慷慨。李井泉有三個孩子就是受同事託付養育，一直視如己出，還供養他們讀最好的學校。[11]常見的是，某位領導家裡住了一群孩子，而他自己也分不出哪些是自己

的，哪些是他妻子的，又有哪些是朋友或是他同事的孩子。不過，在這個命運無常又反覆的時代，有些人事還是不受影響，像後來成為元帥的羅榮桓，在林彪前一段婚姻所生的女兒*[02]與繼母產生齟齬時，就將她接往家中照顧。[12]也曾有過被某一位長官特別欣賞的下屬，將自己的孩子送給長官收養。[13]地方省領導的孩子們，譬如宋任窮的，很快學會在這些北京「叔叔和阿姨們」之中長袖善舞地穿梭往來。[14]

家族關係就此看來並非壞事，而能讓人受特別照應。然而，這些關係的發展卻僅止在權貴集團內，以及在當權者照看下對子弟們的特別教育上。換言之，這是要為新成立的國家培養未來的官員。對於志得意滿剛坐上新職大位、熱切要為新政府發揮所長、正要思考國家和自己未來的領導人們，這種徇私照顧也只是順手方便而已。

按常理，由於會有成堆人不停上門要求要彌補以往的虧欠或特別關照，幾乎所有紅牆內的新住民都不太願意回家鄉。[15]即便如周恩來，雖然貴為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沒再回去看家人。雖然他一直照料著姪女周秉德，但也要到很晚期，才小心翼翼、低調地接見來自家鄉的幹部和一些親戚。[16]多數來訪的故鄉親戚，都希望領導們能協助解決財務問題，但當時到處都不容易，他們的這些要求很難獲得回應。大部分的中央領導，比如劉少奇，至少在建國剛開始的那幾年，都避而不應鄉親的請求，因為即便他們再慷慨，薪資也只能讓他們做出有限的資助，而薪資中又有大半是用實物支付的。直到一九五八年開始，大躍進的失敗才讓這種支助施惠行為稍稍多了一些。[17]

同一時間，中央領導利用人事任命壓抑「地方主義」。先是廣東，隨後是上海，先後發生大規模的人事清洗。許多重要或次要的省級地方領導人，很快察覺當時的政治風向並維持和中央的關係。[18]這波中央集

權的效應顯而易見：這讓領導人在一段時間內不敢回家鄉探望，很久以後才放下忌憚。

相反的，最高層的幾位領導卻保留了他們家鄉特別的語言和飲食習慣，當中屬毛澤東最明顯。特別是一些領導人來自四川，除了說話時帶有濃厚的地方口音，還經常會一起去觀賞地方戲曲，或是嘗辛辣的川菜。這個權貴集團可以容許他的成員保留一些身分認同，但只限於在個人和文化上，尤其不能妨礙到黨這個新生，又以黨委「中央」為核心的大家庭。

雖然這些太子們能從一些親人的轉述、訪客和往來的信件中得知自己家族的事，但和家族與過往間的隔閡對他們有著重要影響。他們對家族了解得太少，卻被來自中國各地的「叔叔和阿姨們」養大，並往來於操持著北京話的同志間。這批黨領導的孩子們，當然明白自己有著被應許的廣闊未來。

紅牆之內

未來在紅牆之內悄悄的鋪陳。這些太子的父親們是如此低調地進行對他們的生涯規畫，這種悄然無聲的行進就後見之明，對照著接下來一連串重要事件的發生，簡直讓人難以相信。中國在一九五○年介入韓戰，接下來有一段詭譎的沉默，沒有太刻意的政治爭辯，這種情形讓毛澤東得以處理他的私人問題：他和江青處得不好，而在他的衛士之間還流傳著關於他倆幾年前一次爭吵的謠言。那次爭吵牽扯到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江青受不了他，但丈夫卻經常支持這個人，為李銀橋說好話、緩解爭執。[19]此外，他權貴集團中的敵人也沒有閒著：一九五四年三月，一封顯然出自黨內有些地位之人的匿名信送到毛澤東手裡，[20]重提江青在上海的一些不堪過往。*[03]

雖然如此，這些卻不是身為黨主席的毛澤東唯一要擔心之事。當韓戰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因停戰協議暫告一段落時，即便設想為繼承權力的毛岸英在戰爭中死亡，他也沒有因為哀傷而停下腳步，甚至也沒有搭理女兒李敏和李訥因共用一間房引起的摩擦。就在一個紅牆內舉辦的舞會中，他囑託劉少奇的妻子（部分當然出自真心，但也是基於他心中的策略布局）說：「我現在睡眠不好，腦子壞了。」還有「今後要少奇同志多做工作」。[21]

隨著歲月流轉，紅牆內的氣氛並沒有跟著緩和。當常常喜歡藉舉辦各種舞會縱情娛樂的高崗遭到整肅時，他表示應要回歸正經規矩的氛圍，並說明彭德懷反對組建文工團是對的，且合理的懷疑組建文工團像是在幫毛澤東選妃。[22]一九五四年三月四日，禁令由陳毅於中南海懷仁堂一次內部長達七小時的講話中宣布。[23]這個處置讓高崗仍占有黨內高

位的對手從中得利，諸如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還有鄧小平（他後來取得了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位置），*[04]以及一些其他省級的領導人。[24]

同一段時間，一連串的小事件確立了這個政權的去軍事化。那些在游擊作戰中養成的刻苦生活終於告終，所有家庭的銀行戶頭終於有進帳，並且開始擁有私人財物，孩子們終於可以耍玩木製玩具飛機了。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也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搭上民用飛機。此外，較大的孩子也可以投身建構在工業和技術上的前景中。[25]

但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發動，現在正在加速進行的集體化政策，卻不太得人心，有時甚至造成嚴重的問題。意料之外的是，群眾的怨氣居然滿溢到了紅牆邊。五月，一些不滿的民眾打破兩扇大門、貼了一些標語。楊尚昆在他的日記中記錄道，情況「比較嚴重」；毛澤東則在幾個禮拜後表達了自己的分析，用著了然於胸的語氣安撫說：「中南海有反革命，但不是那麼多嘛。」[26]雖說如此，一些警衛員在放完年假回家後驚訝的發現，非常明顯地，饑饉仍存於這個國家。[27]

終於盼來的美好時光

在中國，不管是北京還是其他省會，絕對沒有一個地方像此處，能讓孩子與外界的喧囂苦痛隔絕並成長。對這些年輕人而言，這兒是前所未見之地。紅牆內的巷道中不時可看到年少的身影往來穿梭，一部分的房子又像是寄宿學校。育幼院、幼兒園和學校，都是大人關心的主要話題。

孩子們在紅牆內有規律地來來去去，往往到一週將盡時，他們就成了這裡的主要居民；當這些年幼的小學生們週六下午放學時，公園空地便突然之間熱鬧了起來。不管他們是已經在外地住宿或仍被奶媽的手牽著，也不管是在飯廳，還是媽媽們忙著在紅牆內的專門商店購物時，這些孩子始終是父母話題的主軸。孩子們身邊那些出身農村，被認為品德良好、可以作為孩子們正面教材的警衛員們，也一直討論哪些父母較佳。

週六晚上就像回歸一般的家庭生活，充滿笑鬧聲。大家紛紛查問孩子學校成績；劉少奇還將他幾個最小男孩的身高刻在牆上。週日對所有家庭而言是兒童日，就連毛澤東也不得不強迫自己接受這些喧鬧（他通常睡到中午才起），讓這些孩子進到原本是由他獨享的中南海游泳池玩。週日下午通常會安排散步，有時到公園，有時去圓明園，又有時會去玉泉山。這種時候往往也是展現高明家庭交際手段的時候，因為這時候爸媽們會利用機會，邀請朋友的家庭一塊活動；有時候是父親家鄉的朋友，有時候是母親那邊的，還有時候是孩子在學校認識的朋友。

暑假是難得的家庭時光，眾人最期盼的就是去北戴河。北戴河就像俄羅斯的索契，二十世紀初便是以療養保健知名的度假地區，一九四九

年落入戰勝者手中，很快就再度開放。[28]所有別墅全年為生病或過勞的領導人服務，而在夏季的幾個月裡，則用來接待重要領導人與其家人。北戴河的接待名單主要是在紅牆內生活的領導人家庭，每年還會有較得勢的各省首長、領導人要慰勞的秘書，以及領導人想要犒勞的紅牆內服務機構負責人等加入。[29]

北戴河假期主要的想法，是可以一邊放鬆休閒一邊兼顧工作，因而一些黨中央委員會特別重要的議程會在這裡召開。此外，這也可以讓孩子們享受與略微放鬆的父親在一起的時光，也能體會一下身為太子的特權；像是偶爾可能會遇到「穿著白色浴袍的毛澤東」之類的事，可以讓他們在回北京之後好好的驕其同儕一番！這有些像其他國家和政黨安排的夏令營，主要是能充分鍛鍊身心。[30]女孩子們不是在比較彼此的穿著打扮，就是躲在室內玩著她們「女生的遊戲」，而男孩們則在元帥賀龍的吆喝下，組隊和在附近海灘上與蘇聯專家們較量足球。[31]

學校——打造未來的工廠

即便在度假，父母們也不放鬆對孩子們複習功課的關注，畢竟那是一個仍在努力追求工業現代化的時代。黨的宣傳一再強調科技至上信念、強調力量來自科學技術，且黨的復興要以中國的科技、經濟和軍事為手段。

學校教育因此更被重視，尤其這批孩子父母大都在一九三○年代結合，那個年代的母親們大都有著較高的學歷、肯定教育的價值。曾山的妻子（鄧六金）、羅榮桓的妻子（林月琴），以及鄧小平的妻子卓琳，[32]曾經在取得政權前辦過非正式的學校，更證明了這點。

這些非正式學校當中有兩所比較知名：其一是一九四七年創建於河北省阜平縣的「八一學校」（主收高層領導子女。前身為「榮臻子弟學校」，一九四九年後改名為八一學校）；另一所是在一九四八年時，毛澤東的姪子、姪女和劉少奇以及其他高層領導子女都曾經讀過的「育英」學校。[33]一九四九年後，這些帶有傳奇色彩的學校增加小學部，並開放一般民眾就讀。學校的負責人遵行兩項重要原則：一個是政治審查，其中包括學校領導的任命權屬中共；其二是就讀學生的身家背景必須是中共黨、政、軍成員。讀者諸君閱讀至此覺得驚訝嗎？這確實是當時的政治大方向，擁有權力的市政府和各重要經濟機關都要在財務上支持這些學校，並且任命有分量人士任負責人。總之，黨毫不鬆懈地關注著這個它一手打造的權貴集團與承繼者。

育英小學很快就被視為中央委員會的私人學校。身為名譽校長、當時正任職中央辦公廳主任，且身為當局具實權人士的楊尚昆，經常為學校操慮。他甚至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的黨委辦公會議中，討論「育

英小學問題。」[34]多數很受重視的小學也同樣要靠著重要的黨機關或是軍方單位的支持。例如「十一學校」的靠山，就是當局的政軍核心中央軍委；「景山學校」是中宣部；「八一學校」是北京軍區；「北京小學」則是北京市委。[35]就算這些學校的名稱並非那麼響亮，但負責人卻有能力可以直通高層；例如有名的北海小學校長，就是掌管經濟大權陳雲的兒媳婦。

多數幹部會以能讓他們孩子進入這些學校而深感慶幸，畢竟這是高層領導們在考量學校位置、教學良窳、背景關係之後精挑細選的。比如鄧小平就是因為他老紅軍的軍事背景，才將孩子送到「八一學校」就讀。[36]

這些北京小學的名氣使家長們想方設法，動用各種手段將孩子安插入學。例如周恩來，就將他的兩個姪子安排入「八一學校」就讀。[37]最有名氣的學校往往有許多特權人士的孩子們，例如「實驗二小（北京第二實驗小學）」，一九五○年代劉少奇的三個孩子和朱德的兩個孫子就曾在該校就讀。「十一學校」的校史中，還提到曾經一班四十個學生中，就有三十八個學生的父母是將軍的小孩。[38]

集中在知名學校讀書，更強化了這些孩子對於身為權貴集團的共同認知，而這種認知也很快的衍生出一些偏見，等他們進了中學後偏見又被更進一步的強化：首先是對混血兒（雖然當時還很少見）的鄙視，再來是看不起出身在沒什麼英勇事跡的家庭，或是家境沒那麼好（沒有汽車接送）的同學。其他還有像是不尊重師長、傲慢地於衣著上攀比爭奇、爭論誰的父母職位較高，嘲笑那些因為父親在外地、父母雙亡或是離異影響而課業表現較差的同儕。[39]

無論如何，在那個公立學校系統剛剛起步的年代，雖然受到體制上

條條框框的束縛，好家庭出身的孩子仍然能在安排下接受不錯的小學教育——民運人士魏京生對這點應該知之甚詳。[40]同時，優先為這批人考量的中學教育，也開始成形了。

中學教育

緊接在新式小學後，新中學很快紛紛設立，採用男女分校。當時知名的女校只有一所，附屬於師範大學，*05文化界兩位領導周揚和林默涵的另一半*06先後擔任該女中的校長。41出身紅牆的重要領導人女兒們在那讀書所受的管教相當嚴格：校長緊迫盯人地關注著她們的思想發展，並請一些較了解近期當局要求與變化的家長們作報告。42不過最有名的中學還是男校：「一○一中學」、有名的「八一學校」，還有軍職家長想進卻沒那麼有名的「北京四中」，它的支持者遍及政府高層（還有一種說法，表示曾有一陣子有四分之一的學生家長職位至少是副部長以上）。43

高中照道理是培養學生準備接受高等教育，因此要求標準更高。能取得大學入學名額的「重點中學」，自然成了各方爭取就讀的目標。在必要時，家長會毫不遲疑地花錢為孩子請家教——劉少奇便帶頭這麼做。當發現孩子們的課業表現落後，他們還會向校長和老師們施壓。像是林彪和妻子葉群就透過層層施壓，要求校方注意女兒英文學習上的困難；江青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就讀造船工程方面的科系，是李訥就讀的中學的校長*07頂住壓力，才讓這女孩能按自己的興趣讀文學和歷史。44在上述競爭激烈的情形下，家長和老師當然都不欣賞和課業無關的讀物。

這時的另一個大變化，是政治化的風潮掃進了中學。隨著群眾運動的此起彼落，相應而起的政治組織開始發展、壯大。他們以班級為基礎，組織成各種戰鬥隊、兵團，聽從首領們和他們副手的號令，而這些首領和副手則由各地黨委會挑選、掌握。45

此時在中學裡「自然地」發生了一些事件，家庭較一般但功課好的學生與靠父母為領導的背景和關係入學的學生，彼此對立了起來。前者資質好，人數卻沒有後者多。[46]而這種衝突，不知是否曾讓當時的政策主事者操心過。

一九五七年時，讀中學確定要支付學費，不過獎學金的設置可供出身普通而功課好的學生爭取，如此一來便不會妨礙出身黨政領導家庭的太子們就學；一九五○年後，這些特權父母的待遇增加，其子女的入學已不成問題。

雨後春筍

太子們的就學潮只是社會變動的一部分，它表現出文化大革命前城市社會的整體特點：整個中國汲汲於生養和教育。孩子和學生的數量愈來愈多，全都要為成年後的生活做好準備。從那裡所獲取的動能和適應力，讓這批太子黨們在數十年後嶄露頭角。

由於要研究的對象群體為數眾多，我們只能從少數案例做觀察，選擇約四十多個領導人深入了解。[47]在這些人之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沒有子嗣，因為當時兩人們的妻子面對可能遭受的風險，不願生育。周恩來後來收養了姪女周秉德，彭德懷則收養了兩個孩子，但在北京住處先後照顧了最少六個讀書時住在他家的孩子。[48]另外有四對夫妻只生養一個孩子：聶榮臻夫婦和其他人一樣，照顧著女婿和其他同僚的孩子，他們的女兒聶力，後來成為軍中官階最高的女性之一；[49]陶鑄和妻子曾志也只有一個孩子，曾志是紅軍女戰士出身，個性相當獨立，曾生過許多孩子，但都讓給或送給他人了，[50]只留下一個女兒。*[08]另外還有在中共領導人中傑出而複雜的饒漱石，他和妻子的經歷坎坷；*[09]以及中國的秘密警察頭子康生。[51]

這四例涉及到的人物，在紅牆內的社會中都是相對特別的。只有兩個孩子的領導人也同樣獨特。例如鄧力群，他長期擔任劉少奇的秘書，晚年又成為毛澤東遺緒的保衛者；還有胡喬木，他曾任毛澤東秘書，具有相當的文化涵養，生怕失去毛的信任。這兩人是公認少有的真正知識分子。另外，毛主義發展歷史中的重要角色李富春，他的妻子蔡暢是中共黨內少數的女性主義者之一，在生了兩個孩子後決定做絕育手術；*[10]她花費許多時間和精神照顧「烈士」遺孤，後來更成為照顧紅牆內

所有孩子的媽媽。[52]她和鄧穎超都是中共黨內少有的特例。

有些夫妻可能是為了盡生養責任育有三個孩子，比如自私又自負的林彪、在戰場上指揮若定但在家中卻嚴厲難近的大將粟裕、楊尚昆。還有田家英，他也是黨內的知識分子，娶了一個很有個性的妻子，後來得罪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導致他在一九六六年自殺。[53]

大部分的領導人都有四個或四個以上的子女。其中較重要的領導人，像是毛澤東能找到的孩子有四個，劉少奇則有八個。在最受人歡迎、感念和敬佩的領導人中，詩人元帥陳毅有四個孩子；青年偶像賀龍、任弼時，[54]在打游擊時財務情況仍然不錯的李先念也是；在毛澤東之前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張聞天，認了他第一段包辦婚姻所生的兩個女兒，之後又認養了一個在大躍進中因為飢餓而命在旦夕的農村小女孩。鄧小平、北京市長彭真、曾山、外貌深沉的陳雲、元帥羅榮桓、陳賡和後來成為林彪助手的邱會作等人，都有五個子女。子女數從六人到九人的有趙紫陽、薄一波、陳正人、賈拓夫、許世友、主政廣東的葉劍英、[55]林伯渠、謝覺哉、曾任公安部長且對家人最好父親之一的羅瑞卿，還有宋任窮及一些其他領導人等[56]。

雖然我們無法更進一步詳細計算，但仍然可以觀察出在一九五○年代，這些成員眾多的家庭被視為中國貴族階層。他們的子女包括前幾段婚姻所出的，這讓我們的觀察更深了一層——像劉少奇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就是如此，這些孩子被王光美視若己出，到文革前才意識到她並非親生母親！另外還有一些被領養的孩子也包括其中，例如張聞天的女兒和王震的兒子。

人妻、人母

孩子的教育，成為這批在一九三○和一九四○年代被婚姻套牢的妻子們最好的成就。不過其中還是有些人特立獨行，尤其是在一九二○年代，中共仍在城市做鬥爭時期最早的「夫人」們。蔡暢在妻子與母親的角色兩者之間，就選擇做妻子更甚於一個母親，終其一生都維持著和李富春的浪漫夫妻生活，但她也沒放下成為其他孩子代理母親的角色；鄧穎超，她是幫助周恩來有所成就的推手，基於自身曾有過的不好經驗，她曾接力推動有關婦女的政策；曾為中共中央組織部模範且受人欽敬的帥孟奇也是一例。

另外有些領導人的妻子相當有個性，彼此間差異甚大。像是習仲勛的妻子，當前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彭德懷的妻子浦安修，[57]都是一例。而且就算外表看來溫馴順從，她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盡可能企圖擺脫束縛。[58]例如最早的這批女性，就曾經盡其所能的投入工作和「為人民服務」的使命，以成就屬於她們的事業；不過在過程中，她們始終離不開丈夫的庇護和幫助。

多數案例中，她們的丈夫並不會因為不安而阻礙其工作。[59]有些人的先生還表現得很有同理心，如同趙紫陽一樣坦然面對、如彭德懷一般順從接受，或是像妻子曾籌組劇團的楊尚昆，持續表達關心；也有人是像陳毅一樣理性對待：「當然這不是那麼容易，但她不想待在家裡，再怎麼樣我也不能阻止她，從根本上來說她是一位同志，不是老婆。」[60]有些領導人的妻子似乎也有著強烈的意圖，想在第一個五年計畫的重點企業中，擔任領導職位。

相對上述的情況，有些職位在男性社會中並非那麼容易接納女性參

與，在黨和軍隊中擔任政治角色就是一例，反對女性的爭論始終存在。與社會中配偶角色有關的爭議調查曾經連篇累牘出現，指的正是一九三○年代末期城市女性大量前往延安後的情況。[61]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間，中共黨內女性幹部比率從八％降到四％。[62]此外，讓配偶遠離政治的做法也蔓延到家門外：無論是不是黨員，領導人的配偶們都不能參考、閱覽中共黨內各機關發出的文件。

如果說政治決策職務大多由男性擔任，女性則有許多人是出身於行伍。從一九五四年開始，在已經復歸和平的理由下，國防部採取了一些積極措施降低軍中女性領導職務的人數。[63]另外還有些先生們則小心翼翼，不讓妻子擔任太高職務的人員；例如被認為勇敢過人的羅榮桓，[64]就拒絕讓妻子升任將軍。*[11]

一些領導人配偶之所以能繼續保留政治或是軍事職務，是因為其職務低於她們的先生，有些人甚至還在丈夫的手下工作。一個顯著例子是曾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之妻，*[12]她雖然有軍職，但其實只是丈夫的副手。[65]

在其他領域，階層制度中以男性為主的傾向隱而不彰。因此光看李先念妻子林佳楣的職務（衛生部局長），很難理解她是衛生部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66]而當張聞天任外交部副部長，需要任命一位「助理」時，他也欽點妻子擔任，她早期曾是革命戰士，而且能力出眾。[67]

總之，如果一位領導人的配偶當真要工作，最好就是協助自己的先生。因為隨著工作負擔增加，丈夫們都需要一位秘書，支持他們承擔領導人工作中官僚化的日益加重。一時間，太太們紛紛著手協助先生，而且表現非凡——不過孩子們卻對這種情況有諸多抱怨。另外有些領導人則正式讓他們的妻子成為有職銜的秘書，例如曾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

舒同，他去每個地方都帶妻子隨行。[68]其他人不喜歡妻子太有才幹，會輕視，或是限制她們發揮長才。像周恩來就硬是不讓鄧穎超發揮所長，在一九五○年代時，她還因為長時間的孤單和寂寞，深受神經衰弱所苦；另一個案例則是鄧小平，不過他太太的情況相較下還算好——這些先生們要的只是個「生活秘書」，幫他做些像是整理整理文件之類簡單的工作。[69]

迎接這批當年懷報救國理想，投向共產主義的高中女學生們的，是難以承受的衝擊。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們經歷在岩洞中的生活和次次艱險的行軍，到北京後，就算認為那只是暫時性的安置，但衍生出的錯綜複雜問題又紛至沓來。當權貴集團逐漸成形，情勢漸趨明朗：昨日的女戰士不得不承認，她們只能成為居家的妻子和母親。當夫婿在外銳意馳騁時，她們所能做的只是思考著扮演好如同宣傳樣板一樣的女性：「既是夫人、孩子們的母親，又是護士、秘書、管理員。」[70]

她們獲得的是難以忍受的孤獨和疑惑。此外，這些女性還要負責照顧年齡較大並有著斑斑傷疤過往的先生，他們如同當年在軍中號令指揮一般，在家中頤指氣使，卻不沾手具體的家務事；日後成為傑出外交官的黃鎮*[13]養了七個孩子，終其一生從未洗過一片尿布。[71]即便比較講理的男性，像是鄧小平，家務也是由孩子的娘一手打理——這是一種以男主外女主內為名的假象平等；只要丈夫能在週末時表現溫柔一些，妻子們便可以將許多辛勞拋諸腦後。

有些人就此日漸羸弱，像是劉建勛的妻子即是，*[14]她原本有機會前往美國讀書，卻選擇嫁給並不那麼細心敏銳的共產黨領導幹部，不但飽受心臟和肝臟疾病之苦，後來更患了憂鬱症。另外一些人則和她們的丈夫日漸疏離。[72]雖然如此，還是有許多女性得以忍受衝擊，並避免過

於頻繁懷孕。[73]所有人為了孩子，都很快適應低調的生活，在他人眼裡，這些女子表現出：謹言慎行、自我克制，以及對所親手建構家庭的關愛，還有已經適應這世界要求的守分及忠誠。

幾年後，一些家務協助員和警衛員逐漸分配給領導人家庭。大多數領導人家配有廚師，或有配廚房家務助理，以減少公共食堂的負擔。[74]另一方面，隨著時間，太太們也學會了補償自己所吃的苦的方法。她們會要求丈夫們待她們好些，要帶她們去參加紅牆內辦的舞會，或是假日一塊出門散個步。此外，太太們也會參與領導人夫人聚會，這些聚會通常是由鄧穎超、蔡暢和康克清主辦，她們三位是紅牆內姐妹們的老大姐。[75]又有些人可能是為了補償她們的不被重視，特別擺出一種傲慢的姿態，魏京生年輕時，就曾因此留下不甚佳的一段回憶。[76]

對心理補償的共同需求，主導著這些已為人母女子們彼此的關係。有些人因共同喜好而聚在一起；像喜歡戲劇的，有習仲勛、鄧小平的太太等人。有的人則是圍繞著不同成員形成團體，比如羅榮桓元帥的妻子林月琴、陳毅的妻子張茜，以及江西省負責人楊尚奎長於社交的妻子水靜。[77]

家庭

這些領導人的妻子們能夠在這些困境中挺住，而丈夫也能維持對她們的忠誠，是因為她們當時正承擔著歷史賦予的使命：建立一個家庭。事實上，她們成功的讓其孩子意識到自己身為權貴集團成員的身分，而該集團的力量不只來自於它的領導者和政治權力，也來自於組成的家庭。這些家庭不會排拒，而會協助這個集團成長，並從中得利。實際上，在菁英成員眼中，家庭被視為那個時代中的重要成就之一。[78]黨內重要領導人對家庭的布置謹慎且保持低調，他們的孩子則接收和其父親地位相當的安排。

有一小段插曲可特別作為上述佐證：在那個蘇聯還是中國欽羨仿效對象的年代，一批送往蘇聯念書的年幼孩子，成年後從莫斯科回國受到熱烈歡迎。像蔡博*[15]在一九四九年初抵北京時，蔡暢就忙前忙後，通知劉少奇和毛澤東之子毛岸英，又安排他去見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其他人有相同經歷的人也受到同樣歡迎，並馬上獲得分配的工作，像父親也曾是中共重要幹部之一的林利即是。*[16]後來這批人先後從事經濟或是科技方面工作，卻沒有任何一人擔任政治方面的要角。[79]原因為何？推測應該是因為在他們之中，帶頭的毛岸英最有可能在政治上嶄露頭角，卻青壯即歿，加上中共注意到這些人都曾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員。此外，也因為他們那時還沒有清楚意識到這個新生的權貴集團，又沒有受到紅牆內有分量的任何家庭的支持和幫助。例如前文提到的蔡博，其姑父李富春後來就在政治上失勢，不再受到毛澤東的器重。

在這當中，具分量的家庭有毛澤東和黨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經濟方面的負責人（陳雲、薄一波）、北京市負責人（彭

真），軍方領導的地位尤其吃重（朱德、賀龍、林彪、彭德懷、劉伯承、聶榮臻和後來的劉毅）。黨政軍職務高低排序的變化和脆弱性質，讓太子黨們明白了兩件事：始終要留心在此層級中的政治排名，以及該排名不會一成不變。

嚴父

一直以來，在權力場域中縱橫捭闔的中共主要領導人們，放在第一位考量的都是工作，且眾所周知的他們的「工作」，更在宣傳中被不斷地放大，而在文山會海的壓力下，工作更形勞心傷神。取得政權的初期，這些首長毫不在意自己的穿著，除了偶爾有人會配把槍、攜帶幾本筆記簿和一些幸運物外，沒有屬於自己的私人物品。就拿饒漱石來說，一九四九年時，他的衣物之少，外套就那麼一件，是朱德送的皮外套。[80]這些領導人們的工作量很大。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許多同僚，經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這使得他們中飯前很少有其他活動，也讓他們的家庭參與的機會變得少之又少，父親缺席則成為常態。比如李先念，他通常在早晨五點三十分就起床，等回家時孩子們都已經就寢。[81]有些一家之主，像譚震林，直接睡在辦公室，只有在週末晚上才出現在家人面前，接下來週日一塊吃個中飯，然後又投身公務……一直要到之後，他們才有時間能夠好好陪伴家人。[82]

多數人除了將家中發號施令的角色讓給太太，沒有別的選擇。就像粟裕曾說過的一樣，他認為和妻子的組合是「政治夫妻」，兩人只決定家裡大事，不管柴米油鹽之類的瑣事。[83]他規定當他不在家時，其他人不許隨意進出夫妻倆的房間，不過如此一來那間房間卻反而成為了孩子們玩耍時想要探險的標的。

只有一種情形可以讓這些領導人放下工作，就是「組織上」基於為其健康著想，要求他們一定得休假。太太們也十分在意丈夫的健康情況，她們也會敦促孩子們留心這批老戰士的健康。一九四九年，當毛澤東要擇選軍事幕僚長時，就碰到了相關的困難，因為大部分的主要將領

不是生病就是體弱。[84]一九五○年，任弼時因心臟病早逝，這讓大家驚覺健康的重要性，從此以後，他們才認為首長們在工作時也應該適當休息。[85]在這之後，每位領導人都配有指定醫生；在朱德孫子的回憶中，醫生的到來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在其他家庭，媽媽們也會要孩子們隨時提醒爸爸留心醫生的叮囑。[86]然而像是主導經濟的陳雲的每日完整睡眠時間，仍舊無法超過四小時。[87]每個家庭討論最多的話題，常是學校和男主人的健康，政治話題則是小心避免，沒得商量，媽媽們通常都會嚴格監督。例如劉少奇家，就絕對不在「小耳朵」們面前談論工作上的事，一旦得知某個孩子將聽來的小道消息到處亂傳，劉少奇一定發火。[88]至於鄧子恢，他被逐漸抽離主管的農業工作時，也絕不對孩子透露毛澤東對他的批評。[89]

大家記憶中不那麼一樣的，是各家父親們的嚴厲，或是說專制程度。王震就常常愛說：「養孩子，不過就像帶兵打仗一樣。」[90]而似乎有許多當父親的領導人把這句話做到了極致。當時共產黨內的許多父親都像彭德懷的副手黃克誠一樣，給人完全不在乎自己孩子的印象。[91]他們只在乎孩子守不守規矩和成績好不好，一旦老師不滿意，當爹的就會怒不可遏，只差（但真的能讓人相信嗎？）沒動手狠揍一頓。王震的其中一個孩子就曾經透露，他被父親這方面的要求嚇到過；[92]王任重還只是個省級幹部時，毛澤東很欣賞他的文化素養，不過他卻會毫不猶豫地翻看女兒的私密日記。[93]事實上，許多當父親的領導人對自己孩子特別嚴厲，甚至多所猜疑。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常常很粗魯，比方說林楓*[17]的遺孀（郭秋明）堅稱他先生只喜歡書本和孩子，但他們的女兒回想起來，卻認為她父親並不喜歡她，而媽媽會這麼說，是因為怕他。[94]

劉少奇一直想要做個好父親，他時時留意家裡，並盡量知道小孩的

學習情況——這也是他和他太太始終爭辯不休的事情。他常常在週末晚上召開「家庭會議」，不過在這些父親中，他並非唯一這麼做的人。劉少奇和毛澤東採取放任的態度不同。毛澤東曾經在一九五三年就預先表示他不會緊迫盯人的控制孩子（事實是他幾乎沒照顧過自己的孩子……），而劉少奇卻會設法閱讀並思索要如何教育子女。他的做法並不複雜：訂好各階段目標，九歲學會游泳、十一歲會騎腳踏車、十三歲就要會照顧自己，以便於在十五歲時就能離家自立。看到孩子寫錯字和不守規矩時，他一定會立即糾正。

在這方面，劉少奇也毫不猶豫地反駁毛澤東的放任主義：「對孩子而言，既要嚴厲，也要放手，端視需要而定。」[95]實際上，他對女兒劉愛琴的看管的確嚴格，不但要管她穿的服裝、讀的書、從事的娛樂和零用錢的花用，甚至在她申請加入共青團時也加以阻撓，讓劉愛琴放棄往這方面發展的企圖。然而，劉少奇對再前一任妻子（王前）所生的女兒*[18]卻是疼愛有加。[96]

有些領導人在父親這個角色上與其他人不太一樣。像鄧力群，他就沒有過於要求孩子的課業。李先念則是嚴格與寬容並濟，專斷和自決兼施，讓他的孩子「只要確定能做好，什麼都可以去做」。楊成武對孩子只有三項要求：要有較高的思想覺悟和好的道德品質、必須學有專長，達到大專畢業以上、努力工作，「多為人民做貢獻」（也就是成為領導幹部）。羅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長一職，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年止，長達十年）除了在週日抽出一段時間外，很少去看他的孩子；按他的說法，那段時間他是在「接待」他的孩子，就是說帶他們去從事一些像是拌拌嘴、散散步、打打乒乓、釣釣魚之類，他們喜歡的活動。曾任四川省委書記的李井泉則幾乎不管小孩的課業和生活，他認為那些都是他們

自己的事。[97]還是有些父親，像陳賡和陳毅，比孩子們的娘更希望他們懂得自由；有元帥詩人稱號的陳毅，還常向孩子誦讀自己的詩作。[98]

人子

有沒有可能用一個真實的圖像，將一九五○年代這批孩子的世界表現出來？這件事只怕不容易，不僅因為這些回憶都會經過美化，而且他們都忘了一些現在眾所周知的事：當時這些孩子無論是物質或是心理上的生活條件，都有別於一般人，這些條件讓他們在看待他人時有偏見，或是蔑視。[99]

也許在這裡我們該強調，在一九五○年代，這批太子黨能較頻繁接觸到不屬於他們這些政府新貴小孩的人只有兩類：在小學或是中學中得到補助的普通學生和一般市民，以及紅牆內為首長服務的警衛員和秘書的小孩。[100]

一旦我們提到這些，就必須知道這些太子黨和紅牆內年輕住客們的日子，也不像這個權貴集團掌權者設想的那般輕鬆。先說學校，對其中有些人（像大部分失去父母和父母因為工作而無法照顧的孩子）而言，他們就像被拘禁在這裡一樣。其中最幸運的，不過是那些可以經常在週六中午回家，到週日晚上或是週一早上才回學校的人，至於其他人，只能在學期與學期中間較長的空檔，才能回去和家人團聚。學校的伙食粗糙，床板也硬，等到了週末回家時，這些小學生們總是身體疲憊。此外，這些孩子心理上也承受極大壓力，因為回家後，父母往往要針對成績做諸多檢討與要求。

這些孩子因此沒什麼時間玩耍。一星期有兩到三次，一些男孩與女孩會溜進首長和夫人們參加的舞會。元帥朱德誇張的舞步和劉少奇每次都會邀請妻子跳第一支和最後一支舞的習慣，讓這些孩子仰慕不已。[101]到了一九五○年代稍晚，還會播放電影，但通常是給年紀較長的青少年

和成年人看的。[102]此外，還有個大公園，是年齡較小的孩子們帶著玩具玩耍的地方。最讓人興奮的是出現從蘇聯來的稀奇玩意兒時；李訥就曾在一九五○年和媽媽去蘇聯旅行時，帶回兩輛小自行車。[103]在往後的十年間，紅牆內逐漸有了二極體收音機和相機。其中最吸引這些孩子目光的，是停在近處的蘇聯摩托車和轎車。[104]有時候孩子們也喜歡玩一些稍微嚴肅，甚至有些政治意味的遊戲：像是在胡耀邦近北京市中心的大房子裡，他們會玩些角色扮演遊戲，像是「攻占柏林」、「八路軍的勝利」之類。[105]

小同志們

一般而言，這些孩子在家裡都是聽從母親，遵循鉅細靡遺的號令，並且在這些身為家長的領導人們略有壓力的影響下生活著。在生活規矩上，男女有別是其中一個基本觀念，而這個觀念對女性不甚友善；沒有兒子的家庭，無論如何也要生出一個來。於是，就有領導幹部在連生四個女兒後，還要再添一個兒子。[106]由於大家對男生有著較大的期待，男性也因此在家裡較有發言權；在某位將領的家中，就只准男生玩打仗遊戲，而且不准女生回嘴兄弟們的嘲弄。[107]

但即使如此，爸爸的小女兒們仍然會懷有對父親的感念，劉少奇最小的幾個女兒就是如此。更何況，在某些家庭的追憶中，部分一家之主還有些普世父親對子女的樣子。多數父親都希望女兒能從事一份專門職業，而且要她們念茲在茲，提早做準備。即便在家裡對女孩子的要求、壓力沒有像對男孩子來得大，我們倒還沒發現表明父母們不讓女兒讀書的明顯案例。像是薄一波、陳毅、鄧小平等人家裡的女孩，都可以隨意去學音樂或上繪畫課。[108]

總之，在學校讀書的那些年，生活對這些孩子而言並非那麼好過。對一些有幸能到北戴河度假的孩子來說，那段假期是回憶中最好的時光。那裡的夏天比起北京要來得輕鬆，父母的看管也放鬆許多，沿著海灘可以自在的遇到許多人，偶爾還會見到一些平常在家裡連提名字都要小心翼翼的大人物，或可以親眼看一下江青是不是真的一隻腳只有四根腳趾頭……。那裡充斥著家人間彼此開的玩笑和吆五喝六的聲音，而這種優閒只有在父親們被叫去開政治會議時才會被打破。此外，在那邊也可以交到新朋友，從其他省份來的，或是別校來的住宿生。從一九五○

年代中期開始，一些愛苗悄悄的在稍年長一些的孩子之間滋生……。[109]

在這種環境和以往曾經是同學、鄰居，或是在某個週日下午曾共同踏青因而相識的基礎上，更產生了一種同志間相知相惜的情誼。[110]對年紀較大的孩子來說，以往的共同記憶更加深了彼此的友誼；朱敏和許多人，例如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蔡暢的女兒李特特，都曾經在莫斯科讀過書。[111]同僚間的孩子或是同班、一起上鋼琴課的同學，在這裡也很容易再相聚。[112]

另外有些孩子們的連結，則是大人們有意安排的。比方說，有張三個女孩子合影的相片就看來有些不真實，應該是一個想取悅她們的秘書人員拍攝的；這張照片裡有周恩來認養的姪女周秉德、李訥和李敏（毛澤東沒有花心思去了解的兩個女兒），她們旁邊還有一個人笑得更率性，是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他對李敏相當有好感。[113]他們彼此的關係，也被父母們看在眼裡。

在那個時代，即便私人關係也多少帶有小小的政治意味，只消一個輕微不滿，不論有多隱而不見，都會成為被疏遠的因素，這也是為什麼當時林彪（他在韓戰時稱病不願帶領赴韓作戰的部隊，惹惱了黨內領導層）在北戴河的別墅位置偏遠，這也減少了其子女和其他領導人小孩接觸的機會。這造成林彪的孩子林立衡和林立果喜歡去家庭成員眾多的羅瑞卿家中玩，希望能沾到幾絲開朗和活潑的氣氛；當時許多媽媽們在談到這對姊弟時，語氣中都帶有一些心疼和惋惜。[114]

眾所周知感情最好也最為父母們讚賞有加的朋友圈，就是僅限男性參加的足球隊。這支足球隊由賀龍元帥負責，和蘇聯專家組的隊伍比過好幾場比賽，敗績頻頻，但最後一場賽事在一些專業球員助陣下，終以勝利坐收。此外也有一些籃球比賽，賀龍的兒子賀鵬飛、陳雲的兒子陳

元，在賽場上的表現都相當出色，彭真的兒子傅洋尤其優異。[115]

在北戴河的夏日時光留給了他們關於那時代的一些遺憾。在那段時間，他們可以同時碰上毛澤東、江青和劉少奇。也是在那段時間，他們可以像父母一樣，一起構思共同的遠景。往後，當他們有機會再談到這段往昔，談到這種純然的同志情誼時，卻僅存懷念和省思。

對這批紅二代而言，他們很難不再提一九五o年代的美好時光。當時的政治菁英集團仍然緊密合作、充滿希望，每個家庭都健康有活力。他們在這段歲月汲取的養分，成為在稍後來臨的考驗中能否存活的能力來源。

那個年代百廢待舉、教育威權充斥，而且自絕於世界潮流。舉目盡是虛假的教育，但卻讓這些孩子能對爾後發生的，日漸暴烈以致撕裂整個國家的一連串衝突有所領會。

第三章
是無知還是不能理解？（1957—1965）

在某些時空，人類不太能理解發生在自己周遭的歷史。該說法剛好是這批太子黨在面對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在他們身邊所有事情的寫照。他們察覺不出大躍進時周遭發生的慘劇，又不能從一些徵兆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他們或許不懂，但仍然在其中生活並成長。

顛沛與悲劇

從一九五六到一九五七年開始，政治上的騷動愈來愈厲害。在紅牆內，父母們惴惴不安卻不敢稍露口風，孩子們則像是被封閉在為他們營造的象牙塔中。此外，在「雙百運動」*[01]短暫過渡的自由過後，隨即而來的鎮壓雖然只打擊到幾位領導人的秘書，但引起的深層動盪隨後卻在黨內和中央辦公廳中悄悄地蔓延開來。[01]大躍進的政治動員對全中國來說，是個戲劇性的事件，但對於權貴集團的成員而言卻否，他們只是訝異於政府誇下的承諾。沒有人注意到，原本已經為工作油膏耗盡的幾位領導人，還被毛澤東要求要少用機要人員——劉少奇的健康狀況更因此惡化。[02]一九五八年在孩子們的回憶中像走馬燈般精采，先是到處追殺以麻雀為首的「四害」，再來是紅牆內也建起高爐鍊起了鋼，說是用鍊出的鋼可以買台電視機給大家。也是在那個時候，第一部中國製的「紅旗」轎車首度發表，但卻因為大量的物資匱乏，拖到一九六六年才分發給政府機關使用。[03]

接著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o年發起的反右鬥爭，氣氛就不再那麼高揚，加上反右主要的目標彭德懷雖然性格不善，但卻是個好人，向來是紅牆內大家敬重的對象。整肅行動悄然進行著，所有人都生怕受株連，在遭整肅對象的周遭築起一道靜默的圍牆。[04]只有蔡博是太子黨中唯一受到牽連的人，而且是由其姑父李富春到他的工廠宣布（或是設法減輕）對他的處分。[05]另外還有官方雖然大力呼籲要求，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但卻少有人響應，除了張聞天的兒子，為了減少政治上的負面影響，先是被送往河北附近的一座農場，後來又在一九六二年被送往新疆；還有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為了取悅她的父親，嫁給蒙古籍丈

夫，全家遷到內蒙生活。[06]

接著發生的大饑荒，讓警衛們休假返回家鄉時，見證了這場災難在農村造成的驚駭景象，回來後他們將所見所聞描述給其他人聽，讓大家很快的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而這場饑荒造成的影響也愈來愈真實了。[07]紅牆內的公園在剛展示完大躍進的光榮成果後就變成種菜的園子，孩子們也興高采烈加入工作。劉少奇一家一如以往帶頭示範，種起一些蔬菜。在稍遠的城裡，頗有名氣的一位將軍家也養起小豬。[08]一九六○年，毛澤東也下令將他住所內原本種植大量花卉和一些老樹的地方，騰出來種植蔬菜。[09]

紅牆內配給的糧食減少了，緊接著連學校的配糧也減少，這讓大多數領導人的孩子受到了影響。因而學校中不時有學生昏倒，像是劉少奇的女兒就曾昏倒過，更嚴重的是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後來她因為健康受損，在大學時曾休學一年休養。[10]直到一九六一年，這些權貴集團中的家庭食物供應才有些改善。[11]不過困難時期也會有些因應做法，例如賀龍就設法取得米糧、牛奶，以車運送到孩子的學校去。[12]但不管怎麼樣，在這場災難中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劉少奇幾個較小的孩子就一直記得，在一九六○年危機剛開始（也是情況最嚴重）時的事，要等到新疆一位領導人請郵局送來一塊羊肉，他們全家新年那頓中餐才有著落；此外，他們的母親必須臨時去借來一些得體的衣服，才能會見來訪的阿富汗國王。[13]

大人們沒有告訴這些孩子的是，有數百萬人在這場饑荒中失去生命，還有引發這場災難的真正深層原因——那畢竟是屬於高層政治的範圍。而他們沒注意到的一些小事，卻是山雨欲來的徵兆。例如發生在兩家人之間的齟齬：每個人都知道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劉少奇的妻子王光

美彼此不和已久，但其他領導人家的媽媽們卻幾乎毫不避諱地支持王光美。[14]不過，對紅牆內人員而言，最糟糕的是貪污和瀆職的情形隨著物資短缺而出現了，有些人因此遭到不為人知的整肅而從中南海消失。一九六○年秋，毛澤東召回之前在他身邊擔任安全警衛工作而後下放到江西的汪東興，責成他對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特別是警衛，進行小整風的整肅；這些被整肅的人都出身農村，而整肅的最後卻是發現他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曾有過貪污或瀆職的不當行為。[15]

在一些瑣碎小事交錯中，大悲劇悄悄醞釀。當李先念兒子的自行車被偷、陳毅兒子開玩笑說要在身上綁滿炸藥的時候，中南海北門被貼上「打倒人民公社」和「中央各位首長，睜開你們雪亮的眼睛，瞧瞧農村廣大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的大字報。*[02]然而對紅牆內的孩子而言，這一切對他們絲毫沒影響：從一九六○年開始，在中南海原本一週才舉辦一次的舞會變成了兩次；週日的散步行程也依然那麼有趣……。[16]

黨輕巧的將注意力轉向青年，還有那些曾受到寵愛的孩子們。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四年間，下鄉運動又再次被大力提倡，要將青年送到鄉下或是較偏遠的省份去。但這段時間之後，這些領導人家庭關切的一樣著重在孩子們讀書這件事上，就我們所知，只有周秉德（由周恩來養大的姪女）和她的先生，被送到偏遠地區；他們都是教師，是被送去「支援」偏遠省份。[17]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更認真，由於他深深受到毛主義吸引，狂熱的實踐毛澤東幹部參加勞動的提倡，他從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每年夏天都組織幾個同學參加中南海警衛隊的操練；但當時可能有絕大多數的人，都由父母出面設法推掉這些訓練。[18]

我們還要說明一點，在這段政治動員和充滿災難的幾年中，這些太子黨和其父母，在一九五九及一九六二年與遭到整肅的幹部的孩子沒什

麼聯繫；比如曾經借住在彭德懷家的那些孩子即是；張聞天的孫子在失去倚靠後，也沒辦法和其他領導的孩子保持聯絡、往來；還有習仲勛的孩子（包括習近平在內）也受累於毛澤東對他的嫉恨，但他們在父親平反後應有權利也隨之恢復，紛紛進入好中學。[19]

這一代太子也對他們其中較年長孩子的遭遇渾然不覺。有一件讓人難過卻非常能說明一切的事件——在講這個事件前，先要提另一個晦暗又悲涼的例子，關於郭沫若的兩個兒子。郭沫若是當時有名的作家，深受當局吹捧。年齡較長的兒子叫郭世英，在北京大學讀哲學，一九六三年時發起一個小組，做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比較研究，在當時是相當大膽的行為，後來他和其他三個同學一起被舉發，他被送去「勞動教養」，雖然不久後被釋放，但卻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紅衛兵毆打致死。*[03]

郭世英的弟弟郭民英就讀於中央音樂學院，被揭發用卡式錄音設備聽「反動音樂」，被送往海軍部隊參軍，隨後即自殺身亡。[20]我們該認為這個例子只是個案嗎？暫且不談。除了郭世英，我們還可以查到的另一筆類似資料，提到陶鑄的姪子和廣東一位高階職人員的兒子曾一起唱頌揚卡斯楚的革命歌曲，在政治正敏感的當時，這種事的確可能挑動當局敏感的神經。[21]

從蘇聯歸來

蔡博之後，還有更多更讓人難過的事，發生在從蘇聯回來的領導人孩子身上。不過，這些遭遇可能並非所有自蘇聯歸來的人都會經歷，有些人依然過著不錯的生活。以孫維世來說，當外界流言蜚語對她的婚姻狀況大作文章時，她依然在官方文化工作的小世界中自得其樂；林伯渠的女兒林利，回國後得到一個不錯的研究員職位，也曾陪同許多代表團訪問蘇聯，其中就有兩次是陪同江青。[22]

有些從蘇聯返國的人境遇沒那麼好。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就被要求收起衣櫃裡所有的裙子，換上褲裝。朱德的女兒朱敏和其丈夫有兩年時間住在學校宿舍，沒和她父親住在一起；可能是因為她和父親之間的關係在那段時間有些緊繃；她認為自己在蘇聯受了不少苦，回國後黨應該相對要給些補償——她會有這樣的想法，也許是受到一些同儕影響。[23]

在這些幹部子弟中，最讓人難過的是一九六o年，毛澤東秘書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的自殺事件。陳小達是陳伯達第一任妻子在一九三四年所生，[24]陳伯達將他帶到延安，三年後將他送上從延安飛往莫斯科的第一班飛機，此後直到一九五一年為止，他都在那裡生活。嚴格來說，陳小達就是半個蘇聯人。在返國、再度前往莫斯科讀書之前，他因為不適應北京，到俄羅斯人占大多數的東北城市哈爾濱居住。完成學業後，由於他父親很清楚中蘇雙邊關係發生變化，在一九五八年將他召回，卻也開啟了他日後的一連串悲劇。由於陳伯達之前曾離過兩次婚，讓陳小達和自己的親生母親（第一任妻子諸有仁）相處得也不是很好。此外，陳伯達是大躍進時的意識形態旗手，而陳小達知道蘇聯對此的批評，也不

滿當局的政策。再加上受到中蘇關係交惡的失望情緒影響，也連帶讓他在工作上表現出問題。他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找機會講俄語，常常和以往在蘇聯讀書時的夥伴在一起，其中就有李敏和朱敏，他也因此愛上李敏。但在江青反對的壓力下，李敏不得不和陳小達分手，並且很快的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另嫁他人。一九六○年初的某一天，據說陳小達去找他父親，表示有事要談，但陳伯達當時正忙著處理和蘇聯間爭論的問題，沒時間見他，他便轉而去找母親（陳伯達當時的妻子，劉叔宴），卻也不得其門，最後在北京郊區的鐵路臥軌自殺。[25]

更轟轟烈烈的是劉少奇家發生的事。起因於三個由劉少奇其中一位前妻何葆貞所生，從蘇聯返國的孩子身上。何葆貞為維護共產黨，死於一九三四年。有些歷史學家推測，後來發生的事和他們的繼母王光美並沒有好好照顧他們有關。王光美出身於相當不錯的資產階級家庭，在當時各領導人妻子中是最出眾、年輕的。

劉少奇的長女劉愛琴，很早就被賣給別人作童養媳，後來由中共尋得並花錢贖回，在一九三三年將她送到蘇聯，在一所技術學校讀書。隨後，她和著名的西班牙共產黨領導人伊巴露麗（Dolores　Ibarruri）的外甥相戀，但這段戀情卻遭到兩邊家庭反對。劉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將女兒帶回北京，不久後，她生下一個混血兒，可以想見，這在當時的中國會衍生出多少日後的麻煩。爾後的日子，她和不太重視她的父親，維持著一段微妙而又疏遠的關係。[26]

何葆貞所生的另外兩個兒子的磨難，與長期反抗父親以及被迫切斷和蘇聯聯繫有關。他們的孩提生活和劉愛琴一樣，同樣沒有父親陪伴在身邊。不論在學業或是心理上，劉允斌都被認為是最值得期待的，劉少奇也對他能擔任中國留蘇學生同鄉會會長（這個位置讓他一度和毛岸英

有所聯繫）也很滿意，同意他在一九四九年後繼續留在莫斯科讀書，並很可能在那時建議他進入高科技領域就讀。一九五二年，劉允斌娶了一位蘇聯女孩為妻，生下兩個孩子。當時他想留在蘇聯，蘇聯領導人也同意，但劉少奇深知中蘇雙方關係就要生變，要求他盡速返國，劉允斌於是在一九五七年返回中國。他的蘇聯妻子在接下來的一年內兩度前往中國，嘗試著定居但卻無法適應，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王光美沒有盡力協助，此後，她就再也沒來過中國了。不久，劉少奇和王光美催促劉允斌再婚，最後他認識了一位也曾在蘇聯讀書的女孩，生下兩個孩子。這對夫婦住在戈壁沙漠劉允斌的工作基地裡，劉允斌在那裡和另一位曾在蘇聯留學的同事負責核能及航天方面的研究。在文革時期，紅衛兵摧毀了劉允斌本來就脆弱的精神，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心懷絕望地臥軌自殺。[27]

三個孩子中最小的劉允若的遭遇也同樣悲慘，但比起兩位兄姊來說更具獨特性。他約莫出生於一九二九或是一九三o年，一九四二年開始在上海流浪，一九四六年被尋獲，後來送往莫斯科就讀航空學院。他很快就面臨兩道難題：一個是他喜歡讀的是文學，另一個是他想娶一位蘇聯女孩麗塔（Rita）為妻。也許是受到處理劉允斌婚姻失敗的挫折，再加上中蘇關係惡化，劉少奇這次完全沒有商量的餘地，不同意就是不同意，要求劉允若隻身返國，甚至說出「進了我家門，就是政治」這番話。這件事確實有政治意涵。蘇共第一書記赫魯雪夫就曾拿著一封麗塔向他求助的信，向劉少奇表達他支持這對異國鴛鴦，但是這個舉動卻激怒了中共領導們。即便這對年輕情侶後來仍有一些書信往來，劉少奇仍鐵了心反對到底。

劉允若畢竟不像他哥哥，不願束手退讓。他拒絕了之後其他人介紹

來的所有對象，而他悲劇的命運走向，也自此大致底定。一九六四年，他被送到部隊，隔年參加在河北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已知的太子黨例子裡，他的行為舉止相當特立獨行；例如，他看到農村慘況，質疑：「為什麼解放已十多年了，這裡的農民還是每天喝玉米麵粥和吃玉米麵餅子？」針對政治整肅，他也質疑：「為什麼只要憑著有人揭發，就可以認定是誰從集體裡貪了東西？如果他否認，怎麼辦？難道不應該有法律上的證據嗎？」在他所寫的見聞錄中，表達出對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對德國音樂的仰慕。

劉允若的多言或許是因為相信自己特殊出身背景的庇護。但當文革一起，過去累積的帳便接踵清算。他被關押八年，於一九七四年釋放時已是疾病纏身，而且性格孤僻，最後在這場苦難遺留的傷害中死亡，約在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28]時去世。*[04]

中共的領導菁英和太子黨們，究竟如何看待這些悲劇？我們不得而知。這種事可能只是在高層間流傳的消息，也就是說，流傳在一群不在意這些消息會不會進一步傳開的人之間。這些消息也同樣流傳在另一群封閉而小眾的群體內，也就是曾經在蘇聯留學的留學生們之間。

往後數年……

再怎麼說，上述這些悲劇在歷史潮流中只占邊緣位置。不過詭異的是，儘管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四年間發生這麼多悲劇，這段時間卻一樣在動盪中有精采。對權貴集團和這些領導人的家庭而言，在這段緩慢流轉的時間裡，就算生活中充斥著高音喇叭和單調反覆的宣傳口號，他們居然還有著一絲幸福感。

最讓人不得不正視的，是領導人的老化問題。這批在中共高層領導職務上的人大多生於一九○○年前後，取得了政權十年後，大多數人都已五十多歲。然而內戰時的生活環境對健康造成了損害，之後他們又沒能好好保養，尤其在遭逢大躍進期間。因此，即便醫生再努力，他們的健康情形仍然如江河日下。毛澤東就因為憂慮自己的身體狀況日漸不佳，搭乘專列往來於專門為他保留的各個療養處所，其他領導人則依習慣，倒會帶著家人到停留的住所休養：冬天到大連，或特別到廣州、福建，夏天到北戴河或是青島，季節交替時則去上海。[29]即使如此，健康因素仍讓這批當年內戰勝利者的隊伍日漸衰頹。林伯渠、羅榮桓、陳賡均歿於一九六○年代初期，而其他的領導人也都可以看得出明顯的形體衰頹；其中像劉少奇，他在一九六一年知道大饑荒的慘況（上千萬人死亡）後就心神大傷，一九六三年更罹患肺癆。另外還有陳雲和林彪，他們也都曾因病停職[30]……這些例子讓許多領導人開始有所警覺，從一九六二年起，開始定期到北京醫院作檢查。[31]

對一些人而言，我們不排除這時的困頓不僅來自於政治上，也同時有精神上的原因。他們將希望傾注於新的政權，也同時傾注於帶領他們取得內戰勝利的毛澤東身上——畢竟像康生一樣虛偽的人還是少數。但

他們隨後發現，治國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於是也寄望毛澤東能以大躍進找到一條盡速進入共產主義的道路，而這條道路，換句話說就是依靠群眾路線、揚棄菁英治理。然而，大躍進帶來的卻是一場災難。這怎麼能叫他們在心理上還能再說服自己去相信？當孩子們質問時，除了沉默以對，他們難道還有更好的選擇？[32]

知識界和群眾之間，也開始出現了一些心理變化。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就曾深刻反省有關的教條，並對他的兒子表示，道家《道德經》裡就充滿了辯證思想；魏京生也回憶，他那曾任高級幹部的父親，當時躲進了驚惶保守的謹小慎微裡。另一位有相當級別的省級領導幹部的兒子也表示，那時他的父親「完全變了一個樣，再也不是以往那個嚴守規定的人」。江西首長的妻子也曾說出當時的一些實際情況，她透露，在那段糧食供應困難時期，一些省級領導人還會利用開會的機會，順道進京一遊。[33]至於其他的領導人，似乎依然自顧自的悠然在衣食無虞的舒適生活中。[34]

對最高層的領導來說，設法了解情況和進行調查是首要之務。就連毛澤東也無法逕行反對，只能找方法轉移其他同僚對責任歸屬的追究。當他們思索著要如何重新振作時，許多領導人紛紛回鄉探望，劉少奇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第一次回到湖南老家，當時見到的景象讓他忍不住落淚。[35]

許多領導人的身心俱疲也讓家庭產生了相當的變化。在家中，較年輕且充滿活力的太太們地位愈來愈提升，擁有的優勢也漸漸擴大，這也要拜提供給她們的家事服務人員所賜；林彪的妻子葉群就有三個人服侍她，此外照顧小孩的責任還交給了他們喜歡的一位女管家。[36]有許多這些領導人的妻子，後來活超過九十歲，有些人活得更久，上看百歲（例

如任弼時的遺孀）。

對不少家庭來說，這衍生出了權力掌握在誰手上的問題。有些女主人就是家裡實質上的權力中樞。例如陳毅的妻子，就連丈夫吃什麼、抽多少菸、喝多少酒都緊迫盯人，搞得他有時會以離婚相脅，還向好友周恩來求救。[37]另外藉由襄助先生的機會，這些夫人們也就因此得以插手政治。像是林彪，因為頭痛的毛病讓他經常不能親視公務，就委由妻子代為傳達對下屬的指示；劉少奇要王光美參與一九六三年秋天發起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卓琳則是在大躍進期間，積極向鄧小平建議她的想法，而鄧小平也應其所請。[38]夫人們重獲影響力，也讓她們找回新的社交生活。江西省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太太，就在她的回憶錄中坦誠地表示：從大躍進開始，私下召開的會議愈來愈多，許多夫人們也跟著四處走動，開始有更多的機會彼此碰面、討論，相互品頭論足。[39]

孩子長大了！

領導人的孩子們陸續成長，而父親的衰老更增添了他們的分量。對這些家庭孩子和整個權貴集團而言，孩子們代表著未來，是能讓領導人們在議中分心他顧的唯一原因，也是在彼此對話時可以唯一不具政治味的話題。所以當朱敏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受傷時，朱德雖然從這女兒自蘇聯回國後就沒認真對待過她，卻仍派直升機將她接到北京就醫。[40]

在這之後劉少奇和王光美發生的事情，更坐實了上述的想法。文革中，清華大學蒯大富和其紅衛兵組織編造他們女兒車禍的消息，將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出他們深居不出的中南海紅牆外，成功抓住王光美進行批鬥。

較年長的孩子們，也就是曾生活在延安或是莫斯科的那些人，顯然是這些家庭中承擔最重的。他們的繼母為了面子，想方設法要讓他們回到以往擁有一切的生活。第一步是將孩子送進大學，就算學業成績不佳，她們也竭盡所能讓他們就讀的中學能夠重視這件事。第二步是動用手段讓他們能找到好工作——不能一下子就讓他們坐上領導職，這是政治上不得不然的謹慎。朱德待兒子就和女兒一樣，並非積極照顧，只將他安插到一個不起眼的鐵路職位上。周恩來則是敦促他的晚輩們從軍，只是這種做法也沒什麼人跟進。曾山讓兩個孩子去當個普通的工人，而他們後來都進入了官場；他把主要希望寄託在長子曾慶紅身上，將他安插在國家計畫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余秋里的身邊當秘書，好讓曾慶紅往後的仕途能順遂又長遠。[41]這樣的安排成為一種模式的開端，在往後愈來愈普遍：將表現最好的兒子安排在自己任職領導高層的朋友身邊。

最年長的那批太子黨也到了開始談論婚嫁的時候。實際上，早在一

九五○年代初期就已有公開辦過一些人的婚禮，那時的場面非常簡單。像是朱敏，她的婚姻還曾因為丈夫只是駐俄使館一名小秘書，而且僅是省級軍事院校畢業，引發了一些的議論。周恩來的姪女周秉德曾有過一個在蘇聯留學的大學生對象，在被勸阻後，嫁給一個同樣任教職的丈夫。[42]一陣子過後，權貴集團裡舉辦了真正重要的婚姻大事，毛澤東和賀子珍女兒李敏和聶榮臻女兒聶力的婚禮。

總是被人視為處於這種權貴等級頂端的李敏，下嫁的丈夫是一位後來歸附中共的原國民黨將領之子。*[05]當時在政治上還沒有那麼狂熱，因此這個婚姻還是被普遍接受的。李敏選擇孔令華，極可能是因為他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因為她長期忍受繼母江青對她的責罵，還要面對生母的哭訴）。婚禮的賓客名單由毛澤東親自擬定，盡量減少受邀人員和繁文縟節。[43]

聶力是聶榮臻的女兒，曾在蘇聯讀書。她的婚禮帶出隨後三個領導人子女的婚姻，他們在文革後的數年間相繼完婚。聶力於一九六一年成婚，婚禮在隆冬的廣州舉辦，在當時是一場高層社會的盛事，有一半以上的元帥到場參加，致賀年輕一輩接班人事業啟航。[44]這場婚禮是往後一連串領導人子女婚配的開端，他們的結合大多是被安排的，有的人是為了繼承家業，有的人則為了家族財富。

家庭包辦式的學業與工作

大部分權貴後代這時候還沒到就業、結婚的年齡，都還在一些知名的中學裡就讀。對於成績差強人意的，父母就讓他們參軍，或者用一切手段讓他們擔任公職；課業表現好的，父母就會幫他們認真規畫。進哪一所大學？自然是找最好的，對紅牆內的家庭來說，當然是知名傳統大學清大或北大這兩所擇一。這兩所比起另一所由蘇聯捐助成立的人民大學，以及培養未來教師而受女孩歡迎的師範大學來說，比較受權貴家庭青睞。至於其他大學，或是位於他省的大學，只有在這些大學提供特殊課程或為培養特定專業，一般的將領或是副部級領導人的兒子才會選擇就讀。

在所有考量之前，父母們最上心的是爭取中學畢業後不必經過大學入學考試，就能直接進入大學的保送；一般的學生都必須通過入學測驗才行。有些學生由於家長成分不好或是太窮，連想都不敢想進大學讀書這件事。[45]權貴集團的父母們很快就動作起來，爭取這個難得的入學捷徑。在爭取入學這方面，元帥賀龍夫婦為兒子用的心力之深人盡皆知。他們的兒子學業成績太差，考試無法達到入學要求，以致一直留在高中第三年補習，最後才被清華破格錄取。[46]元帥陳毅在這方面也不遑多讓。還有曾權傾一時的北京市負責人彭真，一九六三年時不接受北京大學拒絕錄取他那未達到成績標準的女兒傅彥，而直接將申請資料送到校長本人手中。很快地他就得到回覆：錄取！[47]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工作分配了。這方面一直是家庭內和朋友間反覆討論的話題。這是一家之主出面的時刻，由父親出手規畫未來的發展藍圖。今日西方人對於這樣的規畫結果應該極感意外：大部分的領導人對

子弟的未來規畫方向並不傾向政治，而是朝向科學和技術工作。這種不看好政治職務的狀況，在共產世界並非首例；蘇聯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Beria）就曾要兒子避開政治這條路。[48]對孩子前途期望最深的父親們，會努力幫兒女做出最宏遠的未來職業發展領域規畫。陳毅就分別將他的三個兒子分別往技術、工業和農業的領域而去，女兒則從事外交工作。他曾對家人說：「現在是新中國了，政治方面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正在下決心解決發展科學技術推動經濟建設的問題。」[49]而羅瑞卿為了讓三個兒子記得他的期望，將他們改名為「箭、宇、原」，就是「火箭（導彈）、宇宙飛船（人造衛星）、原子彈」的意思。[50]

只要是有用的領域都會被考慮進去。例如，有些比較能跟上時代的領導人就將女兒送往製藥廠工作。[51]他們認為健康產業是有發展的領域，女兒未來的能力會對他們有利，特別是對健康方面會有困擾的父親而言。另外一個比較具有爭議性的想法是送子女去海外讀書，其實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已開始低調挑選赴海外的學生。有些父母可以接受這種安排，諸如林彪和陳雲，有些父母則否，他們認為書還是要在國內讀。[52]在大學中要選擇哪一個專業或科系，除了看教授是否合適，父母也會給予意見；例如李先念，他就不准子女從商。[53]

孩子畢業後，到了該找工作的時候。多數的父母都會動用關係，像上將楊成武在就一九六五年安排女兒楊毅到《空軍報》擔任編輯。這些安排來的工作都不會太吃力，太子黨內有的領頭者在一九六○年代初期，還進入機關部委、大工廠或是部隊裡工作，這些人至少在文革時可以不致受到太大衝擊。[54]

屬於權貴子弟的學院

社會上一些非議可能傳進了高層領導人耳裡，尤其是關於軍中高層幹部家庭。考量到他們的孩子必須由民間教授認可才能從事高等研究，加上一般大學在國防課題方面都相當受節制——當時軍中林彪勢力在相關國防政策上的影響益形重要；可能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使得進入位於哈爾濱著名的軍事工程學院就讀，在一九五○年代末成為一股受眾人追擁的潮流。*[06]

哈軍工的歷史有些特別，值得探究。似乎是在一九五○年代初期，由史達林親自提出要成立一所中蘇雙方合作的軍事學院的倡議，這也是為什麼會選在東三省北邊蘇聯人占多數的哈爾濱設立這所學校。創設時不但有蘇聯專家大力幫忙，就連學院相關的規章制度都由他們主導設立。[55]一九五三年九月，學院正式成立、開學，由先後在越南及北韓戰場上立下名聲的大將陳賡主持院務。但就算是在一九五四年出任副總參謀長職務的陳賡，在工作上仍遭遇到一些麻煩：學院中的一些老師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五七年遭北京下令整肅、受到某些元帥反對，不過最重要的，還是中共和學院設立時出力甚多的蘇聯關係惡化。無論如何，從蘇聯於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切斷軍事援助開始，以及成立核子物理系後，哈軍工成為了權貴集團子弟們的嚮往之地。[56]哈軍工受青睞的程度，可以由一些家長甚至想要自己的女兒就讀看出，這促使了後來時任總理的周恩來親自介入，讓原本只收男學生的哈軍工開始招收女生。[57]

哈軍工之所以成功，主要是呼應了那個年代的廣泛需求。朱德曾簡要的在對他孫子的談話內容中這麼說過：「稍後你要申請進入這個學院就讀，因為未來的戰爭肯定是高科技戰爭。」而正當毛澤東和林彪還在

公開讚揚小米加步槍的游擊戰爭時，參與建設導彈戰力已經成為學生進入學院就讀最大的吸引力。[58]學院的入學條件似乎也比進入大學要來得寬鬆，這不只有利於那些出身高幹家庭但成績差強人意的學生，也對那些出身較一般（在統治菁英中較一般）且成績遠難達到要求，媽媽也沒能像領導人夫人般擁有較好學識的孩子有利。

從一九五○年代末起，統治菁英家庭的孩子們開始湧進哈軍工，讓學院愈來愈像貴族子弟學校。一九五九年，兩位元帥的兒子和毛澤東姪子的名字赫然出現在入學名單中，在權貴集團中造成轟動。然而，這也讓學院領導們開始思考：這樣的招生情況會不會引起黨內，或是主席的批評？一份一九六一年的內部調查顯示，這所學院中大多數的學生都有一種優越感。同年七月，中央軍委在會議中揭露了這份調查結果透露的現象，並決定從那時起，入學學生必須通過全國大學入學的高考統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毛澤東重新取得權力的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之後，突然爆發一事：有位父親只是普通將領、曾在學院就讀的學生，被查獲看色情影片和收聽違禁廣播《美國之音》。一份有關學院學生的報告於一九六三年四月提出，提及估計有約占十八．五％的學生，不論是在學業或是作風上都「思想落後」，引發後續對於學院「不正之風」的整改。*[07]學院此後開始失去它的光環，北京的大學也因而從中得利。[59]

青少年太子黨

中共這份報告中表達的批評和憂慮，證實了一個這些權貴家庭一再忍受卻不知要如何處理的事：這批太子黨的青少年時期。官方出版的教育書籍中連篇累牘地叮囑家長必須要留意孩子的這個時期，卻沒什麼用，有些領導人家庭甚至在這方面完全沒有把握。楊尚昆在個人的日記中就透露了他的不知所措，一下子對兒子的行為感到不安，一下子又因為給了次子一些建議而洋洋自得，一個禮拜後，他又把女兒罵得大哭一場，也讓自己的情緒激動難平。相反的，劉少奇在這方面就氣定神閒，他在其中一個女兒十四歲生日時，和王光美聯名寫了一封成篇說教的信，信中充滿著如下的句子：「妳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妳的理想是什麼？」、「妳是不是真的能成為一位共產黨員？」[60]而經常言必稱劉少奇的林楓，對女兒也十分嚴厲，有一次責罵當時剛考上清華大學的女兒時，甚至上綱到：「以前是反革命的老子有革命的兒子，現在有可能是革命的老子有反革命的兒子。」[61]

在進入青少年時期後，這些孩子在家裡的地位開始改變，他們說話愈來愈大聲，且會毫不遲疑地提出個人意見，父母也愈來愈花心思關注他們的表現。也因此當父母收到一些關於孩子教養或行為的指責後，有些人便會帶著較年長的孩子一塊前往外地出差；劉少奇就是如此。有趣的是，這種情形從大躍進失敗後開始增加，似乎是在這段政治挫折期間，家庭成員更需要彼此緊密相依。[62]

父母們對孩子的謹慎注意事項，更常見的是會與當局，或夾雜著與當局亦步亦趨的作為，當然，這也在他們的回憶錄中表露無疑。有位將領曾帶孩子到天安門廣場看國慶煙火；胡喬木也曾帶孩子到中南海的游

泳池游泳，並將他們介紹給毛澤東認識。此外，還曾有幾次大夥組織起來到鄰近「南海」游泳的紀錄。[63]

那些稍稍長大了些的孩子，身上的限制則都放寬了一些。賀龍的孩子帶著朋友去看父親辦公室和配發的槍枝，大家對他這麼做都睜隻眼閉隻眼；陳雲則是讓兒子陳元閱讀原本限制只能給領導人看的「參考消息」。部分父母對女兒的關注更甚。像是楊尚昆，當他得知他女兒要作放射治療時，心中惴惴不安，召來醫院院長和放射科負責人詢問。[64]還有許多家長不再要求女兒一定要加入共青團，並且允許她們去學在她們那個年齡感興趣的事。[65]

雖然如此，仍然存在一些限制。女孩子的衣著依舊被緊盯，此外還有電影，儘管孩子們有時會抗議，播放的管控仍嚴格。[66]兩性關係尤其被嚴密的審視，家長要求男女分校。當時除集郵外，男生和女生玩的遊戲也不同。男生玩打仗和組裝收音機，女生們則是在為她們父母舉辦的舞會裡努力跳舞。[67]或許青年男女間有些小小的愛苗在滋長，但畢竟這種情況在當時極度不受允許，以至於不論是記者或是傳記作者在這方面都不曾有著墨。一些通常在男女生間會出現的小小「遐想」，只會在他們記述北戴河度假期間的經歷時才偶有出現。[68]

無論對年輕人態度有多開放的那些領導人，一旦面對自己的子女，就變得和其他人一樣嚴厲，而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在那個時代，這種嚴格要求被說成是因為要適應黨所創造新社會需要。雖說如此，不過不只領導人對家中的年輕人會嚴加管教、要求，當時中國其他家庭對此的態度也是一樣嚴厲。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時會發生一些激烈狂暴的行為呢？上述情形很可能可以提供一部分解釋。

提供自我肯定的新場域

中南海原本是讓孩子們遊戲的地方，同樣成為他們得到自我肯定和表現的場域。太子黨在那很快認識了紅牆內的重要人物，例如號稱是真正抗爭者的蔡暢。他們也曾在路上和高層領導人交身而過，當然是在父母的告知下，他們才會知道是哪些人，也有機會尊敬地向他們致意。這種機會不少，像是在游泳池會看到毛澤東，在食堂會遇上朱德等。膽子大的孩子這時候還會上前和他們說上幾句話，像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就和中南海警衛負責人汪東興很熟。劉少奇最寵愛的女兒劉濤更是出奇的大膽，一次在巷子裡遇到毛澤東，她居然提出請求，希望毛澤東能讓她爸媽准許她轉系或轉學其他專業。毛澤東不久之後寫信給王光美，建議她尊重孩子的興趣。這封信讓劉少奇和王光美不太高興，很快就回信向毛澤東解釋。[69]這個小故事說明，在劉濤不了解毛澤東和劉少奇彼此間複雜的恩怨情仇和毛澤東喜歡逗弄對手的前提下，她只是單純的認為可以對紅牆內的大家長傾訴問題而已。這樣的環境生活，增長了這些權貴子弟們的膽識和信心，畢竟這些「大人物」們就在他們的左鄰右舍。

就算在生活中有著對重要事務的保密措施和處處存在的監控，權貴集團本身仍是一個小社會，不論是較年幼或是稍長一些的孩子，都能察覺出存在於這些領導人同僚間的親疏遠近甚至不和，以及曾為戰時袍澤兄弟間的情誼。大家也對機關單位或是個人間存在的隔閡習以為常。例如，頗受林彪提拔的高階將領李作鵬，在與林彪對手賀龍間交談，僅有一次能放鬆的話家常。[70]

還有一些和這些大官夫人們有關的小道消息，在家事服務員和警衛間流傳著。其中就有一則是關於在王府井大街九十八號，保留給領導人

購物的特供處所發生的劍拔弩張事件。[71]該事件發生在林彪妻子葉群和陸定一妻子嚴慰冰之間，這兩人在延安時已有夙怨，後來林彪曾收到多封匿名信，譏諷他床笫無能、葉群風流放蕩。葉群當時就懷疑那是嚴慰冰之作，後來也證實的確是如此。這件事並未就這樣結束，隨後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又再度爆發。

一些家庭間也有真實的情誼，彼此的孩子們能維持長期的往來。這些家庭常常在週日下午碰面，他們的孩子也利用這個時機經常玩在一起，像是同是四川老鄉的陳毅家和鄧小平家即是。在權貴集團內和其他地方一樣，同鄉情分、飲食口味，以及夫人間和孩子間的氣味相投等因素，都是家庭和家庭之間能否建立通家之好的主要關鍵。

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同校就讀的同學之誼所形成的團體持續最久。這些團體的多樣化和影響力隨著其中的重要人物而動見觀瞻，例如陳雲的兒子陳元、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陶鑄女兒陶斯亮、王震的兒子王軍、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以及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寧。[72]

這種基於友情而形成的團體很值得進一步研究。依據所知，這些團體的形成並不能從他們從事的工作或是父母的政治屬性來判斷；像是陶斯亮（其父曾在南方主持大局，但未晉升中央最高領導人之列）的朋友圈中，就有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林彪的女兒林豆豆、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她們彼此往來時都已經過了中學階段。[73]另外，賀龍極有個性的兒子賀鵬飛，和四個被認為比較偏向「文職」領導人家庭的孩子始終保持往來：鄧小平、李井泉（曾任四川省委書記）、彭真（曾任北京市委書記），以及劉少奇家族。[74]也因此我們要再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當例子，他曾經在「八一中學」和四個太子黨成員結成一個圈子，一九八○

年代時，他又在自己發起的極具影響力的基金會中網羅了這些人。

在那段艱困時期和隨後漫長的療傷止痛過程中，也多虧了這些他們享有的特權，這批太子黨才能夠在權貴集團和家庭的雙重保護下安然度過他們的青少年時期。他們當時無法理解毛的算計，要在日後親身經歷過，他們才能在後見之明的字裡行間中看出些端倪。例如，毛澤東很快突然對青年們示好，而劉少奇卻受不了因為毛澤東縱容這些毛頭小子而製造出的喧鬧，將他的辦公處所搬遷到別處。[75]毛澤東對紅牆內的孩子們親切相待，對一般青年們愛護有加的態度更甚於自己的孩子；他的骨肉連想要見爸爸一面，都還要透過預約才能安排時間，但至少他對毛遠新（暱稱「小毛」）與他自己親生的兩個女兒，倒都還一視同仁。後來毛澤東也選擇將他一九六四年七月和毛遠新的談話內容作為討論文件下發，在這篇講話內容中，他埋下了幾個對教育問題甚具煽動性的「爆雷」，廣泛的傳達出去。[76]

此後，毛澤東開始四處散布他對教育中威權充斥的不滿，並表達他曾經在一九五八年批評幾個同僚們在教育小孩一世上太過於縱容、放鬆，卻沒得到任何回應。[77]他尤其認為一般領導人家庭在重視學校課業成績這種事，其實不必太過認真。接下來，一九六五年的一整年間，毛澤東利用不同的場合和方式表明他認為教育中講政治講得還不夠，更用重話批評高層領導人的小孩，認為他們簡直就是「災難」。[78]

接著在幾個月之間，愈來愈多的耳語四處流傳，打擊著紅牆內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們的形象。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又在一九六四年對外宣稱領導人用的秘書太多，並表示：「如果什麼事都讓他們做了，還要部會首長和辦公室主任做什麼。」[79]但許多報紙並未重視他的發言，同

僚們也都消極的不予理會。另外一所軍事學院裡的某位學生，在他的日記中記述著他發現林彪和陳毅兩人對於「又紅又專」的講話彼此矛盾。一九六五年八月，個性謹慎自制的劉少奇，曾對女兒劉愛琴透露：「黨內也存在著鬥爭。」[80]那一年夏天按慣例的北戴河假期，被中央委員會取消，說明了劉少奇這句話是對的。劉源和一幫紅牆內的少年加上另外召募的一些志願者，還被安排替重要處所擔任警衛。一九六五年下半年，所有領導人家都分得一本剛印好的「毛主席語錄」，只是當時還沒有任何評論。[81]

沒有任何徵兆顯示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場風暴將臨，太子黨中沒有任何人能意識到接下來的悲劇。原因在於，他們先是在之前大躍進慘狀遍地時沒有反應；接著在大躍進中沒受到太大波及和損傷的這些人，又從權貴集團那得到不應得的補償慰藉；最後，他們對自己已然站在光明前途起點這件事深信不疑而無心他顧。當時也沒有人清楚、理性的觀察和分析發生的所有事，就算這些太子黨的父母將陸續發生的種種讓人不安的現象都看在眼裡，卻不敢想像毛澤東竟然真的會做到如此決絕。尤其是接下來毛澤東召喚出來的文化大革命，危及到權貴集團和權貴家庭的存在：雖然日後仍有正面影響，但開始時造成的震撼著實讓人驚懼。

第四章
危機四伏（1966－1971）

在本章開始之前，我們必須再次強調：對於即將來臨的危機，權貴集團的子弟們比他們的父母更為遲鈍。和現實脫節的他們，只耽溺在自己的幸福和特權中，這些權貴子弟可說是長輩們執行資訊管制下的第一批受害者。在連哄帶捧下，他們根本看不出父母和同僚的和與不和，更遑論要從父母對媒體大力吹捧「毛崇拜」表現出的無言以對裡，看出些什麼來。

多數太子黨不了解有些人工於心計，也就不會懷疑這些人會帶來危害，其中毛澤東有著崇高的形象，江青、林彪、康生、陳伯達隱身於幕後，而且和自己的孩子又有著距離。就算是劉少奇和陳毅之流，偶爾會和子女交換一些意見，但他們的孩子又能了解多少？毛澤東從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啟動他精心設計的整肅行動，展現出的圖謀太過於深遠，也遠非這些孩子能想像得到的。

毛澤東為奪取絕對權力而採取行動，開啟連串激進而血腥的事件，太子黨們生活的世界便在一九六六年夏天一夕丕變。從他們被連篇累牘的宣傳文字包圍開始，就已身陷劇烈的權力鬥爭，只是當他們變成少數派而身居弱勢時，才開始被迫要去適應這個極權體系的政治圈、這一段可怕的經歷。

一馬當先的太子黨

依據蕭小紅女士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有關的出色研究，突如其來的文革，開始於一群太子黨們不知所以的激情表現。她引用對許多人的訪談資料，表明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六年間，他們確實在各中學或大學裡有些不同以往的舉動：起而反對老師和行政幹部、與其他學校同儕間的齟齬對抗，以及對於反「修正主義分子」和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寫給林彪信中所傳達，帶有煽動性的革命語言*[01]愈來愈深信不疑。這股對意識形態的激進化也吹進紅牆內，一些太子黨為了表現自己的熱情加入中央警衛團。[01]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在一九六六年夏天還拒絕前往北戴河，宣稱「等到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能去北戴河的時候」，他才去。[02]

蕭小紅的研究能解釋，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前一個月，在北京最好的幾所中學所發生的事件中，為何有許多太子黨成員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蕭小紅列舉了幾個人的名字，我們往後內容都還會再提到他們：劉少奇的孩子劉源、劉平平、鄧小平的女兒鄧榕、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永、孔原的兒子孔丹、董必武的兒子董良翮和陳毅的兒子陳小魯。[03]在一九六六年夏季，他們號召各中學和大學裡和他們有志一同的同學，成立了一個大團體，擴大紅衛兵運動規模，並將穿著綠色軍裝作為一股風潮：代表是毛主席的好戰士。八月十八日，紅小將們蜂擁迎接文革第一件大事：毛澤東首次接見來自各地的紅衛兵。當天，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隆重地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的紅袖章。[04]

太子黨們在文革前幾個月十分活躍，而且並不只限於在中學和大學。像是康生的孫女，就還可能牽涉到發生在北京附近大興縣的「殺地

富分子」*[02]事件。[05]許多太子黨中高幹子女都聚集北京參與暴力事件，他們服膺當時盛傳「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這種主張合理化他們的行為。

從十月開始，毛澤東命曾任其秘書而後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向外布達，要這批太子黨團體收兵。不久後，就像蕭小紅所寫的，大家開始明白，先前的這些亂象，只是毛澤東拿來利用、引爆的「雷管」。此外，大家也可以想像得到，毛澤東並不排斥這種利用完這批搖旗吶喊的人掀起文化大革命，再設法將他們清理掉的做法。

在文革初期，孔丹是太子黨中最知名的代表性人物。他是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的兒子，生於一九四七年。由於他的語言天分（他自學英文，在當時很少見）和對事情的衝勁，被大家注目。一九六六年八月，在面對劉少奇兒子劉源的競爭下，他以高票獲選為北京四中革委會主任。[06]在往後一九八○年代的中國經濟發展大潮中，他也扮演了要角。

但太子黨內也不是所有人的意見都一致。在當時被認為應該是毫無雜音的體制和社會內，文化大革命也有著多種樣貌。因此，當賀鵬飛（賀龍之子）和劉濤（劉少奇之女）在清華大學領導紅衛兵運動時，在北京大學的鄧樸方（鄧小平之子）和胡德平（胡耀邦之子）正冷眼旁觀這場運動。[07]陳毅兒子陳小魯，在「北京八中」拒絕退出共青團加入紅衛兵，見證在當時有勇氣獨立思考的精神還是存在。

一些插曲顯示了文革最初的幾個月政治風向的變幻莫測。陳小魯在其中表現得積極參與，他和幾位「四中」和「六中」的同學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西糾），而隨後在文革中表現得極度積極的孔丹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也跟著成立「東糾」。他們在十一月時聯合三個「分隊」*[03]，在十二月五日成立「聯動」（首都中學紅衛

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革命幹部子弟」「在黨的領導下」忠誠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個在政治上或知識上都有問題的主張；要「忠於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08]十二月二十六日，這個新生組織舉行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大會，而逮捕行動已陸續展開，超過三百多個聯動成員被關押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橋監獄。[09]

不同的資料都曾指出，周恩來曾私下成立紅衛兵組織，但到底他有沒有甘冒風險這麼做？對於他這種向來小心謹慎的人而言，我們存疑，然而，他倒是有能力藉由中間人在財務上支持像聯動這樣的組織。無論如何，譚震林等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抗爭的時候，*[04]據信他可能藉此讓毛澤東知道有關這些「糾察分隊」的活動發展，讓他同意釋放一些主要的紅小將們；當時還辦了接見會，讓一些主要領導與這些被釋放的幹部子弟會面。[10]同一個時期，上海市的領導們，還曾經操控一個由幹部子弟活動其中的紅衛兵組織。[11]

事實上，站在文革運動前頭的太子黨們，愈來愈投入這個狂潮，隨之逐漸改變交往的朋友和自己的喜好，有些人還到自己父母認識的領導幹部家裡去抄家。劉少奇在這件事上，曾以法律觀點諄諄告誡過他的兒子不要這麼做。但即使如此，一九六六年夏天，有不少幹部子弟參加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還是打死了他們的校長。*[05]

父母們在做什麼？

隨著時間發展，幹部子弟也遭遇了先前無法預知的情況：當他們的父母被毛派人馬指為鬥爭對象後，他們要選擇站在哪邊？有極少數人幡然醒悟，選擇和這場運動保持距離。楊成武的兒子就因此進入軍隊，陳雲的兒子陳元也似乎接受了父親給予的意見，畢竟陳雲對政治上這套東西了然於胸。[12]有更多人失去原本該有的純真，或是付出了更大的代價，像是李井泉的兒子，就在一場紅衛兵的武鬥中喪生。[13]

其他部分青年仍然選擇心向父母，恐懼著這項運動。也有一大部分人仍然在包括激進派在內，各種派別橫生的紅衛兵運動中積極活動，這畢竟是讓他們比較容易表達自己政治主張的方式。像是湖南省某個高幹子弟楊曦光，選擇極左立場；*[06]在北京，劉少奇的女兒劉濤位列清華大學紅衛兵領袖之一，當她父親成為文革某派系的鬥爭對象時，她也毫不猶豫的公開批判。[14]有些太子黨成員得到某些消息時，則會先向父母示警，例如張聞天和曾任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的兒子即是。[15]

還有許多領導人被子女舉發。林彪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兒林曉霖就是其中之一，但當時林彪仍然穩坐軍方主要負責人位置，並受毛派陣營支持，於是針對此事發表公開聲明，並將林曉霖押送到新疆。其他領導人就沒能像林彪那樣有力量保護自己。至於究竟有哪些領導人有過被子女揭批的遭遇，這個問題直到最近能見的資料裡，對此的描述還是模糊且欲蓋彌彰的。[16]

大部分的幹部子弟在暴力橫行的紅衛兵組織前難有其他選擇。例如稍晚一些時間，中南海的造反派就要求鄧小平的子女舉發父親。[17]這些參與紅衛兵的幹部子弟，有的也對他們父母做出令其難過的批判，這些

批判一併揉雜進了他們之間舊的衝突和裂痕。例如劉少奇的兒子劉允真，他想往自己有興趣的攝影領域發展，劉少奇卻認為那種工作太過於平庸而插手阻止，使父子間有了心結。[18]大部分的批判都是杜撰虛構，最輕的就是作家王蒙，藉由他小說人物之口對他父親所說的：「您們只要求我們、只允許我們做守業者，做接班人……現在，我們該自己教育教育自己了，該自己去選擇自己要說的話。」[19]這就是這批長久以來被父母光環包覆，退化為只能接班的年輕人所做出的反彈。

在江青那幫人操控下的宣傳、警察和特務機構，將這些揭發糾鬥握於股掌之間。有證據證實，一位紅衛兵帶著康生和公安部長謝富治到清華大學，要求劉濤揭發他的父親。[20]其他參與運動的幹部也毫不猶豫的直接介入；一九六七年夏天，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就在批鬥王光美的現場，監看施加在王光美身上「噴汽機式」*[07]的凌辱，只因為她是劉少奇的老婆，而且深受其母江青的厭惡。[21]

時至今日，人們傾向對外提出一些資料，以示文革那段艱苦歲月中家庭成員間的忠誠，但這些資料的片面性，讓各種杜撰的謊言和捕風捉影的小道消息仍能四處傳播。會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因為當前在位掌權太子黨的合法性，有一部分就來自於他們曾經參與反極左鬥爭，但這場鬥爭後來演變為動亂。

文革後來覆滅的主要原因在於它政治上的失能。如果好好加以引導，紅衛兵運動或許可以轉向，成為加速權貴集團內部領導方式世代接班或是改變的訴求。然而，這種假設卻沒能讓這些所謂「文化大革命」領袖們有印證的機會，畢竟他們還是在傳統方式下養成的。他們想打破自己立足的根基，這是不可能的，只是讓這批貴族（不論是老一輩或是年輕一代）既成為受難者又成為反抗者。就是這種混淆，讓文化大革命

走向最終的失敗。

矛盾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是一段高聲宣揚理想的歷史，只是一開始這個理想就已經被背棄了。難道文革是真的要掀起一場革命嗎？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一些和劉少奇一樣被指有錯誤的老幹部，例如那些躲進「西山」軍事基地寬闊舒適住處裡侃侃而談的元帥們，得以全身而退？[22]又為什麼老軍頭朱德可以受保護，而他的夫人被指責的程度沒他來得重，卻要被全國婦聯的「群眾」抓去批鬥和遊街？[23]如果不是因為嫉恨，又是什麼樣晦暗動機，讓曾在北戴河度假時帶給孩子歡笑的元帥賀龍，橫遭折磨致死？[24]

這些發生在作為政治和社會中心的紅牆內的林林總總，意義究竟何在？一九六五年九月開始，一些領導人成為被聲討批鬥的對象，接著中央警衛局有三個副局長遭清洗，而汪東興的權力從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卻進一步得到提升。[25]然而，大部分仍受信任的領導人對這些都採保持距離的態度，被點名的人則深居不出，整天為那些捏造和構陷的指責擔心受怕。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竟使曾任毛澤東秘書，而且十分熟悉中南海孩子們的田家英，在一個陽光耀眼的清晨自殺身亡，留下三個孩子。田家英很快的被戚本禹取代，而他是一個輕諾寡信、聽毛澤東指示、揣摩上意的人。[26]

很快就沒有人再追究這些問題，因為答案令人害怕。而後由個性謹慎頭腦清楚的董必武代理共和國國家主席，他和其家人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搬出中南海。因為看出來接著會出現的種種事端，他將他涉入紅衛兵運動甚深的兒子董良翮送到附近的軍營入伍當兵。[27]

要如何理解這場運動？要選擇什麼立場？一九六六年十月的一個晚

上，鄧小平召集全家人，原因是毛澤東和他見面，要求他和林彪、陳伯達搞好關係，他覺得情況不妙。他列出了幾種可能性：一個是徹底被打倒或是部分被整肅，或是維持被整肅的情況，而後再被啟用復職。考慮靠向林彪和陳伯達沒意義，還不如讓他們繼續批評，他決定按兵不動，「以後走著瞧」。[28]他的想法是和現實狀況對著幹，認為這種混亂失序的局面不會持續太久。這個盤算是對的。他的子女對他的想法知之甚明，並在爾後當他重掌權力時，扮演好他們的角色。

紅牆內的冬天

像鄧小平這樣的先見之明在當時確是鳳毛麟角，畢竟從一九七六年冬到一九七八年間的局面來看，這種與趨勢相左的說法很難見容。中南海的公園在住戶們無暇他顧之下，愈來愈封閉、冷清，毛澤東也只是悄悄來去。毛澤東的女兒離開了那裡，他的妻子江青也搬到原本用來招待國賓的釣魚台賓館接受他人吹捧。[29]領導人子女們遭批鬥的人數不斷增加，他們也不再有機會回去。即便如朱德的女兒朱敏也曾被驅趕過，連李敏都要叫來駐守警衛的負責人，才能進入公園。[30]

此外，紅牆內發生的事，在共產世界的統治階層中可說是聞所未聞。不一會，中央委員會內年輕具企圖心的工作人員也組成了紅衛兵，要靠著在鬥爭上的表現爭取晉升，他們更沒有理由放過這些以前曾經服務過的領導人和其子女。周恩來對任何事向來都機變甚快，他成功的限制這些人不得結合外部力量，畢竟紅牆外的失序混亂正逐步擴大。結果，這反倒讓受江青指使的戚本禹更容易操控這批人。這些人還分成數個隊伍，依自己的想法指揮一次又一次的鬥爭。曾服務過劉少奇的人員集體控訴和批鬥他，鄧小平的服務人員在所謂「造反派」批鬥他時也沒有維護他。[31]

在被趕出住處並被迫和孩子、妻子分開後，這些原領導人的待遇愈來愈惡劣。經過策畫、組織的鬥爭大會，往往會就地，或在某個大學校園內舉辦，被批鬥者的子女也會被叫來旁觀。被戴上「走資派」帽子的領導人反應各不相同；陶鑄硬不屈服，劉少奇淡然處之，鄧小平保持沉默。態度的不同有的來自於個性，或是來自於在心中對將來要如何回應的謀畫。[32]在首都遭受的對待令人難以忍受，但外地省份的大城市更糟

糕；薄一波的太太就在廣州被紅衛兵迫害致死。孩子們有的知道情形，有的還在懷疑。一些人在批鬥中因為受不了痛苦而崩潰，有的則撐到日後得以平反。對此，我們不得不推測，孔丹母親的自殺和劉源父親的死，可能是日後推動孔丹和劉源站出來的原因。[33]

一九六七年秋天開始，在滿城混亂中，被打倒的領導人們的生活待遇驟然改變。他們的住所變得更小，服務人員全撤走。耿飚和胡耀邦家俱是如此，而且毛澤東還是知情的。[34]中南海內的「重大罪犯」直接接受多次批鬥，並依照犯下的「罪狀」大小，移往沒有任何特殊待遇的住所：例如賀龍，剛開始時還能住得比較舒適，但當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宣布不再保他時，就連醫療照護都變得極差，後來更因此身亡。[35]到了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間，有許多被鬥倒的對象被關進一般的監獄，像王光美，就被關押在北京近郊有名的秦城監獄裡。[36]

驅逐、追捕高幹子弟

將領導幹部家人趕出住所，不僅僅具有強烈象徵意義，對這些「罪犯」們的子女而言，更造成了一些重要的影響。他們的孩子被託付給祖母，或是以前曾在家裡幫忙的服務人員照顧；劉少奇的孩子就是這樣一個個送出去的。有些較年長的孩子會被分配到較差的住處，將他們的弟妹接來一起住，每個月靠勞動，還可以領到大約二十五元的勞役費。[37]這樣尚可餬口，但已遠離領導菁英的生活了。

大部分的太子黨成員在短短幾個月內，陸續失去父母、聲望，以及以往的種種好處。他們過去看不起下層社會的人，自己卻在突然之間也開始受人蔑視，甚至其中有些人還變成一批政治新貴批鬥的對象。像是江青和康生兩人，基於報復和算計，就在一九六八年初，對陸定一、陳毅、蘇裕和董必武等四人的兒子進行政治審查。[38]

他們手中最後能掌握的就只有自由了！有些人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之間，為維護這項僅存的權利而奮力一搏。剛開始，有些幹部子弟靠著家裡的關係尋求庇護和收容。例如在一九六六年春天，他們習慣找和家裡有往來且在北京較好心的朋友們幫忙，羅榮桓的遺孀就曾經提供過類似幫助。一九六六年冬天到一九六七年以後，紅衛兵之間的同志情誼進一步主導家庭與家庭間的交情互助；伍修權和陳丕顯的孩子，就讓父母同意收容並保護自己的朋友。[39]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這種收容和庇護行為要承受的風險愈來愈大。很快的，有幸因為毛澤東的眷顧或是因為本身具備的能力受到重視而仍保有職位的幹部家庭開始退縮。廖承志倒是其中讓人注目的例外；由於他出身自相當具有名望的家庭，影響力遍及海外各地，加上他又是在僑務政策方面不可或缺的負責人，因此能

持續保護幾位朋友的子女。[40]

無論如何，有些太子黨成員反倒藉此有了新體會和新學習機會。這種事例甚多，筆者自身就認識一位有名鋼琴家的孩子，他趁文革的機會溜進成為「地獄」的北京國家圖書館，在當時已經不准許任何訪客借閱圖書的情況下，利用躲在裡面的幾年間，閱讀了許多書籍。另外有許多人，則是自我放逐到中國的各個角落，像是西藏或是蒙古等地，過著烏托邦式實驗性的集體化生活。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成，在受不了父親遭整肅和母親死亡的打擊後，偷渡中越邊界到越南，打算自願作戰而死，結果卻在邊界被戍邊的部隊逮捕。[41]他的哥哥薄熙來和彭真的兒子則是過著放蕩的生活。賀鵬飛和他妹妹賀曉明，在和他們父母賀龍和薛明脫離關係之後逃到天津，上了一艘往來上海的運輸船，藏身其中，最後被周恩來尋獲，而元帥陳毅也在他們生病時送藥給他們。[42]江青、康生和他們的黨羽，則是掌握著一份名單，上面列出憎恨的對象。江青想方設法讓劉少奇的孩子濤濤（劉濤）和丁丁（劉允真）站出來反對父親，還用力散布不利上將蕭華兒子的謠言，只因為蕭華當時不聽從她的話。[43]

除了這些個人恩怨外，還要加上政治因素，也就是針對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左勢力，和一九六七年夏天幾波對主要紅衛兵派系的嚴厲鎮壓。逮捕理由不斷推陳出新；從政治錯誤到破壞秩序，罪名甚至包括一些「不道德」的行為都是，刑罰則和一般使用的刑罰相近。劉源就曾經因此服過不同的刑期，進出不同的監獄，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葉劍英、董必武、彭真、羅瑞卿以及其他人的孩子身上。江青後來還將陸定一的兒子關押在獄中六年之久。據我們所知，李井泉的孩子也同樣被送到類似古拉格的勞改營中，薄一波的三個孩子（薄熙永、薄熙來、薄熙成）也被關到北京市郊的少年犯管教所。當然，這些刑罰對減緩整個運動中

的暴力行為來說，沒有任何作用。[44]

放逐

文化大革命針對的不僅限個人恩怨，而是著眼於以消滅當權派為主的改朝換代，運動的領導人對此心知肚明。由於當權派藉由家庭作媒介延伸影響力，如要消滅這些當權派，就要連根拔除整個家庭。所以在一九六八到一九六九年間採取兩項做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或將現職幹部送往「五七幹校」，並接著下放他們的父母。[45]

這兩項做法即便在宣傳上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但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且在執行時仍有一些例外。事實上，有些青年在之前就設法找到地方安插工作，用以逃避這一切。[46]原本大家不看好入伍當兵，現在倒成了熱門的選擇，更何況入伍當兵還可以進修讀書。魏京生就曾回憶那段日子裡「有許多青年都想要入營參軍」[47]，而女生則是選擇醫護工作棲身。[48]林彪家人則是利用這個機會，從毛澤東身邊人那取得一些好處。[49]一些高階將領也將他們惹禍上身的孩子安插到部隊裡加以保護：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就是一例，他在一九六六年時惹了不少麻煩。[50]

下鄉意味著遠離權力中樞，通常以愈偏遠的省份為優先，像是往西的沙漠地帶、往東西部山區、東北冬季寒冷省份都是，下放地區遠近則按下放對象的背景影響力和學業表現分配。實際上，許多知識青年，特別是幹部子弟，有四十二％都被送到廣州，根本上就逃過了上山下鄉政策。有些人估算，真正被送到鄉下地區的青年知識分子不到三百萬人。[51]不論有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根本上就是個官僚特權橫行的國家。

這一切讓人受到不小的衝擊，尤其是被監控的太子黨們。他們被迫和父母及兄弟姊妹四散分離；羅瑞卿的七個孩子，就分別被送到六個不

同的地方。[52]當身處陌生環境，他們才突然察覺已經失去父母庇蔭，除非有幸被分配到以往曾是父親舊屬的管轄範圍，或是遇到其他的太子黨，他們才有人可依靠。當他們用上「關係」的時候，才明白建立交情的可貴。[53]

我們可以想像，被下放到這些地方的人要面對許多艱難和無從預知的試煉，　有人在這段日子中受到極大折磨，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但他只是盡量不讓人知道這段歲月。習近平在一九六九年被下放到陝北，中間曾一度逃回北京，被捕後，又被關押了幾個月。他從這段時期的生活中，學到不少往後日子用得上的知識。受惠於父親於一九三○年代曾在這個地區活動，習近平也願意屈就自己學著去服侍地方領導幹部。這使得他漸漸學會負責任，也對農業有了一些想法，讓他能有機會在一九七五年回到清華大學讀書。習近平成為曾經被迫下放到農村太子黨中，少數能利用這個機會的人，他跳脫了被下放的處境，了解必須暫時屈就，以圖往後的能伸。[54]當然，有其他人遭到嚴厲的打擊，例如劉源就曾兩度被關進監獄；廖承志的長女則在勞改營裡度過三年。有些人則再也沒有回來，比如高崗的兒子。[55]

一九六七年開始，特別是一九六八年，有些打擊高幹子弟家庭的做法，則是將這些高層領導人夫妻分開。夫妻倆一個被迫只能在辦公處所活動，另一個則接受更嚴厲的處分，必須分開各自生活。康克清和朱德就是這個情況，[56]但至少朱德還有配了幾個人員服務他。其他的高幹家庭，父親通常年紀較大且拙於處理日常事務，極難適應失去一切的生活；像是賀龍，他甚至連醫療待遇都被剝奪了。另外，大多數政治局委員被迫要到工廠參加生產勞動，以表示對左傾的支持。[57]這種做法一旦太過分，反而讓這些曾居高位的領導人得到更多人望。[58]而這些下到工

廠勞動的領導人，還是抱有能回歸城市，或是過一段時日可以見到孩子的希望。

一九六九年十月，一則蘇聯可能會展開攻擊的消息，剛好讓執行下放這些領導人的做法更省心。以保護為名，這些領導人被疏散到各地。被認為和那些與毛為敵的「黑幫分子」走得愈近的人被送得愈遠、待遇愈差。每個人可以據此判斷自己的政治行情；朱德到了陽光明媚的廣東，陳毅則是在北京附近的城市，陳雲和鄧小平被丟到偏遠貧困的江西（陳雲還享有較好的待遇），張聞天則被送得更遠。[59]

雖然這些做法並沒有像將他們的孩子遣送上山下鄉一樣嚇人，但對高幹權貴家庭來說仍是苦痛難當。實際上，原本許多領導人就有慢性病，長途跋涉加上過程中又不是隨處都可取得照護，使得這些身為一家之主的領導人身體愈發羸弱不堪。他們的妻子盡可能提供最好的照顧，但丈夫的健康狀況仍日益惡化，她們又苦無管道接近地方機關（這些地方通常都是男性居多）。

最初就被下放的鄧小平一家感受最深。卓琳的健康狀況本來就不好，但家裡只能分配到微薄的津貼，還要儉省一些下來作為日後所需。他們更想念分散在各處的孩子，尤其特別擔心鄧樸方，他聰穎又堅強，但由於一九六八年在文革一連串混亂中從高處墜落，落下終生殘疾。當鄧小平夫婦知道鄧樸方並未獲得很好的照護時，就要求中央將他送來和他們一起生活。考慮卓琳以及同他們住在一起的鄧小平繼母的辛勞，鄧小平也希望其中一個女兒鄧榕能到他們的身邊來。在經過一九七o年一整年，和曾任中央警衛局局長，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書信往來，他們終於在一九七一年春節獲准讓部分家人過來短暫團聚。接下來，鄧樸方被送到他們身邊（由鄧小平親自負責照顧），接著是鄧榕，

之後的家務事便轉由鄧榕負責。[60]

鄧家的故事並非特例，因為在這段時期，每一個曾經在當權派光環中生活的家庭都有著不同情節的類似經歷。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間，可以說這些在以往擁有極大權勢的權貴們都在努力掙扎求生。和鄧小平一樣仗恃著軍事鬥爭經驗不肯屈從的領導人，他們的威望和銳氣已然被消磨殆盡。在原本的服務人員一一撤走後，從未受過這種打擊的妻子們意志也開始動搖。又加上他們幾乎聯繫不上子女，報復的想法便在心中漸漸滋長。他們心中充斥著不安，消息不通更加深了疑懼。

孩子們的表現出乎他們想像，不再是剛開始那幾個月的吳下阿蒙。多數人在面對生死攸關的時刻，都能表現出超凡的勇氣。他們之中有些人可能曾經歷病痛、失去希望，或是聽聞有人自殺（像是胡喬木的孩子和田家英），或是在貧瘠的農村裡日漸消沉，或是被當局的謊言蒙蔽，[61]然而，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慢慢適應，甚至成為生活的主宰。例如劉少奇四個最小的孩子，在父親焦慮不安、母親被關押的時候，就重新團聚起來，共同對抗周遭襲來的壓力。[62]

當生活現實接踵而來，或是要盡力維護家中成員間的基本聯繫時，女孩子們就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這時候她們成為解決事情的高手；比如有兩個分別只有十一歲和十四歲的小女孩在父親被逮捕後，獨自生活了三年。[63]在被下放之前，許多女孩子們承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在母親不在時暫代母職；例如薄一波最小的女兒就去做工，用微薄的薪水養活她的兄弟姊妹。[64]在下放期間，女孩子們也設法擔任兄弟和父母間的聯繫人，她們往往比兄弟們早一些回到城市，並負責照顧身體狀況日漸衰弱、性格變得暴躁的父親，甚至要擔任他們的秘書，協助父親重新回到領導人的角色。[65]由於她們的努力，這些家庭得以度過煎熬時期。

林彪的末路

這些被鬥倒的當權派們之所以能撐過施加在身上的打擊，主要是因為他們政敵的無能，這相對凸顯出他們的值得信賴。不過新權貴上台後，在生活上邯鄲學步被他們打倒的這些前領導人，卻只落個東施效顰。像林彪的妻子葉群，不是大擺排場的請李訥喝茶嗎？結果回程時卻因為她安排的車子沒準備好，破口大罵家事服務員，而這位家事服務員也不掩飾她對葉群的反感。[66]此外，林彪身邊的四名將領也是極盡能事，想要表現出上流社會的行止；黃永勝在西山的營區辦兒子的婚禮；李作鵬在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前夕，幫女兒辦了場盛大的婚宴，還為了慶祝孫女的出生邀宴眾人。[67]他們的孩子並未像與同輩的前領導人子女一樣受到嚴格管教，反而自得地享受這種放任；李作鵬的孩子可以毫無限制的想看多少電影就看多少電影，黃永勝的兒子可以不受限制閱讀父親手中的極機密文件。[68]他們形成的小團體和掌權到一九六六年之前的權貴集團並無不同，只不過像是劃分出來的一支。原本權貴集團腐化和墮落的行徑，早在文化大革命時被大量揭發，而掌權新貴們的所作所為，比起被打倒的當權派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相對的，這些政治新星對於一些像是要尊重他人之類的行為規範棄之如敝履，因而江青對於不論是對服務人員還是自己的女兒，一概都頤指氣使，不但毫不體恤服務人員，對女兒李訥也完全不假辭色；李敏當時已經離開中南海，不在她身邊。[69]以中國傳統禮儀來看，的確很難想像這些人會是這副模樣。

總之，在當時最有權力的這批人，私生活簡直就混亂得讓人難以卒睹。陳伯達繼續和老婆們不清不楚；[70]康生的虐待狂行徑成為坊間流言

的材料；林彪最親密的副手，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在男女關係上態度始終輕慢，還曾經私自跑到香港去嫖妓，就連他老婆都因此公開抱怨過。[71]

林彪和葉群這對夫婦，和以往中南海舊首長中的模範夫妻截然不同、對照鮮明。林彪對他太太的態度始終粗暴，葉群則引誘黃永勝發生不正當關係，而且就在林彪和毛澤東意見諸多分歧的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間，葉群和黃永勝竟談了一段堪比青春熱火的戀情，讓身邊跟從他們的人深感不齒。[72]

在視養兒育女為要務的權貴集團中，林彪夫婦絕對敬陪末座。就先說林彪和前妻所生的女兒吧，她遭受的冷漠待遇在權貴集團中已經讓人議論紛紛，甚至連林彪的政敵都看不過去，表示願意收容她，而他的女兒也在開始有機會造反時，第一個出來反對父親的政策。*[08]再說林彪和葉群所生的一對兒女，也始終在這對夫婦追逐與迷戀權力的過程中備受折磨。其中較年長的女兒林豆豆，在父親的漠不關心和母親的輕視下成長，甚至還一度相信自己不是他們的親生女兒。她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八年間，曾有過數次自殺未遂紀錄，最後想用婚姻來逃離這個家，但就連這件事葉群也不讓她自己做決定，堅持要在高幹家庭中親自篩選婚配對象。不滿母親連在婚姻上也要強加控制、不准她自己作主，林豆豆最後揭發了父母要叛逃到蘇聯的事。[73]

但這個叛逃事件的始作俑者卻是林立果，他是家中經常會出主意的男孩子，而在他策動的奪權計畫失敗後，全家是不得不逃。林立果出生於一九四五年，所有權貴集團裡較正直那批人厭惡的事，他全包辦了，基本上就是個聰明但好逸惡勞的男孩子，喜歡女色、西方音樂和開車。[74]他媽媽為了捧他，說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助一臂之力，將他安插

入高階職位，以便召募一批高階年輕軍官為他所用，也讓他有能力插手國防事務。[75]

葉群更說服林彪相信他們的孩子具有不世出的「天才」，從一九七○年開始就讓他能參與政務。讓林立果逐步接掌他父親的事務後，葉群還用未來「指揮官」的標準張羅他的婚事。在林彪部屬夫人們的幫忙下，她針對年輕又門當戶對的女子展開大規模遴選：長相漂亮、年齡二十歲、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初中以上程度……這件事動員了許多林彪親信，並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一年夏季。[76]

林彪之後更進一步，很快就把機密文件也讓林立果看了，並聽取他的意見。在廬山會議失利後，*[09]林彪沒能阻止兒子針對毛澤東將會參加的活動展開奪權計畫，而且計畫以失敗告終。[77]

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權貴家庭仍籠罩在陰沉的氛圍當中。毛澤東的同夥仍在追殺，持續將成員從家長身邊帶走，而他們卻毫無抵抗餘地。有些孩子參與了自己父母的批鬥，最後仍逃不了被下放的安排。這些曾在一九五○年代風光一時的家庭，最後只得寄望一件事：敵人突然倒台。而在林彪叛逃後，這件原來不可能發生的事，居然慢慢成為可能了。由於文革陣營失去軍事依恃，毛澤東的身體每下愈況，他身邊的文人成員又無法讓所有人信服。再加上原本的太子黨成員都存活下來，有時間思考和反省過去的失敗。在維護家人和權貴集團的考量下，他們將起而對抗這些文革派領導人。

第五章
重整旗鼓（1971－1976）

「林彪事件」指共產黨員在毛澤東操控下批評林彪，隨後林彪因害怕被整肅，被迫乘飛機出逃，卻在蒙古境內墜機的事件。這件事的弔詭之處，在於它始發於密室謀畫、終結於令人驚懼的意外，後續更引發嚴重的震盪效應。當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尚足以掌控各個派系和參與其中的人員，但他親自指定接班人卻遭到背叛造成的精神打擊，幾乎要了他的命。在這之後，他的生理和心理狀況江河日下，無法再主導派系成員間的相互傾軋，這些人也不能再壟斷左派力量，毛澤東再也無力制衡由周恩來支持的反對陣線，更別說這陣線還獲得了文革受害者的力量支持。

政治上的變動明顯到所有參與者都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甚至連單純的旁觀者都能即時了解情況演變，並且用不直接說破但隱晦暗喻的方式彼此議論。當時正當少年的魏京生就在這種情形下，從高中同窗、父母、軍中同僚處，花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就了解林彪事件的來龍去脈。[01]

新風向

當左派中的軍方勢力倒台後，政治天平無可避免的向右傾斜。新情勢對原本的權貴集團和其子弟有利。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做出重大調整時，嘲諷將下獄的林彪親信將領們：「你們放心，你們問題的處理只會限於你們自己，不會株連到家人和孩子，不會像你們之前對待葉（劍英）帥那樣，連他的孩子也不放過……他不會這麼做。」[02]毫無疑問地，這時權貴集團終於能夠緩過氣來了。

然而，由於為了保護自己不落入毛澤東近瘋狂的左傾思想，周恩來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反反覆覆的態度，仍讓他的信用度打了折扣。長久以來毛澤東對他的輕蔑也威脅著他的地位，就他現有的能力和隨年歲的衰老而希望誠實面對自己的態度，也同樣成為威脅他地位的隱憂。例如他在接見以往不太聽話的賀龍遺孀時，突然情緒激動的向對方的女兒表示歉意。[03]周恩來也明白，為了要讓情勢能繼續進行，需要靠一些可資信任、沉穩的人。

在這段太子黨的發展中，有兩個重要的角色。一個是王震，他最初給人的印象是個毀譽參半的武夫。他一方面好在始終是個優良戰友、優秀的軍事將領，一方面壞在從一九五○年代占領新疆後實施的屠殺，慘烈到連看多了類似事件的中共領導人們都看不下去。在將王震卡在不重要的職位好些年後，毛澤東終於向他敞開大門，徵召他進入核心領導群。他高興的回到北京，舒舒服服的住在三○一醫院套房裡，只是醫院裡的護理人員困擾於他每天都要咒罵江青。王震很快的就成為毛派勢力和想要設法回到北京的太子黨家庭間的傳話媒介，而他更有意地助刻意庇護的對象一臂之力：榮毅仁、陳毅和鄧小平。對「民族資本家」榮毅

仁，王震預感這人將來總會擔任一方要角；陳毅則是周恩來和毛澤東都敬重的人；對鄧小平，王震認為他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但常常和他互通消息，連鄧小平最活躍的女兒鄧榕返京時，都在王震家留宿。[04]

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胡耀邦，他曾是紅軍隊伍中的小號手，一九五○年代成為贏得眾人信任的共青團負責人。胡耀邦由於個性寬厚，因此不被看好，但這種性格即便有弱點，在中共領導菁英中亦屬難得。在一九七一年回到北京後，胡耀邦敢於拒絕接受要他自我批評的要求，並且馬上投入協助老幹部的工作，甚至要求他太太（他對待妻子的尊重態度實屬當時少見）幫那仍下放在外地、稍有年紀的陳雲縫棉被。[05]

王震和胡耀邦這兩人都明白，每個人都可以要求平反，但問題出在毛澤東。因為他倆的廣結善緣，使他們能致力推動改變。他們更在推展的過程中，給予備受結束下放陸續回到北京，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同僚們支持和引導。他們的經歷固然重要，但還有另外兩個條件，讓他們更能取信於人。一方面，他們和周恩來維持著適當的關係（即便周恩來過於小心的態度讓大家都有疑慮），和外表看來溫和而實際意志堅定的葉劍英也有聯繫，並且和所有人一樣，在考量事情時的想法與鄧小平一致。另一方面，由於他們都是和自己的孩子非常親近的父親，當時也喚起所有人讓家庭團聚的信心。王震有三個兒子和一個認養來的女兒，當時還看不出他們日後會在政界和商界嶄露頭角。[06]相反的，胡耀邦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是時已在從事研究工作，他們慷慨的性格和對同輩的情誼在權貴集團中為人所熟知。胡耀邦家隨時對所有人開放。[07]

王震和胡耀邦兩人維持著和周恩來、葉劍英以及汪東興的往來（汪東興過去曾是王震的部屬，後來成為毛澤東的警衛和最信任的人，並負責阻擋這些平反的要求），兩人並全力幫助四散流離的老幹部恢復正常

的家庭生活，之後更協助他們重回北京。這些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王震負責出意見（一般來說是寫信對毛澤東表示尊崇，以及向葉劍英請求協助等），胡耀邦負責提供具體資訊。[08]

重建家庭

對這些家庭而言，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團聚。在這件事上，女孩子們相當重要，尤其是家裡的長女，因為正如人們所說，她們常常發揮母性的力量。另外兩個因素加快了整件事的進行速度，分別是高層風向的改變和王震及胡耀邦的努力，讓孩子們得以探視被關押的父母，完成他們努力促成的家庭團聚。許多家庭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能聽到被關押家人的消息；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年公安部和監獄的秩序稍稍恢復後，這些被監禁者的境遇獲得改善，而在林彪事件發生之後，秩序更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這些被拆散的家庭成員，也準備要去探視他們的家人，但要探視一些比較重要的人必須毛澤東親自點頭才行，這時就得全靠王震周旋了。也許可以說是剛好，許多被監禁的老幹部由於惡劣的待遇而死亡，給了毛澤東一個理由，得以歸咎責任給部分下台的政治領導，而釋放被關押者更能減輕獄政的負擔。[09]毛澤東因此決定讓太子黨和他們的家庭能夠回到正軌。

很快的，政策有了轉向的徵兆：先是彭真和羅瑞卿獲准接受探視，接著劉少奇的子女（他們這時也才獲悉父親已經死亡的消息）也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秦城監獄探視王光美。而被戴上「修正主義」帽子但未被認為是主要人物的伍修權，在被釋放後得以進入醫院獲得長期治療。同一時期，許多身體狀況極差的領導人或是他們的孩子，也都獲得相同待遇。[10]隨後，陳雲和于若木的孩子以及薄一波的孩子（一九七四）先後被釋放。

這些探視和釋放讓這些家庭有理由要求遷移，或是住到方便和家人見面的地方。[11]他們第一次安排重新團聚時，場面往往令人心情激動；

一位被下放過的幹部回想起當時的情形時提到：「一個男孩子當著我的面叫我爸爸，我完全不認得他，直到他告訴我，他是那個當年被帶走時才八歲的兒子，我才認出來。」[12]等大家彼此交換消息後，才知道究竟有誰不在、有誰還活著。普遍來說，死去的人數比大家擔心的要來得少，是因為這些極左派的打手們只是要折損、打擊他們，並非殺人。即使如此，有些遭殺害的案例仍然成為血淋淋的象徵，例如孫維世，她之所以被迫害致死，只是因為江青容不下她的氣質和聰慧。[13]另外還有許多人就此不知所蹤，有些人是自殺，有些人則是因為成為他人打擊報復的目標，[14]尤其是被打倒的領導人當時正處於體弱或生病的狀態。這點很重要，畢竟在那幾年，許多被清算的當事人，是曾參與建國那個世代的人。

每個家庭都有各自視為優先的待辦事項，例如爭取某位成員獲釋、要求給某位成員醫療照護、遷到可以就近照顧父母的城市……等。此外，他們也開始和一些相關機構或人士進行長期的文書往來，並主動重拾社交生活。作家陸文夫曾用生動的文筆描述後者：「這陣進進出出的景況到處都有！大家四處奔走，想找回舊日的關係，忙著拜訪以前的老戰友、同袍、老長官，甚至以往曾往來的故舊。」[15]

許多奔走讓一些老幹部得以住進北京或是地方省會的醫院接受照顧。可能是以往的習慣，從一九五○年代開始，一些領導人就會不時的到醫院裡住上一些時日，尤其是北京的三○一醫院，因為有中共中央的警衛保護，在這住院人身安全也能受到保障。[16]但是這波就醫潮和以往不同，申請住院檢查及醫療的人數眾多，再加上受到一九七二年左右雙方陣營都有主要領導人相繼死亡的影響，[17]申請就醫的頻率更高了。

上千名領導人和高幹都要申請進幾間較好的醫院，且多數要進行長

期的醫療照護。[18]整個權貴集團中流傳、交換著對各照護中心醫療品質的評論與消息，而且在這之中還開始形成新的等級階層：有女兒在醫院工作的家庭會優先獲得關照。當毛澤東的姪子，同時也是毛陣營看好的明日之星毛遠新，娶了一個瀋陽醫院的護士時，社會情勢的演變便開始打破政治的藩籬。[19]回過頭看江青這邊，卻有一些人到醫院是為了輸液或輸血，因為他們相信這樣可以回春。[20]

返回北京

許多過去遭整肅的領導人獲釋，特別是軍方幹部。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之後，有一百七十五位軍方將領走出關押他們的「牛棚」，[21]政府高層則突然出現了許多副部長。短時間內，言論自由似乎開放了一些，像是陳毅就在這段時間和兒子有過一段較輕鬆的對話；根據他兒子的轉述，陳毅表示，他過去一直以為中國政治制度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證明了實際上並沒有完全解決。[22]已回歸和正在重返原先地位的家庭間往來慢慢恢復，權貴集團又重新建立了。[23]在這種情況下，王稼祥密集和老同志們見面，楊尚昆也得以應在文革風暴中幾乎全身而退的李先念之邀共享晚宴。朱德更邀請了一幫朋友和他們的孩子到家裡一起看電影，[24]大家相互說起一些以前家中服務人員的小故事，這些之前不得不遣走的服務人員，他們又打算招回來幫忙家裡了；服務員們對此的想法是「這些人還沒忘記我們，他們仍然喜歡我們」。不過在這之中，曾為高等教育部部長的蔣南翔卻不太願意提及過去的司機，因為當那位司機被問到是否要回去他身邊時，竟直接表達：「不要，我才不要再一次被像狗屎一樣對待！」[25]

在恢復權貴集團的大量工作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是鄧小平的復出，他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在全家尚未安頓下來前，就和他的妻子回到北京。鄧小平倚仗他女兒鄧榕甚深，還戲稱她為「外交部長」，因為就是靠鄧榕，鄧家才能和聶榮臻、王震和楊尚昆三位領導人家庭維繫良好的關係。[26]鄧小平顯然保留了許多手段，但他身邊人的身體狀況大多不若以往，尤其是周恩來，他深受膀胱癌所苦。江青一夥人仍然活躍，但她還是憂心這些老幹部會成為以後的阻礙。

這些人都隨著歲月年華老去而將心思放在孩子身上。江青插手幹部職務的安排已是習以為常之事；當新任組織部部長接見陶鑄的遺孀時，她不止安排相關的健康照護等醫療事宜，還安排她女兒到空軍總醫院當醫生，更送她的兩個小外孫進中共中組部的幼兒園。[27]

一恢復原有的生活，這些領導人們在家庭上表現出很大的轉變。不像毛澤東只能孤獨終老，他們開始積極處理接班事宜，著手培養自己的接班人。大家都在傳述鄧小平和其妻子、岳母是如何照顧他那個成為殘疾的兒子，這件事成為那段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故事之一。

每個家庭都把精神、力氣用在設法讓子女回來這件事情上。就像陳雲的家人，他們都努力想讓流放在外的陳元能夠回來。劉少奇家的劉源也是，他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幹過壞事，後來仍被安排到北京的一個工廠裡工作。[28]女孩子們都盡可能的被安排進醫院做事，男孩子則被分配到陸、海、空軍在北京的機關單位。這時的軍方就像是國家現代化的前沿，約有幾十個太子黨成員在這樣的安排下就職。[29]大學招收的「工農兵」學員，理論上都應該來自基層，但實施的日子一久，學員中太子黨的數量也愈來愈多。陳毅的兒子陳小魯*[01]就是這樣於一九七五年在南京一所有名的大學註了冊。[30]所有的領導人都在努力幫自己的孩子，連敵對的文革派陣營也十分注意這趨勢代表的意義，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就曾在他的日記中坦承：「我太太心裡最擔心的就是這些孩子。」[31]

孩子們的新境遇

孩子們在家裡愈來愈獲重視，男性尤其，長子更是。兒子之中最年長的往往和父親有著較密切的關係；薄熙成就是一個例子，他經常在晚上陪父親薄一波散步，薄一波則和他無話不談，包括對毛澤東的看法，以及他自己犯下的錯誤，這在十年前是難以想像的事。[32]在另一方陣營中，上海左派領頭人張春橋則給了他兒子一份記錄日誌，裡頭盡載當前發生的事件。[33]

這樣一來，孩子在家庭事務中的分量日益加重，他們也被允許發表一些意見。其中流傳在權貴圈中最精采的一件事，是任外交部長、靠向江青陣營的喬冠華要再婚，而他的孩子卻反對。喬冠華是少見可以獲得江青尊重的人，當他決定要娶一位知名作家之女，同時也是毛澤東賞識之人*[02]時，卻遭到子女的大力反對，[34]最後導致他的子女搬離、不再與他同住，搬家時，還將家裡的東西統統帶走。*[03]

從父親那裡，孩子們學到了「關係的藝術」這項在中國奉行已久的社會行為，他們靠著家裡的名望，幫許多朋友解決困難。例如葉劍英最小的兒子就曾經靠著父親幫一個朋友找到她被關押的先生，並設法讓他能獲准就醫。[35]

太子黨的成員開始在不同的時機與地方得到眾人注目。當鄧小平一九七三年二月回到北京，第一個獲准去看他的是往日同僚李井泉的三個孩子，不久後，羅榮桓的遺孀也帶著孩子去看他。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陳毅的女兒陳珊珊返回英國大學讀書前夕（在文革期間，送孩子去國外留學是破天荒的事）被邀請到周恩來和鄧穎超家作客。[36]特別的是，就連毛澤東也開始注意太子黨。由於哀傷陳毅的去世（陳毅畢竟是

他少數似乎真正有朋友情誼的人之一），毛澤東接見了陳毅的四個孩子。在這之後，毛澤東送了一份人情給最不受他喜歡的陸定一夫婦，要他的孩子轉告父親：陸定一將會被除去黨籍，但他的孩子不會被波及。在這之前，毛派黨羽進行鬥爭時，從不曾考慮過罪不及妻孥這件事。[37]江青還在一九七四年為了對葉劍英施壓，將他的一個女兒打入獄中。[38]

太子黨在政治上的分量也出現了變化。連在文革中獲益的領導人們都明白，太子黨的回歸是必然的，他們很自然的就會思考如何表達對太子黨的重視，甚至會提供協助，以及思考如何從中獲利。太子黨的成員中，下放農村再回到城市中的這批，比剛剛下放沒有多久的受重視，不過也有一些例外。有些已經落地生根的人（他們在被下放的農村中嫁娶了當地人，我們之後還會討論一些相關的案例）沒有馬上回到城市和原本的生活環境，但大多數的太子黨都希望能夠回到城市。只要具備中學畢業學歷，他們最希望的就是能夠進入大學就讀，但必須要符合政治上「工、農、兵」的資格要求，還要有地方幹部的推薦才行。

在這之前，太子黨們其實沒能得到什麼優待，畢竟人們也會嫉妒、蔑視他們。胡耀邦那曾進工廠工作的兒子即是一例。[39]另外有一些人，用送禮給地方小幹部等方式小心經營，好不容易終獲調動；像鄧小平的兩個孩子、姚依林的女兒，以及後來成為國家副主席的李源潮、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和習近平等，都因此成功離開，習近平更進入清華大學就讀，並在畢業後擔任地方幹部。[40]這些獲得特別照顧的例子，老百姓們都看在眼裡，才不會去聽信官方媒體高聲疾呼的反對「特殊照顧」的宣傳內容。

許多太子黨被成功安排進工廠或是機關單位工作，但這種事在運作時都相當低調，因為中共對此還是相當在意。他們聯合在文革期間未被

波及的太子黨成員，其中年紀較長的還擔任幹部或是工程師。之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批人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維持了中國的生機。另外還有些人在國防工業領域工作，比如曾在一九五○年代中蘇合作企業工作的鄒家華和廖承志的兒子廖暉。我們稍後還會再提及廖暉。[41]

相較之下，被下放到偏遠地區的青年要爭取回到城市就不是那麼容易，更不要談重新回歸高層領導菁英子弟的生活圈子了，因為許多事都已改變。不僅僅是因為新貴領導人相繼產生，高層領導間的生活習慣和休閒活動都更精緻化了，比如電話和電影觀賞都更為普遍；尤其是一九七二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電影《巴頓將軍》顯示出美軍的強大和指揮的靈活後，電影的影響就更深了一層。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就曾經提到，當她回到北京，拿著寫好的信要交給一位重要的領導人時，*[04]自己孑然一身的站在大門口等候接見，看到出出入入的領導人專車，心裡真是翻騰不已、極度不平靜。[42]

太子黨間的通婚

因為重掌權力，權貴家庭自然而然想要多添人丁，甚至希望連孫輩都能人丁興旺。年老的周揚被釋放時，妻子告訴他的第一個消息，就是家裡多了三個新生兒。[43]一九七一、一九七二年時，許多太子黨成員的年齡早已超過二十歲，彼此通婚的情形頻繁。先是陳毅的兩個兒子帶頭，兩人合併舉辦婚禮，接著他的第三個兒子也和父親的老同僚大將粟裕的女兒結婚。其他高層領導人的孩子也紛紛嫁娶。即便像賀龍、羅榮桓、羅瑞卿、彭真、宋任窮、譚震林、楊尚昆等，有的已去世，有的尚未奉准復出，但家人們利用婚禮向外界表示他們依然活躍積極，維持著原有的地位。有些人利用這種場合，向人顯示他們未來仍有所發展，例如陳雲、胡耀邦；其他人則利用這些機會宣示他們復出，並且擔任比以前更高的職位，例如葉劍英和鄧小平。不過在已經重建的權貴集團之中，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44]吳法憲（林彪副手）的女兒，後來就嫁給了一位秘書的兒子。此外，原本存在老幹部間的義氣也不再有什麼大不了，比方說羅瑞卿曾是親毛分子，林楓則是劉少奇支持者，但羅瑞卿的長子還是娶了林楓的女兒。[45]

即便如此，每樁婚姻還是得經過家人的查問和討論，這點可從鄧榕自傳裡相當精采的描述中窺見。鄧榕的姻緣第一步是由著名老將呂正操的女兒牽線，介紹給她一位聲譽相當不錯的軍醫之子。鄧榕答應後，兩個年輕人魚雁往返了兩個月。接著第二步就是見面了，雙方將對方正式介紹給彼此的父母；當然，他們事前都對彼此稍有了解。不過也有倉促成事的，陳毅就是等到家裡的兩個兒子要結婚時，才急急忙忙向老同事王震請教。[46]

婚配的程序很有意思，揉雜了對傳統儀節的尊重和自我想法的表現。家長的同意（或說家庭的認可）不可或缺，所以魏京生的父親才能阻止他結婚，而陳雲長子結婚時，他因為一九七二年就下放江西而無法參與，但要求舉行婚禮時要以他的名義辦理。[47]新郎新娘的雙方家長彼此認不認識或有沒有好感雖然不很重要，但多少也會有些影響。這種傳統規矩關係到雙方的媽媽，或是其他家長的事前安排。他們倒不強求雙方門當戶對，但彼此一定要在權貴集團內；可以接受雙方的家庭地位存在一些差異，但不能差太遠——這點日後受人批評。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會影響雙方的選擇和結合，像「烈士」之後的鄒家華和葉劍英的女兒葉楚梅，就因為兩人有許多共同點而走在一起。他們倆都是留蘇團體「四八二一」（為一九四八年中共選派二十一名領導人和烈士子女赴蘇聯留學的別稱）成員，且隨後都被分配到瀋陽的工廠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又被關押在同一所監獄。[48]楊尚昆的女兒也是因為類似的原因，才認識和她下放到同一個地方的丈夫。[49]

另外一件引人注意的，是在文革正熱時高幹子女之間出現的門戶不對等婚姻，後來受到權貴集團壓力，基本都沒有維持下去。據我們所知，有以下兩個例子可以供說明：一個是彭真的女兒，原先的丈夫出身工人家庭，當她父親一九七九年平反後，她的婚姻狀況便受到眾人矚目和議論，最後只得選擇離婚，再嫁給高幹子弟出身的新任丈夫。另外一例是陳雲的女兒，她原本和一個老實的生產隊隊長結婚，後來她通過考試得以進入北京的大學就讀後，儘管父親極力勸說，她還是選擇離開這個丈夫，回到權貴集團的圈子。[50]

從一九五○年代中共重構婚姻制度，到現在一些傳統模式的恢復，不只意味著這些太子黨受重視的程度，以及宣告他們已步入成年階段，

還表示他們對所屬權貴集團有所維護。另外，這也凸顯了他們和毛澤東的孩子從文革發生以來在歷練上的差異。毛澤東的女兒李敏和其丈夫在文革期間同樣遭到「造反派」施虐，後來不再與故舊往來，隔絕於社交生活之外，不像其他太子黨成員忙於應酬往來。更甚的是，李敏當時也等於和家人隔離，在毛澤東行將就木的一九七六年，她也只和父親見到三次面，連後來瞻仰遺容時也要和其他人一起排隊。李訥則自己選擇嫁給一個在江青身邊工作的服務人員，生了一個男孩，後來離了婚並變得意志消沉，切斷和所有人的接觸，一個人退縮在孤獨中生活。[51]

毛澤東對權貴集團就像對待人民，有件讓他感到相當挫折的事。在最輝煌的時候，他曾經對毛遠新透露過：「幹部的子女都被寵壞了，吃不了苦，你以後不要在他們之中找對象，要找出身工人或農民家庭的。」[52]張春橋也因比而不敢將太太引介給這些權貴人士，而姚文元的太太因出身工人家庭，身處上海左派領導人之中時，始終因為文化上的差距而覺得格格不入。[53]

文化大革命並沒有改變這些太子黨的思想，反而讓他們不再隱藏自己和父母那一輩在想法上的不同。原本任上海市委書記，後來被領導人排擠的陳丕顯，他的兒子就發起一場運動要求政治變革，卻不是向左傾。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則在一九七五年時，在鄧小平的同意下蒐集了一些檔案文件聲討江青。同年九月，兩位高層領導帶著朱德已長成青年的兩個孩子探視老帥朱德，力勸朱德設法阻止「野心家」掌握軍權。不久後，賀龍的孩子協助母親辦了一場追思賀龍的紀念會，會上充斥著對時局不滿的怨氣。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爆發的反四人幫示威抗議中，聚集了北京的群眾和過去被打倒的領導幹部。有位太子黨女孩衝到天安門廣場上，只為拍一些照片；一個情報機關創辦者的領導人長子和他的妻

子也參加了這場抗議，而且和其他參加者同時被捕，這真是對歷史的嘲諷。[54]

隨著時光流逝和毛澤東在調整政策上態度的反覆，緊繃的氣氛充斥權貴集團和人民之間。與先前幾次重大變故發生時相同，後來圍繞著中南海發生了一連串事件：一九七五年八月，一個四川出身，曾被指為右派分子並遭關押的人，因為想要建議領導人結束文化大革命和鎮壓行動而遭逮捕。[55]這件事在權貴集團內點燃一把怒火，尤其是那些正在等待落實政策要復出的領導人，有少部分人在三○一醫院住院的人發起抗議，老帥徐向前經常探視並安撫他們。他對上海幫的後起之秀，和被毛澤東視為接班人的王洪文有著莫名的忿恨，還放話要「打他（王洪文）一頓」，大家都等著想看好戲。[56]

由於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再度被批鬥，整個人變得更為陰沉。就連平常表現冷靜、職位穩固的人，面對這樣的形勢也會沉不住氣，以謹慎和富責任感為人所知的李先念，便因此在家中稱病療養、休假不出，用另一種形式表達抗議。[57]接下來周恩來的離世和毛澤東身體狀況的急遽惡化，讓權力接班衝突浮上檯面，也給了權貴集團帶頭領導人打擊四人幫的機會。

鋼索上的政變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死後，眾所周知汪東興以武力在十月六日進行政治清理。原是中央警衛團負責人的汪東興成為毛澤東的下手，此時接受由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形成的領導集體指使、操控。這個領導集團代表的中間派、溫和派和激進派三方老幹部，是在林彪事件後形成的。大家沒注意到太子黨們在這個事件上扮演的角色，他們在其中雖然不甚重要，但的確是具體存在的因素之一。

早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毛澤東幾乎已是氣若游絲之際，葉劍英讓姪子葉選基到曾在中調部工作的特務頭子熊向暉處，詢問華國鋒在政治上是否可以信任。這個問題對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還有文革中較理性的幹部帶頭人來說非常重要。葉選基的回答是肯定的，兩人便結成了對後來行動成功至為關鍵的聯盟。綜觀歷史發展，派系平衡總是會有重新分配的時候。[58]

接著，葉劍英繼續讓姪子、女婿*[05]和女兒負責聯繫工作。於是一九七六年六月初，葉選基帶著熊向暉到葉劍英家，雙方討論後，葉劍英首度同意七月和華國鋒見面；七月底，葉選基向熊向暉透露，葉劍英和華國鋒已經見過面了。[59]葉選基和劉詩昆一直擔任與熊向暉聯繫的工作，直到逮捕四人幫的那晚為止。在行動的幾天前，還是由葉選基和劉詩昆遊說一直不贊成用政變解決問題的陳雲進行。[60]行動當晚，一些太子黨成員——當中包括鄧小平的女婿和陳丕顯的兒子，[61]將消息傳給各自父親的幾位主要朋友和同僚知道。六天後，熊向暉和葉選基召集了一個聚會，讓王震知道整件事情的經過。[62]幾個月之後，葉向真陪著父親葉劍英去探視當時住院治療且對自己仍未獲平反而微慍的鄧小平。在當

時的情境下，這種探視確實有些微妙。[63]

上述由這些就現存資料列舉出的紀錄，強調的是葉劍英子女在事件中的角色，但我們有理由認為李先念、紀登奎、劉建勛的子女也有擔任訊息傳遞的工作，在急迫情形下嚴守本分，因為這次使用強制武力的準備工作並沒有消息外洩。不過。有件事可以顯示，領導們的孩子其實並沒有將一些重要的事告訴他們：在一封一九七六年九月流出的一封信中透露，紀登奎的兒子曾表示毛澤東死後將串聯其他人大幹一場，還要宣布張春橋為叛徒。如果這封信的內容外洩，江青的黨羽們就會有所警覺。[64]

文化大革命的教訓

隨著最後的插曲，文化大革命讓太子黨們扎扎實實的上了一課。在這段時間親歷過的一切，讓他們知道孩提和青少年時期的自己是多麼天真。

太子黨就是因為少不更事，才讓毛派分子從一九六六年底開始得以利用他們初生的熱情反過來壓制，讓他們承受這段殘酷的試煉。有一小部分重要的太子黨成員，特別是那些主要紅衛兵組織的負責人，學會冷靜的觀察和分析，不但看穿了文革煽惑人心的伎倆，也明白社會和法治秩序的重要。這些人之中更有部分具備相當膽識，特別是參加「聯動」這個紅衛兵組織的人，曾嘗試採取手段降低這場災難的損害。他們在往後的體制改變上，也將擔任重要角色。

接下來的上山下鄉更是愚弄太子黨，但這次不論是受折磨的時間、被下放的偏遠程度、發現的社會真相、對家庭向心的依靠等，都讓他們在見識和心理上切實的反躬自省：面對極惡劣的困境，他們才幡然醒悟過去經歷的一切都是騙局，進而了解他們的未來能得到的依恃，仍然來自自己的出身和過往的環境，也就是家庭和身處的權貴集團。經過了青少年想像世界的幻滅，他們回過頭來只取信最初始的信念，而用輕佻和現實的態度看待其他的一切。[65]

此後，他們對任何崇論閎議都懷疑以對，至於忠於黨及國家的態度，則與對他們的家庭、權貴集團和財富是否有利相連結。

第六章
邁向接班（1977－1989）

一般人看到大趨勢的演變後，往往會不在意伴隨著一塊發生的小事件，中國現代史學者亦然，他們常會忽略中國領導人在剛開始冒險改革時的躊躇和錯誤，例如鄧小平說過要「摸著石頭過河」，但沒有石頭的地方他就繞越避開。其中許多人將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九年這段時期，簡化為對文革撥亂反正、對現代化政策的運籌形成，以及成就這些功績的領導的集體養成過程。

透過一些新資料，我們得以重新檢視這個被奉為圭臬的說法。從以往的謬誤到現在的改革，在這期間的經濟政策方向、國家是否開放和民主化等問題，都曾在幾位重掌權力的老幹部間引起激烈爭論。他們的子女在政治上無法影響、改變父母的想法，只能伺機和緩地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些爭論經歷三個階段，最後導致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場大動盪。首先，華國鋒捍衛的「合理毛主義」被棄，一個還沒有任何細部規畫的現代化政策取而代之；接著，經濟形態改變，太子黨開始從各方面進入政治體制工作；最後，有關民主的爭論在體制核心內部爆發。這場爭辯最後在政府對應失當和群眾示威遊行中戛然而止，而這結局讓專制威權站上檯面，也為太子黨們闢出了一條大道。

有以待之

許多人很早就在猜測，四人幫被打倒後，這些獲利的高層領導間的齟齬就會顯露端倪。實際上，他們的齟齬建立在葉劍英所促成的雙邊妥協上；一邊是毛澤東原本一心想要打倒的官僚權貴（大家以鄧小平和陳雲馬首是瞻），另一邊則是在毛澤東要打倒權貴這事上提供一臂之力的人，主要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一個是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一個是他最後的打手）。一九七六年冬季開始，到一九七八年冬為止，這兩年中官僚權貴集團中的幾個主要人物一直在遲疑要不要毀棄雙方的妥協，但又考慮群眾的反應和領導集體的團結，這些都會對領導們地位的穩固與否造成影響。

這兩群人彼此看不順眼，且都有一定年紀，身體經常有些毛病，其中許多人都需要到醫院作檢查，甚至接受治療。鄧小平在一九七六年冬天到一九七七年這段時間就接受過前列腺手術；這次三○一醫院為他保留了整整一層樓供療養。到一九八○年代初期，幾乎所有還活著的軍方元帥和文職領導人，都至少有過一次住院治療的紀錄。[01]官僚權貴們一聽說有國外新的醫療方式，都想要找機會出國尋求治療，而這也是為什麼會那麼快就派出醫學代表團前往西方國家進行考察的原因。其中鄧小平家人最想要的，就是送癱瘓的鄧樸方出去進行手術治療。[02]

另一件緊要的事，是要盡快將下放在外的人轉調回來。最後這批成員中包括劉少奇的家人和故舊，也是毛澤東最不喜歡的人；有劉少奇之妻王光美、長期負責中央辦公廳工作的楊尚昆、前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這些人直到很晚期才得以回到北京。[03]相反的，習仲勛因為妻子和長女先前的努力奔走，加上和他頗有交情的王震、葉劍英和鄧小平的援手，

早在一九七八年二月就回到北京，並被分配到廣東工作。[04]

太子黨再下一代的孩子們所過的日子，就比較趨近一般的平民百姓，其中有多數人還在當初被下放的農村裡生活過好些年。[05]總之，為了回到城市，他們可以用盡所有方法和理由。對那些調回希望不大但年紀較輕的，入伍當兵是可行之道。像在年紀較長一批太子黨中較為人所知的李鵬，他的兒子李小勇就是一例。[06]不久之後，軍方對這批新血的需求就會增加，因為懲越戰爭在一九七九年二月開打，雖然地域範圍有限，表面上時間也沒拖太長，[07]卻給了一些高層領導人讓孩子參軍表現的機會。一些人希望這段經歷對孩子未來的發展有所幫助，相反的，另一些領導人卻希望他們的孩子能避開這場血腥戰爭。不管怎樣，好事者的物議總不會少。[08]

這段期間，一件特殊的事引起了官僚權貴的關注。一九七七年恢復了高考制度作為大學入學錄取辦法，取代那些行之有年經由政治考慮分配入學的方式。初次舉辦時，總共有五百萬學子參加，最後總共錄取了二十七萬三千人，許多錄取者都有著較好的家庭背景，此後便按往例每年舉辦一次。[09]這件事不但象徵屈辱的結束，對新學生而言，則代表著想要得到心儀的工作職位就必須通過考試去爭取。實際上，由一些曾被下放到農村後仍盡一切努力準備考試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不顧生活環境困難，還有自己已超過讀大學年齡的限制，仍要爭取入學的勇氣。胡耀邦的兒子在一九七八年通過高考時已二十七歲；曾是劉少奇秘書的鄧力群之子被困在河南好些年，他通過高考時也是同樣的歲數。[10]至於劉源，則因為他父親劉少奇的問題還沒解決，在報名參加高考時被拒絕。為了要參加考試，他大膽的靠著向鄧小平寫信抗議，爭取到參加一九七七年的考試。但即使如此，著名的北京大學還是不敢收

他，他只好轉而爭取成績要求次一些的北師大。稍晚，陳雲的兒子陳元也成功考上研究生。[11]接下來幾年，大學新生中有著大量的太子黨成員，而這種狀況讓其他人非常不滿。這些太子黨在大學裡受校方另眼相看，而且畢業後也會分配到較好的職位，甚至就連沒通過入學考的人也能找到不錯的政府職務。[12]

這些高幹子女一旦自農村回到城市，在回到以往從容的生活之餘，還會開始做些自己想要做的事。舉劉源為例，他就常在舞會吸引異性，也曾與曾山的女兒交往。[13]但對絕大部分的高幹子弟而言，愛情不僅止於社會交往那麼簡單，它還有著政治上的意義。有些夫妻離異的例子可供佐證；曾任公安部長又是江青愛將的謝富治，在四人幫垮台前就已故，他的女兒後來被丈夫斷然割棄。另外有些結合是因為需要，像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訥，後來嫁給一位曾在警衛團當軍官、五十餘歲的人，她還曾戲稱對方為「叔叔」。對新掌權的當局而言，婚配是最穩妥的監控方式。[14]

大家都關注著那些曾經被打倒和下放的人，像是政治上扶搖直上的胡耀邦，他嫁女兒時就成為了眾所矚目的焦點。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也湊上這波熱鬧，幫忙張羅賀龍女兒賀捷生，和毛澤東手下出身的湖南省省委書記的婚事（鄧穎超對於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能幫上賀龍而深懷內疚）。其他婚姻的目的，或是在權貴家庭間門戶相當的聯姻，或是消弭以往因意見不合而生嫌隙團體間的過往情仇。像是前文提到，當時正值高位的胡耀邦，其子胡德平就娶了安子文的女兒；安子文曾是劉少奇的支持者。有許多高幹子女甚至從沒和對象討論過就結婚了，比如李先念（在元老中相當有影響力，而且在家裡也很要求原則）的女兒李小林和劉亞洲便是；劉亞洲也是太子黨的一員，而且在軍人當中十分特殊，後

來很快成為權貴集團倚重的作家。[15]

和以往相同，有些規矩不見得會被所有人遵守。例如有些高幹就不像以前凡事都俯首帖耳；曾是彭德懷同僚的黃克誠，就曾對為文革期間受難者發聲的「傷痕文學」風潮發表過意見。劉伯承的孩子們都離家自謀生活，這也是少見的例子。相反的，鄧小平就很傳統的讓所有的子女以及配偶和他住在一起。[16]另外有些婚姻因為決定得太過倉促而沒能善終；例如薄一波最聰明的兒子薄熙來，在一九七七年才剛結婚沒多久，就和另一位高幹的女兒谷開來有私情，後來在一九七九年與她結婚。[17]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則是因為拒絕跟和他年輕的前妻（中國駐英大使的女兒）出國生活而離婚，他打算之後再找更適當的姻緣。

改變將至？

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之間洋溢著一股情緒，不是要求安定，而是渴求自由和出國旅行。自由和出國這兩項選擇相連，是因為在中國才剛剛過去的記憶是那麼痛苦，而自剛剛擁有的電視裡播出的海外世界，看起來是多麼美好。即便原本目的在於揭露黑人被奴役情況的節目裡，都可以看到汽車在美國城市中川流不息。[18]高幹子弟中，有關西方國家的情況成為彼此間口耳相傳的傳奇內容，再加上他們父母從參加考察團的同事那聽來的見聞，描繪出了一份令人嚮往的圖像。當谷牧結束西歐國家訪問團完成一九七八年五月到六月的考察工作後回國進行匯報時，最高階的幾位領導人都參加了這場會報，[19]不過鄧小平用不著去聽取這些報告，因為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期間，他訪問的國家數量超過了他這輩子其他時間到訪國家的總和。一九七八年底時，他曾表示：「我們到國外看得愈多，就愈知道自己多麼落後。」往後當他再出訪，也不忘帶上子女或孫輩隨行。[20]

另外，外國人在中國的行動限制也放寬了，不再被限制在旅館裡不能隨意走動。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和觀光客，尤其是來自日本的，讓太子黨們一直有著對他們「現代化」的服裝和消費的關注。美國菸迅速流行起來，而一些迷上爵士樂的樂迷，也開始染起了頭髮。[21]

隨著中共黨內強硬派重掌權力可能性的日漸渺茫，以及文革受害者一九七八年春天開始平反，再加上原本關押在勞改營中的幾十萬人被釋放，抗議不公和迫害的活動終究開始此起彼落地出現。十一月時，許多「上訪」者湧向北京；讓這些年輕人不滿的，是他們過去受到的不公不義對待沒有得到妥善處理，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工作安置。

一九七八年，紛擾情勢的愈演愈烈可從北京的權力僵局來解釋，不過這些紛擾也加速了解決相互牽制的局面。就外部觀察來看，由於看出團結是必須而且可行的，鄧小平使得這些抗議者得以聚集；以鄧小平和陳雲為首的黨內高幹，在年末最後兩個月舉辦的中央各個會議中主動出擊，讓葉劍英和華國鋒只能朝他們設定的方向走。最初，他們正面鼓勵各項抗議活動，當中尤其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張貼的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堪稱為這段時間的代表作。[22]抗議行動從最為熱烈及大膽的北京，在公安力量的克制和壓抑下向各省擴散。

在北京，一九七八年冬到一九七九年春季參與示威抗議活動的青年，年齡相對較大，大多有三十歲。他們在受盡折磨後，期待著能討個公道。這批群眾的組成非常多元，有無業者、工人，還有教師和小學教員，他們或演講、或寫文章，表達出他們的痛苦和希望，更向外界傳達、描繪出一個他們期待的更民主的中國。[23]相較於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熱火朝天，太子們對於這些運動卻意興闌珊；也許是因為家人都已經得到補償，而且他們大多數人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從下放的農村回到城市裡了。[24]

雖然如此，太子黨中仍有兩個例外。第一個例外發生在那個有意義的年代，但今日較不為人所知。戴晴，她以記者的身分參與了中國的民主運動，並曾出版一本描述文革歷史的書；她是革命烈士之後，也是中國最有權勢的葉劍英的養女。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她傾聽一部分堅信中國應走向民主化的知識青年的想法後，成為他們的辯護人。[25]

第二個例外更為重要：在這段運動中堪稱最大膽的文章，也就是提出民主是「第五個現代化」的文章，出自魏京生之手。魏京生也是幹部子弟，他父親的職務並不高，但他的智識、勇氣和清晰的思慮，讓他成

為最知名的中國民主和人權推動者。[26]

然而，當鄧小平和陳雲的權力相對穩固，他們逐步收緊對這些運動的控管。一九七九年四月，幾個帶頭的推動者被逮捕。[27]魏京生的意念則成為往後這些運動的啟發，等到了一九八九年青年們再度動員起來時，就有少部分太子黨的身影出現在抗議的人群中，或在一旁支持。

總之，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中國青年十分嚮往民主，就連一些領導幹部也開始質疑起共產體制。

中共老幹部李維漢在兒子李鐵映要進入政界發展時，就對他強調，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就是因為中國封建遺毒作祟。[28]另外還有一些太子黨成員受到新潮流影響；例如劉源，就有接受西方模式帶來的一些觀念和價值的傾向。[29]其他還有些人進到了新改組的社科院；像陳雲的兒子陳元，在一九七八年時就曾寫過中國體制社會基礎研究的一份論文。曾任劉少奇秘書的鄧力群之子，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連周恩來個性樸質、剛開始在內蒙任小學教員的姪女，後來都進入內蒙社科院工作。[30]

在大學生中，有些人想藉參加一九八○年在大學選區舉行的地方公開選舉，以推動政治改革。參加北師大選舉的劉源，在和黨指定候選人競選時就毫不忸怩；由於他曾經被下放到農村插隊，該經歷在提問答辯時，提供了他不少優勢。他還爭取發表一些不同於官方立場的言論，在不怕引發矛盾的情形下，也對原本官方不贊成的多黨制發表了意見，*[01]但他最終還是落選。另一方面，相當克制、謹慎，也是現任國務院總理的李克強，則在北京大學共青團的選舉中勝出。[31]

許多人認為，全面檢討整個體制必須假以時日，並非一蹴可成，而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到西方國家取經，等待機會到來再回中國進行改革。

前往美國或歐洲的留學潮因此而生。第一批被美國大學錄取的學生都是重要領導人的子女，而這在以往是不被允許的。一九八○年，錄取的名單中有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劉亭亭和徐向前的兒子，之後陸續還有鄧小平、朱鎔基、楊尚昆、江澤民之子，[32]那些年齡過大不適合到美國讀書的，就想辦法到駐美使館工作，例如鄧小平的女兒和她的先生；或是利用考察訪問的機會出國，像習近平一九八○年六月就曾赴美考察。[33]此外還有日本和香港，也都是眾人想要去的地方。[34]

在所有中國青年都夢想著要前往西方國家的那些年，太子黨成員還有一項他們在進行商務考察時經常會用的特權：用化名出國，使用特殊的證明文件隱匿自己的身分。一九八七年在國外讀書的三萬多個留學生中間，就有不少人是用這種方法。[35]

權貴再起

年輕一輩於婚姻和學業上次第展開新生活之際，權貴集團不但重新站穩腳步，更逐步強化地位。此後，太子黨中的成員開始被視為權力的接班人，他們的父母還會盡己之力推他們一把。

成為被培養對象的通常不是女孩，一般來說會是長子，要結過婚，而且在智識和社交上要有出色表現。像是楊尚昆在一九七九年就利用幾次前往北京拜訪王光美和習仲勛妻子的機會，薦介兩個兒子給薄一波。[36]而習仲勛在大部分靠女兒奔走獲得解放後，則培植他表現最好的兒子習近平，將他送到一位軍方高層領導身邊當秘書。*[02]一般人會以出國讀書或是直接下海經商為起點，不過有少數的太子黨成員，比如說孔丹，*[03]就和習近平一樣選擇以擔任高層領導秘書做出發點。就日後的發展情形看來，後者的方法顯然高明得多；擔任領導秘書期間，可以讓未來有志從政者在日趨複雜的中國官場中，獲得許多有用的資訊。[37]

此後，每個家族的影響力端看該家族建構的關係網而定，這些就是曾任高層領導老幹部和其子弟通往權力之路上，所仰仗的資本。

這些權貴子弟很快的就取得了用「黨的歷史」替換詮釋當代史的權力；無論重要的老幹部在世與否，保留他們的傳記和重建其行止記錄，成為這項任務的當務之急。官方的歷史編輯工作獲得了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及大筆預算，許多傳記和回憶錄因此陸續面世。[38]為了讓輝煌的過往能持續流傳，幾位黨史上的重要人士在家人陪伴下也都會回到一些歷史勝地緬懷過去，有時候還有像毛澤東的女兒李訥，或是毛澤東曾倚重的舊屬如汪東興等人，也會陪同出現。另外有些太子黨會參加專門為年輕一輩舉辦的紀念活動。[39]所有的活動都是為了表現毛澤東成就的事項中

「功」的部分，以重新建構官僚權貴的合法性。

一些高幹間的社交或是社會活動，可以讓大家建立對家庭的歸屬感。在毛澤東和劉少奇治下，由於他們倆對這種事不感興趣，曾經對鄧小平和彭真為反映其他人需求而規畫建立的幹部休閒娛樂設施提議打了回票。到了現在，演變為在「三門」*[04]成立一個休閒娛樂俱樂部，並交由嚴謹的軍方管理。該俱樂部位於北京市中心，在景山和北海公園入口附近，有四個電影放映廳、幾個體育場、乒乓球室，以及可以看到重要領導人出現的橋牌室；*[05]只有陳雲不會在那裡出現，因為他不從事任何休閒娛樂。[40]

和重要老幹部建立關係成為大家趨之若鶩的目標，而拜訪這些老「叔叔」們的方式成為了必要的一門藝術。劉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禮貌性的去拜訪楊尚昆和彭真，而他們也熱情接待，並詢問他過去發生的事件詳情。他們正努力思索想了解原由，對劉源提出的大哉問是：依他的看法，毛澤東為什麼想要鬥倒劉少奇？許多高階將領也紛紛去看望粟裕，雖然他過去以作戰的才能和脾氣暴躁出名，但年齡和臥病讓他變得較易親近。而在這些老幹部的賀壽場合中，彼此孩子們的發展情況永遠是大家最感興趣的話題。[41]

在當時，社會上重視老一輩去世後殯葬送終儀式的想法仍然興盛。政府在慮及這事的重要性和家庭支出的撙節問題，決定以過世者生前六個月薪資的額度補助喪家，使喪家得以辦理和死者職務身分相當的葬禮。不論是生前或身後事的進行，都必須依當事人的要求和政府的規定辦理，[42]這也是為什麼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會在生前召集親人交代後事，提前要求不保留財產、不辦追悼儀式、遺體火化、不留骨灰。[43]

葬禮本身仍然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因為依過世者本身和受邀到場參

加者的職務層級，官方在八寶山公墓舉行追悼會時，都有一定的等級規格要遵循。然而在一九五○年代中期，中共官方通過了一律火葬、葬禮從簡的原則，卻遭到關心身後事的高幹們的討價還價。有些領導幹部要求土葬，像是火爆將軍許世友即堅持如此作為，最後北京方面還是讓步了。[44]其他要求還有骨灰的安放、拋撒和墓碑的設立方式等。例如粟裕的遺孀和長子就為了尊重他的遺願，將他部分的骨灰拋撒在許多同袍戰死的戰場上。[45]此外，喪禮出席人數的多寡、追悼會舉行的地點、前來悼念的領導人的身分，都代表著當事人家族、權貴集團中層級的高低，也反映出他們在政治圈或軍事圈中的地位。而在喪事籌辦過程中，高幹子女們總扮演著重要的折衝角色。

政治回春

就算在權貴圈中流言蜚語和糾紛事端不斷，但讓人滿意的事仍占多數，因為從一九七八年冬季到一九七九年間發生政治轉變，讓權貴家族得以逐漸重新取得以往的地位和利益。尤其是華國鋒離開權力核心以及葉劍英的淡出，幾乎沒有引起太大的反對意見。而鄧小平的權力逐漸鞏固，他和陳雲及胡耀邦攜手共治的局面基本為大家認可。此外，從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三年間，都沒有出現太大的觀念分歧。[46]

鄧小平表示的政策走向（通常由胡耀邦詮釋執行）大概比陳雲所提的要更有利於變革，尤其是在幹部年輕化和政治接班問題上。一九七九年七月，鄧小平就指示組織要選拔並培養年輕幹部，也同樣要求省級單位要注意引導並拔擢年輕人。而鄧小平和陳雲兩人在「年老幹部離退」（最高層的領導人除外）問題及「拔擢年輕幹部」二事上觀點完全一致，這樣一來就為太子黨們大開了方便之門。[47]

新上任的領導幹部總認為是按照既定的過程接掌權力，可是，鄧小平在這件事上的態度仍時有反覆。相較於此，陳雲就曾經明確地對這件事表示過看法：「我們的子弟接班，至少不會反對我們。」[48]由於兩人的共識，一九八二年通過了兩項決定：七十歲以上的老幹部要離開工作崗位、要設置中央顧問委員會安置這些老人。領導年齡一超過六十歲就離休這件事，則更沒得商量；在這批人裡，胡耀邦是最有影響力的。[49]為了讓還健在的老幹部能同意接受離退政策，准許年老的高層領導幹部家裡保有原來的優惠待遇，以及讓其中一個子女接替離退者的職務等做法，都被提出考慮。[50]年輕化政策在顧委會經過往來交鋒；陳雲希望在經濟專業能力和幹部道德考評上有所要求，而其他人則希望在待遇上能

有好處。還有老幹部家庭中被選定接班的子女，要求在該離休幹部工作單位以外的機關擔任不同職務，不過之後這項要求卻被大家置若罔聞。到最後，最主要的幾個領導人可以不用受到離退年齡七十歲分界限制的規定，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這也是第一次所有人都認定所謂的主要領導人，也就是政權的最高領導，而實際上「哪些人」可以列名其中，則由當時的「權力三角」——鄧小平、陳雲和胡耀邦三人來認定。

縱使有例外條款，幹部年輕化還是逐步落實了。受到拔擢的年輕幹部也不盡然都是太子黨：例如一般家庭出身、出任共青團負責人的王兆國和胡錦濤，就形成了一股箝制太子黨的勢力。另外有些出身顯赫的世家子弟，陸續在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二年間出任一些有意思的職位，例如羅榮桓的兒子羅幹，就進入工會擔任領導；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則成為瀋陽的市委書記；另外還有李鵬，他接了黨電力工業部部長職。[51]這三個人都生於一九三○年代，基本上我們可以稱他們是「老」太子黨；三人都擁有相當的專業，也都有一九五○年代和蘇聯合作的工作經歷。他們擔任政府領導職務之際，正逢文革時被迫離開工作的上萬名由蘇聯養成的工程技術人員恢復工作之時，而這些技術人員正是一九八○年代經濟振興的要角。[52]

在這段太子黨逐步攀升的時期，他們的地位其實並非十分穩固，必須看各人依附的主子而定；像照看王兆國和胡錦濤的是鄧小平和胡耀邦，但他們有時並不會表現出對他們的關照。陳雲有時則會對太子黨做出嚴厲的批評，他極力主張每個高幹家庭中只能有一個子弟進入政界任職，[53]但陳雲在這方面的態度並不會影響自己對和他一樣持保守立場的李鵬和姚依林的特別照顧，也不會讓他去鼓勵自己的兒子參與政治。鄧小平則不同，他會調整自己對一些太子黨成員的看法，並支持子女建議

的一些人選。

此外，不僅止於鄧小平和陳雲參與其中，有些職務的任用還要看不同家族在各方面的影響力。一九八o年，當華國鋒下台這件事削弱葉劍英的政治地位時，為了拾遺補缺，他的兒子葉選平被任命為葉劍英耕耘甚久且深具影響力的廣東省副省長。隨後，葉選平於一九八三年接任廣州市市長，一九八五年任廣東省省長。[54]另一個讓人注目的例子是烏蘭夫，烏蘭夫在文革前後均獨力管理內蒙地區，他其中兩個兒子也在一九八o年代初期就在內蒙古任職，至於烏蘭夫自己，倒是不再干犯政治風險。[55]

空降部隊

在最高領導人技術上的同意下，太子黨進入政界的人數驟然攀升，整體情況就像是這些權貴家族在政治棋局上搶著落子布局一樣。其中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鄧小平家族，但鄧家的做法其實更有技巧。雖然鄧家長子鄧樸方因身體因素無法擔任要角，年幼的成員也看似對這些政治職務不感興趣，但在各種重要決策的前前後後都看得到鄧家子女的身影，他們也會設法從中得益。

想要「空降」到某單位任職的想法五花八門，但整體看來，過程中讓人看出其中有些算計並不是很明智的做法。「著陸點」的選擇有的時候要碰運氣：林伯渠的兒子就被分配到和他家庭沒有任何關係的內蒙古去任職；陳雲的兒子陳元在銀行界有著受人矚目的發展，而他剛起步時曾花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北京市西城區委書記職務上，但卻和另一位擔任東城區委書記的高幹接班子弟有同樣遭遇，在北京市委一致的抵制下，不再繼續往這條路發展。*[06]還有習仲勛的兒子習近平，被分配到河北擔任一個縣的領導人，但卻碰上一位專斷的上級領導，這位領導*[07]從不掩飾他對習近平的輕視態度。[56]相反的，王震雖然沒在黨內占有重要職位，卻在許多年輕幹部即便經過多方嘗試也難以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情況下，很可能利用了一些承諾交換，成功地將他視之若子的賀敬之*[08]塞了進去。[57]有些人則是在某些考量下，在個人發展上起步得較順利，像是劉源，他之所以能獲得河南省的工作職位就是因為其父逝世；堅持理想主義的陳毅之子陳昊蘇，之所以能獲選為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道理亦然；還有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在一九八五年擔任中央統戰部領導職位，就可能是因為有些人天真的想要討好當時擔任中共總

書記的胡耀邦，不過當時胡耀邦的一些作為正值爭議之際，這個升遷太過惹人注目，反而容易招致攻擊。[58]

這些「空降部隊」一開始就以各種方式出現而且容易為人詬病。有些人並沒有讓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像是林伯渠的兒子。也有些人沒有繼續從政，而以本身具備的專才轉換跑道發展，像是陳昊蘇和陳元。也有一些像曾任中組部部長的安子文之女安黎之流，她當時也是胡耀邦的兒媳，*[09]在廈門市副市長任內，作風不佳、揮霍浪費，給人留下相當糟糕的印象。[59]另外有些人，雖然分配到的職位對他們的發展有幫助，而且較有吸引力，但是還是會碰上一些阻礙，像是劉源在河南（後來劉源要轉進到軍中後才有所發展）、習近平在河北等。只有少數人一開始就得以穩定發展，像曾經是江青情夫的黃敬之子俞正聲，就在山東煙台擔任市委副書記後就此循序升遷。

平步青雲

雖然這些太子黨毫無經驗，但在一陣混亂的起步後，他們都能在官僚體系中逐步攀升，其中有些原因值得探究了解。比方他們的養成過程也許就對這一切有影響，另外他們個人的企圖心當然是原因，但儘管他們有著不同的選擇和態度，最重要的還是擁有能讓他們一直在高層職務間轉換的父母和關係。這些一九八○年代還在低階職務工作的太子黨，十幾年後居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占有大半席位，這在共產國家中相當罕見。

他們雖然沒能參與當時發生的大辯論，而在面對這些造成高層領導們各據一方的重要爭論中，彼此的立場也並不一致，但他們仍在層層阻礙和嫉妒目光下逐步前進。由於各有各的關係網絡，他們在一九八三到一九八九年間愈演愈烈的政治情勢中，不會完全支持其中某一方。像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和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在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四年間，站出來批評針對會產生不良的西方政治和思想影響進行的「清除精神污染」意識形態運動，而這個運動正是在陳雲支持下，由鄧力群發起的，也受到許多太子黨成員的聲援。[60]

此後，這些準備克紹箕裘的接班人開始介入運用每一個政治上的轉折。一九八五年在一次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中，藉著六十四位老幹部離退的機會，許多人以新老交替之姿進入到各個機關單位，*[10]尤以中央委員會為最。[61]有些人放棄繼續從政，例如劉源在河南仕途受阻，或是陳元和鄧樸方等33，[62]而有些人就以這裡作為政治生涯的起點。例如據傳，彭真在之後就讓他的一位女婿接下他在中央委員會的空缺。在一片政治紛擾和老幹部監國之下，幹部年輕化倒還是在持續進行著。作為年

輕化政策成功的證明，可以舉「資深」的太子黨李鵬作為代表，他在一九八八年就坐上國務院總理的高位。這項政策的執行一路順暢，讓十幾位太子黨們得以擔任副總理、部長和副部長職，而他們上頭還有「八老」*[11]在盯著。[63]這些新的政治做法和經濟活動，讓太子黨有了新的收入來源和品味，他們開始穿上最時尚的衣著，女生也直接模仿西方人的打扮，有些人更肆無忌憚的和他人姘居。有許多高幹子女，像是趙紫陽的兒子，就濫行官倒，*[12]為眾所周知。*[13]在警察極少查緝他們的違法行為之下，仍然有三名高幹子弟因為犯下連續強姦罪遭到處決。[64]他們十分仰賴雙親，卻極少住在父母的住所，因為在這些房子所在的區域內生活，絕不是什麼輕鬆的事，更何況管制也十分嚴格。這也是為什麼許多領導人在北京購置許多房產，而且大部分都在高級地段的原因。[65]

接下來太子黨所表現的高調張揚、肆無忌憚、特權橫行，在在招致群眾的另眼相看和撻伐議論。胡耀邦更在一九八六年加以批評，還發起打擊高幹子弟特權行動，查處胡喬木兒子走私色情錄影帶案及薄一波兒子薄熙成偷盜黃金一事，而胡耀邦自己抱持支持民主立場的兒子胡德平，也對他提出了一些批評。[66]

然而這些都沒什麼用，權貴圈中年輕一輩幾乎全力投入權力職務的追逐。具有極大野心的高幹子弟，一旦擁有知名大學學歷以及漂亮的聯姻關係，對未來的看法就此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能得到赴國外讀書的機會要看運氣，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七年間，才只有三萬個幸運兒得到機會遠赴國外，但高幹子弟卻利用這些機會賣力取得文化交流機構的推薦，爭取國內提供的微薄獎學金，或是由美國基金會及友邦國家贊助的獎學金名額。大部分的高幹家庭都能不花錢的將子女送到遙遠的國度去讀書。[67]隨後，由於錢權貪腐成風，這些高幹家庭很快就得以自行支

付兒女們的留學費用。一份一九八九年四月的資料，就揭露民航局長沈圖曾因放行美國波音公司一份利潤豐厚的飛機買賣合約，收了五十萬美元的賄款，這讓他能供應得起三個兒子在美國，和一個女兒在歐洲的留學費用。[68]

每個家庭都要將小孩送上追逐權力之路，但不論用何種方法，代價都相當昂貴。送禮上競逐攀比的事讓茶餘飯後永遠不乏新話題；送的禮要貴重，才能為他們爭取親友的支持、建構良好的關係網。[69]就連張羅婚姻都搞得像做生意般的要衡量利害，一旦成功的和高門貴戶結成姻親，過年的照片便瀰漫著權貴家庭貴氣的排場。附帶一提，當太子黨在外喝醉鬧事、影響形象時，警察都會盡可能的低調處理。[70]

一家兩制

光是權力還不足以滿足太子黨的欲求，他們還看上高薪的職位，他們是看不上眼小酬小利的。因此，大批的高幹子弟大多或擔任高層的代表，或擔任沒有太多繁瑣事務的差使。例如余秋里擔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時，就任命賀龍的女兒賀捷生負責編纂軍事百科全書，這當然是個象徵性的工作，但薪酬卻很高。[71]這慢慢形成讓高幹家中的女兒接掌一些所謂「友誼協會代表」的慣例，例如前面曾提到過的李先念女兒李小林，就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主要負責人之一，這讓她能名正言順的以相當於其職務的規格出國旅遊。[72]

一項重要的創舉出現在各項革新作為當中，誘使經濟上的積極性完全迸發：原本多多少少就存在的私有經濟部分從現在起的十年間開始逐漸擴大。私有經濟的發展在毛澤東死後不到十年間仍然不太穩定，甚至面臨一些風險，原因在於仍有一些高層領導人不贊成，而且不止是陳雲，連習仲勛這麼支持開放政策的人，也還是禁止他女兒到私人企業工作。[73]這種擺盪的態度讓太子黨們不敢成為領頭羊，連最有影響力領導人家裡的子弟都不免擔心。

有關這點，可以舉兩個領導人作為例子，一個是鄧小平家，一個是王震家。兩家都由極有權力的老人當家，也都在對外開放時專門在私有、半私有、假私有和所謂的公有領域發展：不論是他們的家庭成員或是特別服務的對象，都懂得如何很快的詮釋新規定、向機關當局施壓，以及取得諒解。[74]

負責引導外國資金進入中國的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即日後有名的中信集團）成立後，從此山門大開。這個許多人還不太敢直呼其名的

新公司，是由鄧小平和王震託付給榮毅仁的。榮毅仁是上海大資本家家族出身，接掌家族事業，在中國建政後曾一度受到打壓，但事業保留了下來。他的親友遍及香港和台灣，情報單位和高層領導因此對他愈來愈感興趣。因為他們了解，在賺西方人錢的同時，也要想辦法研究掌握（當然是不付費的）西方國家的創新、產品和技術。[75]執行方面的工作，就交由王震、孔原和葉劍英的孩子（孔原的兒子孔丹在文革一開始就躍上台前，搞得人盡皆知）負責，更有鄧小平的支持和鄧家人的參與。之後，中信公司成為國外資金的入口，更雇用其他的高幹子女，像是彭真和楊尚昆的子女就在這裡服務。這件事教會了太子黨如何利用在中國的資本主義規則，或更明確的說，利用規則的漏洞讓他們能在全國各處開創各種經濟上的新做法。[76]

隨後，太子黨快速的成立更多類似的公司機構，並負責操控。這些公司、機構藉經濟、政治和情報需要，得以在各種規定和法律間遊走，名為搞活經濟，但也致力充實私人口袋。例如保利集團，原出於軍方，乘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之便，在一九八四年成立，長期由賀龍的兒子賀鵬飛掌控，挑戰諸般法令限制；又如鄧樸方的康華公司，也是另一個太子黨聚集點，由於執行官方對殘疾人士的補助政策，也獲得了許多方便。[77]

雖然這兩個機構沒有像中信集團那麼有名，仍受到歷史學者注意。保利集團的主要辦公廳舍位在著名的北京東直門十字路口，毫不遮掩的集軍品工業、對外貿易、情報蒐集、軍火販運及金融匯款，甚至文藝經營於一身。保利集團實際上是解放軍總參謀部裝備部成立的，我們可以在它的前幾任負責人中看到三個家庭的女婿身影：鄧小平、楊尚昆和趙紫陽。[78]

康華公司是另一個北京版對法令限制的挑戰，它將原本主要應進行的慈善作為，轉變成各種不同的活動。在進行相關研究時，歷史學者主要應釐清三個面向：這些活動的性質、它們和中共當局各個不同機關的聯繫，以及鄧樸方的人格特質。由於鄧樸方沒辦法參與政治，這位鄧家長子很可能想藉由他創辦的慈善基金會所嘗試進行的各種商業甚至金融的創新，來改變國家經濟和政治體制。

這位對未來抱有願景且具相當資質的開創者，在具有極高權柄的父親以及母親關愛之下，受到姊妹們的敬重。一開始，他無論在課業還是運動上都沒受優待：高中時他雖然受學校重視，仍然選擇透過入學測驗考進入北京大學，並在文革剛開始的第一個月致力投入其中活動。一次學生衝突時，他被人舉起拋出窗外，從此成為殘疾，必須克服各種可怕的痛苦。當時，鄧樸方必須有著相當的勇氣，才能自己推著輪椅到二十五公里外的中南海求治。回到父母身邊後，他才得到較好的照顧。他對父親提出有利於改革開放的建議，娶了一位關節骨科醫生為妻，最後下海經商。總之，在這個中國人的世紀裡，鄧樸方十分特殊。[79]

就這樣，在對各項新領域寬鬆的規定下，經濟情勢逐步轉變。有問題發生時就會有某一位太子黨出面解決，因為許多高幹子弟都被放在為了舉辦不同商業活動而新近成立的企業公司，這種情形在各省內尤其明顯，[80]因為要由懂得相關規定的負責人，設法尋找能排除適用規定的辦法，而且到處都有負責提供這類服務的仲介角色，甚至連政府經濟機關內部都有，成為一種新興職業。如此一來，就能在新舊做法之間，建立起聯繫雙方的橋梁。

許多人開始同時從事不同的活動，有些在公共領域，有些在私人領域。剛開始時，大多數人都有正當的理由，但諷刺的是，他們最後都以

貪腐告終。這就是習近平一九八五年離開河北到福建時面對的情況，也是讓他後來大力發起反腐運動的原因。[81]

此外，有些夫婦或是家庭成員在公私領域一塊工作並互通有無。像溫家寶在一九八三年成為了地質礦產部副部長，他的妻子則是一位地質學家，並在珠寶協會任職。後來這對夫婦的財富愈來愈多，溫家寶最後也得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82]

在一九八○年代，太子黨當中敢干犯風險的，在公務和企業間從原本擔任的溝通和中介角色，發展成結構性的腐敗；不論國內還是海外，只要是有權錢關係的公務和企業，都涉入其中。[83]換句話說，這些太子黨集團在共產政權建構的規則中運作資本主義——目的當然是為了交換金錢利益；爾後三十年，這種違犯法規卻能獲取大量利益的做法，卻提供大規模經濟成長的動能。這種運作機制也將原本由毛澤東時代以降形成太子黨集團，一變成為培養掌握巨額財富和政治權力後備人選的搖籃，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能力操控打著共產主義招牌的政權，和走著資本主義道路的企業兩者的聯合體。

在這之中，還是有些特別人物可以成功的優游於兩者之間。例如陳同海，他是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浙江鎮海石油石化總廠的負責人，一九八六至一九九四年進入政界，官至寧波市市長，後來又就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總經理，直到二○○七年*[14]為止。[84]一般而言，一個家庭的不同成員分別在兩個領域工作更容易作業：這是一段不停變動、沒有定型的調整過渡，是在太子黨們邊摸索邊發展出的一種狀態。

屬於家庭的年代

組成權貴集團的各個高幹家庭的結構出現變化，而且影響力愈來愈大，成為這個時代的一個社會政治現象；前段所述的就是這個現象的深層成因。在毛澤東時代，高幹家庭幾乎都是以家中具有權力的一家之主作為對外識別的標記；兄弟姊妹依靠他生活，外人也不太認識他的孩子，而妻子則最好的角色就是做他的附庸。但毛澤東治下，這些家裡的大家長都不得善終，即便生存下來，權威也大不如前。

相對的，他們孩子的地位變得重要，而他們取得家裡重視的方法則各有不同，常常經營代理業務，像是醫藥或教育，女孩則大都專門協助年邁的父母或是專注管理家務，這使得她們其中一些人反而擁有實際的影響力。比如在鄧家都是由鄧楠和鄧榕發號施令，除非鄧老爺子發脾氣。[85]男性則相對選擇特定事業發展，並在兩個原本界限分明，但後來卻逐步靠攏的領域取得具有實權的職位。這兩個領域我們在前面就曾提到過：一個是傳統的當官或從軍，另一個新興的則是下海經商。簡單來說，一個家庭不只是因其家長而貴，更因每一位成員而貴，且男性變得愈來愈重要。家中男丁在政界或在商界發展愈成功的，在家中的角色愈受肯定。

官僚權貴集團中每一個家庭的影響力大小不同，而且差異甚大，相較於過去，這和凝聚成他們影響力的因素有關：仍在世「大家長」的健康狀況、母親的身體健康、年齡較長子女的人格特質，還有家中男丁的人數和所從事的事業情況也愈來愈重要；其中又以第一項和最後一項為最。即便這些家庭中身為老幹部的家長仍健在，他們之間的工作能力和權威大小仍有極大不同。除了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比較特別外，其他

老幹部講的話已經不太有人聽，尤其是那些解放軍的老帥和老將們，已經不太能影響什麼人了，如果這些老幹部的子女又沒什麼發展，他們就更不會被當回事了。

高幹子弟中男孩子的發展，在這個政治、經濟和軍事交相混雜的過渡時代中，有著相當的多樣性：對家族地位最有利的，就是子弟得以分別在政界、軍方和商界立足，也因此一個家裡有三個以上男孩是最有優勢的。最有權勢的家族就是那種既有眾多男丁，更有健康情況良好而且具相當榮耀資歷的家長；就是因為具備這兩項特點，有著四位男丁的薄一波家才能長期擁有影響力。[86]

這說明不論是這個政權的最高領導人或是副手，更或者中共整個官僚體制，都接受讓這些家庭成為結構整個體系的骨幹。之所以如此的第一個可能原因，也許是因為自毛澤東時代開始，大多數的主要領導人或多或少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其中只有周恩來因為太謹慎自持而不敢說，而劉少奇則太重視官銜而不敢做。更何況，在這些家庭組成的結構下，也便於藉此進行必要的溝通和合作。

以當時黨的負責人胡耀邦為例，他常教誨家人遵守法規，且對人寬厚，在許多方面和同僚們有些許不同。他對官僚作風多所批評甚至出手整飭、對妻子謙謹敬重、對子女關心垂詢，也沒有涉入經商領域，但他參加高幹權貴集團的社交活動，對物質上的特別享受毫無愧色，在兒女的嫁娶上也從眾隨俗——他女兒嫁的對象後來擔任海軍少將。*[15]總之，胡耀邦並未置身於權貴集團之外，還是其中受人注目的一員。[87]

從這時候開始，在保守和改革的拉扯擺盪中，這幾十個文革前就已種下恩怨情仇的家族，就著彼此的對立和盤踞在官僚體系中的權位，將中國政治攪動得既混亂又精采。相關資料或許無法提供足夠的依據，讓

我們了解這些家族因為交情建起的網絡；他們因早期經歷或是因為在地方任職共事而種下因緣，不過其後的變化卻是隨著情勢發展、家長影響力和具決定權的子女經歷而有所不同。

曾打過游擊，且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後大半時間都在江西發展的楊尚奎，其妻水靜在回憶錄中就透露如何建立起他們家族的關係網絡；一部分是以往在地方打游擊時就有的交情，一部分是在地方任職時的同僚，還有一部分是和在北京對地方事務有影響權力的領導人家族往來，其中當然包括總理周恩來，另外還有主管財政的李先念和薄一波。[88]

能主導其他人的重要領導人家族及其特殊性一樣值得關注。這些家庭因為在不同職務上發展而得以崛起；因為家長是軍事領導人而壯大的家族，今日仍然在軍事事務領域中活躍——例如老帥聶榮臻、賀龍和徐向前家族。家長曾任大將的家族也不遑多讓；下一代子女本身具有企圖心，刻意選擇和他們父親同一軍種，甚至同一軍區發展，楊成武家族一九七○年代就開啟這樣的先例，隨後其他軍方將領家族的跟進，讓這個趨勢愈來愈明顯。[89]文職領導人就不大一樣，像鄧小平家就沒有在純政治領域發展（有部分是因為鄧樸方的身體狀況和不得人望），子女也沒有投身軍界。雖說如此，鄧小平的妹婿後來成為了解放軍的高階將領，*[16]鄧榕的丈夫*[17]後來也在一九八○年代成為能綜觀戰略大局的總參裝備部領導人。[90]

以往領導人和家族、現在領導人及家族所擁有的權勢，則有明顯的差別。例如朱德，他的子女從一九五○年代起就非眾人注目的焦點，到了孫輩，更不太張揚自己的出身了。而對葉劍英家而言，除了葉選平的位居要津，其他子女成功發展以及其家族擁有的可觀財富，對照改革開放初期他強調的廉潔和在政治轉折上做出的貢獻，都讓他家的名聲不太

好聽。[91]聶榮臻和他的妻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為革命立下許多功績，兩人只有一個女兒聶力，她在軍中發展得非常好，先生丁衡高在軍中經過一九八○年代的快速晉升，在軍事科技研究上是位權責。[92]

相對其他家族的逐步發展，王震家則成為一個反例。王震家族發展較晚，在一次成功的押對寶後竄起。王震雖然是早期參加游擊作戰的老將，長期以來卻不受毛澤東關愛，但他成功的在毛澤東和他整肅過的高幹權貴間穿針引線的做溝通工作。當他再度回到權力圈內，便大膽地向鄧小平提出建議：由他三個精於商業經營的兒子和長於政治操作的女婿，協助創建中信集團公司。

王震雖然粗魯又現實，但他知道，一旦不再追求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權力競逐不再是威脅，再加上共黨體系的永續執政，此時還能引起官僚權貴集團興趣的，只剩下財富了。鄧小平受制於不能採取太多動作，而家中男丁又不旺，王震則恰好可以提供他一個積累財富的大好機會、一份對未來的藍圖和一心想完全掌控政治的欲望。換句話說，在那個企求發展的全盛時期，有一群冒險家努力的衝撞，要在體制上打開一個缺口。於是，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間，有三十多萬家公司紛紛成立。[93]

塞翁失馬

奇特的是，官權集團除了靠著重新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創新運作資本主義，來強化他們的權力，更靠著他們的子女掌握著整個新生的經濟，但是身為各家族家長的老幹部，卻又因為面對世界上民主國家的健全體質和共產國家的困境遭遇所引發的強烈對比，造成想法上的差異而彼此分化。胡耀邦和他的支持者與那些「老不死」的領導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薄一波……等）之間針對民主和共產主義的私下爭論就愈演愈烈。

在這場爭論中，保守派因為受到他們主要庇護者的介入支持而占優勢，造成胡耀邦於一九八七年被迫下台。但保守分子也不是那麼的團結緊密，以至於胡耀邦的位置由另一位改革派的趙紫陽取代，而他的作風更為謹慎。趙紫陽留下國務院總理職位由李鵬接任，他不但是第一代太子黨，且具備相當的能力，更是保守派能接受的人選。然而，中國社會對於通貨膨脹的怨氣和學生示威抗議浪潮的加劇，終於引發了一九八九年春天嚴重的政治危機，使得中共只能以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殘酷屠殺平息之。這場無意間由胡耀邦和趙紫陽帶動的民主運動，在受到鎮壓後一蹶不起，相反的，共產主義體制在實施靈活有效的經濟政策後，卻克服了原有的困難。

在這些弔詭之中，這段危機期間最常被提起，也受到最多批評的就是太子黨，但他們卻反而沒什麼作為；在另一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會「對他們有所評價」。在一九八九年五、六月發生的悲劇之前的幾年間，太子黨在黨政機構內競逐攀升，甚至連《人民日報》都起而呼籲要節制太子黨的晉升，也讓胡耀邦祭出手段壓抑他們過分的舉動。[94]一九

八六年冬天到一九八七年，學生抗議在校園中蔓延開時，太子黨們並沒有介入，部分原因是因為不論是保守或是改革，兩派人馬都同樣要為學生抗議的貪污腐敗負責。當時最多也只有老帥陳毅的兒子，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陳昊蘇出面對北京大學學生喊話，希望能夠安撫學生。[95]

一九八九年四月底開始，學生抗議風潮擴大，太子黨便成為了輿論的主要目標之一，因為反對太子黨享有的權力成為了群眾的信條。街頭有人高喊著「槍斃掉那些貪腐高幹」的口號，甚至還可以看到中信集團的人員參加遊行，並喊著「打倒官倒」。[96]在四處發送的小冊子和各處舉行街頭的演講中，人們一再嘲諷鄧樸方在賭馬上的花費；一些資料上也披露涉及貪腐官員的財產預估數額、這些「罪犯們」的姓名和他們購置的豪宅坐落位置。有的人要求領導人公開收入明細，還有人要求公開太子黨和與他們往來的友人姓名，以及這些人的父母是哪一位領導人的名單資料。還有傳言趙紫陽的子女也涉及官倒（具官方背景倒買倒賣的投機者），但在趙紫陽於一九八九年五月下令調查其子女財產，並提出打擊太子黨貪腐行為的提案後，謠言戛然而止。當位居要職的胡啟立於五月十八日向學生承諾，政府將會發起反腐敗鬥爭時，有位學生以「應該先從糾正他子女做起」回應他。六月一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更被迫表明，他沒有任何親人在政府高層任職。[97]

這些「子弟們」彼此間的實際對立情況，較外界所想的要嚴重。有些人，例如李鐵映，主張採取較柔和的中間路線，或是和一些軍方高層，如聶榮臻、徐向前和國防部長秦基偉[98]一樣，反對使用武力鎮壓。還有些人對年輕人的訴求頗有所感，甚至有不太為外界所知的一小部分人，直接加入了民主運動行列，或是居中協調設法能讓官民雙方達成折衷的協議。我們可以舉出幾個出身知名家族的主要人物為例：羅榮桓的

女兒羅點點、陶鑄的女兒陶斯亮、陳毅的兒子陳昊蘇及陳小魯、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趙紫陽的兒子趙大軍、李富春的孫子李勇，以及劉少奇的兒子劉源[99]……還有我們之前提到過，十年前曾支持民主運動的戴晴，她既是葉劍英養女，也是知名的記者，她為阻止屠殺慘劇的發生而多方奔走，事後還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中十個月。[100]

極大部分太子黨不論是公開或是私下，對民主運動表現出的態度都是不贊同，他們的說法是考量到在運動中過於激進的動作，反而對中國民主的發展不利。雖然如此，在他們之中倒沒什麼人積極參加鎮壓行動；除了第一個率領所屬軍團進入廣場的艾知虎之外，其父為瀋陽軍區砲兵副司令艾福林。[101]整個鎮壓行動中，特殊人物的孩子都受到同儕排擠，例如王震的孫女，據說就因此被迫從北師大退學；江澤民的兒子在美國準備論文時，也因此受了中國同學們的氣。[102]

無論如何，時至今日，我們還是可以很明顯看出，不管太子黨引起了多少批評，一九八九年對民主運動的鎮壓和改革派的受挫，顯然都幫了他們一把。基本上太子黨成員幾乎完全依附父母的權勢，也就是依附著共產黨政權，而這個政權的專制屬性讓利益和權力可以輕易世襲。讓絕大多數民眾（或政黨）享有取得資訊或是國家治理權利的民主化，或是單純的「法制化」，對他們而言沒有任何好處。

我們必須再次認知，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危機扼殺了自由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成為反對力量的可能性，因為在反抗行動中所遭受的損失和隨後的流亡國外，讓他們從此一蹶不振。再加上這些人也開始重視經濟的成長，以及與錢權關係良好的官僚權貴合作的價值。

太子黨依附的中共政權也認知到，群眾對李鵬等人想要將改革向後倒退的反對，也不再使用鎮壓手段，畢竟原本萌芽的西方政治影響和商

業大潮不但仍然存在，還因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於此同時，在中國南方扎根的太子黨，像一九八九到一九九一年在廣東的葉選平，也開始與中央對抗。而一旦成功消除了轉向民主的意圖和可能性，北京的當權者就能隨其意發展屬於自己版本的資本主義。[103]

這一切成為了太子黨壯大的契機，而也是在這場悲劇發生後的二十年間，發展屬於中國版本的資本主義，成為了領導人致力投入的工作。

第七章

權力在望（1989－2012）

改變歷史屬性

天安門屠殺之後，人們認為在這般血腥和難堪的慘劇發生後，原本歷史走向可能會朝繼續擴大傷害發展，但結果並非如此，整體情況甚至還有所好轉。實際上，這起事件後中共採取某些持續性的策略操作，原本是想要拔除群眾和菁英分子心中對西方民主嚮往，然而卻仍難以平復、遺忘天安門事件的政治浩劫，不過，這些操作回應了兩個數十年來這個國家所承受的痛苦：貧窮和束縛。

鄧小平推動的策略就是要對付這兩個問題，也是日後其接班人繼續執行且見效的工作。在這件事情上，太子黨積極投入，甚至還有些人效率極佳，但他們投入的同時卻沒有想太多，只為了一個單純的理由：創造財富。他們致力引進一種既能被當權者接受，百姓又認為可行的資本主義形式。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之所以能為當權者接受，是因為它的結果能讓當局維繫權力，而百姓認為可行，是因為它帶來的物質生活和自由滋味。

由於缺少資料來源，我們難以進一步了解以下這個問題：太子黨們是不是確知能夠參與其中對他們而言是個絕佳機會。但回過頭看看，在這問題上好像也無需多問。依他們的條件和社會位階應有的企圖，事情如此演變也是順其自然。對他們這兩代人而言，在這四、五十年間，一切就是這樣自然而然的加諸到他們身上，彷彿是經過百般磨難後情勢突然豁然開朗、一片大好，而他們也剛巧站在最好的位置上。對他們來說，不太記得那段時間的遭遇是件好事，因為在那期間發生的許多事是他們不能理解的，身為高幹子弟的他們，甚至被當成持不同政見的異議分子一樣對待。

這般經歷交錯匯聚三種不同人生經驗，對他們來說，既能感受又能運用這些不同體驗，應該是一種優勢。三段經歷中的第一段，讓他們得以感受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情勢變化如何改變了父親那一輩人，還有下鄉時他們認識、熟悉了許多農村幹部實際所處的情況；現今有部分像是「李鵬那一輩」較年長的子弟，都已經進入黨政機關工作。這批進入黨政機關的幹部子弟明白確保政權、享有利益，以及為中國維持最起碼的國際尊嚴才是他們要做的事。為了這個目的，所有的創新和改變必須受控制。要滿足這些要求，就要少說多做，以眼見實績為憑。隨後的第二段經驗，讓他們上山下鄉遠赴偏遠地區生活，了解到大部分的中國人民都生活在農村，而且要求的並不多：秩序、安定、家人們能一起過活、生活條件在可預見的將來能逐步改善等，僅此而已。有穩定的薪酬和收入，就能讓他們對未來懷抱信心並忍受現實，隔離不滿情緒。最後是第三段經驗，當出國旅行變得方便後，他們經常往返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了解存於共產世界的危機和對中國利大於弊的全球化之間的時代現實。擺脫蘇聯威脅之後，中國終於能夠實現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一九七o至一九七三年描繪出的發展道路，並從全球化潮流中取得好處。或者換句話說，順著全球不斷的成長與擴張，中國利用政治罅隙裡主導經濟發展，進而藉著財務和技術優勢讓提升人民生活品質、增長國家力量，更使得參與其中推動執行的政治人物，也能從中取得相當財富而不需付出任何政治代價，此外，更讓中國在與西方角力時情勢得以翻轉。

不過更重要的是，要設法實施一套策略性的做法，擺脫一九八九年春天事件引起的爭議。這套做法要做到既不徹底清算那場抗議行動，也不追究參與屠殺的人員。因為不管是徹底清算或追究責任，都會造成黨內和群眾的分裂，因此唯一能做到的是慢慢將兩方明顯參與甚深的人驅

離權力中心，並爭取曾支持民主運動的警察、黨組織及機構、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等的合作。能採取的手段中，最有用的就是在最終攤牌決戰前不要急於攻城掠地，用減少敵方戰士的數目和質量進而削弱敵人戰力為要，藉以轉移或避開正面對決。中共曾用這種戰法在以往革命鬥爭中贏得不少勝利，鄧小平之所以會想到運用的這些原則，就是受毛澤東的游擊戰法啟發。看著父執輩文章長大的太子黨對此也能心領神會。

也許就是因為鄧小平用了這套做法，才能在一九七八年凝聚黨內大部分的力量並投入現代化建設。他所採行的現代化作為，過去曾引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衝突與對峙，這次再次推動的不同之處，在於要面對一九八九年更激進的威脅，而且能運用的力量不再只有黨，還有一群在社會中占極少數，卻很能體會、適應這些改變本質的特殊群體——太子黨，以及一些受共產教條薰陶且對民主不感興趣的人。從過去到未來，正是他們逐步將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嫁接了起來。

在政治上，對內愈來愈重視要經濟和社會發展，對外愈來愈強調要加入全球化浪潮，這讓太子黨的重要性水漲船高。加上只有他們才能幫合作對象恣意解讀官方政策，使得愈來愈多人想要尋求與太子黨的合作，除了政治官僚，還有親朋好友、富商財主、媒體記者、各方掮客，更有「外國友人」加入「與狼共舞」的行列……決策複雜度增加，較之早期主要只考慮官僚因素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時代，現在則有了更多新需求。

日益增加的改變更有利於太子黨發展，他們的崛起、養成和經歷，使他們有足夠能力應付三教九流各方人馬，八面玲瓏的涉足包括人事安排等各項事務，也促使決策更順利、執行更彈性。甚至就連他們插手事務的多元性，也成為了一種優勢。不論是意識形態、專業、心理上，他

們建構的權貴集團對外關係（後面會再回過頭討論這一點）更為複雜，比起父親那一輩擁有更多的異質性（他們父親那輩，基本上出身於軍事背景的同質性太高），使得這批新權貴集團變得更能屈能伸，在政治上更有彈性——這種柔軟度和彈性，在未來成為他們極大的優勢。然而，無論再多元、再有彈性，他們在某些看法上仍然相當一致：他們明白自己是誰，也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累積財富和維護政權。

此外，一九八九年的屠殺過後，兩邊陣營的人既羞辱又同情太子黨，這個尷尬處境反倒成為好事，讓他們在想方設法撫平的衝突中不屬於任何一方。他們之間也存在許多些微差異，使得各個派系中都可以看到太子黨的身影。他們可以適應任何政治變動，並且不需要刻意迎合，而是讓大家慢慢接受，先使自己能為人所用，進而成為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面對太子黨的步步高升，政治表態和資訊來源或多或少淪入私人化，並在小圈圈中流傳，這阻礙了政情的分析工作。在一九八○年代，政策會因為領導人之間私下的重要論辯而稍作調整，許多這類論辯都會編印成書冊公諸於眾，未公開的則會被有意的流傳出北京，成為觀察家們撰寫各項報導和分析的養分來源。[01]然而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由於太子黨的社交活動及他們為跟上「流行」而辦理沙龍聚會或交換意見，私人小圈子大量增加。如此一來，相關的討論內容變得真假難辨，這讓在外流傳的消息豐富性大增但可靠性大減，許多記者不再閱讀出版品，轉向不同來源追尋各種小道消息。

因為太子黨每個人的性格不同、經歷相異，我們可以想見以後他們自己向外流出的消息，將會超出需要且多種多樣。這些消息而今只會出現在中國人的圈子裡，在分析時要十分小心，且只有和高層有接觸的人

才能取得並詮釋所有訊息和傳言，必須要等到一些個人的回憶錄，甚至日記問世後才能窺得事件全貌。在這之前，我們常常必須經歷對資訊的失之交臂和錯誤解讀。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

從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慘劇到一九九七年鄧小平身故，我們可以依時間序列將政治分為三個時期。

一九八九年夏天時，鄧小平似乎因為楊尚昆家族的氣焰而暫時受挫。楊尚昆曾是劉少奇副手並留學蘇聯，當時任軍委副主席。家族中除他之外，他弟弟楊白冰也在軍方擔任高職，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02]

接著，深信一九八九年春天一連串事件是國際間陰謀策畫結果的國務院總理李鵬，想方設法要阻止政治改革。但不論他如何以輕鄙或恨意加以煽動，太子黨都不太搭理，比起護衛政治陣線，他們更在乎維護自己的實際地位。

受到蘇聯東歐集團解體刺激，有一批太子黨聚集了起來，其中有陳元和鄧英淘（左派領導人陳雲及鄧力群的兒子），以及陳昊蘇（陳毅的兒子）。在知道蘇聯東歐情勢造成許多領導人不安，以及陳雲表態要倚仗太子黨後，一九九一年夏他們發出「新保守主義」的呼聲，其中倡言要抓取對軍隊、政府甚至經濟的掌控，這種想法在當時看起來是反動，但骨子裡卻是保守的：他們捍衛的對象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國家主義。[03]這段較少人注意的插曲，正好透露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共產黨的目標是想要建立一個受禁制且去除一切雜音的體制。有位太子黨在這過程中有十分醒目的表現，隨後更擔綱主辦不少研究和研討會，這個人就是潘岳。他的父親一九四九年前曾在大城市的地下黨擔任過領導人，因而在經歷上較沒有毛派色彩。[04]

第三個時期的發展，不論是在中國本土，或是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上，都更凸顯出太子黨的影響力。一方面，六四屠殺後對西方國家

的貿易禁令已成為過去，尤其是對於從開放貿易中獲利不少的沿海省份來說，這一段更是已成過眼雲煙。葉劍英之子葉選平在牢牢掌控廣東之餘，也繼續在合法範圍內維持著與香港和西方國家的貿易往來，這讓大家對未來發展充滿更多想像。[05]另一方面，包括李鵬在內的中國領導人，因為成功繞越或減緩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實施的貿易杯葛，使得重新思考和「謀中國之心不死的西方國家」重新交往是否有利的中國領導人也陸續增加。

同一時期，在中國社會和中共當局的協調下，對某些事和某些次級群體的壓制悄悄減緩了，社會氛圍漸漸恢復平和，政治也設法慢慢回到一九八九年春天之前的狀況。在李鵬主張的政策對中國未來發展顯見毫無助益下，鄧小平靠著和陳雲維持不錯的關係取得愈來愈多優勢，也將政治路線朝更進一步開放的方向推動，並且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南巡視察，前往廣東最開放的特區，達到宣揚改革開放效果。[06]同年，中共召開代表大會，政治方向丕變：已然有相當規模發展的經濟成果自此將持續向前邁進。許多太子黨紛紛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大家口耳相傳鄧小平多次重申同意幹部「下海」，也就是讓幹部可以投入經商浪潮。[07]

江澤民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取代趙紫陽，被鄧小平任命為總書記，地位開始日益重要。他被過繼給「烈士」當繼子，算是第一代太子黨，然而在一九八三年被任命為部長之前，江澤民的表現並不十分突出，不過後來在因緣際會下，他在一九八八年成為上海市負責人，職業生涯也就此起飛。

江澤民僅具備一項才能，但這項才能在這個體制下和衝突一觸即發的時代中，卻是必要珍稀的，那就是過人的察覺能力。這讓他能以靈活彈性應對，對於處理人際事務更有獨到之處，這個特點更在一九八九年

中國民主運動發生的那段時間展現無疑：他一開始表現出比北京政府更強硬的態度，隨後避免採取太過激烈的手段壓制抗議活動，最後讓上海這個中國改革開放都會，得以在悲劇事件發生後倖免於遭政治緊縮波及。江澤民的工作績效讓鄧小平相當滿意，於是交付他中共總書記之職，後來更加信任他，讓他擔任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職位。一九九二年秋天，江澤民成為整個政權的負責人，聲勢一下子就高過李鵬，而李鵬當時正因原本貪腐的傳言逐步被證實而飽受攻擊。

江澤民這個以粗俗小調和可笑舞會取悅法國總統席哈克，行為舉止像個工地主任的人，可能是中國的第二個機遇。一方面，長久以來鄧小平和陳雲爭執不斷，好幾次出現險象環生的情況；江澤民地位的不斷提高，則為這種互不相讓的局面畫下句點。另一方面，出於謹慎的原因，他仍讓李鵬留任總理，但卻安排另外兩人分擔李鵬的繁重工作，其中一個是朱鎔基，負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擔任黨、政和經濟決策者之間的連結人，在個人行為上也沒有什麼把柄。因為擔任這項工作，江澤民需要太子黨的協助，所以和他們往來密切，但他也十分明白分寸的拿捏：可以表示對太子黨的支持，但不能完全依賴他們。[08]

朱鎔基一九九三年兼任人民銀行行長時，精心挑選了兩位副手襄贊，一位是王岐山，另一位是陳雲的兒子陳元，這兩位都是同輩太子黨中的拔萃之士。一九九五年兩人共同推動中國建設銀行和美國摩根史坦利公司合作，合資成立負責投資業務的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09]這部分我們將會於本書後半段再討論。朱鎔基的這些作為都是為了達成他設定的更大目標：將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市場運作。他之後也確實交出一份亮麗的成績單，[10]這才是一個成功官員所當為。

分擔李鵬工作的另一個人是曾慶紅，他是太子黨的代表也是領頭

羊，既能代表太子黨對外發言，也能對他們求全責備，還能幫著他們了解江澤民的想法。曾慶紅是曾山和鄧六金的兒子，曾、鄧兩人為人敬重，然而就算有著顯赫功績，在毛澤東身邊的幹部中也從不顯目。

曾慶紅有著堪稱經典的出身，一九三九年生，在艱困的農村度過幼年時期，而後進入他母親創辦的幼兒園，接著在北京最好的一〇一中學就讀，之後再進入北京工學院。他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就進入官場，比同輩人都早，而這也讓他免於受到上山下鄉運動的波及，沒有被下放農村。在文化大革命後，由於父親的關係，他得以進入政界發展：就像習近平和許多受照顧、安排的太子黨一樣，一九七九年曾慶紅成為當時主管經濟事務的余秋里的隨行秘書。他的發展就此起步，隨後擔任過許多不同職務，這些歷練給了他相當寶貴的經驗。一九八四年，他在一個轉折下來到上海，遇上江澤民。他於一九八七年成為江澤民最信任的謀士，並跟隨他到北京任職，先是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隨後在一九九三年升任主任。[11]曾慶紅老練、機變、忠誠，太子黨出身的他成為當時中共體制和江澤民政權的重要依恃之一。此外，他也維持著權貴集團內部和諧，並且照顧好和當權者之間方方面面的關係。

朱鎔基和曾慶紅兩人做事果斷，而這成效亮眼、相輔相成的人事安排，是非常聰明的選擇。當經濟上許多創新做法和現行體制發生衝撞時，江澤民手上有人可以處理，而當這些做法在政治上引發問題時，他就召喚辦公廳裡的「超級太子黨」出面應對。

有這兩位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人物輔佐，再加上從上海帶來的保皇黨，江澤民的地位愈形穩固，但也讓一批老幹部不安，紛紛起而設法維護他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例如薄一波，在一九九二年就要求每個高幹家庭都能安排一位子女擔任要職，並且爭取到讓兒子薄熙來擔任東北

重要港口城市大連市市長的職位。[12]至於陳雲，在讓他的長子陳元坐上人民銀行副行長的位子後，也提供了兩個女兒幫助。分別是在組織部門工作的陳偉蘭（當時她已經在組織部門工作了十六年），和在私有企業工作的陳偉力[13]（她最小的兒子也受到父親的提攜，但名聲後來不太好）。太子黨在他們的第一個職位都沒有待太久，隨後四散到不同的領域發展，有的在機關單位，有的在其他地方，只要哪邊可以獲取金錢或權力，那裡就有太子黨。依據一位在香港的歷史研究者表示，約一千七百位領導人的子女，十年中在黨政及軍方部門中任職的就超過三千一百多個。[14]

官方政策備便，未來就在眼前。對身為監國大老的老幹部來說，只剩下把他們關心的事安排妥當就好。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年間，王震和鄧小平達成一個在西方人眼中看來令人瞠目結舌的協議：讓榮毅仁接王震死後留下的國家副主席職位，榮毅仁在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經理位子，則由王震的兒子王軍接任。《習近平》（*Xi Jinping: Red China, the Next Generation*）一書的作者艾格妮絲（Agnès Andrésy）還透露，後來王軍和榮毅仁的兒子榮智健分別掌管不同領域的業務，前者負責處理純商業協議，後者負責政治協議，鄧小平那邊則由他女婿取得王軍在軍方外圍保利集團的職位。[15]

當鄧小平的重要性不再，江澤民開始反抗他施加的箝制。「小舵手」鄧小平只想維護子女們；他家族的財產在一九八四年時「僅僅」約千萬元人民幣，但從那以後數目大幅增加。一九九五年時，江澤民授意曾慶紅壓制鄧家。當年一月，鄧榕接受美國紐約時報專訪時曾明確表達，鄧小平重新反省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但隨即被警告。[16]當市井小民對有權有勢者大玩金錢遊戲日益不滿時，江澤民於一九九五年春以

反貪為名逮捕北京市負責人，而該負責人與鄧家關係匪淺，並因此牽扯出一宗大醜聞。接著他更逼使北京市無人不知的「首鋼集團」董事長周冠五去職。周冠五早年與鄧小平共事，交情甚篤，一九八○年受鄧任命為首鋼公司負責人，其子周北方為首鋼總公司助理總經理，後和鄧小平之子鄧質方合組「首長四方公司」。[17]隨後，「反腐鬥爭」於焉展開，打擊了鄧小平的兩位女婿（鄧林之夫吳建常和鄧榕之夫賀平）及一些相關者。此舉等於對外宣告江澤民已處置了最嚴重的聚斂行為，傳出他不會再對其他重要老幹部們窮追猛打的訊息。[18]

一九九七年初，薄一波、鄧小平和彭真相繼傳出死訊。在九月舉行的全國代表大會中，江澤民的權力更獲鞏固，隨後他以朱鎔基取代李鵬擔任國務院總理，逐一清理許多領導幹部，尤其是未表態服從的軍方人員。[19]曾慶紅認為在太子黨操作上將更為順利：他提出一份正式的中央委員候選規畫名單，將他的人馬囊括入列，但這個舉動卻惹惱了全體會議代表，結果最後只有鄧樸方和習近平被選入，而且還是候補委員。在落選名單中，較熟悉的名字有鄧楠、陳元、賀鵬飛、劉源，以及薄熙來。[20]從這次事件以後，他們開始明白要對江澤民俯首帖耳。

隨後的幾年間，江澤民、曾慶紅、朱鎔基，終於可以在一九七九年後建立的各個領域中放開手腳。他們繼續清除軍隊影響、削弱李鵬勢力、強力回應法輪功對內部安全造成的威脅，以及在對外政策上以愈來愈強硬的態度對待台灣和美國。但在首要任務——經濟和市場發展上，他們則採取彈性、靈活的態度，以便能在一九九九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這場參與世貿組織的談判也將為太子黨開啟一個政經操作的新世界。

打開新局

雖然在生產力改革上仍遭到不少困難，甚至還在一九九七年碰上嚴峻的亞洲金融風暴，中國在幾年間的經濟成長仍然相當驚人：年成長率幾乎高達十％。但這也讓中共領導人意識到兩個問題。第一，要如何看待這麼快速的經濟成長以及私有經濟成分。針對這問題，他們採取順其自然的辦法：在政治控制下支持經濟發展。由於太子黨直接插手經營許多企業，使得這種策略在執行上成效斐然。然而在實際操作執行後，當新興經濟產生了鉅額利益、資本家力量開始壯大時，接著浮現了第二個問題，且演變為難題：如何監控這些新興資本家？還有，該如何避免讓那些掌握監控大權者藉機中飽私囊？如何避免太子黨過度追逐權力？

當中共當局將經濟體制監管和操作權力交付給太子黨後，馬上出現了權錢交換的聚斂行為，且情況比預期的更嚴重。各個階層都有許多幹部家族，他們很快就習於劃分各自的領域。[21]和電力系統有關的生意往來都是李鵬的勢力範圍，比如三峽大壩就成為了他最重要的資源和財源；年輕的薄熙來在大連落腳後，很快掌握了這段經濟轉型期間的空隙並加以利用，還收編之前由李維漢之子李鐵映帶頭形成的「東北幫」為己用，為自己打造了一個相當可觀的金庫，成為日後助他問鼎高位時的重要財源。像這樣的金權誘惑，其他大城市的一把手也極難抗拒，例如上海市的陳良宇即是一例。[22]

江澤民和曾慶紅對這些事情都裝作視而不見，改革後的新經濟情勢使得各個行業和對外貿易蓬勃發展，而他們身邊的人也跟著沾光獲利，其中弊端醜事當然在所難免。其中有件事就曾經在香港喧騰一時：王震的長子王兵在當時有如美國芝加哥般龍蛇雜處的深圳，因為另一位太子

黨成員欠他一筆債務而將其綁架。*[01]這件事連江澤民都不得不低調處理，只能以「長輩規勸」[23]的方式勸誡了事。二○○○年發生的另一件要案，則比前面這件還難堪，不但涉及中共在福建廈門的黨組織，還關係到與黑幫間的商務往來和對外貿易，某位前外交部部長的兒子和一位軍方高級領導人的女兒也參與其中。*[02]當時年僅四十多歲的習近平正擔任省級領導，[24]沒人預期他未來將成為國家領導人；他後來曾提及，這個案件對他造成了極大的震撼並引以為戒，對類似事件敬而遠之。

由於大多數黨和國家負責監管類似作為的幹部都抵擋不任誘惑，對一些掩蓋不了的和明顯有中央領導人涉及明顯的案件，自然迴避掉了有效和公開的懲處，再加上當時還存在放任不管對經濟也有促進作用的氛圍，北京當局也就很快的不再積極尋求解決這些弊端的方法。相反的，他們似乎對這種情況早有腹案，採取兩種做法。一方面，對於遍地開花的「正常」資本家，當局以現代國家擁有的一切手段（檢查施壓、財務投資、賦稅減免、提供諮詢、協助出口）監管。甚至在二○○三年，他們還開放讓某些資本家加入中國共產黨！[25]另一方面，依靠耳目送回的情資，各級執政當局得以在強化他們監管力量的同時，更鼓勵太子黨插手商業經營，同樣的，當局也設法控制他們。

上述這些背景與原因，說明了一九九○年代權貴家族為什麼如此瘋狂投入經商行列。

著魔的權貴集團

讓我們先從那些沒什麼改變，或改變不多的事談起。在各種亂象紛呈的景況下，維持不變的是那些關係在長時間下盤根錯節的權貴家族們。當太子黨在公眾舞台上穿梭、展現自己時，他們的父母仍運用一切影響力和特權讓法規容忍他們的一切行為。

年少即相識的這些老幹部依然隨著歲月持續蒼老，有的人則已入土為安，活著的則還努力現身歡宴群聚或是樣板行程。[26]那些早年曾叱吒一時的領導人兒女們的時間，也一樣無情地流逝。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周恩來的姪女周秉德就像平常的老太太，都迎來了六十歲。[27]那些名噪一時的中學和哈軍工畢業的校友們會定期舉辦聚會，而一些手握權柄的太子黨成員，則一定會做一些具有象徵意義的動作。比如曾慶紅，他每年都會赴以往的革命根據地延安一趟，胡耀邦的門生故舊也會在每年忌日時到他的墳前聚集悼念。[28]

在權貴集團的核心成員之中，熱門的話題始終圍繞著不同職位享有的不同待遇打轉。住房的問題即是一例：副部級的幹部規定住房不得超過六到八個房間！[29]此外，以往的舊怨也在暗暗滋長。一九九七年鄧小平開追悼會時，鄧樸方明確地表明不歡迎鄧力群參加，因為他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帶領一群保守分子發起反右鬥爭被批評，事後卻表示發起政治運動的是鄧小平。[30]一些理想主義者也努力發聲。戴晴繼續在環境政策議題上扮演捍衛戰士：在她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書中曾揭露，河南省南部大小水壩的潰壩造成了約二十三萬人的死亡。*[03]曾在一九五○年代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之女羅點點，則發起一個推廣生前預立遺囑、選擇臨終不插管積極治療的「尊嚴死」[31]網站。

大部分的權貴子弟仍熱中於在經濟大潮中賺錢，且獲利最快的產業最吸引他們關注：諸如房地產、金融、採礦、能源及高新科技——最後這項是喬石兒子蔣小明的領域。蔣小明為「京城四少」成員之一，所謂的「京城四少」，其實不過是幾個不太理會道德戒律的年輕人而已。[32]這些站在經濟發展前沿的產業常常引起政治上的爭議，這也是為什麼它們大多都先在香港發展（香港常常是較沒有經驗的太子黨，甚至更年輕的高幹兒孫輩的培養、訓練場域），或者是先在經濟特區和沿海地區成長。[33]

沒有人放過可賺錢的機會，人人皆可插手。在一九九八年間，就有高達一萬五千個企業在解放軍庇護下運作，幾乎每個任職指揮職務的人，都兼管著幾家私營企業。實際上，一些最高級別領導人子弟的事業就是依恃著軍方撐腰：鄧小平的女婿們，以及葉劍英、賀龍、劉伯承、粟裕和其他人的子女，他們「商業殖民」的對象不是無的放矢，而是專門找諸如核工和飛彈（或稱「第二砲兵」）等的尖端領域。[34]中共中央深知讓這種趨勢繼續發展的危險性，於是在一九九八年要求軍隊不得再經商，然而卻遭到相當大的阻力。[35]而這場隱藏在內部的衝突結果如何？外界不得而知。

當時經商的利益十分可觀，鄧小平、王震和榮毅仁家族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就從其中獲得上千萬元的利益，[36]這也是為什麼這些幹部子弟都要競相投入攫取由經濟發展提供的好處。擁有權勢的家族設法讓年輕一輩當上某些企業的負責人，像是鄧小平家的鄧榕、葉劍英家的葉選寧等；一旦當五十多歲的爸爸擔任重要職務，他子女之中的某一位就會繼踵其父，而通常接任者會是那位沒進大學且表現也不太突出的，家人安排讓他進入經營利潤豐厚的產業，或是為他安排一個較清閒的差事。[37]

江澤民也不例外，他認為子女投入經商是很正常的事。[38]另外也有一些安排是因為愛屋及烏，像是周小川受提拔就任人民銀行行長一職，據說是因為其父認識江澤民之故。[39]還有一些例子顯示，有些家族甚至建立了與圈子外，甚至與國外的合作關係。據了解，葉劍英家族的後代就和某位電子工業部部長，在一九九五年時合作成立一家公司，目的是為了協助日本高新科技企業打進中國軍火市場。事實上，許多中國邦交國或是海外華僑（主要是來自香港和日本）[40]成立的企業，常常是藉由熟識朋友的關係投入這個經濟發展大潮。

政治領域中的太子黨

在那個紛紛擾擾的年代，不只有太子黨在其中運籌帷幄、穿梭打點，還有一批新興的政治菁英也應運而生。

這其中包括江澤民身邊那批表現較普通的幫手，諸如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等，由於他們的表現平平，有不少受人批評的空間，也有人虎視眈眈的想取而代之。這時政治作為一份職業也產生了些許改變，畢竟黨這棵大樹衰頹時，也需要修修剪剪才能維持榮光。一些來自較遠的省份且出身較卑微的優秀幹部，也被拔擢到高層任職，比如李瑞環，他來自天津郊區農村，曾當選「勞動模範」，後來進入政界發展。[41]他過去曾長期在共青團體系，而共青團分布甚廣，也深入社會各層面，雖然同樣受到共產主義價值弱化和資本主義影響而衰敗，但仍然培育、養成了不少優秀的菁英。

胡錦濤是鄧小平和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初期共同發掘的年輕幹部，對共青團和共產黨的結合有重要的影響。一九九二年他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甚至在同年被鄧小平指定在江澤民之後隔代接班。在這期間，雖然江澤民讓胡錦濤扮演可有可無的角色，但他仍然設法塑造自己守本分、傳統的形象，和經商活動保持距離，甚至在政治上營造出一些人道主義的味道——他在二○○五年毫不猶豫地赴胡耀邦的陵墓悼念。此外，他還很技巧的提拔了幾位出身共青團和中央黨校的優秀幹部；當時中央黨校為省級領導職務培育的高素質人才數量正逐年增加。在這些他提攜的幹部之中，以李克強和汪洋為代表。李克強在一九九八年受推薦進入河南省領導班子，盡力收拾當時感染愛滋病毒血液流竄全省的災難。至於汪洋，我們之後會再回過頭來談

他。

就像上述的這兩位一樣，這些出身共青團的幹部通常都是專業官僚，頂著漂亮的學歷和專家的頭銜在省級政府裡工作。[42]

太子黨雖汲汲於經商，但是仍未能忘情政治。其中有像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一樣的自由人道主義者，長期大聲疾呼不要遺忘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前前後後細節。也有像陳元一樣聰明優秀的人，因為和北京清華大學都有淵源，形成了一股號稱為「清華幫」的勢力。[43]另外，更有部分人像劉源這樣放棄政治改向軍事發展，同時一些軍中同僚則轉向沿海經濟發展省份發展，比方說遼寧的薄熙來、青島的俞正聲，以及福建的習近平。

江澤民和曾慶紅在這些當時還沒有像他們那批一九八○年代就嶄露頭角的太子黨之間，靈活巧妙的操縱並以其為所用。由於曾擔任上海市領導，江澤民盡可能滿足、支持上海市的同僚們和曾擔任過他部屬的太子黨成員，主要是因為這些人都支持他的政策路線：堅持黨的專制；主導沒有任何規範並排除任何政治意涵和影響，實質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經濟開放（當時正值要爭取進入世貿組織），以及積極推動中國企業進軍世界。但是這套政策路線在實施時還得小心翼翼，既不能太過於依賴太子黨，也不可摻雜進他們彼此的家族恩怨情仇。後來他漸漸排除了一些太子黨的參與，即便這些人原本和他的關係還不錯。這種疏遠可以從一些職務的政治任命，以及交由曾慶紅執行的糾偏工作中察覺。

總之，一九九○年是太子黨豐收的年代，雖然沒有任何統計資料可以具體表達，到接近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他們究竟掌控中國經濟到什麼程度，但一切情況顯示這種控制的力量已經十分巨大，他們握有中國幾乎達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生產總額。不過，這些太子黨的力量還要做

一些區分：在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時，[44]政治局委員中只有三位太子黨，卻同時有六位上海幫及三位胡錦濤的黨羽。*[04]

江澤民表面上依例卸任黨總書記後，即便十六大上就任的領導班子是由他主導選出，仍不敢掉以輕心，因為這個領導班子有兩點不利於太子黨。第一個問題是，就算這些領導機關仍然持續依照他制定的政策路線執行，但全國代表大會仍然沒有忘記鄧小平要胡錦濤接班的囑咐，選擇了胡錦濤作黨的總書記。胡錦濤自己有一批擔任省級領導人的親信部隊，均是共青團出身的秀異之士，像是李克強和胡春華等，面對經濟、試行、實務方面的問題都能談笑用兵。[45]另一個要擔心的是擔任國務院領導的溫家寶，他曾經在趙紫陽轄下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性格開放寬厚，但卻深為他太太和家裡其他人什麼生意都做的名聲所累，只能說斯時而有斯人。[46]

胡錦濤、江澤民及太子黨（二○○二—二○一二）

由於自北京傳出的資訊或是模糊或是矛盾，而且往往不太可靠，使得史家幾乎難以詮釋這之後的十年。尤其是對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下的政治情況，不論是其代表意義或運行時內部的情況都難以分析清楚。另外還有江澤民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太子黨內部的衝突，這些我們都不得而知。

按時程來看這段發展會顯得有些複雜。胡錦濤的第一個任期是二○○二到二○○七年，要等到江澤民真正交卸了所有的職位和權力，且北京奧會的準備工作完成後才正式開始。而在第二個任期中，特別醒目的是太子黨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以及溫家寶不斷提出帶有人道主義的主張，好像他明白自己已經不再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雖然阻礙重重，胡錦濤仍然以將自己人安插到周邊省份任職，還有藉查辦眾多貪腐案件以削弱江系人馬等手段鞏固權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就在二○○六年九月遭到整肅清洗。[47]胡錦濤同樣也想繼踵胡耀邦改革派政策的遺緒，像他在二○○九年時就盡量放鬆對異議分子的鎮壓，[48]但民主制度仍然不會被納入考慮，胡錦濤所想只在於改善社會秩序和重拾部分儒家教條，用以維護他推動的公共安全體制。他採取許多措施，讓人認為他有心要抑制官僚特權，像是要求擔任公職要公示財產之類的，然而結果卻差強人意。同樣的，他也曾表示要對付幹部貪腐問題，只是並沒有人會當真。[49]但他政策如此，在許多事情上採取的態度卻又不是那麼回事，比方說，那段時間在沿海地區有許多大企業爆發許多勞資糾紛，他只是袖手旁觀。他的這些舉動，在總理溫家寶不時刻意表現出的個人溫情作風下顯得不堪，尤其是從二○一○年以後，溫家寶

更是多次針對改革政策發表支持言論，更加凸顯了這個情況。[50]不過，溫家寶自己的家人在各項改革領域中的種種爭議性動作，也是不遑多讓。

太子黨在這段期間對政治事務較為低調，因為他們都投入了商業活動。基於群眾對他們行事風格的嫉恨，對他們彼此爭鬥的不耐，再加上太子黨缺少一個能帶頭的領袖，低調的姿態倒也較符合群眾觀感。他們之所以如此，可能也是基於有秩序的體制、旺盛的經濟和能取得利益等等，但總之都能讓他們安於現狀。太子黨當中還有些人玩笑似的直呼最高領導人是他們的「打工仔」，彷彿他們才是主子。[51]

在二○○七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政治上出現了一些騷動。由於江澤民對優先導入年輕力量以平衡決策機制的政策不滿，這些年輕成員僅占不到總數的四分之一，[52]而江派人馬還掌握政治局常委會的多數席位，何不善加利用這項優勢呢？於是江澤民和習近平安排了一場關鍵性的會面，習近平的妻子還陪同會面，她和江澤民不但是舊識，而且彼此還有些情分。習近平在這場會面後，就成為「擁有最多人脈」的人。[53]於是曾慶紅暗度陳倉地安排，於二○一二年中共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的接班名單上，將習近平的順位調整到李克強之前，他明白，這將是他作為江最高幕僚所完成的最後一件工作：讓上海幫和在習近平身後集結的太子黨部隊結成聯盟。[54]

接下來的幾年，胡溫團隊並不能改變局面。二○○八年五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帶出的豆腐渣工程醜聞和隨後對異議分子的嚴厲鎮壓，*[05]這些事都降低了群眾對他們的信任度。相較之下，江澤民反而愈來愈活躍。他設法打造習近平這位未來的國家領導人，甚至安排他會見新加坡具歷史傳奇性的領袖李光耀，開啟他們此後經常會面的開端。[55]隨後幾

個月，追逐大位的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的位階並未改變，但他們兩人間也並未如外界想像的那般對立。李克強是一名知識分子，曾經過一九八○年代初期紛亂環境的歷練，健康情況不好（一直受心率過快困擾），他是典型由共青團培養出來的幹部，也是胡錦濤屬意的人選。他娶了一位高幹的女兒為妻，而他在工作上的才幹彌補了背景的不足（他父親曾任地方縣的縣長，兄、姊都曾在地方任職），而且他也是個完全可被對手陣營接受的人選。[56]

相較於李克強，習近平則是標準的權貴集團子弟。不過由於他是當地方官員一路歷練上來，所以並未樹立太多敵人；第一個職位是在內陸，接著就被調到沿海地區任職。這兩方人馬在一些政策面上彼此相容。李克強因經歷、經濟長才和妻子背景等，和太子黨相處融洽。習近平雖然有相當好的家庭背景，發展卻是一路曲折；他的妻子彭麗媛的父親是一位將領，她本身也是軍職，更是一位廣為人知的歌手，名氣比習近平還大。黨內許多元老都十分看重習近平，像是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57]不過，即便他也能被軍方接受，但在太子黨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贊同他。

習近平的勝利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權力遲早會回到太子黨的手裡，只是看究竟是誰脫穎而出？在元老幹部中，薄一波曾經擔任過比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更高的職位，在他的七個兒女之中，薄熙來近幾年的表現似乎在同輩當中最被看好——這對中國來說是件新鮮事。薄熙來天資聰明，但卻到二○○二年才成為中共中央委員，後來雖然進入政治局，卻沒能成為政治局常委，職務上也只擔任直轄市重慶市的領導人，[58]沒能成為一省的主政者。他認為這些發展過程的不順遂原因在於別人的妒忌，心中因而為此憤憤不平。他深知習近平在他追逐大位的路上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但他為了取得認同的方法不是依照既成的途徑逐步攀爬，而是採取宣傳他還頗受歡迎的唱紅打黑政治路線為之。[59]他所用的幾個新手段甚至有些像毛澤東訴諸民粹的味道，即便他的同儕也對此深感困擾；他在重慶的大動作，連習近平、劉源等人都不得不基於禮節而略表姿態，而廣東省的年輕改革派領導人汪洋則和薄熙來在一些社會問題上隔空交火針鋒相對。[60]江澤民和胡錦濤並未聽任事情自行發展：他們著手調查薄熙來，發現不少貪污和犯罪事證，便將他下獄問刑。新一屆的政治局成員在江澤民和胡耀邦兩人的主導下選出，讓新任黨領導人習近平和其盟友李克強，能夠在大多數太子黨及盟友的支持下自在施政。有關情形我們將會在之後的章節再回頭討論。[61]

一個有著新面貌的非典型「共產主義」於焉出現。它源自毛澤東個人野心的催生，甚至還可以說是在他散布的恐懼中成形。接著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它展現了自己的獨特性：和某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妥協，並由歷來領導人的子女們負責實施這種政策路線。此後，他們之中的代表人

物要更進一步做的事為：主導管理這種和資本主義共舞的局面，以及整個中國共產——但卻從不對這情形進行全面而深刻的思考，至於公開省思，就更不用提了！

第八章
習近平和習派人馬

要清楚說明習近平如何取得大位不是那麼容易。更仔細些來講，要了解他登上權力頂峰的原因，就是要了解一個從憑藉資本世界挹注而財富流溢的權貴集團中脫穎而出的太子黨家族，如何攀升到擁有強大權勢的共產主義政黨的權力頂峰，進而承繼一個世代共知的專制政權，以及一個再怎麼也要維持所有表象，或至少要維持住政治活力的政黨……。

習近平為什麼能上位？

有些人會對這個問題抱持懷疑態度，畢竟眾所周知共產政權的一個特性就是他們能在決策、群眾期待和本身所持的原則中間，維持一定的空間。就算他們提出的說法不太有說服力，這個政權也仍然在習近平最初掌權時，就認真的對二○一二年舉行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安排做出解釋，讓大多數媒體都傾向接受這種說法：選擇習近平作為接班人，並且讓他在常委會中擁有多數的支持力量，是在江澤民和曾慶紅支持下，對薄熙來事件及他和汪洋的爭議作為製造的危機，所做的積極安排。

江澤民和江系人馬之所以做出如此決定的原因，才是我們應該要問的問題。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地方」因素的影響。第一個是江澤民和他的主要黨羽都是上海無條件的支持者，他在一九八九年夏赴北京就任前，一直都是上海市的負責人，而江系人馬中的主要成員也都曾在上海起家致富，在那裡還維持著相當龐大的利益關係。習近平也曾在周邊省份經歷許多職務後，於二○○七年到上海工作，稍早於他進入中央高層被指定為接班人之前。我們不能隨意猜測江澤民是否還滿意習近平在上海的施政，還是他們二人達成了某種協議，而在協議中，習近平答應了一些事情，以及讓上海市擔任某些角色。以上海市為優先當然不會是李克強的想法，也不會是多數共青團團派成員的想法，因為李克強畢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內陸省份發展，而這些省份數年來只能眼巴巴看著沿海省份占盡便宜而怨懟不已。

第二個原因我們可以稱之為中國式的數人頭政治影響。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生涯以七十歲為分界，升遷通常十分緩慢，這讓六十多歲這個年

齡層的領導幹部之間有著十分激烈的競爭。二○○○年代較重要的中央委員，都是江澤民和曾慶紅在一九九○年代提拔起來的。但在二○○○年代被提名準備要接班的這批年輕菁英，大多是共青團出身的團派。胡錦濤儼然是團派幹部的共主，在擔任兩任最高領導人後，中共的政治、經濟或是財政的操控權力，顯然都偏向共青團勢力，而中國領導人也像其他國家領導人一樣，總會想要在各派系間維持最起碼的輪換流動，讓每個派系在政治權力上都有利益分享的機會。在實施兩黨制的體系中，隨時都要準備接掌權力……而習近平和從共青團最優異分子中脫穎而出的胡春華，兩人獲得提名和選舉的過程，也有著類似的意義，他們都設法表達出對未來的目標和看法。

還有另一個可能的因素，則是李克強的健康狀況不好，家庭背景又不像習近平那般顯赫。再加上習近平身材高大（一百八十公分），有領袖的架式，妻子又是著名、受歡迎的歌手，有著高階軍職，自然平息了一些質疑者的聲音。[01]最後，也許是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們也都認為，是時候讓有能力和經驗的太子黨在經濟事務上能有表現的機會，也可以藉此機會讓他們不要再批評現行的做法。二十多年來，眾人都同意——尤其是中央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大家要思考的共同重大議題是：將中國的強大和世界連結起來的紐帶，就在推動具有成效的經濟政策當中。

就在二○一二年，當各派系彼此傾軋時，一個最「重要」的籌碼於政治舞台上現身。一九七九年起，有件事（但在當年起頭時卻是萬般艱難）最見成效：經濟的快速發展；有鑑於中國的龐大，使得這種經濟表現在國際間動見觀瞻。當各方都肯定中共各級領導人在經濟上表現出的經營長才時，許多高幹陸續逃往國外的案件，卻又使領導幹部對黨和國家的忠誠度飽受質疑。更何況，外逃情形還有擴大的趨勢，許多大企業

的領導幹部甚至都已經申請好他國的長期居留許可，為潛往國外偷偷作準備。因此，對經濟領域內各相關負責人的任命，除了要求要具備能力和能綜觀全局外，對體制的忠誠成為必要考量，太子黨成員於是成為最好的人選。

另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社會問題也跟著浮上檯面：罷工、示威、各式各樣的陳情要求、反對破壞生態的抗議行動……等等，在謹慎評估各種方案後，他們以迅速解決問題、減低政治效應成為主要訴求。胡錦濤在這方面事情的處理上表現一直相當好，但當經濟成長所需的代價愈來愈高而導致成長趨緩時，情況變得複雜。現在要面對的問題是，一方面要維持足夠的經濟成長，一方面又要降低因為經濟成長帶來的種種問題。

新任領導人必須思考各種政治、經濟、社會面，以及今後面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而從中做出抉擇。在這種情況下，比起共青團培育出的省級專職幹部，太子黨同樣較受青睞。即便如此，李克強在提名上的出線仍然勢不可當，除了他省級職務上的歷練外，對經濟趨勢分析的專長，也讓他在考量經濟事務管理時無人能出其右。

當團派人馬受提名，支持太子黨的音量也相應提高。這些支持的論點主要集中在太子黨們能適應當前世界，又能保持對黨和國家的忠誠。這些太子黨能接觸國際社會是因為當中國開始對外稍稍開放時，他們就迫不及待的衝出國門，這也是因為他們擁有特權，方便取得多次國外居留身分。他們經手過各種金融操作、熟悉各國貨幣，更因為出身和經歷，使人們完全合理相信他們對黨和國家的忠誠。

傳奇家庭

總歸來看，最高領導權還是得落在其中一位太子黨成員的身上，因為只有他們才有輝煌的背景和有力的家族支撐。

從這點來看，習近平的雀屏中選，並非因他是候選人當中最優秀的。他獲勝的原因，首先是因為得以揀選能夠參與的競爭者的範圍不大。由於毛澤東時代的領導人名聲都各有瑕疵，帶有這些領導人色彩的候選人很難被接受，而參與一九四九年建政和一九七九年改革體制建立的領導人，大部分也備受質疑。想到毛東澤，就想到大躍進的災難和文革的狂熱；想到劉少奇，就想到他在意識形態上不敢明確區分毛澤東和莫斯科的不同，更遑論他在反對毛澤東意見上的懦弱；鄧小平（所犯錯誤當然最少），一九八九年的屠殺和他家人沾染金錢遊戲的影響也留下陰影。曾任國家領導人之列的人物中，要找到歷史背景「乾淨」的，還真不太多。陳雲在合法反抗毛澤東前後，為了生存也做了一些取巧的動作，而且人緣不太好；朱德當然算是一個背景堪稱乾淨的人，但他的形象只限於是一個傳奇性的軍事指揮官；周恩來沒能留下任何子嗣……剩下的只有曾留下一些功績，但都不是第一線的主要領導人。至於彭德懷則無後，李先念早就遠離了政治。

英雄留名

事實上，除了最早被整肅的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同僚能或是敢於指正毛澤東造成的寃錯案，這種做法讓他們免於被套上反黨反毛主席的口實。對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而言，後來往回看，會發現他也許是幸運的。習仲勛在歷史上雖然不是主要領導人，但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他曾經在荒涼的西北地區紅色根據地工作，這個地方在一九三○年代沒有江西根據地影響力那麼大，但卻同樣獨立而重要。當時習仲勛的兩個上司（劉志丹和高崗）較早離世，他的生涯發展約和毛澤東同時並進，卻沒有依恃對方。他在一九二九年開始投入陝甘寧邊區的游擊作戰，在一九四八年主導的一項農村土改工作中，習仲勛的效率和相對溫和的作風經常透露出是一個傾向實用主義的領導者。一九四九年，他成為彭德懷在西北地區的副手，在建政後的前幾年，他盡可能以最少的軍事手段實施接管和鎮反工作，讓帝制時期曾作為首都的西安城免於炮火劫難。一言以蔽之，在以殘暴屠殺為手段換取勝利的當時，習仲勛是一個注重效率而不那麼殘酷的領導人。[02]

由於賞識習仲勛是作風實際的幹部，又有參與游擊作戰的經驗，周恩來於是將他調到北京，先是任國務院秘書長，後來在一九五九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成為政府部門第二號人物。[03]但是，他在立場上相對溫和及對周恩來所表現出的唯命是從，造成了他的失勢：當主席以鄧小平為首的支持者再次按捺質疑大躍進引發的災難時，習仲勛卻掀開各地慘況，並在其他人同意下進行糧食調運。[04]再加上他在彭德懷被批鬥一事上還力圖緩頰，此後，習仲勛的命運便大致底定。

在卑劣小人康生的操控下，他成為毛澤東肆行報復的第一批受害者

之一：一九六二年，在刻意淘挖歷史事件作為政治入罪的坑害下，*[01]習仲勛遭解除職務並下放。[05]由於周恩來和許多同僚的私下保護，他在文化大革命發展最惡劣的時候得以倖存，更在一九七八年春天時結束下放生活回到北京。由於他回來的時間較晚，且並非靠新強人鄧小平的幫助，因此對初掌權的鄧小平仍持續不假辭色的加以批評。當習仲勛很快的被任命為廣東省省委書記時，他馬上明白自己要扮演的戰略性角色，這個職位讓他能夠為對外開放試水溫，也讓他完成了一項歷史性的成就。[06]在鄧小平和陳雲將他排除於權力核心之前，他始終致力於推動經濟甚至政治上合理的改革工作。

這段符合毛主義式的生平介紹，也適合被塑造成傳奇性的描述，但卻省略了一些事實。實際上，習仲勛出身的紅色根據地和毛澤東不同，他的經歷中既沒有參與任何屠殺，也沒有投機吹噓。他長期在毛澤東手下工作，在他犯錯時沒有為虎作倀，之後很快的投入改革開放工作，卻沒有大肆宣揚。在所有人之中，還有誰比習仲勛更適合作為土改工作中最好一面的代表、革命陣營中堅毅和品德的模範，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之後靈活開放改革主張的象徵？

模範家庭

有關習家的過往，由於其中揉雜了許多不論是在傳統或是現代都能引發人們共鳴的想像畫面，因此儘管大家不太熟悉，也還是成為競相傳說的故事題材。在這些流傳的內容中，大家知道的習仲勛是一個小地主家庭出身，娶了一位來自思想先進菁英家庭的女子，*[02]這位他所娶的女子後來成為婦女聯合會幹部，兩人生了四個孩子；據正式說法，其中一個女兒在出生後由習仲勛照顧頗多。[07]隨後大家所知，他個性溫和的妻子似乎投入總是非常忙錄的工作（這在當時較為特殊）。不同根據的說法都指出，她將一週五天照顧孩子的責任交由習仲勛負責（這也是個特殊的例子），只在週末時才能回家，週日晚上要離開時，經常都會惹得孩子們大哭不已。[08]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們的四個孩子都在很好的小學和中學讀書，文革時則和大家一樣，到農村接受教育。然而由於習仲勛受到以往的長官周恩來的照顧，他的四個孩子得以在一九七二年時，得到獲准探問他們媽媽的機會，並安排團聚。[09]

一九七八年習仲勛回到北京後，全家終於可以在他身邊重聚。官方的資料顯示，習仲勛的女兒齊橋橋為人聰慧熱情，在一九七八年時已然六十五歲的父親身邊，角色吃重。她陪著父親到廣東工作，在他被剝奪權力時支持他，持守著當時的傳統和要求，也為此放棄了自己原本不錯的工作安排；直到二○○二年父親過世後，她才到清華大學就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也由於擁有相當不錯的人脈關係，這對夫妻能涉足不同領域（房地產、稀土金屬、高科技）大作生意：他們的家庭財產總值在二○一二年時已達到三億九千三百萬美金。[10]

總之，身為大家長的習仲勛，是一個對他二任妻子所生的孩子們都

很好的父親，其中兩個孩子後來還擔任省級重要幹部。[11]這個家裡的氣氛並非一直很和諧，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所出的孩子們也會彼此嫉妒，但整體而言，習家的成功範例和表現出來的凝聚力，對當時的中國來說，來得正是時候。

而今，習近平感覺上維持了來自家庭的人脈關係，這些關係也會直接對他的作為指手畫腳。[12]他的大姊和母親會出面協助處理這方面的事情；其母齊心在習近平尚未登上權力大位前幾年，曾召集她的孩子，要求他們在各自的事業經營上要謹慎注意，但不確定的是，她其中一個女婿是不是真的就不再投資在維京群島設立的離岸公司。[13]符合世人看待高幹家庭的一般印象，習家在二○一三年為習仲勛辦了一場百歲冥誕，[14]而且由於齊心對傳統價值的尊重，她對習仲勛的朋友們也始終不離不棄。一九八九年失勢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逝世時，她就送上了一個相當顯眼的悼念花圈，且眾所周知，她也曾在家裡接待過幾位在毛澤東時期或後來遭到整肅幹部的遺孀。[15]在一個充滿凝聚力、受人矚目的家庭中，有著一位剛毅且忠實的母親：這才是這個傳奇性故事應有的描述，或許某些程度上也較貼近真實。

勤懇、耐心且幸運的接班人

如果是在歐洲國家，習仲勛的長女齊橋橋應該會從政，因為她極為聰明，對人情世故的掌握又有天分。但在中國，這個念頭連想都不用想，尤其是大家對「江青」的例子還記憶猶新。這對夫妻兩個男孩中較長的近平（指「北京出生」的孩子。習近平出生於一九五三年，當年他父親剛調入北京），因此承擔了代表家庭逐鹿權力的責任。

習近平身形高大健壯，外在親切和藹，但過於克制壓抑，甚至給人一種距離感：他有胡耀邦的熱情、江澤民的體形，卻又有李先念的冷漠。[16]有別於胡錦濤那種政治高官的形象，他更像是一個現代世界的國家領袖，熟稔且能掌握政治語言的運用。他能在同僚間堅定支持自己的想法，在大會時從容應對，但也能不留情面地責備合作對象。曾有一則知名的小傳聞，表示曾慶紅在二○○七年時將自己的一個助理施芝鴻引介給習近平，但卻因為在為習近平想法辯護上不夠主動，一段時間之後就被撤換，並由另一位完全服從習近平的人取代。[17]

無論如何，在屬於習近平的時代，他的成長過程中似乎沒有太大的困難險阻。從小，即便母親不常在家，他仍然是個受寵的孩子，畢竟太子黨的童年享有許多特殊的待遇。他的青少年時期有些磨難，在一九六九年被下放到陝西省；早年他父親曾經在當地執行過戰鬥任務，但習近平卻不太受歡迎。地方幹部認為他只是跑來分窮人口糧的富家子弟，有些人還用他父親身上的政治錯誤責難他。他也曾經逃回北京，被抓到後以「黑幫子弟」罪名被關押六個月。再回到下放的農村後，習近平改變了：他明白，在中國，只有取悅有權者才能擺脫困境。他積極配合、參與，並貢獻他的知識，利用調停村子中各宗族紛爭的機會，成為地方領

導眼中的積極分子，而那也成為他最初的政治經驗。習近平先入黨成為黨員，隨後成為支部書記，還曾經擔任過「赤腳醫生」（未受正規醫療訓練的醫療人員）；擔任這工作的，通常是村子裡知識程度較好的人。最後，在傳奇故事中描述的是，習近平利用一些農藝手段，改善他所工作農村的收入。雖然和村子裡的同僚共處，他仍然有著自己的目標：回到北京，想辦法接受高等教育。他成功的以「工農兵學員」的身分進入清華大學就讀，也就是說在村委會的支持下，他得以取得這樣的資格，並在一九七五年四月畢業，被分配到政府單位工作。[18]他從困境中脫身並學到了不少經驗，現在，他已經準備好要發展自己的未來事業了。

習近平隨後可能也配合參與了家中設法讓其父於一九七八年恢復工作的運作。無論如何，在父親的建議和幫助下，習近平得以成為曾參與推翻四人幫的要角，耿飈的秘書。當時耿飈位居國防部長及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位高權重。[19]就這樣，習近平漸熟悉權力的運作，也了解到，在中國，沒有軍方的支持配合，重要的事是一件也辦不成。

特別是在參考父親的意見後，他做了一個決定，而這決定與兩方面有關。一是當許多同志都傾向出國留學時，他放棄前往英國讀書的機會；另一方面是，和那些希望留在中央任職或是繼續在大學完成深造教育（直到二○○二年，習近平才拿到博士學位，但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怎麼辦到的）的人不同，他決定和劉源及其他一些人一樣，從基層做起，他在基層的工作表現曾讓中共中央組織部將他評為「重點培養年輕優秀幹部」。[20]

但這是否就意味著習近平的前途就此一如旭日東升？並不盡然，他始終受制於刻意培養安排及反對刻意培養安排兩方力量的拉扯、牽制，必須以耐性、勤奮、謹言慎行守時待機。

他第一個不好的經驗，發生在剛開始被分配到河北省工作時。當時的河北省負責人是位對太子黨不太友善的老資格幹部，習近平一到任，他就接到習仲勛的電話，並對此很不高興。事後習近平觀察發現，無論如何努力在建設發展上獲得好評，在省委上司的刻意對待下，他仍然被卡在縣委書記職位上無法升遷。[21]

幸運的是，在他父親的聯繫下（很可能也獲得胡耀邦和喬石的首肯），中組部負責人將他調到廈門市政府。在這裡，習近平得以有機會明辨開放帶來的機遇和威脅。但他再一次受到蔑視，因為他的前任是某一高層領導人的女兒，在任內任意揮霍公款，*[03]造成大家對太子黨出身者留下不良印象，這使得接任的習近平難以獲得眾人信服。[22]

他在幾次的政治整肅中都巧妙的避開了麻煩。先是改革派的福建省委書記項南落馬，接著是胡耀邦在政治上的失勢。不過即便避開麻煩，他也不免受到影響，在一九八八年被調到福建省偏遠的寧德地區擔任地委書記。在那裡，他展開懲治腐敗的工作。反腐雖然是個很敏感的工作，但習近平仍能全身而退，而他的工作績效在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政治大地震後才被人看到：他被任命為福州市市委書記（福州就是克勞戴爾［Paul　Claudel］曾描寫過的那個有名城市），*[04]並接著升任福建省省委副記、省長，於二○○二年調離福建。此外，他還被選入了中央委員會。[23]

這段時間的發展較少人提及，但卻是習近平經歷中的重要階段。他必須擋住反腐工作引發的反彈聲浪，以及在過程中被設下的種種圈套。另外，由於其父所倚仗的胡耀邦失勢，以至於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他不再能受到從父親那邊提供的助力，也遭鄧小平疏遠。從那時起，他所能依恃的，就只剩他大姊的支持和自己的力量。

似乎因為他的行為無可厚非，以及一九九六年得到當時福建省省委書記賈慶林的青睞，還有一群通過他能獲得政治利益的人在他的升遷過程中提供幫助；像是在上海，他就得到江派的助力，因為江澤民當時在太子黨中還沒有支持者——種種條件讓習近平面對挑戰的表現受人注目。換句話說，習近平一直都被看成改革派，在沒有正式脫離那個標籤的情況下，靠向江澤民陣營這個動作，讓他最後終於勝出。

習近平的第二任妻子很可能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他在一九八七年再婚，對象也是位高幹的女兒，本身在軍中任職，是位有少將軍階的歌唱家，出色的表現，讓江澤民這位向來欣賞具天分又知名的女性的人，也相當賞識她。習近平和第二任妻子彭麗媛兩人育有一女，她非常低調地在哈佛大學就讀。*[05]

幾年後，到了江澤民任內最後一年，二○○二年，習近平事業發展迎來轉捩點：他被任命為最具影響力、於政治上極具重要性的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省長，還有省委書記。更別提，浙江省的地理位置又在上海的「後院」。[24]他同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在新舊力量的支持下，突然獲得了能進入政治局的候任資格。在這段期間，他開始和一些中國非常活躍的企業家聯繫，像是阿里巴巴的創辦人馬雲，以及以帶有山寨他人產品爭議的娃哈哈集團創辦人宗慶後。[25]

他同時也開始進行不那麼直接的打擊腐敗工作。然而還是刻意的維持著所有的關係網絡。當然，他父親舊日的同志，像宋平和喬石等人都已離退，而以往配合他工作的支持者和他母親的朋友，例如胡耀邦的妻子，[26]也幾乎都已不在位上。他也和胡錦濤身邊的人保持著一定的關係，再怎麼說，胡錦濤也是胡耀邦昔日的門生。他仍然和江澤民及江派人馬緊密互動，因為他知道，接下來他們也將要尋求新的領袖。他成功

和各方政治派系維持良好關係，並可以向以後取得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那一方靠攏。[27]

二○○七到二○一○年間，當他權力一旦穩固，就開始向三個層面實行自己的策畫，其中最首要的是軍事。他多次向軍隊講話，並常常到部隊和官兵一起用餐，更依恃著一些在軍中占有重要職位的太子黨成員；昔日的同志劉源當然是首要人選，他常發表一些出人意表的議論，有時不會那麼刻板；另一位是劉亞洲，他是曾寫過一些戰爭故事的軍方將領；還有劉曉江，海軍政治委員，也是胡耀邦的女婿。[28]此外，他還結合了利益相關者和親朋好友，在周遭打造出眾星拱月的態勢。他以提供職位和噓寒問暖的手段換取他人的輸誠，例如他就常殷殷問候曾慶紅的母親。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幫忙負責和葉劍英家族的聯繫事宜，大姊在北京坐鎮折衝，[29]他自己則親自照應舊有的關係，並聯手四位在二○一二年代表大會中新任的政治局常委，在常委會中形成壓倒性的多數力量。這四人分別為：在太子黨中為人熟知、具有相當能力，同時也是習近平舊識的俞正聲和王岐山，以及最典型，省級負責人出身的張德江和張高麗。

習氏王朝（二○一二—二○一六）？

習近平一旦在中共召開代表大會前的預備會議中取得優勢，也就是說，當事前部署都已就緒時，他便開始有技巧地向原先的庇護者展現個性中強勢的一面。也許是因為期望安排的人選沒有得到預期職位，他不惜引起中國國內及國際間的疑慮，迫使中共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延期召開。他的目的就是要遴選出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隊，讓大家知道：習近平不但是黨的新任領袖，還是一個有主見的領袖。[30]

習近平非常迅速地投入領導各委員會的工作，讓它們全力推動他的政策。當年，江澤民還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能擺脫鄧小平的攝政和李鵬的影響，但新任的習近平，在一開始就將經濟工作交給在麾下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李克強在習近平人馬的牽制下，採取兩項勢在必行的經濟調整：將經濟成長率調降到約七%，以及將經濟活動轉向內需市場。[31]未來，歷史可能會記上這麼一筆：二○一○年代是重要的轉型時期，經濟由出口向消費轉變、社會由農村向城市化轉變，社會則愈來愈高齡化及對國際愈來愈開放。這些努力的成果會在未來出現，但第一時間的總結卻正在成形。

當這些基本但仍有些不確定的改變正在展開之際，習近平又在另一個非常傳統的領域表現出他積極的企圖心：振興中國的偉大和光榮。在二○一二年底，習近平喊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及「中國夢」。[32]接著，他又在二○一三和二○一四年中共一連串的內部文件中，一再強調中國革命的啟迪，以及在黨的傳統，甚至中國文化之中，對西方民主假借普世價值，人權、公民權、媒體自由、司法獨立等之名的反證。[33]現實中，習近平則先是對媒體和西方記者，接著對大學人文學科

收緊控制。

他致力投入兩件彼此相關且首要的工作：加強對所有政策的掌控及在外交上展現君臨天下的大國姿態。

習近平先初步強化他對政治和經濟相關機構的指揮。利用太子黨的力量，他著手壓制了幾個由大型國營企業發展成的經濟巨獸，例如，他以更換一批新領導層的方法，打擊了三個大型石油公司。[34]另外，他還推動「依法治國」，作為馴服這些大企業的攻勢作為。「依法治國」廣為外國媒體報導，殊不知這是為了打造一個中央集權的力量所為。[35]用更一般的說法，習近平努力（無論如何，在他的公開宣示中有這樣的意圖）建構一個以國家作為仲裁角色的市場機制，讓權力保有最後裁判的施為空間。

然而，即便對知識分子的監控範圍不大，或即使為打擊西方價值觀有時採取近乎荒謬的宣傳手段，在某些方面，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改善，像是對法庭的尊重、司法的理性化、死刑判決的減少、私有財產的保障……等等。[36]習近平更在二○一三年一月宣稱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可是，他一方面想要讓制度克制權力的暴衝，另一方面，在二○一三年秋天，卻同樣想著要創造一個具有超級權力的國家安全委員會。[37]

要把這些做法放在同一種想法之下確實有些不太容易，即便宣傳部門高調的以體制本身具有的崇高精神相辯護亦然，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還是彼此包裹。像是習近平為了打擊最大的政敵周永康採行的手段就造成他在二○一五年六月的秘密審判中被判處無期徒刑。[38]周永康不但是公安系統的負責人，還是前一屆政治局的常委，同時也曾是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對四川省也有影響力（極可能是由於有薄熙來的

支持）。[39]同樣的，習近平對一些像阿里巴巴一樣發展成具備強大力量的大型私營企業，也保持著緊密、直接的監控。

習近平的控制範圍更進一步擴大，觸及政界和軍方的清理工作，特別是要削弱和震懾公開拒絕向他輸誠的那些人。其中一個指標性的案例就是令計劃案；令計劃曾經是胡錦濤的支持者，處理他可以起到殺雞儆猴之效。*[06]人們也傳言曾慶紅會遭到同樣的待遇，這讓他的故舊人人自危。[40]不過，軍中貪腐的發展倒是先讓習近平找到了最好的整肅機會，他還掌握了一批明顯參與其中的太子黨。[41]曾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的徐才厚，在二○一五年三月病逝前，就曾受到貪腐案件調查的波及。[42]

大部分的清理整肅都配合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反腐肅貪。這沒什麼新意，就像所有共產政權一樣，北京當局從未停止過大張旗鼓的推動反腐敗運動，但當然也從未貫徹到底。從推動「共產資本主義」伊始，如同疫病的腐敗就如影隨形，因為中國經濟運行機制就是它的溫床，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至少群眾希望能加以抑制官僚的腐敗。但即便習近平上台後採取了必要且急迫的大規模打擊措施，要連根拔除這個禍害仍是不可能的，不過在另一方面，它卻讓新上任的掌權者得以藉此更換一大批國家幹部。

習近平在推動反腐時也明白會引起一些物議，原因在於他的家人也從其中嘗到部分甜頭——當然在程度上比其他人輕些。但是不管怎樣，他的政策仍然行禮如儀地運作推動，就像以往強行實施共產主義那段時期。如果我們無法期待一個活躍的經濟運作能夠完全排除貪腐，就像是要維持一個共產主義社會卻完全不使用強制手段一樣，至少要盡可能設法將這些不適切的行為降到最低，「假裝」維持這個經濟運作，爭取時

間懲治高階幹部，以儆效尤；此外還可以維持原本就應被視為「高大全」的最高領導形象，讓他們擁有編派「腐敗分子」標籤的權力。

總之，這波新登場的政治運動劍指菁英，不過群眾即便沉默以對，或是冷眼旁觀，也並不表示他們就因此而漠不關心。因為牽涉其中受調查的高層幹部從二○一二年的二百五十人，到了二○一五年初已攀升至六百人，其中部級以上領導就有六十九人，國有企業領導則超過一百人。[43]再往前一年，各級公務人員中，就有十八萬兩千人因此被懲處。[44]

調查組在全國四處奔走、搜查、指使，甚至炮製出被認為在其他案件中可資採信的招認供詞，如此就可以進行實質上的整肅——顯然這種做法承自文化大革命。我們可以想見，在過程中的屈打成招、刑求逼供絕不會少，為了諉過卸責，當局也不得不承諾調查那些「非正常死亡」案件。[45]調查機構送交的案件通常都會上呈中央委員會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確認，而領導圈中更雷厲風行的下達了禁奢令，連酒類消費都開始減少，這些毫無疑問地都在傳達：「新掌權的領導人是玩真的！」

但不管所使用的手段從何而來，也不在乎這些作為所產生的衝擊，這位共產政權的新當權者，在剛開始的幾年間對於政治上的掌控力度是愈來愈強。另一方面，外交事務原本不太受到領導更迭而影響，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俱是如此。但這次，習近平在二○一四年十一月召開自二○○六年首次會議後即未再召集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之後，情況丕變。[46]

這位新任領導人的行事風格和前面幾位大相逕庭。像許多其他國家領袖一樣，他決定親自介入外交領域。他不厭其煩的發表長篇講話，毫不扭捏地表現出他的自負，例如，習近平就曾嘲諷戈巴契夫在蘇聯解體

那段時間的表現「不是男子漢」。[47]習近平認為必須重視和政治人物的接觸，特別是普丁和歐巴馬，並覺得和他們保持對話非常重要。

實質上，中國的外交政策確有一部分已然出現變化。人們已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外衣，對外國公司表示歡迎的惺惺作態更不復見——由於不再那麼殷切需要這些外國公司，中國開始對他們不假辭色。[48]他們開始在商業和政治上做出清楚劃分，並且不加遮掩的對外公開表露。由於習近平既得職務所帶來的國際地位，讓他得以在包括環境等多項議題上展現出這種姿態，對大家而言確是耳目一新。在國際間位居老二的中國，將與世界第一強權同等協商作為其目標，並盡一切手段爭取全球領導權，還在北京舉辦拉丁美洲加勒比共同論壇會議！[49]不管大家怎麼說，在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的確由於經濟成長和政治體制，得以在眾聲喧譁的國際間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的政治風格開始變得專橫，也很快的開始犯錯。在傳統的想法中，一個位列世界強權的國家，在所屬區域內一定握有區域主導權，而這也讓它重蹈以往強權帝國的覆轍。

對常引起外界覬覦的鄰近疆域內的所有爭議，中國是寸步不讓，更隻身對抗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鄰近國家，執意要獨享中國海的利益，且不惜動用武力。[50]另外在習近平二○一三年九月訪問中亞一行所標誌的轉折後，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活動愈來愈積極，[51]這有可能是為了因應周邊環境出現的嚴峻挑戰，不過他治下的中國也同時藉此擴張影響力。

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一位迥異於以往的領袖。毛澤東和鄧小平總綰軍政，江澤民和胡錦濤受同僚共舉，但習近平卻有所不同。他幸運坐上大位但仍認真勤奮，家世出身無庸置疑。身為太子黨之首，又是革命者後代，讓習近平被寄予厚望，被視為最有資格追逐宏圖大業，甚至走向帝

國霸權……。

這樣的發展，會不會讓他最後走向帝王之路呢？

第九章
權貴集團

歷史學家們由經驗中了解，共產政治內部政治紛擾，大多源於一些師心自用而非政策推動，也並非是社會運動或是思想改變造成，而是領導人彼此以金錢和謀畫的合縱連橫引發的。在毛澤東治下的中國政治即已如此，而在一九七八和二○一二年打破成例的兩次改變影響更大；不僅人事全面換新，連基本決策也改弦易轍。還有，二○一二年的情況與一九七八年相似，讓核心領導在政治決策最高機構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中，掌握多數的力量，使習近平握有穩固的實權。實際上，常委會中除了兩個習近平的舊識外，還有俞正聲和王岐山，都和習近平一樣出身自權貴集團而聲氣相通，而且他們握有各種方法可以影響重要決策。

除了認同民族主義外，這個權貴集團還包容不同的看法，這些觀點有時甚至彼此分歧，不過主要都在於如何結合原則性的共產主義和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重商主義。這不僅是他們資產的來源，無論怎麼說，也是他們所要負擔的歷史任務。

權貴集團的內聚力大多來自於他們共有的經歷：在奪取政權時期面對的艱難險阻、一九四九至一九六六年共享的特權和期待、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頓失所有和掙扎求生，最後是快速的家族接班。家族接班在經濟領域較沒什麼問題，但在政治領域就比較複雜。

即便成員彼此存在矛盾和分歧，這個由太子黨和他們父執輩所形成的權貴集團擁有一個有點弔詭的重要優勢：他們的敵人總將權貴集團視為一個整體，不論是採取對抗或是打擊手段，都一視同仁。太子黨的所有成員也樂於掩護彼此的作為，並在新形勢帶來的好景中盡量撈取好

處，但他們的力量和罩門卻是交互共生的：對那些由於個人才能或運勢得以攀附高位的成員，權貴集團都給予關鍵性的支持力量，但問題是這個支持力量足夠嗎？還有，能持續多久？

面對上述所謂的權貴集團，我們第一個定義上的困難在於：這個菁英團體的確切人數有多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或是足以讓人信服的資料可以說明，而有個原因或許可以稍稍讓人理解這種情況：就像所有的貴族階級一樣，這個權貴集團是一個整體性的個人認知。在中央層級就有上百個家族被認為屬於該集團，再加上省級領導幹部中的一大部分，以及和軍方有關的社會網絡所涵蓋的層面，完整的數字當然難以得出，但我們仍能想見，位於權貴集團核心的應該有三到五千個家族。[01]

自認或是他人認為具有太子黨身分的人，一定超過實際上應有的數目。沒有任何理由能說明，這批共產政權的世家子弟和西方國家的世家子弟不同，不會成為篡權奪位的潛在威脅。

現代中國的一連串社會紛擾中不乏謊言及詐術。也因此，就像後工業化時期的歐洲一樣，像是胡錦濤和溫家寶之類出身較一般的人物得以平步青雲、躋身權貴集團之列；歐洲大陸的全國性菁英和地方性菁英之間，也曾有過這種接觸、流動的社會空間，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接合地帶」。比如李克強的父親，他身為縣級幹部，也就是地位較一般的幹部，不也設法竭盡所能將他的兒子送進大學就讀嗎？基本上，雖然沒有任何明確規則，但李克強不是太子黨，然而這位現任總理，卻和太子黨一樣，娶了一個太子黨出身的妻子。[02]另一方面，有一些「少將」本身也是另一批「少將」的子嗣，他們被分配到較基層的基地或是偏遠的城市工作，沒有任何社會資源或關係，直到他們的子女中出現了一位在政治上或是經濟上有發展長才，並且從知名大學畢業的人，原本沉寂的家

族關係網才就此活躍起來。

要明確指出中國權貴世家的具體數目以乎不太可能。也許較起碼我們可以說，這個階層隨著一些並非出身於良好家世，不過具有良好大學學歷、在官場得到快速升遷，或是得到難得的婚姻助力（這種較少見）者的加入，加入的管道變得愈來愈多元化。

位處邊緣

無論如何，這些天之驕子會受一般人豔羨或是眼紅。因此，很多人會尋求或投入能提供這些領導人或是權貴家族服務的工作。例如，從一九五○年代開始，頭等大事就是如何能夠讓較年長的那一輩能活得較久一些，醫生於是成為自我成就感較強的群體。在某種意義上，醫療人員雖然只是為領導人提供服務的人之一，但中國高層領導都會在身邊為他們的醫生保留一個特別的地位。

這份工作甚至可以鋪墊出打進世家權貴圈子的另一條途徑。令計劃的父親就是薄一波在延安時過從甚密的醫生，而他到了胡錦濤時代則坐上中央辦公廳主任的位子。另外，曾任中央保健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其父也曾是高層領導幹部。*[01]

還有另一批人，雖隱而不顯卻缺之不可：曾擔任秘書工作的老幹部和他們的子女。這些人分布甚廣，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是「秘書治國」，而這也說明了這個國家政治的官僚本質。[03]在毛澤東時代，這批高素質的秘書幫完全不是權貴集團出身，和權貴集團也沒有婚姻關係。有些秘書也住在紅牆內，他們的孩子和所服務領導人的孩子經常在一起，也上同樣的學校。[04]他們成為領導人家庭的一部分，像是劉振德和劉少奇家的關係，或是曾任習仲勛秘書的張志功就是例子；習近平仍經常去探望他。[05]

後來的日子裡，運用秘書協助工作的慣例持續著，而人們常認為秘書掌有極大的權力；像是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就被認為握有軍方人事任命權。[06]這些秘書也為能服務領導人而自得，有些人還能從中獲取利益；像是陳雲的秘書許永躍後來就擔任國安部部長，還有他的一位副總

參謀長也曾任國防部長秘書。二○一二年時，有四分之三的省級負責人、二十五位政治局委員中的十五位，都曾擔任過秘書一職。[07]

秘書職務可以為晉升鋪路的現象，也被權貴家族的家長們注意到，這為他們為子女安排發展起步時提供了許多機會。許多表現傑出的世家子弟，就是從擔任領導人秘書出發，如孔丹、曾慶紅，還有習近平。[08]在權貴集團內部，有些領導人會被認為是「好老闆」，[09]比如周永康，在近年被唾棄前，就因為出手安排兩位擔任他秘書的幹部接任副省長而被大家這麼評價。[10]

在權貴家庭的服務人員或是警衛，不太為歷史研究者注意，但卻比較容易吸引媒體留心。在紅牆內生活的警衛人員小孩可以到公園裡遊玩，不過有位媒體編輯注意到，他們不太敢跑到離他們父母工作地點太遠的地方。[11]此外，只有較高層領導人的警衛或是真的被領導人家人喜歡的警衛員，才會被太子黨在爾後的回憶中提及；很可能就像是世上其他受寵溺的孩子一樣，除了能從他們那裡得到好處的人以外，太子黨們很少會去關心這些服務人員。

一般而言，這些服務人員都是由權貴集團家庭中的女主人，以對待僕人的方式看管著，但至少有兩種情況例外；一是曾經在國民黨高官家中擔任過廚師之人，由於在中共建政初期那幾年這類人很搶手，所以都受到很客氣的對待；另外一種情況則是有些被丈夫冷落的女主人，會轉而向女性服務人員傾訴依賴。像是林彪的妻子葉群，就要求她家的服務人員幫忙分擔處理一些瑣事，不過這些服務人員中，有些人反倒情願去幫和她處不好的女兒林豆豆。[12]

另一群權貴集團中的邊緣人士，是不同政治「牽連」的受害者，以及他們的父母和子女。這些人彼此仍有著不同的際遇發展。在毛澤東時

代，權貴集團對他們避而遠之，避免介入及降低自己被波及的風險；彭德懷被批鬥時的情形就是一個例證。當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間，毛澤東表現得愈來愈失控及反覆時，除了少數幾個例子外，權貴集團內部的相互支持的情形是不再復見。更早之前，就連周恩來都被迫眼睜睜看著老帥賀龍嚥氣離世而無所作為。

毛澤東死後，原本的受害者才受到較好的待遇，尤其是他們的孩子，林彪身邊助手的子女就因此得以獲准就讀大學，也才能在城市中工作。但即便他們仍維持著和權貴集團的聯繫接觸，卻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其他也曾被批鬥的對象在組織部詳細研究過案例後，也是得到許可能夠「恢復工作」，[13]但他們的命運和前文提及的受害者子女相同，權貴集團也沒有挺身拉這些失勢的成員一把過。

最後一個處於權貴集團邊緣地帶的群體，是一群「失意者」：沒能取得好大學的學歷，也沒能擔任領導職務的那些人——因為中國權貴集團只認菁英分子。除了少數例外，那些發展不好的人很少會對外張揚，而這些失意者的父母為了顧及「面子」，也會幫著遮掩他們的失敗，以至於我們很難深入了解那些人經歷了哪些不順遂。例如薄一波的子女，除了大家熟知較有發展的薄熙來，還有雖然沒有高等教育學歷，但卻擔任過幾個重要職務的薄熙成之外，其他位就不太為人所知，只知道他們生活無虞。[14]可見家族發展足以相對遮掩部分成員發展的不順遂。例如大家都不太清楚李訥兒子（毛澤東的外孫）的現況，只知道他從某個技術學校畢業後，進入旅遊業工作……。[15]不過，這是那些少有資料提及、難堪的醜聞、怨偶仳離而人人欲言又止的另一個篇章了。

家族光環

有些世家子弟固然個人才學不足，卻有著大家族光環可以依恃。這些光環首先來自於父母——主要是父親，當然日後孩子們也能夠從一些經歷中看到母親的堅毅。權貴集團的影響力首由家族先人開創，更以各個家族持續的事跡繼之，再加上共黨的發展傳奇才足以成就。這其中當然也包括毛澤東的功績，但由於毛澤東有些中外皆知的負面評價，所以並不會過於強調這方面。

重要家族及知名領導人的英雄事跡（農民起義、紅色根據地、各地武裝力量……等等）都被重新改寫，排除那些曾經犯下明顯「錯誤」的領導人，但仍將像是彭德懷這類被毛澤東冤枉者的事跡收入。在重新編寫這些傳奇事跡時，他們也避免將其中當事人寫得太過超凡入聖，以免相對顯得太子黨們太過不足。這些權貴家族中專門有一些人負責和傳記作者，甚至和一些政府研究人員及重要報社交換意見，以維護家族光環；例如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紀登奎的兒子紀虎民、葉劍英的姪子葉選基等。[16]

太子黨在面對家族光環的態度是正面又有些審慎，而關於這種態度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比方說，他們這態度可能源自曾經親身經歷父母因犯政治錯誤，讓他們文革期間遭受各種折磨後灰心喪志，爾後才一點一點的走出那份居於人下的心理陰霾。此外，也有些太子黨由於常受到吹捧而急於建立屬於自己光環，於是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文革前期那幾個月狂熱參與、面對下放和各種羞辱時奮力抵抗、在爭取回到城市時努力不懈，並在追逐權力時堅持到底。

最終，他們或從大學、或從出訪、或從參與經濟活動中，得到了在

新形勢下發號施令的能力。在共產主義觀點上他們不夠純粹，甚至有些叛道離經，再加上父母過去的縱容，讓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自認超越他人，有的人甚至認為可以引領中國朝向他們認為的，當今唯一可能發展的道路前進：以放任型資本主義為有效率的共產政權服務。有感於群眾對先輩的包容，這些太子黨認為群眾同樣也會認同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和未來將推動的事。

讓人訝異的是，這種樂觀的態度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危機後，仍持續了二十多年之久。但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表現的態度，就會發現這並非特例。這份樂觀來自於太子黨們相信這是歷史潮流賦予他們的機遇，而他們不也因此取得了龐大的財富了嗎？具體來說，經濟的飛速發展擴大了許多可運用的資源，而太子黨的政治地位不斷獲得提升，更增加了他們取得財富的機會。[17]

家族的等級

權貴集團擁有財富，讓躋身其中的家族得以雨露均霑。在這之中，每個家族的等級隨各自的地位有所不同。以往，家族的地位來自於曾經參加過的戰役，或是受到主要領導人賞識的程度，現在卻是靠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實力來衡量。家族光環當然是其中一部分，但卻不如能影響物質豐盈的權力。

因此，在權貴集團層級中處於最高層的家族，代表的就是最受矚目、最富有、在權力操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也就是那些最能適應新形勢的家族。最為所人熟知的家族並不見得一定能停留在層級的最頂端；例如劉少奇和李先念家族，由於成員幾乎都不太涉及經濟領域，使得受重視程度不若以往。[18]許多重要家族相繼投入經商浪潮，即使像王震這種行伍出身的老粗，兒子們也無一例外的從商去。

在這個經濟發展異常快速的時代，能在指揮鏈中占有一席之地變得十分重要，甚至讓某些在這個最富有小範圍菁英集團中的家族地位悄悄攀升：像李鵬、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和現在的習近平，[19]再加上鄧小平、陳雲及薄一波家族，這就形成了一個在政治、經濟上的上層交流圈。

在毛澤東主政晚期幾乎銷聲匿跡，那些「民主」進步人士的家族也再度出現，像是榮毅仁，以及曾為軍閥後來也成為「進步人士」[20]的馮玉祥，他們握有良好的關係和別人需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一般人較少留意中階幹部，尤其是地方幹部的子女情況，這些人必須力爭上游，走出一條通往菁英階層的道路或擠進太子黨的圈子。我們所知道的一個例子是後來擔任空軍司令員及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馬曉天，他的父親是

「小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21]

英雄和烈士之後

有群特定的太子黨成員發展軌跡比較特別，卻從未被外界觀察者提及，這些有趣的群體，便是共產黨的英雄和烈士子嗣。回顧以往，中共在延安安頓下來後就開始積極找尋被黨員遺棄的孩子，並盡量提供他們良好的教育，甚至把他們送往莫斯科讀書。再過一段時間，這些孩子們有些人進入了高中，接著再進入知名大學，其他年紀稍長的則被安排接些榮譽職務，或是成為傑出的研究者；比如第一批參加農民起事者之一的彭湃，他的兒子彭士祿就是參與中國原子彈的研究製造者之一。但除了極少數例外，這批人的生活環境沒有其他太子黨那樣優渥，他們在文革前或是文革中也沒有受到太多注意。

然而一九七o年代末開始，表現最好的三個佼佼者，江澤民、李鵬、鄒家華，逐步在政治上發展他們的事業。一九八七年，當李鵬成為總理、江澤民成為上海市委，而鄒家華成為國家機械工作委員會主任，他們才開始步入人生的重要階段。

他們和典型的太子黨不同，大部分都是技術官僚；李鵬是一逕的保守派、江澤民長期以來從不在政治上有突兀之舉。至於那些俯首帖耳的太子黨成員，他們也不會想要走在政策最前端而力求積極表現；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當時的國防部長秦基偉就曾拒絕對執行天安門廣場的「清洗」任務。[22]另外有一些資料顯示，不論在技術部門、地方行政機關，或是在一些不太緊要的工作上，特別是像派駐到澳門或是香港的工作，常常都可見到這種不做不錯的溫吞消極。[23]不過，這倒也不會令人覺得奇怪，因為有些工作的分配本來就是為了補償這些人所做的安排；例如鄒家華的弟弟鄒競蒙任中國氣象局局長一職，就是一例。[24]值得注

意的是，李鵬和鄒家華於二○○○年代初期退休後，較早世代的太子黨就很少再有人擔任超過部長級以上的官職。他們當中幾個較知名人物的後代，像是陳獨秀的子女，也只是擔任一些還可以的職位。

仍在世的家人

一個接著一個世代的太子黨隨著時間而來來去去，但家族就像是基本單位結構似的，留存在權貴集團中。各家族的首任家長和他們的伴侶陸續謝世——活得最久的也大約在二○○○年代初期離開，這讓權貴集團的活動和結構都發生了變化。

一個又一個紀念會陸續舉辦，大多數是為了紀念太子黨們的父母。生辰紀念也是一個辦聚會的理由；曾山一百一十歲冥誕時，就有過一個盛大的紀念會。[25]太子黨成員的父母去世時，官方追悼會都會在八寶山舉行，而當中有些人的骨灰（像胡耀邦、習仲勛和楊尚昆）會選擇和家族先人葬在一起。[26]隨著人的離世，他們身後的遺產問題也浮上了檯面，不過家族成員會低調處理，宣傳機構也只報導少數的案例，而且報導規格相當克制。[27]不過一旦當局依嚴格的規定，要求去世的領導人家族歸還原先配住的房舍時，就會產生爭執。[28]另外，有時過世領導人的家人為了緬懷先人，或是要沿續先人的政治遺緒，常會辦一些參訪旅行，沿著過世先人曾經生活經歷的之地，將這些山川一一踩踏一遍。[29]

權貴家庭的住處往往會成為大家聚集談話的地點。在過去，或許這些「家庭聚會」所談論的不是權貴集團之間發生的事，就是他們自己負責的提案，或是黨的重要領導人的活動，但現在，討論卻都圍繞在簡單的生活瑣事上。

每個家族都有自己在權貴集團內部行事的「規則」。一般而言，像是參加重要領導人的喪禮、官方重要紀念日，以及以前曾就讀知名高中的校友會活動等等。這類活動中有部分確實會引發一些關注。例如二○一一年，葉劍英的兒子就曾舉辦過集會，討論如何減低黨在社會中被孤

立的現象，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主張要削減黨的專政體制，但主辦人卻反對；二○一二年一月，另一批太子黨則集會紀念開啟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南巡二十週年。[30]

權貴家族間的愛恨情仇也常見於群眾的談話內容。比如鄧小平和王震的後人，他們和父輩一樣往來密切；陳毅和粟裕的後人亦然，尤其在陳毅的兒子娶了粟裕的女兒粟惠寧之後兩家關係更近，不過粟裕的長子和鄧小平的女婿賀平一直彼此敵視，陳小魯和鄧樸方之間也是同樣的情況。[31]這些權貴家族間糾葛的關係，也會因為兒女就學（尤其是上大學或是赴國外讀書）、父母或朋友的去世，還有婚姻關係而交錯變化。

和所有貴族階級相同，婚姻是共產黨權貴集團中的連結機制，而離婚則一如以往地沒人擔得起，這也是為什麼當彭真的女兒離婚後，大家對她的評價就變得不大好，因為人們比較容易原諒男人犯錯，對女性較嚴苛。[32]婚姻的好壞成為衡量一個家庭的具體方法，也因此在權貴集團中，不婚的人極為少數。陳雲的五個孩子中有四個打破常規而未婚，就成為少有人願意學習的「不良」示範。[33]

有些時候，太子黨成員和極富有的企業家孩子聚會是可被接受的，特別是高層領導的家族成員，但像是朱鎔基、胡錦濤，或是溫家寶的女兒們要是做這些事，就會有被議論的風險。也許是因為他人對她們的尊重是來自其父的職位，而不是曾經立下什麼歷史功勛。[34]

改變

新的變化出現了，家族和每位成員的個別經濟利益成為優先事項。這顯示了家族這個原本是以在「政治」上追求人人稱羨職位為目的基本單位，現在也成為追求經濟目的的基本單位。太子黨究竟如何以交換資訊、諮詢顧問，或是合作經營等手段，讓一個又一個與他們聯手的案子可以一路綠燈、通行無礙？人們或許不在乎其中的細節，況且每件事的做法不見得都一樣。但總而言之，有些家族的運作方式就像一般的公司組織（習近平即是），每一家都有自己從事的活動。

這些發展也促成了一些家庭內部的改變。第一個是太子黨們的另立門戶；當父母都健在的時候，他們基本上全家都在分配給父母的大宅子裡一起生活，一旦大家長離世，這些家族常常會保留一個共有的住所（有時就是一間住宅公寓），但大部分的成員都會搬出去另覓住所，而他們的住所或是由一些商人幫忙購置，或是工作單位依有關規定配住：省部級領導人不得超過二百五十平方公尺，政治局委員不得超過三百平方公尺。[35]

第二個改變在於家中的等級排序。一個家族通常由主要繼承家業的男性發號施令，但這人卻不一定得是長子，而是由擔任最高階職務、財產最豐厚，或是性格最權威的人出任；比方鄧小平家的鄧樸方、陳雲家的陳元，葉劍英家之前是葉選平，最近則是葉選寧，至於習仲勛家，自然就是習近平了。

家族中屬於家務、組織，或是財務的問題上，常常由其中一位姊妹協助處理，而這位姊姊或是妹妹才握有真正的影響力。在鄧小平家，這個角色由鄧榕負責，習近平家則是齊橋橋。

大約在一九九○年代左右，太子黨成員的孩子相繼出生，形成另一個新的世代。這些新生代要進入大學就讀時，成為了眾所矚目的焦點。不管在中國或是國外，進入好大學都需要特別的審核，但資料卻顯示，許多高層領導的後代都能獲准進入美國的一流大學就讀，不禁讓人產生一些疑慮。比方說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以及陳元的女兒陳曉丹；習明澤和陳曉丹個性低調，薄瓜瓜則相反，人人都知道他常夜夜笙歌，而當他父親受審時，他也理直氣壯的公開為父親辯護：「根據我的了解，我父親信仰正直、忠於職守。」[36]其他有些從事軍職的人已經升任握有指揮權的職務，像是任弼時的孫子；有一些則擔任有榮譽頭銜的工作，像是李大釗其中的一個孩子便是；或是在商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像王震和葉劍英的孩子；也有人在其他領域一展長才，例如李鵬的孫女，就在花式滑冰上有所表現。

太子黨中女性群體的數量也在變動，但改變的情形卻有些弔詭。還記得之前曾提過，文革期間，這些女子在有關維護家族的大小事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文革結束後，她們當中有許多人克服萬難地通過入學考試，進入大學就讀，剩下的人則擔任她們父親的秘書，或是陪著父親重回工作崗位（例如陳雲和習仲勛）。她們擔任秘書的工作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受信任，另一方面則讓她們的父親能得到像在家裡一樣的照顧。[37]但她們似乎都成為了某種不成文規則的犧牲者，這個規則讓她們只能選擇從事協助夫婿工作，或是協助處理家族事務。當一九八九年春天發生社會運動時，一些領導人的身影穿梭其中，但第一線卻沒有半個太子黨出生的女性。這時期黨的領導班子中，女性占的比例甚至比毛澤東主政的最後幾年還低。

在這些人之中，唯一取得相對較高職務的是聶榮臻的獨生女聶力，

她跟隨父親的腳步投入國防科研工作。[38]其他的女性（或是應該說是夫人們，因為單身女性難有發展出路）在放棄自己原本應有的發展後，即取得躋身權貴的地位，依附在無論是軍方或是安全機構，是省級政府或是國家機關的從屬職務上（但黨的最高層職務就不會開放安排），她們倒也能自得的接受。[39]有些人還接受一些次要代表的職務安排，比方說到世界博覽會申辦委員會中工作。[40]她們少見於商業經營領域，除了少數幾個人因為父親職務夠高得以獲得安排（例如李鵬和溫家寶的女兒），但據我們所知，沒有女性接任領導工作。

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太子黨中的女性似乎比較容易在醫護（通常都要有大學學歷）或是在教職領域（擔任高中或大學教師）找到工作。從事醫護工作好像也是權貴集團共同的偏好：陳賡、林伯渠、王稼祥、王樹聲的後代都有人投入。相較之下，教師、記者或是公司企業代表職務就沒有那麼普遍。[41]在權貴家族中，還有人的子女從事藝術工作，像習近平的夫人就是位歌唱家、趙紫陽的兒媳是演員，葉劍英的女兒也曾從事導演工作。

這些女性一旦進入幹部隊伍中工作，獲得重視的往往是她們的先生。這些「夫婿們」因為婚姻進入高層領導家庭並成為其中一員，從中得到了不少好處，在高層領導家庭事務處理上也涉入得愈來愈多。鄧小平的三個女婿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中鄧榕的丈夫賀平，從一九八○年代初期就開始幫忙處理鄧家的事。這似乎成了某一種程度的利益交換：許多家庭利用夫婿幫忙處理事情，而這些權貴家庭的夫婿們也樂於接受因此而來的地位提升。[42]

這些夫婿中也有一些人的表現傑出而優秀，像是胡耀邦的三個女婿，還有李先念、羅瑞卿、王首道、溫家寶、吳邦國、劉華清（他對女

婿潘岳的期待比對自己的孩子還要高）等人的女婿都很出色，特別是葉劍英的女婿鄒家華，在一九八○年代曾任副總理並位列政治局委員；二○○六年時，吳邦國的女婿還曾經幫中國一家大銀行出面商談一宗非常重要的交易。[43]

權貴家庭夫婿獲得快速晉升的例子中，有三個人特別令人矚目，分別是聶榮臻、黃鎮和姚依林家的女婿。老帥聶榮臻對女婿丁衡高幫女兒在軍中和黨職發展上的協助十分感念，便出手相報。[44]曾經擔任駐法大使的高層外交官黃鎮，對也同在外交領域工作的女婿戴秉國多所幫助，讓他後來當上外交部副部長、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國務委員。而最讓人注意的是姚依林的女婿王岐山，他是現任的政治局常委，負責執行反腐敗運動，也是重要國家領導人之一。王岐山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在工作開始起步時得益於岳父姚依林之助甚多，而姚依林又因兒子夭折，對女婿多所關愛。姚依林將王岐山引介入國家機關工作，而且至少有好幾次出手維護他；王岐山在一九九○年代獲得朱鎔基的信任後，事業開始快速攀升。[45]

接班

權貴家族和成員在事業發展上，不單在承繼前人還是另開新局的做法，都讓人眼界大開。太子黨們不但以父母曾有過的經歷作資源，努力在這個基礎上力求發展利用，並更進一步設法開創新局，特別是在國內外事業經營方面。

太子黨第一個要面對的通常是接班問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許多年輕的太子黨成員都設法跟隨父母的腳步，尋求擔任政治領導人的職務。在軍界，子承父業的情形更是層出不窮，有些例子甚至延續到了今天。[46]高階將領家庭至少都會讓一個孩子進軍中發展，有些還不只一個：陳士渠有六個孩子都在軍中謀職，朱德有五個孫輩，粟裕家含女兒在內也有四個人在軍界！這些承繼父業的後人們，不是在父親曾任指揮職的地區或部隊，就是在父親曾經服務過的地區工作；有的人在過去父親待過的艦隊或聯隊，有的人則在相同的軍區或是軍分區。*[02]例如曾任北海艦隊司令的某將領，他的兒子在三十多年後就任北海艦隊政委一職；于海濤曾擔任廣州軍區部隊領導，而他的父親就曾在該地擔任過司令。[47]

有的高階將領家族就像是總參謀部的附屬機構一樣。比如二○一四年時，高齡百歲的上將張震家就有三個兒子是少將以上軍階，其中一個兒子的岳父還曾是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將領。此外，張震的女婿也是少將，還有一個姪子也在同樣的階級。[48]

顯然，只要這些將領不「犯錯誤」，軍隊就一直是這些家族的後備資源。林彪的舊屬吳法憲，*[03]就沒能將他四個孩子中的任何一個送入軍中。[49]無疑地，軍方十分歡迎曾擔任過高階將領者的子女們，他們要

升到少將也不是難事，但少將以上的階級就不是那麼容易。因此，雖然進入軍中發展確有優勢，但許多太子黨也確實是憑實力做出一番成就，更有不少人在複合指揮任務上展現長才，比方說以往的導彈部隊，也稱「第二砲兵」的火箭軍，或是在核武發展方面。[50]海軍也似乎吸引不少人投入，畢竟這領域因以往發展較弱，成為中國在政策上優先發展的目標。

家族傳統力量的支持和相對容易的升遷管道，能說明太子黨對軍方的忠誠嗎？根據一項我們認為十分合理的推測，在某個階級（當然是「少將」）以上的高級軍官，都在全職或是兼職的開設或是經營一些企業，這些企業直接和他們指揮的部隊有生意上的往來，且所得利潤非常可觀。中共當局曾三番兩次想要抑制部隊經商的風氣，例如一九九八年，政府就曾對此下達相關的指示。[51]

這種子承父業的情況愈是在軍方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愈是凸顯出在黨政的文職系統中，承繼上一代工作職務的情況並非主流。身為黨政領導人後代的太子黨們當然很少人會疏遠這個體制，仍然有承繼父職的情況，但僅靠父母庇蔭，不論是在黨務組織或政府機構中，都是不夠的，他們還要考慮到外來競爭，考慮各級黨校和各級共青團培養機制提供的新血，特別是它們為省級機構培育、供應的幹部。

然而還是會有一些例外，尤其在遠離北京的地區更容易發生。像從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間持續掌理福建的葉飛，就可以將女兒安插到廈門擔任副市長。另外在內蒙和西藏，有兩個在文革期間曾遭打擊的家族：烏蘭夫和阿沛．阿旺晉美家族，同樣都將子女安插到可以從中獲利的職位上。[52]就連李鵬那大部分時間都在私人企業工作的兒子李小鵬，都在二○一三年出任山西省省長。[53]

外交界也有一些子承父業的例子。像之前曾提過的戴秉國、和陳毅女兒結婚的王光亞，這兩個人都是外交領域重要高層領導人的女婿，顯然他們在官僚體系中晉升也是受益於家庭背景。[54]不過也有太子黨出身，卻仕途不順的相反例子，比如前外交部長喬冠華的兒子喬宗淮，他雖然曾擔任過外交部副部長及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但在工作上一直與他人格格不入（或許是因為他的家庭背景，讓別人無法信任他吧）。*[04]

下海經商

從商風潮，明顯由來於太子黨試圖揣摩新任領導當局意圖和政治路線：掌握共產政權體系的權貴家族中，多多少少都有著資本主義的行徑。

有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家人都涉足商業活動。[55]在一九八○年代「治國八老」的一百零三位後人中，有不少人是國家或軍方幹部，其中四十三人或自己開公司，或成為私人公司的股東，還有二十六人在國營企業任職。[56]除了軍方領導人的家族，對這些太子黨哥兒們而言，「做生意」壓倒一切，也因此薄一波的三個兒子中只有薄熙來投身政治（但也沒放棄聚斂行為帶來的利益），薄熙永和薄熙成都在經商，一個在香港，另一個在北京（經營餐廳）。[57]為了投入商界發展，不少太子黨紛紛放棄他們從一九八○年代以來就開始經營的黨政職位。

這些人轉進中國經濟的各個領域，許多大企業也刻意招攬他們，以備必要時。[58]比方說，一旦公司遭遇困難，就可以向這些太子黨成員的兄弟、親戚或是朋友們求援。實際上，所有「下海」經商的太子黨，背後都有家族或是朋友組織的勢力支持，這些支持力量也多少都有官方背景，以提供所需要的資源或是庇護。這些關係網大多是在公安系統中有耳目或人脈，使得公檢法系統極少追究他們的活動。知名的中國觀察者斐敏欣指出，涉貪官員只有三％的機率會被查處下獄，[59]我們可以從這點想見，這機率對太子黨而言只會更低。

一九八○年代起，中共曾經下達堅決禁止領導人子女經商的政策，然而上述的網絡卻可以讓太子黨避開這些規定。由於相關規定屢遭挑戰，以至於後來竟沒有人敢再提這回事。結果自然顯而易見：只要有錢

可賺的地方，就有太子黨。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在一家航空集團公司中看到孔原的兒子，在保險集團公司裡見到陳正人的兒子；陳元自己更在中國人民銀行領導高層的長期工作後，再轉而成為國家開發銀行的行長——這份名單還可以開列得更長。據傳，曾慶紅的兒子曾對外放言：「沒有兩個億的進項，免談。」[60]

這些經商網絡基本上是在家族基礎上運作的，圍繞著子女、兄弟、親家……等。就這樣，溫家寶的女兒化名常麗麗，在開了一家顧問公司後，她的丈夫隨之順利進入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工作！此外，太子黨的網絡還擴大到朋友層，像是父執輩世交的家庭成員，或是大學時期的同窗好友等；[61]家庭和好友可以讓保護圈盡可能的擴張。

每個網絡隨各個家族家長的不同，各有自己的經營事業。例如，李鵬家族把持的是電力事業，溫家寶家族則投入珠寶首飾業。家族其中一個成員自行開創事業後，整個家族網絡再為他提供庇護的事也屢見不鮮；例如一位前總理的兒子，在創設了一家資訊科技公司後就由家族支持其發展；胡錦濤兒子的公司，也曾在家族的庇蔭下為機場提供掃描設備。[62]像是高科技和金融業，直到現在都還會吸引一些具有相當能力的太子黨投入；江澤民和李瑞環的兒子，以及李克農的孫子等都是例子。[63]

真正的富豪

總之，太子黨為企業工作絕對不會毫無所圖！十年下來，他們從中累積、賺取了巨額的財富，根據社會科學院引用的凱利．布朗（Kerry Brown）估算出的金額，這些人的財產可能高達兩兆美元之譜。[64]但他們還稱不上能代表當今中國所有的「巨富」；當前中國是一座歷史上罕見的富豪製造工廠，這些太子黨了不起為數僅占約其中一半，[65]而且這比率還可能有些誇大。

在權貴集團中經營最成功，同時也是中國最有錢的人為王健林。王健林曾是軍人，父親也是參加過長征的紅軍，但他後來轉而在大連投入房地產經營，並且和薄熙來合作，利用行賄等手段縱橫中國房地產界，後來更由於習近平、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國高層領導人家族的著意投資而發家致富。他所掌握的資產，約有三百五十億美元。[66]

太子黨給人的形象不是只有富豪而已，他們之中很多人還是全國政協的成員，只是在人們的眼中，所謂政協，也不過是萬把個少數有錢人的俱樂部。[67]也有一些太子黨成員有正式的職務身分，不過這些身分只是讓他們能低調從事商業活動罷了，畢竟他們的家庭是媒體和各方注目的焦點。身為太子黨，還是有許多的不方便。

另一方面，大部分具有公職身分的太子黨（也許這些職務並不是很重要，影響力也不太大），一樣會利用權力空隙獲取利益。像是人大常委會委員，許多太子黨都具有這種身分，他們的個人財富從二○○七到二○一四年間，就增加了八十一％。至於上海和廣東的負責人（通常他們的出身背景都很好）在二○一○年時所持有的財富，即達到了兩百萬歐元。[68]

太子黨很少會被調查，因此許多人都是擁有巨額資產的富豪。像胡錦濤的女婿，就擁有約有六千萬歐元的財產，而且這個數目算是「還好」的，溫家寶的親友賺得才最多，竟有超過二十億歐元！[69]不過有件事似乎很難讓人相信是真的：薄熙來家在數年間，轉移到國外的財產就大約價值六十億美元。[70]

領導人家族擁有鉅額財富的情況讓中國人民憤憤不平，就算其中有媒體誇大的成分在，[71]但相對一些靠自己力量賺取資產的企業老闆，這些權貴家族卻可以擁有如此大量的財產，實在讓人氣憤。這些太子黨的家族完全不理會一些該遵守的規定，其中有幾條還是專門針對他們訂定的，比方說有關官員財產申報的規定，但他們之中到底有多少人在調任新職時會申報自己的財產呢？[72]

有哪個官員敢干冒大不韙譴責權貴家族的所作所為？就連公安機關高層領導都是他們的人！這情況使得太子黨成員幾乎都有豁免權，[73]只有一些小角色會被查辦懲處，而且官方宣傳工具在查辦前就會對外放出消息，披露這些人的名字。例如前浙江省領導人陳偉達的兒子陳同海即是，[74]他被控「竊取」約六千萬美元，被判決死緩。*[05]但即使如此，在幾個大城市中，大家毫不懷疑愈高層的領導人可能愈腐敗的說法。有些四處流傳的小道消息，反映出這種對高層菁英的輕蔑態度；例如，李鵬的妻子到日本旅遊時在飯店掉了一條項鍊，便要求飯店賠償損失，後來雖然找到了這條項鍊，但經鑑定後發現上頭的鑽石都是假貨。[75]

另外，權貴集團知道大家尊重那些為政權建有功勛[76]和擁有財富之人，是因為這些人憑的是自己的努力，也因此太子黨任意的奢華消費行為會讓人們憤慨不已。例如李鵬的女兒穿著義大利名牌Emilio Pucci、流連夜店的玩家開著法拉利，以及不過擔任辦公室主任，座車卻是奧

迪。[77]然而太子黨擁有的不只是奢侈品而已，他們還有高級的住處：有的在安靜並保全良好的郊區購置豪宅，有的經常出入高級俱樂部、酒吧，以及像是私人高爾夫會所的高級休閒場所，有的人還會開自己的遊艇到海上度假，另外那些最有錢的人，則分別在美國、倫敦和巴黎置產。[78]除此之外，當北京空氣污染愈來愈嚴重，甚至連呼吸都很困難的程度時，出現一項新配備標識出庶民和權貴的差異——權貴富豪的辦公室和家中都配置了空氣清淨機。[79]

許多官員和他們子女在性關係上的浮濫，也成為北京市民眾議論紛紛的話題。[80]官方宣傳機構偶爾也會公布有官員涉及性醜聞而遭免職的消息。二○一一年二月，就發生擁有十八名情婦的鐵道部部長遭查處下台的案例。[81]此外，宋任窮的兒子也曾公開譴責過太子黨種種放任的行徑。[82]

海角天涯——國際商貿操作

有錢的太子黨不只在城市裡投資，整個中國都是他們的守備範圍。要到上海，只消乘個高鐵；要去海南泡澡，只消搭趟飛機。當一般民眾要出國也只要跟團買張機票就可行的時候，這些太子黨就更能經常往來世界各地。

早在一九七○年代，太子黨中就有些人預測到中國和世界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間的關係會逐漸好轉，及早做了準備。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前往國外旅遊的人數會迅速增加，對鄰近香港的邊境管制也很快就放鬆的原因。中國在當時簡直就已經把香港當成了自家領土，而英國人也睜隻眼閉隻眼，香港於是成為了實習資本主義的場所及溝通的緩衝空間。許多反應快的人馬上就明白，在香港有許多生意可以做，而太子黨就在其中；他們還知道，在香港經營事業在提供國家服務之餘，對權貴集團也有好處。像是王震的兒子王軍，後來中國式新資本主義的領頭人之一，他就領有香港居民證。於此同時，也有許多太子黨想方設法讓自己能被分配在鄰近香港的周邊省份工作，以便能配合參與香港發展熱絡的貨物往來。[83]太子黨似乎在香港剛交接的政權和市民社會中間，並沒有扮演任何公開的角色，但並不表示他們對這些事漠不關心，像是從二○一二年開始負責處理相關事務的，就是太子黨出身的王光亞。[84]

太子黨也將香港當成學習資本主義各項操作和國際商貿的場域，他們（尤其是習近平的哥哥）在那裡學到並了解未來在中國可以實施的做法。[85]其中有些人為了在香港定居，還設法進入當地原本從上海發跡的大公司；另外也有以婚姻作為手段的人，像是上將張震的兒子和政治局中唯一的女委員劉延東的女兒，就是如此。[86]不少人被安排到中國各機

構或是銀行在香港設立的分支單位工作，有部分成員在那兒找到輕鬆的差事，或是到為酬庸有貢獻先人或是烈士後代而保留一些職位的澳門去。[87]在這些地方不但可以感受到西方和自由的空氣，一些人甚至連生活態度都變得放任。多數太子黨成員很會利用香港特別的環境和自身條件來獲取利潤，因此在一九九○年代，太子黨曾將某個省或某個城市的資金轉到香港，再從香港以外資的面目回到中國投資。這種方法可以享受許多對外資的優惠，這也是為什麼從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九年間，從香港進入中國投資的金額會占全中國外資總額一半以上。[88]

另一個讓太子黨能夠學習了解新的經濟運作，並且因而獲益良多的資本主義港埠是新加坡。許多年輕幹部在那裡學如何面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課程，汪洋就是其中之一。權貴家族也在那邊經營一部分的事業，例如李鵬即是。[89]新加坡開國者李光耀還曾經擔任過江澤民的重要諮詢顧問，江澤民還請他要好好教教習近平。[90]此外，鄰近大國澳大利亞同樣吸引愈來愈多家世背景不錯的中國商人前往，曾慶紅的兒子就在那裡經商。[91]

不過，影響最深遠而且在中國被議論最多的卻是太子黨和美國，或者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猶記一九八○年代，因為讀書或出差而前往美國的太子黨絡繹於途，從那時起這種往來聯繫便不斷增加。一半以上到海外讀書的留學生都是在已開發國家的大學就讀，太子黨更是專挑美國最好大學及部分歐洲的學校。比如專門培養菁英的巴黎政治學院，一般中國學生中除了極少數積極爭取就讀的之外，就只招收具有相當家庭背景的。

於是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的女兒和薄熙來、陳元的兒子於二○一一至二○一四年間在哈佛大學就讀，而溫家寶的女兒正是在哈佛讀書時物

色到夫婿的。其他名人的子女也曾在知名的學校待過；現任副總理李源潮的女兒，就曾在耶魯大學念過書。[92]美國當局也十分熟稔配合不同太子黨的身分，做低調接待的安排事宜。像李先念之女在一九八○年代，就曾經好幾次受邀前往老布希的私人農場作客。[93]

中國和美國高層人士間的關係發展非常順利，並沒有碰到一般人想像會產生的問題。據我們所知，中國方面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曾有過一次「倒退」，那是因為現任政治局常委俞正聲的弟弟俞強聲潛逃美國所致；或許可以這麼說，「美國情愫」在中高層人士中已有廣泛深而遠的影響。之前曾提到一九八○年代中共治國「八老」有一百零三個後人，其中有二十三人曾在美國求學，十八人在美商公司工作，十二人在美國置產。[94]例如掌管中國安全系統的喬石，他的兒子就住在美國；元帥徐向前的女兒，二○○○年代時就曾在加州的一家基金會工作；文革時著名的左派人士王力之女也一樣；更特別的是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她曾在賓州大學修過有關媒體的博士課程，學著用來行銷她外祖父的故事。

這些中國青年在融入美國社會這方面都沒什麼障礙。他們喜歡美國社會，而美國社會也回以相應的報償：給他們許多美好的回憶。他們為自己所取的，像是Winston、Larry　或是Simon等美式名字，彷彿承載著這些美好。[95]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不願意離開美國；興許胡錦濤女兒和她的先生就在美國定居一事，是眾所皆知的。其他一般人和他們一樣，說什麼也想要一遊美國，嘗嘗在那裡生活的滋味；科技設備公司朗訊集團，就曾經安排過三百一十五次旅遊活動，招待中國官員前往拉斯維加斯、迪士尼樂園和好萊塢遊玩。[96]此外，還有許多中國婦女前往美國生產，為的只是讓孩子可以擁有美國籍（日後，孩子的父母也能因而獲得美籍）。[97]

既得利益的愛國者還是無祖國的金融家？

這些政治高層和其家人對美國的喜好，以及不時前往訪問及停留的行徑，都讓他們受到質疑。即便中國對美國的情報工作曾經很有成效，但要指稱他們是為了蒐集情報也不太合理，然而說他們是想到一個富裕且友善的國家去賺大錢，一切說得通了。美國在高層領導子女的成長過程中一直都很有吸引力，連習近平都承認，他非常用心準備幾次和美國總統歐巴馬的會面，還很努力的學習英文（成效顯然比以前毛澤東要好得多……），透露出他對學英文這件事也頗為熱中。

除了美國吸引力的影響之外，還有探索世界以擴大視野這個念頭，讓一些太子黨嚮往成為能跨越國界、無祖國的金融家。到「離岸區域」設立公司蔚為風潮這件事，就成為可以說明這種心態的第一個現象。這些離岸公司極難管理，但卻擁有極大的保護傘；到底是哪些人設立這些離岸公司、公司的數量有多少，都是保密的，但仍然會有來源不太可靠的消息傳出。但即使是些捕風捉影的消息，也足以讓人做進一步的探究：彭真和溫家寶的兒子、習近平的姊夫等人，都被傳曾利用像是維京群島及庫克群島等避稅天堂進行金融活動。其他太子黨成員也會利用開曼群島和百慕達群島，進行類似的操作。[98]

除了這些在海外的活動外，還有另一個眾所周知且議論也多的行為：介入外資企業在中國的運作。在一些諸如軍火交易、商務銀行交易等特別的領域，太子黨不但影響力大，更是動見觀瞻。這類交易經常要由太子黨出面協調，有些人還從未失手過。像新一代政治新星汪洋的女兒汪溪沙，就曾經幫德意志銀行從摩根大通手裡挖走一筆重要的生意。溫家寶的女兒，也同樣因為曾經替幾個西方銀行提供過服務而頗為知

名。但在銀行界中的代表人物卻是趙紫陽的兒媳任克英，她曾經在四家大型國際商銀工作過，最後再回到整併後的美銀美林集團（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99]為美國公司提供服務成為中國年輕人爭相投入的工作，其中當然不乏太子黨，有人還曾經試圖前往北美發展。

在中國的有錢人之中，太子黨遭受的指責最多也最重，這是最大的問題，即便有時候他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責難也不見減少。以離開中國前往國外定居這件事為例，從一九九五年開始至今，已經有一萬八千多位官員和國營企業員工去國，而且在大城市裡，只要財務能力允許，有很多人都會離開中國；只要有能力，六十四％的中國人會移民他國，而擁有兩百萬歐元資產的人，有六十％的人承認他們認真思考移民一事。[100]大多數人想過要移民卻沒動作的原因，有的是還沒找到方法，有的只因為行事謹慎。太子黨會招致批評，是因為他們的身分和擁有的財力使他們可以輕易地移居國外，而這令人嫉妒。太子黨可以輕易做到一般平民老百姓做不到的事：成為一個無祖國的富豪。

這就是中國城市階級與太子黨間的心結所在。在中國，包括太子黨在內的有錢人都被視為自私或是剝削者。對於有些批評表示太子黨是當權者的白手套，這倒不假，但有些批評直指他們背棄國家，這就未必正確。

二○一二年以後，太子黨們逐漸浮出檯面，成為當權者側翼的助攻力量，對領導人而言相當有用。由於他們對國際事務和資本主義的了解，使得當局愈來愈倚重他們，其程度甚至常超越他們的身分。對於這個飽受官僚和腐敗消蝕，但又期望能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獲利的龐大帝國來說，太子黨具備的條件特質正符所需。但同時他們還是帶著當朝權貴的缺陷，另外也受到拒絕改變的共產政權拖累，以及謹守成規且停滯

不前的中國社會障礙：這些阻力相互干戈，卻不會彼此抵消。

結論

且讓我們在最後一章整理之前所述的內容，試著提出結論。

領導人子女的命運，尤其和他們父母那一輩從一九五○年代開始打造出來的權貴集團發展彼此相連。初期，他們獲得非常好的待遇，加上接下來的刻意安排與庇蔭，讓人料想不到有一場風暴正醞釀著，而他們正是第一批被捲入的參與者，且很快地就成為被選定的打擊對象。經過所謂「人民專政」的圍剿、處分和迫害，他們還是能重新振作，並在失去了當初被他們批鬥過的父母陪伴後，才知道孤單的滋味。按照毛澤東和江青的設想，他們要將權貴集團的父母和子女分化後各個擊破，但未料到在高層鬥爭的干擾後情勢卻轉向：一九七○年代，權貴集團在父母那一輩的權勢幫助下重整旗鼓。結束下放回到城市和恢復原有地位後，這些父母竭力幫已屆成年的孩子完成學業並開展事業。

毛澤東死後，毛主義幾乎被擱置一旁，曾參與開國過程的那一輩衰老，在一九八○年代開始了各式各樣的政治接班。太子黨在接收他們父母影響力和體制內發展上擁有優勢，甚至還能青出於藍；他們很聰明的參與經濟上的各種新興產業，但同時也會遭遇到來自黨內和群眾的阻力。唯一未引起議論且順利展露頭角的是第一代太子黨，諸如李鵬、李鐵映、鄒家華等人，他們具備相當的工作實務經歷作為支撐。

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二年間的變化，早期受到天安門屠殺悲劇影響而停滯，接著在李鵬「反改革」時意圖受挫，直到鄧小平在最後出手支持開放政策後，改革才開始加速。後面數年，逐漸興盛的中國商業和江澤民頗具手腕的政治操作，使中國面向西方的領域呈現跳躍式的發展。市場機制及政策調控對中國經濟影響愈來愈大，這讓大批太子黨有了介入

操作的機會。二○○○年之後的幾年時間，胡錦濤雖然取得大位，但在江澤民的暗助下，太子黨們仍然不受影響地推舉出他們的領袖習近平，以及繼續在政治上投入資本，直到二○一二年總攬大權。

促成這段發展的主要因素有三個。一方面，不管在他們內部曾發生哪些摩擦或齟齬，江澤民和其副手曾慶紅在經濟或是政治上都全面支持太子黨發展。另一方面，太子黨最主要的對手共青團一直無法推出強而有力的人選，更重要的是，他們也無法提出既有原創性又能切合全球經濟大趨勢，而且對資本主義國家有利的整體規畫。在太子黨這一邊，良好的教育基礎、文革期間對苦日子的體會，再加上可輕易出國見識，讓這些人之中產生了既具備個人特質，又能輕鬆面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人物，像是薄熙來、習近平和王岐山等人。

最後也最關鍵的因素，是太子黨從一九八○年代起就率先逐步參與隱性資本主義新經濟的運作。他們的參與既是受到鄧小平一九九二年二次改革的感召，也是受到隨之而來的資本主義大力吸引。太子黨不僅是中國經濟的先鋒，也為由他們之中出身的領導闢出一條道路。

我們可以為太子黨或是中國作一個樂觀的假設：在由黨的權力庇蔭、被管控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國際環境下的大量出口，這三項條件結合的中國政治，以及先天由共產體制培養、後天卻接受（當然前提是要有利可圖）資本主義價值的領導菁英之間，有可能完美的調適。如此一來，才能為中國面對全球化無可避免的轉型爭取到時間、金錢和所需的人才。在這期間會遭遇到的問題有：城市化及形塑現代社會各種新生成分的出現、發展和消費問題、婦女地位的改變……等等。

不過，要確定上述這個假設仍有許多問題待釐清。首先是資料來源的欠缺；在缺乏統計資料的情況下，我有幸還能夠得到觀察一些太子黨

中知名人士的機會，所謂知名人士，就是指那些在北京、上海或廣東「相當有分量的太子黨」，他們很快就能適應黨的當權者和全球化環境。如果我們能進一步研究省級領導菁英或再下一級地方領導菁英的子女們，甚至將進入軍中發展的、為數眾多的太子黨納為對象，可能會出現一些更令人驚訝的結果。

再者，由於這些權貴子弟都是以「由上而下」的視角看待事物，使他們至少有兩項重要缺陷，可能成為他們在日後成為鑄下大錯的根源。其一是信念中對政治抱有某種程度的幻想，以及對利益追求的狂熱；為自己或國家賺錢，成為大家的共同目標。如此一來，在許多當代要面對的重要課題上，就會導致短期性的盲目。

不過，施行治理時必然要有政治手腕，在這方面習近平應該有些心得，因為他的統治愈來愈會運用非常「現代」的技巧，卻帶有「帝王式」的風格，也因此才會出現以「史達林—毛澤東」式的專政手段實施的反腐運動，以及收緊對大學的控制。前幾年他的戮力從公無庸置疑，卻還能在全面統治的邊緣地帶為現代思想、「史達林—毛澤東」思想和帝國思想，留下一些可供爭鳴的空間。

其次，由於必須尊重政府決策體制，習近平就得面對權貴集團的脆弱處：不同利益網絡間的分化傾軋和不同家族間的妒恨紛爭。在太子黨未掌權時，分化是驅策的力量，他們心裡想著：「這個時代就要過去……。」而掌權後的太子黨政權，卻被華而不實的種種想法，還有為了爭奪不當利益而起的處處紛爭而消耗、動搖。

只要二○一五年夏季股市危機帶來的威脅還有經濟成長放緩，不會繼續發展成一場經濟大災難，前面提到的那些問題就都能迎刃而解。但若災難一旦爆發、情況失控，太子黨倚重的「資本主義」合法性將轟然

潰散。畢竟「大難來時各自飛」，時候到了任誰也擋不住。

太子黨的各種創新求變，很可能會成為歷史記錄在案的心計手段，他們讓中國原本的共產主義體制，默默、平靜地轉變成為不那麼完全的資本主義體制。而在中國度過這段艱難轉型期之後，接下來太子黨的作為與發展，還有待我們繼續觀察。

譯注/編注

主要家族簡介

＊01　譯注：陳雲活到九十歲。

＊02　譯注：湖南省桑植縣，居民以土家族為主。他雖出生於少數民族地區，但卻是漢族。

＊03　譯注：依中共官方資料，賀龍先後娶過五任妻子。

＊04　譯注：賀捷生，為賀龍和前妻蹇先任所生，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部長。其夫為李振軍，軍職出身，曾任湖南省委書記，後返回軍中任職，曾升任武警部隊總部政委。

＊05　譯注：小女兒李恆，即李滿妹，從母親李昭姓李。實際上，次子因為曾被農民劉世昌收養，胡耀邦以兩家之姓取名為劉湖，以念收養之情。

＊06　編注：此處應是指在瑞士信貸集團工作的胡知鷙。

＊07　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紐約時報》刊出一篇文章，內容引用蔡詠梅在香港發表的〈周恩來的秘密感情世界〉。

第一章　烽火幼雛（**1921－1949**）

＊01　譯注：另有資料表示當時這起滅門慘案中，顧順章八歲的女兒逃過一劫，並安排至浦東寄養（吳基民，《周恩來與上海滅門血案》，臺北：一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月）。

＊02　譯注：此處資料可能有誤，應為何葆貞被殺。劉少奇父在其九歲時即已逝。

＊03　譯注：這裡指的是胡耀邦曾將其中一子劉湖交給劉世宗照顧，之

後兒子跟了劉世宗的姓，並要劉湖定期探望劉世宗夫婦。

＊04 譯注：指的是聶榮臻的女兒聶力流落十年後，在共產黨的安排下和其父母相見。見面前，兩人手中不過只有彼此泛黃的照片，卻能憑著照片確認彼此。

＊05 譯注：鄧小平的長女鄧林、老二鄧樸方和老三鄧楠因為鄧小平和卓琳夫婦無法照顧，均送人撫養，直到一九四五年晉冀魯豫軍區成立後，司令部遷移，鄧小平夫婦才將三個子女接回。

＊06 譯注：此處應指任弼時長女任遠志。

＊07 譯注：時任情報部副部長，部長為康生。

＊08 譯注：指的是從中央蘇區出發的中央紅軍隊伍中的女性，不包括後來會合的紅二及紅四方面軍。已知的有王泉媛、鄧六金、鄧穎超、甘棠、危秀英、危拱之、劉英、劉彩香、劉群先、楊厚珍、李堅真、李伯釗、李建華、李桂英、吳仲廉、吳富蓮、邱一涵、陳慧清、金維映、周越華、鐘月林、賀子珍、錢希均、蕭月華、康克清、曾玉、謝飛、謝小梅、蔡暢、廖似光等人。

＊09 譯注：徐的第二任妻子程訓宣，被張國燾以肅反名義逮捕殺害。

＊10 譯注：此處應為曾中生。他為黃埔軍校畢業生，後於紅四方面軍中遭張國燾監禁殺害。

＊11 譯注：按注釋所列資料來源及相關經歷，此處所舉應是鍾期光的例子，而這位第二任妻子應為胡平然。

第二章　權貴集團中的驕子（**1949－1957**）

＊01 編注：特別供給特定人士。

＊02 譯注：林彪與前妻張梅的女兒林曉霖。

＊03 譯注：江青在上海影劇圈中時曾以藍萍為名打滾，被國民黨逮捕，經短暫拘押後釋放，她一直不願別人知道這段過往。

＊04 譯注：當時黨最高領導人仍為黨主席，中央書記處僅負責在中央政治局之下處理日常事務，總書記只是書記中排名第一的負責人，和今天的總書記不可同日而語。

＊05 譯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一度改名為北京實驗中學，現名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也招收男生。

＊06 譯注：蘇靈揚及孫岩。

＊07 譯注：當時師大女附中校長為孫岩。

＊08 譯注：陶斯亮。

＊09 譯注：饒妻為陸璀，兩人育有一女陸蘭心，陸璀後與饒離婚。

＊10 譯注：另有一說是蔡暢在生下獨生女李特特後就直接結紮，不再生育。

＊11 譯注：一九五五年中共實行軍銜制，羅榮桓之妻林月琴獲授大校。

＊12 譯注：李貞，一九五五年實行軍銜制後第一位女性少將。

＊13 譯注：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及首位駐法大使。

＊14 譯注，劉建勛曾任河南省委書記，其妻為陳舜英，曾任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5 譯注：蔡博是蔡暢的兄長蔡和森與向警予之子。

＊16 譯注：同一時期有兩名中共幹部女兒曾於蘇聯讀書，皆名為Lin Li，一為林伯渠之女林利，一為林彪堂兄弟林仲丹之女林莉，前者於一九四六年回到中國，後者於一九五四年回到中國。惟林仲丹於一九四二年即歿，再者由作者注釋資料推斷，文中所提應為

林伯渠之女。

＊17 譯注：曾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及中央黨校校長，後在文革中受株連，一九七七年病逝。

＊18 譯注：劉濤，文革中和其弟劉允真撰寫大字報攻擊劉少奇。

第三章　是無知還是不能理解？（**1957—1965**）

＊01 編注：「雙百」為在藝術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學術工作百家爭鳴。

＊02 譯注：此處指一九六○年間，湖南女工劉桂陽因家鄉親友受大躍進造成糧食不足餓死，而到中南海外貼大字報的事件。

＊03 譯注：此處指的是北大哲學系「X集團」案，郭世英和同學發起「X詩社」，後經檢舉，被當局定為「反動集團」。成員多判勞改，郭本人也送往河南農場勞動教養。文革時，在北京農業大學被紅衛兵再將這件事翻出來，嚴刑拷打後跳樓身亡。

＊04 譯注：依其姊劉愛琴二○○八年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表示，劉允若死於一九七七年春節，死因為窒息性肺炎，肺部完全鈣化，應與其關押時所受對待有關。參見陳魯豫，《魯豫有約：名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

＊05 譯注：李敏先生孔令華之父為孔從洲，曾任職西北軍楊虎城轄下，參與過西安事變，於一九四六年率部轉投共產黨。

＊06 譯注：該學院正式名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後文均簡稱為「哈軍工」。

＊07 譯注：此處所舉例為「陳東平案」。陳東平為某軍區司令員之子，因病休學。因企圖與台灣國民黨聯繫遭截獲，後由中央軍委

總政治部調查此案，形成多份報告，詳述高幹子弟在哈軍工的表現，造成相當大的震動。

第四章　危機四伏（**1966－1971**）

＊01　譯注：就是指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在學政治、軍事、文化之餘，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辦一些中小型工廠，還要同時批判資產階級。該指示在文革中被奉為指導教育的圭臬。

＊02　譯注：此處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底發生於北京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由於受到鼓勵，大興出現殺地富分子的風潮，幾天內三百多人遭殺害，後經制止。康生孫女張力當時任大興團委書記。

＊03　譯注：除了「西糾」、「東糾」外，還有「海糾」，海淀分隊。

＊04　譯注：此處指當日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其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幹部向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文革支持者發起鬥爭，後來被稱為「二月逆流」。

＊05　譯注：此處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發生在北師大女附中批鬥大會中，副校長卞仲耘遭打死事件。卞仲耘為該校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由於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她即為最高負責人，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劉少奇的女兒劉亭亭、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均為該校紅衛兵成員。

＊06　譯注：楊曦光曾於文革時參加造反派「湖南省會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省無聯」，並寫〈中國往何處去〉一文，成為文革中擲地有聲的革命文章，也讓他繫獄十年。出獄

後改名楊小凱，獲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並成為經濟學者，可惜二○○四年因肺癌病逝澳洲。

＊07 編注：讓站立的被批鬥者長時間向前彎腰九十度、雙手往後平舉，做噴射機狀。

＊08 譯注：此處指林彪長女林曉霖，由於她是林彪前妻張梅所生，受葉群排斥，文革開始時她就讀哈軍工，公開發表演說反對打倒老幹部，和當時林彪執行毛澤東的造反路線背道而馳，後來被林彪送到新疆。

＊09 譯注：指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因在廬山舉行，稱之為「廬山會議」。

第五章　重整旗鼓（**1971－1976**）

＊01 譯注：原文為陳昊蘇，但陳昊蘇為陳毅長子，就年齡及經歷有些出入，經查應為陳毅最小的兒子陳小魯，其調入總參二部後，約於一九七五或一九七六年就讀南京外語學院。

＊02 譯注：章士釗之女章含之。

＊03 編注：喬松都在二○○八年出版的回憶錄《喬冠華和龔澎——我的父親母親》當中，否認了這個說法。

＊04 譯注：羅點點為了知道父母的下落和情況，寫信要給當時的中聯部部長耿飈。

＊05 譯注：指鋼琴家劉詩昆，但實際上他在一九六七年因為被打成反革命，為了不連累妻子葉向真和岳父葉劍英而辦理離婚。離婚後雙方仍維持良好關係，一九七三年他因為託請前來探望的葉向真轉交一封信給毛澤東而獲釋。

第六章　邁向接班（**1977－1989**）

＊01　譯注：劉源當年在參加競選時曾對多黨制表示肯定，並說對共產黨有好處。

＊02　譯注：習近平大學畢業後曾在時任國防部長的耿飈身邊當秘書。

＊03　譯注：原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文革期間曾為紅衛兵組織西城糾察隊，即「西糾」的發起人及負責人，於恢復高考後考取中國社科院研究生，畢業後曾擔任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

＊04　編注：指家門、校門、機關門。

＊05　譯注：依作者描述，該處所應該是「文津俱樂部」，實際上在一九五○年代後期成立，文革時關閉，後來再度開放，提供離退老幹部休閒娛樂。鄧小平及其他高層領導人亦曾多次前往該俱樂部打橋牌。

＊06　譯注：陳元原規畫接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但要先選上市委委員，在差額選舉下受黨代表抵制而落選。所謂另一位高幹子弟，似乎指的是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的弟弟李鐵林，他擔任東城區委書記時雖不是與陳元任西城區委書記同一時間，但也是在北京市得不到好的發展後，轉向中央機關任職。

＊07　譯注：此處所指為當時的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他對高幹子弟獲得特別關照和拔擢頗有微詞，當習任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並規畫要進入河北省省委常委之列時，遭到高揚反對。

＊08　譯注：作者原文為義子，而據傳，賀敬之之妻為王震義女，但難以考證，故調整如文。

＊09　譯注：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前妻，兩人後來離婚。

＊10 譯注：一九八五年九月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中有六十四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提出離退，同時還有三十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及三十七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亦離退。中共在中全會結束兩天後舉行全國代表大會進行增補選。

＊11 譯注：作者原指「七老」，但一般而言，在中共八○年代新老交替期間，普遍說法為「八老治國」，但確實是那八老則眾說紛紜，唯一般認為是：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薄一波、彭真、李先念、王震、鄧穎超。

＊12 編注：官倒指的是國家機關、團體、企業利用資源壟斷的權力投機牟取暴利的行動。

＊13 譯注：有傳言趙紫陽之子趙大軍倒賣彩電，但陶鑄之女陶斯亮曾於《炎黃春秋》二○一五年第二期撰文為其澄清。

＊14 譯注：陳同海後於二○○七年因涉嫌受賄去職，二○○九年經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15 譯注：此處指胡耀邦女兒李恆，即李滿妹，所嫁丈夫為劉曉江，後來升任為海軍上將。

＊16 譯注：栗前明，鄧小平妹妹鄧先群之夫，後升為中將。

＊17 譯注：賀平，總參裝備部少將，退役後進入保利集團，曾任董事長。

第七章　權力在望（**1989－2012**）

＊01 譯注：一九九五年王兵在深圳持槍挾持前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孫女婿陳顯旋一案。

＊02 譯注：此為遠華案，後來牽連甚廣，當時任總參情報部副部長的

姬鵬飛之子姬勝德，以及中央副主席劉華清之女劉超英都涉入。

＊03 譯注：這裡指的是戴晴及薛煒嘉所編《誰的長江：發展中的中國能否承擔三峽工程》中收錄的一篇文章，透露一九七五年八月颱風導致持續四天的大暴雨，河南駐馬店地區五十多座大小水壩一一潰壩，淹死八萬五千六百人，加上後來死於瘟疫和饑餓的二十三萬人，受災人口超過一千二百萬。

＊04 譯注：中共十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中，具太子黨背景的有俞正聲、賀國強、曾慶紅；上海幫背景者有曾慶紅、吳邦國、黃菊、賈慶林、李長春、陳良宇等。但其實具江系色彩者大有其人，而胡錦濤人馬有王兆國、劉雲山、王樂泉。習近平當時仍僅為中央委員，並未入選政治局委員。

＊05 譯注：汶川地震後，許多從事批評和調查的異議人士被中共以持有國家機密和顛覆國家政權等罪名下獄判刑。

第八章　習近平和習派人馬

＊01 譯注：康生以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及反黨為由，將參與審稿的習仲勛定罪。

＊02 譯注：此處應指其第二任妻子齊心，習仲勛第一任妻子為郝明珠。

＊03 譯注：此處所指為安子文的女兒，當時為胡耀邦兒子胡德平的妻子安黎，兩人後來仳離。

＊04 譯注：克勞戴爾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法國駐華外交官，同時也是一位擅於寫作劇作、散文和詩的作家，曾長期駐在福州，並出版過以福州為背景的劇作和散文。許多法國人透過他的

作品認識福州這個城市。

＊05 譯注：習近平與彭麗媛的女兒為習明澤，據說已於二○一四年自哈佛畢業返國，現在其父身邊幫忙。

＊06 編注：令計劃案起於一場北京的法拉利一死二重傷車禍，死者為其子令谷，據傳另兩名重傷者為女性，且三人皆「衣衫不整」。後來令計劃被查出為掩蓋這場車禍，與當時的政法系統負責人周永康做了某種政治約定，被以「受賄、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濫用職權」罪名調查，連帶與其往來、親近者也被徹查。令計劃於二○一六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第九章　權貴集團

＊01 譯注：王世英，曾任中央特科，負責情報工作，後擔任山西省省長、省委書記，文革時被鬥，一九六八年死亡。

＊02 編注：軍分區為省軍區（於省級行政區域設立的一級組織）內劃分的軍事區域設立的軍隊組織。

＊03 編注：吳法憲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之一。

＊04 譯注：喬冠華曾經在文革時期與四人幫親近，四人幫垮台後他曾受隔離審查，後來在其他領導人幫助下才勉強恢復工作。

＊05 編注：死緩為「死刑緩期執行」，適用於應當判處死刑但不需要立即執行的對象。在判決死刑後，得有緩期兩年，兩年內若被判刑者沒有故意犯罪，則罪刑減輕為無期徒刑；若刻意犯罪且查證屬實，則得以執行死刑。是中國特有的刑罰。

注釋

＊　下列部分資料為作者友人提供，但完稿時友人去世，其藏書不幸被清空，致使本書引用資料標示不全。繁中版編輯時已盡量核查、補全資訊，惜力有未逮，請讀者見諒。

前言

01　杜明，*Mao, sa cour et ses complots. Deririère les Murs rouges*, Pairs, Fayard, 2012。

02　羅宇，《告別總參謀部》，香港：開放出版社，2015。

03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 les nouveaux puissants de Chine*, Paris, L'Harmattan, 1999 ; *Who's Hu ? : Le Prèsident chinois Hu Jintao, sa politique et ses réseaux*, Paris, L'Harmattan, 2008 ; *Xi Jinping. La Chine rouge, nouvelle génération*, Paris, L'Harmattan, 2013.

第一章　烽火幼雛（**1921－1949**）

01　特別參考：Nora Wang, *Mao Zedong. Enfance et adolescence*, Paris, Autrement, 1999, p. 39 ；京夫子，《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3。

02　顧保孜，《紅牆秘聞》，廣州：廣州華城出版社，2004，頁419；王震宇，《在毛澤東身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134；*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4 March 2003；《人物周刊》，2009年9月14日。

03 李銀橋、韓桂馨，《毛澤東和他的衛士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207；張文秋，《張文秋回憶錄》，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頁215之後；石翔，《中國高幹子女沉浮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3。

04 作者不詳，《紅牆秘史》，北京：作家文學出版社，2004，頁36；石翔，前引書，頁3。這些資料幾乎未提及兩人在馬賽要前往蘇聯時曾短暫受阻，失去與蘇聯接頭方面的聯繫，隨後被康生重新接上。康生後來成為中共秘密警察頭子，他也是因為這件事得到毛澤東賞識而有後來的發展。還有一件事，他們在巴黎停留期間，曾經和所居住公寓的孩子們打架。這些可以參考：山嵐，《紅牆內的子女們》，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1998，頁6。

05 《百年潮》，2006年第1期，頁6。張文秋，前引書，頁220；杜魏華，《在蘇聯長大的紅色後代》，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頁71；石翔，前引書，頁4。

06 山嵐，前引書，頁18。

07 Geremie R. Barmé,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9, p. 54.

08 《百年潮》，2002年第6期，頁11；馬社香，《一個女革命者的歷史見證》，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139。

09 康生成為中國的秘密警察頭子。1950年代曾經歷短暫失勢，後來在文革期間盡全力爭取表現。

10 曾自在《百年潮》，2012年第5期，頁12，寫過一篇文章說明毛岸英如何和康生漸行漸遠。同時可參考王鶴濱，《在偉人身邊的日子》，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王力，《王力反思

錄》，香港：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頁227；《炎黃春秋》，2009年2月號，頁39。

11 毛澤東當時送給他一件黑色呢大衣：參考陳晉，《溫情毛澤東》，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頁29；何虎生，《毛澤東初進中南海》，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2008，頁400-401；李銀橋、韓桂馨，前引書，頁217以後。

12 董邊、譚德山、曾自，《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31；馬社香，前引書，頁146；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5卷《王洪文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452；另依照Marie Holzman及Bernard Debord，毛岸英曾以「恭謹有禮」的態度承魏京生父親之教，魏父曾經在中共游擊時期參與華東地區部隊，參考Marie Holzman, Bernard Debord, Wei Jingsheng, *un Chinois inflexible*, Paris, Bleu de Chine, 2005, p. 21。

13 《北京晚報》，2008年7月6日；張文秋，前引書，頁235。

14 實際上，毛澤東不能將毛岸英託付給林彪，因為林彪反對中國介入韓戰，並憤而拒絕帶兵。毛岸英當時就成為直接在彭德懷身邊的兩名機要其中一員。參考張曉，《紅色風雲》，北京：中國黨史出版社，2004，頁59以後。

15 師哲，《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386；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338。似乎美軍早已鎖定毛岸英，參考《故事報》，第870期。

16 參考王鶴濱，前引書，頁433以後；王行娟，《賀自珍的風雨人生》，2000，頁327-328。他們的兒孫在體格上也不好（毛新

宇，身材肥胖），不過倒是發展出一塊懷念毛澤東的市場。這個長相難看，腦子也不靈光的人，基本上卻是毛氏王朝具象徵意義的繼承人。

17 何頻、高新，《中國「太子黨」》，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頁357。

18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頁487。

19 Roger Faligot, Remi Kauffer, Kang Sheng, *le maître espion de Mao*, Paris, Tempus, 2014, p. 87.

20 一些例子可以參考《百年潮》，2014年第7期，頁30；《父輩的戰爭歲月》，湖南電視台，2009，頁113。

21 郭思敏、天羽，《我眼中的劉少奇》，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頁307；同時參考《百年潮》，2014年第7期，頁30。

22 《百年潮》，2014年第7期，頁30。一對政治人物夫妻，林楓夫婦，他們的孩子就沒辦法忘記當年被託付給人家的陰影；參考張黎明，《我的父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224。

23 石翔，前引書，頁184。

24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第一代領導核心的秘書們》，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頁226。

25 像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就是一例；參考于俊道，《生活中的劉少奇》，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頁51；另一個被虐待男孩子的例子，參考《紅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國開創者家事追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頁185。

26 楊君，《共和國部長檔案》，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8，頁593。

27 于俊道，前引書，頁50。

28 于石坪，《新太子黨》，香港：明鏡出版社，2010，頁344。

29 石翔，前引書，頁135。

30 有關於從蘇聯回到父母身邊的故事，參考第三章。相關不幸遭遇資料來源很多，如：杜魏華，前引書，頁117以後；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76-478；王光美，《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14；于俊道，前引書，頁106、124。

31 卓琳等著，《永遠的鄧小平》，成都：四川人民出社，2004，頁105。

32 相關案例可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268以後。

33 相關案例可參見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10卷《毛澤東的秘書們》，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頁253。

34 杜魏華，前引書，頁52。

35 有關命運乖舛的孫維世，可參考林利，《往事瑣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有關李鵬，參見石翔，前引書，頁105。

36 陳守信，《中南海記事》，北京：西苑出版社，2002，頁269。

37 《百年潮》，2009年第8期，頁63-66。

38 朱和平，《永久的記憶》，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童丹寧，《西花廳孩子們的懷念》，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頁211。另外可參考一篇完整的記述刊於《百年潮》，2015年第6期，頁34。

39 于石坪，前引書，頁24；劉紅慶，《左權——一團奔突的火》，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203及以後；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1。後來成為江澤民秘書的曾慶紅，是曾山和鄧六金所生的兒子，據說就在他母親開辦的幼兒園中，曾遇到過被以烈士遺孤收養而後來與他共事的劉延東。

40 有關延安托兒所的事，可特別參考石翔，前引書，頁338；高曉，《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2010，頁532；《父輩的戰爭歲月》，前引書，頁226。

41 在一些例子中，有一張照片可以讓我們看到鄧小平和劉伯承如何驕傲的讓大家看他們剛出生的孩子，王培、冷新宇、朱建邦、劉延兵，《紅色之戀》，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頁82。

42 楊聞宇、馬蕭蕭，《紅色婚姻檔案》，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頁64。

43 杜魏華，前引書，頁152。這份資料由於所述嚴謹和坦率，品質相當少見。

44 《紅黨秘史》（作者、出版者不詳），頁378。

45 1940年，周恩來曾經到莫斯科去討論如何在蘇德戰爭期間給予中共領導人留蘇兒女的法律保護問題，同前注，頁304。

46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漢口：南海出版社，1999，頁86。

47 杜魏華，前引書，頁258。有關於這兩個機構的歷史，參見《百年潮》，2006年第1期，頁16。

48 這段生活讓她留下深刻的記憶；參見朱敏，《我的父親朱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337。

49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頁235。

50 杜魏華，前引書，頁55。

51 李鵬後來成為總理，鄒家華成為副總理。同前注，頁423、644以後；《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頁43。

52 張黎明，前引書，書中多處均可看到相關記述。

53 杜魏華，前引書，頁59及頁157。

54 《湘潮》，第211期，頁14-17；羅點點，前引書，頁86。

55 王光美，前引書，頁104-105；同時請參考杜魏華，前引書，頁607。

56 同前注，頁79、159。

57 然而時任外交部長的陳毅，他兒子自殺的事直到隔年才知道，當初他就是希望他兒子盡可能留在蘇聯學習久一點。元帥聶榮臻也是如此對他的女兒。參見楊君，前引書，頁595。

58 其他的例子可以參考John Byron,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 Kang Sheng—The Evil Genius Behi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Simon & Schuster, 1992, p. 71。由於中共對於滿足共產國際派遣的德籍顧問李德需求，在長征期間幫他分配妻子的事隱而不提，中文資料有關這部分的記錄很少。

59 蘇多壽、劉勉玉，《曾山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398。她們各自以鮮明的性格而為人所知，參考林利，前引書，頁46。

60 筆記及口頭資料，北京，2006。

61 陳丹淮、葉葳葳，《三個新四軍女兵的多彩人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322。另一個發生在延安，後來順利解決的是

有關元帥羅榮桓妻子林月琴的例子，林月琴原以為陣亡的前夫（譯注：吳先恩，後授與中將軍銜），在她再婚後突然出現，後來由毛澤東問她個人意願，即便她前夫有漂亮的女性都由一方面軍獨占的怨言，最後仍然由她自由選擇。參閱蕭偉俐，《帥府家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232。還有一例，是有關在1950年代曾任共產主義青年團傑出領導人項南的父親（譯注：項與年，曾於中共央特科工作，後改名梁明德），因為與妻兒失去聯繫而再婚，隨後雖然團聚，但他的前妻自願放棄該段婚姻。參見胡少安，《敬畏人民》，香港：天地出版社，2004，頁101，另書中亦多處提及此事；另外類似的例子，參考劉曉農，《紅色愛情：中國革命前輩的婚戀故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頁77。我們可以想像，其他的例子中，問題可能不會那麼圓滿的解決，然而，資料來源不會強調這些不幸的例子。實際上，在那些年代，一個沒結婚的女人，在生理上（1949年前）或是在社會上（1949年後），都很難生存。

62 對待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孩子每個人的態度都不太相同，但表面上看來都還算好。態度寬厚的，張聞天（譯注：遵義會議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曾任駐蘇聯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廬山會議後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算是一個，態度較嚴厲的，或者是謹慎的，屬滕代遠（譯注：第一任鐵道部部長），他拒絕第一段包辦婚姻所出的長子，提出希望安排在北京工作的請求。參見《百年潮》，2010年第10期，頁75-76。另有關趙紫陽的部分，可以參考劉守森，《年輕時的趙紫陽》，香港：太平洋出版社，2006。這份資料來源顯示，由於趙紫陽在地下游擊組織中的地

位，使得當時組織內女性都對他有好感，對象多到難以選擇。

63 Hua Chang-ming,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t les communistes chinois en action*,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1981, p. 80.

64 例如楊聞宇、馬蕭蕭，前引書，頁97。

65 林利，前引書，頁57。而在此同時，李德和葉劍英的妻子卻適時的離開他們。參見Hua Chang-ming, op. cit., p. 109。

66 部分這些「女士們」還有著鮮明的個性。一些例子可參見朱鴻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256以後。

67 楊聞宇、馬蕭蕭，前引書，頁17以後；吳志菲、余瑋，《紅色之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頁33以後。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彭真妻子張潔清，也是出身自富裕家庭，家族中有一位十分聰穎的姑姑，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45。

68 當卓琳要求鄧即便在執行工作時都要給她寫信，鄧答說會讓秘書寫個底稿……顧保孜，前引書，頁134、137。同時亦可參見鄧小平，《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01；于俊道，前引書，頁48；卓琳，前引書，頁22。

69 葉永烈，《毛澤東的秘書們》，頁253。

70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95。

71 《老照片》，第30期，頁138以後；另請參考《百年潮》，2010年第3期，頁35。

72 Hua Chang-ming, op. cit., p. 101.

73 相關例子請參見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

社，2004，頁277。

74 江青被關押後，對李訥的指責和批評就轉變成為對她的依靠。另外我們可以參考書目中所列李敏的自傳；王鶴濱，前引書中的描述；以及李志綏的親身見聞，Li Zhisui, *La Vie privée du président Mao*, Paris, Plon, 1994。

75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317。

76 依據毛澤東侍衛長的話；Li Zhisui, op. cit., p. 200。

77 王鶴濱，前引書，頁440。

78 參見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213；王行娟，前引書，頁355；李銀橋、韓桂馨，前引書，頁243；《人物周刊》，2009年9月14日。

79 邸延生、邸江楠，《毛澤東和他的兒女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200；馬社香，前引書，頁240。

80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頁303。秦城監獄是關押文革政治犯和著名犯人的地方。參見杜明，*Chine*, l'archipel oublié, Paris, Fayard, 1992, passim。

81 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288；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3卷《江青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920。

82 盧弘，《紅太陽的影子》，香港：七星書社，2010，頁192；《人物周刊》，前引文章。

83 *Libération*, 9 septembre 2006.

第二章　權貴集團中的驕子（**1949－1957**）

01 于石坪，前引書，頁345；杜明, *Mao, Sa cour et Ses Complots*, Paris, Fayard, 2012, p. 80.

02 羅點點，在前引書中第10頁詳細敘述了她們家搬進北京的情形。李富春在瀋陽一下接收了一幢有著十幾個房間的房子。參見《百年潮》，2008年第11期，頁20-21；以及《二十一世紀》，第90期，頁7及以後；王凡、東平，《紅牆記憶》，2009，頁80。

03 杜明，op. cit. p. 12-18. Yang Xiguang, Susan Mac Fadden, *Captive spirits. Prisoners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ssim，描述一個湖南省領導人家庭所住的大宅院。

04 杜明，op. cit. p. 99 sqq.

05 邱會作把原本住在江西山裡的父母接來。陳毅也把在上海的父母和姊姊接來。參見陳丹淮、葉葳葳，前引書，頁59。

06 《二十一世紀》，第90期，頁6；李家驥、楊慶旺，《領袖身邊十三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483；鄧小平，前引書，頁133。

07 張云，《潘漢年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308。劉少奇也曾對他姊姊做過同樣的事。參見郭思敏、天羽，前引書，頁306。

08 吳志菲、余瑋，前引書，頁131、187；《父輩的戰爭歲月》，前引書。柯慶施1955年在上海時就曾經代為照顧過十個孩子，其中九個後來進入大學或是進修教育機構就讀，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國開創者家事追憶》，頁68。朱德和羅榮桓所住的才真叫群居生活，參見蕭偉俐，前引書，頁30、238；以及《中共黨

史資料》，第44期，頁86。

09 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頁59；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頁321。

10 康克清，《康克清回憶錄》，頁380；王凡、東平（2001），頁67。

11 另外像是賀龍也長期照顧二個在北京讀書的孩子。張黎明，前引書，頁91；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13；董保存，《走進懷仁堂》，上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277。

12 尹家民，《紅牆見證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頁776。膝下無子的彭德懷在1953年經過東北會見時任東北局二號人物的張秀山時，曾對他說：「你孩子那麼多，就給我一個吧。」張秀山的岳母當即表達不同意。

13 陳人康，《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271及以後。一旦不再有從屬關係，讓給收養的孩子生病時，情況就會變得複雜。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02。

14 張黎明，前引書，頁169。後來在1980年代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家中房舍，特別地開放，參見《老照片》，第42期，頁5。

15 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8月曾有一個慰問團到湘鄂西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參見張文秋，前引書，頁24。

16 《百年潮》，2014年10月，頁56。周恩來要等到1958年和1960年才接見由家鄉派來的代表團，和他們聊天時也確認了幾個出自同鄉的中共領導幹部，參見周秉德，前引書，頁88。周恩來從1953

年開始即承擔風險保持和出身地主的家鄉代表聯繫，她的妻子鄧穎超就近監看，參見張文和，《生活中的周恩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0，頁82及以後。根據可靠的資料來源，周恩來曾在1949到1976年間，投入36,645人民幣，平均一年約1,065元，幫助他的親戚，在當時，這是一筆可觀的數目。

17 當時的總理周恩來對於在財務上資助許多親戚沒有太多遲疑。對有些領導人也一樣會有所捐輸，有的是對出身的故鄉親戚難以割捨，有的是對游擊戰爭時曾經得到許多對革命幫助，且被認為是「落後」的地區心懷掛念，像是江西、湘東和陝北，對一些親近的友人也會不吝施以援手。

18 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21。

19 邸延生，《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頁525及以後 ；邸延生、邸江楠，前引書，頁183-184。

20 《湖南文史》，116期；《炎黃春秋》，2002年第1期，頁44。

21 王光美，前引書，頁146。

22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頁38。

23 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頁432。

24 張黎明，前引書，頁26；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公司，2005，頁121；王凡、東平，《紅牆往事》，頁93。

25 楊尚昆，前引書，頁99。

26 同前注，頁204；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北京：群眾出版社，2001，頁87。

27 同前注，頁74、95；王震宇，前引書，頁218及以後。

28 從1949年夏天開始，林月琴就將她所創建小學的學生帶到北戴河；參見羅東進，前引書，頁303。

29 杜明, op. cit. p. 96。

30 Paul Thorez, *Les Enfants Modèle* , Paris, Folio, 1983.

31 有關在北戴河度假的資料來源甚多，我們主要引用羅點點以詼諧筆調所回憶的內容。參見羅點點，前引書。

32 蘇多壽、劉勉玉，前引書，頁398及以後；羅東進，前引書，多處可見。

33 前述的學校……由毛澤東衛士長的太太擔任領導，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22。另有關「幹部子弟」學校，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46。

34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81。

35 同前注，頁210；高曉，《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頁53；蕭偉俐，前引書，頁299。

36 口述資料，北京，2005年12月；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86。

37 山嵐，前引書，頁255；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56。

38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前引書，頁112；陳人康，前引書，頁351。

39 杜魏華，前引書，頁54；馬社香，前引書，頁242；以及蕭偉俐，前引書，頁299。同時請參見，王凡、東平所著書中描述細

節，《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前引書，頁65-67及同作者（2011），頁314；吳志菲、余瑋，前引書，頁45；張黎明，前引書，頁403；蕭偉俐，前引書，頁295；卓琳等著，前引書，頁67；以及《百年潮》，2010年第10期，頁77。在張黎明，前引書，頁404中，我們看到滕代遠的長子長年住在鄉下，1950年抵達北京，一時之間在父母、城市和學校等環境改變下所遭遇到的一連串問題。

40 Marie Holzmam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31.

41 在1980年代甚有影響力的王震，他太太也曾經是一中的領導；參見李炎唐、蕭思科，《南樓往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頁118。

42 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141；《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19；以及《紅牆往事》，前引書，頁122。

43 在2000年以降，北京四中每年在「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全體會議及中共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期間約有二十幾個北京四中畢業的校友會一起聚會；參見于石坪，前引書，頁424，有關這些「老校友」的姓名，參見頁349。

44 有一位重要的老紅軍幹部就不得不持續花好幾年要求他的一個兒子，他的兒子由於早年收養家庭的苛待，使他到十六歲才完成小學學業，但他仍然在十二年之後得以進入大學就讀；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8；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322。

45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127。

46 Agnès Andrésy, op. cit., p. 29；口述資料，北京，2005、2006。

47 而這些資料中仍然還有一些不確定性，因為在其中包括有前幾段婚姻所出的子女、姪子、孫子、義子等，在資料中都被認定是後代。像是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的江華，在事後對他的記述中，對他前一段婚姻的一個孩子和最後婚姻所出的三個孩子，並未做出區別。參見《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26。

48 滕敘兗，《風雨彭門：彭德懷家風．家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115；蕭偉俐，前引書，頁86-87；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36。

4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06；于俊道、鄒洋，《鄧小平交往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頁42。

50 曾志（前引書，頁487）在她的回憶錄中就直言她沒有帶過孩子。

51 他為人所知的兒子是他第一次婚姻所出，他也很少照顧這個兒子，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把他的兒子推上青島領導的前端，但最後仍是徒勞無功。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139。另外，據我們所知，陳伯達曾有過許多妻子及情人，但卻只有一個兒子。

52 董邊、蔡阿松、譚德山，《我們的好大姐蔡暢》，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95。

53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73。

54 任弼時的孩子中有三個夭折、三個始終未找到。參見山嵐，前引

書，頁235。

55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43.

56 羅點點，前引書，多處可見；楊君，前引書，頁702。

57 在這裡我們選擇不將江青這個特例放進來，她早在1950年代就對毛澤東完全放任不管。有關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參見http://book.sina.com.cn，2006年4月19日所貼文章（此處要感謝蕭小紅女士的親切提點）（譯注：此處應指有關習近平母親齊心所著《我與習仲勛風雨相伴的55年》一書的節錄文章，但該連結已失效）。

58 Ross Terrill曾做過的一項分類，將這些妻子們分為「女皇」型和「保母」型的，來用外在的服從和溫馴做區分，我們一度深受啟發。參考Ross Terrill,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4。

59 像陳士渠在晚年就喜歡上一個女人，她的職業就是照顧他的護士……他的一個兒子在講述這位將軍的家史時，冷靜而不帶感情的提到這個傳聞。參見陳人康，前引書，頁357。

60 楊君，前引書，頁484，以及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124。有關楊尚昆之妻李伯釗，請參見邸延生，前引書，頁530；還有前面提到的楊尚昆日記。

61 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我們後面會再次提到，在1950年代時，還曾經被嚴格的調查過。參考王光美，前引書，頁393。當前的官方資料表示，這一連串調查和報復肇因於嚴慰冰曾寫過許多匿名信給林彪。

62 1956年召開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省代表團中，只有一位女性，還是省領導的妻子。《百年潮》，2009年第9期，頁42；董邊、蔡阿松、譚德山，前引書，頁80。

63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7，頁957。在許多高階將領家中，例如蕭華，妻子都必須放棄她們從以往革命時期叱吒風雲時就開始從事的工作。

64 羅東進，前引書，頁333。

65 吳志菲、余瑋，前引書，頁181。另一個工作職位是被安排和接受的例子是曾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江華的妻子，他在省委機關中為她增加了一些副手的職位，其他領導人就沒能有這麼大的自主權作這種安排；參見《老照片》，第22期，頁16及以後。

66 Stephanie Balme, Entre soi, *L'élite du pouvoir dans la Chine contemporine*, Paris, Fayard, 2004, p. 123；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266。

67 王培、冷新宇、朱建邦、劉延兵，前引書，頁20。當汪東興離開中央警衛局工作後，擔任江西省領導工作，其妻也隨同前往擔任省公安廳警衛局領導職；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78。

68 石瀾，《我與舒同四十年》，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148。

69 卓琳，前引書，頁31。

70 《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頁84。

71 《知情者說》，第三輯之4，頁183。

72 就像舒同和他的妻子就是。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

頁128、143；石瀾，前引書，頁252；滕敘兗，前引書，頁369。

73 許多太太們會相互交換一些避免懷孕的方法，但往往不見得都有效。羅榮桓和他太太就曾採取避孕措施，但仍生下一個意料之外的孩子；參見《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頁83及以後。

74 曾為中央統戰部負責人之一的金城，就是從1956年開始在自己家裡作飯。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33。

75 有些在1959年3月和1960年7月召開的聚會，可以參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會，2004，頁209。

76 他表示時語帶嘲諷：「高幹妻子的典型就是：高傲、多疑、氣量狹小。」參見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p. 31, 111。

77 吳鳴，《習近平傳》，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25；《中共黨史資料》，第44期，頁93；陳丹淮，前引書，頁43；水靜，《特殊的交往》，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5、175、220。

78 Joseph Esherick, “The Ye Family in New China”, in Jeremy Brown, Paul G. Pickowicz ed., *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26.

79 董邊、蔡阿松、譚德山，前引書，頁236-238；林利，前引書，頁111、161；聶力，前引書，頁191。

80 景玉川，《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158。

81 張黎明，前引書，頁12。

82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2012，前引書，頁266。

83 《湖南電視台》，前引書，頁36。

84 聶力，前引書，頁153。林彪後來休養了一年半，在文職工作中，陳雲和胡喬木當時工作最重。參見張聿溫，前引書，頁222；李夢汶，《生活中的陳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9，頁109；葉永烈，前引書，頁142。

85 戴茂林、趙曉光，前引書，頁326及以後；王光美，前引書，頁124。

86 于石坪，前引書，頁389。

87 李夢汶，前引書，頁109。

88 然而防範再嚴仍有疏失，1952年3月的某一天，劉少奇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女兒劉愛琴，就曾打電話給她一個在莫斯科認識的女性朋友，那位朋友的父親被放逐到莫斯科無法回國，她讓那位朋友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已經同意讓她父親回國的消息。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111。

89 依據劉少奇秘書的回憶。劉振德，《我為劉少奇當秘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32。

90 口述資料，北京，2005年1月；《回憶鄧子恢》編輯委員會，《回憶鄧子恢》，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71。

91 他女兒的結論是：「他很少向我們表達他的內心話。」參見《父輩的戰爭歲月》，前引書，頁69。

92 于石坪，前引書，頁253；蕭雲，《我的母親——長征中最小的女紅軍》，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頁285。

93 《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223。

94 同前注。

95 依據他妻子王光美的描述，王光美，前引書，頁95。

96 邸延生、邸江楠，前引書，頁194；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53；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274及以後。

97 《作家文摘》，2009年7月31日；張黎明，前引書，頁91；于石坪，前引書，頁346；朱敏，《我的父親朱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372。

98 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前引書，頁63；《父輩的戰爭歲月》，前引書，頁135。

99 一項資料來源是直接觀察，另一個來源則描述劉少奇的孩子被寵壞的行為表現。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239；郭思敏、天羽，前引書，頁281。

100 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和李敏長期和李銀橋及葉子龍女兒們維持著的關係。

101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81。

102 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14。

103 同前注，有關從蘇聯返回訪問團和他們帶回來禮物所引起的騷動，參見朱和平，前引書，頁14-15；周秉德（2008），前引書，頁21。在十幾年後，英式自行車和瑞士手表也陸續出現。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20。

104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45、277。

105 《百年潮》，2008年第8期，頁37。

106 陳丹淮，前引書，頁67、359。然而陳毅在有了三個兒子之後，還想再生一個女兒；同前注，頁50。

107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96。

108 于俊道，前引書，頁56；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204、210。

109 羅點點，前引書，多處可見。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107-108。

110 像是田家英的女兒和劉少奇的女兒之間就是。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26。

111 朱敏（2009），頁105-106；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04。

112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222；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4、211；于俊道，鄒洋，前引書，頁32。有關於小團體，最好的例子就是李敏、李訥，以及毛澤東主要秘書的兩個女兒，和周恩來所認養的女兒周秉德。參見周秉德（2006），前引書，頁21。

113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16；有關於陳小達以及他悲劇性的死亡，請參見下一章。

114 羅點點，前引書，頁159。

115 同前注，頁306；杜明, *Mao, sa cour et ses complots. Derrière les Murs rouges*, op. cit., pp. 96-97；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356。

第三章　是無知還是不能理解？（**1957—1965**）

01 參見杜明，*Mao, Sa cou...*, op. cit., p. 159 ；程華，《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頁235；山嵐，前引書，頁667；童丹寧，前引書，頁153；《百年潮》，

2010年第2期，頁43。薄一波和鄧小平的繪畫老師也同樣受到整肅。參見于俊道，前引書，頁56。

02 劉振德，前引書，頁82。

03 《文史參考》，2011年第9期和第11期；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18-219；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289；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81。

04 杜魏華，前引書，頁58-59。

05 Zhang Yi, Chen Weizhong, Huang Honglan，頁48-49。

06 陳守信，前引書，頁107及以後；蕭偉俐，前引書，頁103。

07 這也是為什麼毛澤東在1956年和1958年時會馬上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原因。

08 黃祖琳，《劉少奇家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51；陳人康，前引書，頁120-121；有關朱德家種菜的情形，請參見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79。

09 Geremie Barme, op. cit., p. 14.

10 李訥身體不好，是因為她曾經患過盲腸炎。當時正逢大躍進剛開始，毛澤東正在興頭上，在寫給她的信裡提到：「害病嚴重時，信心動盪，這是意志不堅決。」參見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前引書，頁67-68；李敏，《我的父親母親》，前引書，頁230；邸延生，前引書，頁785及以後。李敏在1960年冬天時也同樣生了一場病，參見Quan Yanchi, *Mao Intime*（原作著為權赤延，由Roger Darrobers譯為法文）, Paris, Editions du rocher, 1991, p. 187. 劉少奇的子女在那段時期也經歷過吃不飽的日子，參見余

瑋、吳志菲，前引書，頁9；許多其他領導幹部的孩子也都受到影響，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402。

11 當時的食物分配供應還分為三個等級：最高層領導人、正部級和副部級、辦公室主任及副主任。參見《炎黃春秋》，第7期，頁16。

12 張黎明，前引書，頁248。

13 山嵐，前引書，頁75。

14 水靜，前引書，頁244。

15 杜明, *Mao, Sa cour...*, op. cit., pp. 176-179, 232。

16 李志綏，前引書，頁365；邸江楠，前引書，頁215。

17 顧保孜，前引書，頁376。

18 于石坪，前引書。

19 許農合，《開國大將的晚年歲月》，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40；Zhang Yi, Chen Weizhong, Huang Honglan，頁59。

20 此處的主要資料來源取自羅瑞卿女兒羅點點的回憶錄，前引書，頁109及以後；有關郭民英，參見《百年潮》，2014年4月，頁57。

21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18。有關中國和古巴關係，參見Cheng Yenxiang, *Idylle sino-vubaine, trouble sino-soviétique*, Paris, Armand Colin, 1973。會和卡斯楚治下的古巴發生齟齬，源自於中共一意弧行的要反對莫斯科的修正主義。

22 林利，前引書，頁156-157。

23 蕭偉俐，前引書，頁41；朱敏，《我的父親朱德》，前引書，頁56-57。蔡博所遭受的政治打擊也說明他到鞍山鋼鐵廠後可能和

人處得不太融洽。

24 1950年，陳伯達娶了第三任妻子，他的私生活雖然被其他領導人家庭看不太起，但他卻是毛澤東所倚重的人。參見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10卷《毛澤東的秘書們》，前引書，頁182、188。

25 陳曉農，前引書，頁185及以後；《紅牆秘史》，前引書，頁378；杜魏華，前引書，頁449。

26 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33、143、281、288；杜魏華，前引書，頁142；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78；黃祖琳，前引書，頁251及以後；王凡，《知情者說》，第3輯，第7冊，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109；王光美、劉源，《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25。

27 杜魏華，前引書，頁117及以後；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76；黃祖琳，前引書，頁240及以後；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185；劉振德，前引書，頁310；王光美，前引書，頁109及以後。我們後來在《百年潮》，2013年第6期，頁10-12發現一篇文章，提到一位技術人員曾於1956年在某個蘇聯的工業城市碰到過劉允斌。依作者認為，劉允斌是真的「熱愛祖國，關心國內發展」。

28 顯然家人對他的關心照顧甚微。有關劉允若的情形引自劉振德，前引書，頁302-303；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80及以後；特別是于俊道，前引書，頁107以後、124。其他資料來源有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300以後、341以後；王凡、東

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20-121；王光美，前引書，頁114；Ross Terrill, op. cit., p. 256.

29 也因此在1961年冬季，當時的福建省委書記葉飛曾熱情的接待過上海和江西的省委書記。參見水靜，前引書，頁284。

30 杜明，*Mao, Sa cour…*, op. cit., pp. 280-281；于石坪，前引書，頁385。

31 張佐良，《周恩來最後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19。

32 可以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62所舉的例子。

33 《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60；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51；Juang Chang, *Wild Swans : Three Daugters of China*, Anchor Books, 1992, p. 227；水靜，前引書，頁256。

34 像是河南省第二書記就是如此。參見《老照片》，第53期，頁106及以後。

35 康克清，前引書，頁455；劉振德，前引書，頁173及以後；王光美，前引書，頁236就曾提及劉少奇的姊姊就在收到救濟金後買了肉和糖吃，因為不能消化而死。張震的母親也在之後死於營養不良。參見于石坪，前引書。我們在一些調查中可以看到其他例子：吳法憲，前引書，頁11；陳丕顯，《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陳丕顯回憶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229及以後。

36 焦燁，《葉群之謎》，香港：天地圖書，1994，頁42、256。葉劍英和一些其他的領導人曾經聯繫被分發到較貧困地區的幹部，

請他們幫忙找工資較低的家事服務人員。參見陳丹淮，前引書，頁359。

37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11。

38 危仁晟，《鄧小平在江西的日子》，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119。我們在這裡可以再列出幾位依靠著他們丈夫條件而獲高職的女性：胡明，薄一波之妻，任第二輕工業部局長；姚湘娥，汪東興之妻，任中央警衛團副處長；楊其慶的妻子則任公安部部長辦公室主任；胡敏，邱會作之妻，任其夫辦公室主任。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5；鄔吉成，《紅色警衛》，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頁179；劉星宜，《楊奇清傳》，北京：群眾出版社，2006，頁444；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林彪秘書回憶錄》，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頁68-69。

39 而她們聚在一起最大的事就是想辦法促成剛失去妻子的陳子華再婚。水靜，前引書，頁301。

40 蕭偉俐，前引書，頁45。

41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122；張黎明，前引書，頁6；《百年潮》，2014年7月，頁31；陳昊蘇、陳小魯、陳丹淮、陳珊珊，《回憶父親陳毅》，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頁102；Wang Zhongfang, Forged in Purgatory, Lexington, Pamir Holding International, 2011, p. 270；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28。

42 蕭偉俐，前引書，頁5；顧保孜，前引書，頁376。

43 王行娟，前引書，頁385。王在之前就曾詳細了解過新郎的家庭背景。參見陳晉，前引書，頁5。

44 《中華兒女》，1991年第1期；杜明, *Mao, Sa cour...*, op. cit., pp. 302-303。

45 蕭雲，前引書，頁295；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胡耀邦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頁329。

46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64。

47 張黎明，前引書，頁209；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51、364。有關林彪和江青為了他們的女兒所進行的活動，請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22。不管是不是正常情況，胡耀邦的三個兒子分別進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就讀，參見滿妹，前引書，頁165。

48 Sergo Beria, *Beria mon père. Au cœur du pouvoir stalinien*, Paris, Plon, 1999, p. 65 ;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e, le cœur du tsar rouge*, Editions des Syrtes, 2005, p. 540.

49 張黎明，前引書，頁206。

50 曾任重要省份四川省省委書記的李井泉也將他的三個兒子送進清華，就讀工程、物理和無線電專業，參見張黎明，前注，頁81、240。我們另外還找到一些補充資料，參見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96；《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60；陳丹淮，前引書，頁363。

51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蕭偉俐，前引書，頁236。

52 張黎明，前引書，頁51；口述資料，北京，2005年6月。

53 于石坪，前引書，頁216。

54 同前注，頁29；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2。

55 《百年潮》，2013年第10期，頁30及以後。

56 蕭偉俐，前引書，頁228；于石坪，前引書，頁425；《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71。

57 張黎明，前引書，頁170

58 這個小故事是由朱德的兒子透露。朱和平，前引書，頁75。

59 最後這一段文字所述來自於一份熟悉哈軍工的人所記述的內容，由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蕭小紅告知，我們對此衷心感謝。另外相關描述也可以參見陳昊蘇、陳小魯、陳丹淮、陳珊珊，前引書，頁29；而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俞正聲，也曾經於1963年進入哈軍工就讀。

60 這裡所透露的所有情形，楊尚昆都記載在他的私人日記中，見楊尚昆，前引書，第二冊，頁132；有關劉少奇的部分，參見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321及以後。

61 張黎明，前引書，頁225；《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10。

62 參見王光美，前引書，頁199；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114。有關其他領導人，也請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63；水靜，前引書，頁217；石翔，前引書，頁257。羅瑞卿在他的長子從外放工作的新疆回家時，請全家到最好的北京烤鴨餐廳吃飯，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75。

63 張黎明，前引書，頁202；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48-349。

64 《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38；楊尚昆，前引書，頁662。

65 于若木，《陳雲家風》，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頁103；蕭偉俐，前引書，頁287。

66 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68。這麼作只是更讓這些年輕人對電影更感興趣——另外也導致楊尚昆其中一個兒子日後選擇攝影作為職業。

67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73及以後。

68 羅點點，前引書。後來知道陶鑄的女兒曾經和一位飛行員有過一些交往。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22。

69 黃祖琳，前引書，頁279-284；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361-362；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5。不同的資料來源對於毛澤東當時的態度的說法有些出入，參見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114。

70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22。

71 焦燁，前引書，頁59-60。

72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3。

73 《中華兒女》，1991年第1期；何頻、高新，前引書，頁559。

7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13。

75 王光美，前引書，頁341。

76 而被提到的毛遠新就一下之間突然知名度大增。當毛遠新1965年自哈軍工畢業時，跟隨林彪左右的吳法憲安排他任高司參謀——然而毛卻要求他到偏遠的雲南從一名普通的士兵作起。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頁1263；馬社香，前引書，頁364及以後；閻長貴、王廣宇，前引書，頁318；《百年潮》，2008年第1期，頁76及以後。

77 逄先知、金沖及，前引書，頁833；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前引書，頁31；王凡、東平，《紅牆童話》，前引書，頁15；王凡、東平，《紅牆童話》（2011），前引書，頁362；王鶴濱，前引書，頁444。

78 李志綏，前引書，頁26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前引書，頁1202及以後；李敏（2011），前引書，頁261。

79 董邊、蔡阿松、譚德山，前引書，頁29-31；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前引書，頁289。

80 朱和平，前引書，頁162。

81 《百年潮》，2003年8月，頁33。

第四章　危機四伏（**1966－1971**）

01 《黨史博覽》，2003年11月，頁10。

02 《老照片》，第42期，頁6；《口述歷史》，第1期，頁138；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p. 124-125.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p. 59-60 已經提到曾經在高幹子弟就讀的中學就出現過一次紅衛兵活動，支持姚文元的所發表的文章，批評北京市政府機關和文化。另外一方面，有資料顯示，1963年時也曾經有畢業學生因為拒絕工作分配在以「階級鬥爭」為名抗議；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前引書，頁354。

03 他們的父親中，除了我們所熟知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外，薄一波任

副總理，孔原任中調部部長，董必武是國家副主席，陳毅為外交部部長。

04 諷刺的是，在那天以後，宋彬彬這個名字就再也不見人提起，而改為毛澤東建議的「宋要武」（意味著要在對付向她父親一般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中取得勝利，她父親宋任窮當時和劉少奇交情極佳。吳鳴，前引書，頁37；《百年潮》，2010年第11期，頁46-50；Song Yongyi, *Les Massacres d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Paris, Buchet Chastel, 2008, p. 47.

05 這件事被1979年6月的《北京之春》雜誌揭露。

06 于石坪，前引書，頁312；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71。

07 同前注。

08 至於「聯動」的其他領導人，請參見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82。

0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72；顧保孜，前引書，頁16。根據另一份資料顯示，只有137人被關押；參見吳法憲，前引書，頁614；王力，前引書，頁862、866。

10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86；顧保孜、董保存、尹家民，《特寫中南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783；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頁63；席宣、金春明，前引書，頁118。稍後河南省領導人也被批評有類似的做法；參見《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41。

11 《炎黃春秋》，2011年第7期，頁22。福建省軍區負責人葉飛的女兒就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參見王力，前引

書，頁719。河北一個有名組織中二十七位領導人的兒子曾在1967年1月極有勇氣的揭批江青。資料來源為蕭小紅女士提供。

12 于石坪，前引書，頁351；石翔，前引書，頁123。

13 武光，前引書，頁88。

14 石翔，前引書，頁24。楊曦光是最出眾的紅衛兵之一，他將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推演得最深入。他的所有經歷，包括那段後來被勞改的日子，可見Yang Xiguang and Susan Mac Fadden, op. cit. 一書。王光美、劉源，前引書，頁187。

15 李原，《只唯實——閻紅彥上將往事追蹤》，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286。但是這樣仍然不能阻止他們父親的自殺。

16 例如就曾有傳聞指出，現任政治局委員，且為中國政界如女性中職務最高的劉延東，就曾揭批她的父親，時任農業部副部長的劉瑞龍。

17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kin,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p. 40.

1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87。

19 Wang Meng, *Le papillon*, Pékin, Littérature chinoise, 1984, pp. 112-113.

20 京夫子，《中南海恩仇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259。

21 Ross Terrill, op. cit., p. 150.

22 《中共黨史資料》，2000年第6期，就舉出一例記述老將們一起吃飯的場景。同時參見劉振德，前引書，頁319。1967年4月時，當元帥徐向前家被抄後，他也被邀到西山暫住。參見徐向前，

《歷史的回顧》，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681。

23 許農和，前引書，頁5及以後；康克清，前引書，頁473。

2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187-189；京夫子，《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250、449。

25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Hi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p. 532.

26 杜明，*Mao, sa cour et ses complots. Derrière les Murs rouges*, op. cit., p. 316；朱敏，《我的父親朱德》，前引書，頁291。

27 同前注。

2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561。

29 李志綏，前引書，頁491。

30 顧保孜，前引書，頁125及以後；陳晉，前引書，頁6。

31 鄧榕，前引書，頁43及以後。有關由劉少奇前服務人員所述劉被迫害的經過，請參見王光美，前引書，頁418。

32 《北京青年報》，2004年8月20日。相關迫害使譚震林的妻子幾致半瘋，參見顧保孜、董保存、尹家民，前引書，頁786。

33 于石坪，前引書，頁168。

34 滿妹，前引書，頁18；張黎明，前引書，頁254。舒同的房子也在他被揭發後被給了別人，參見石瀾，前引書，頁196-197。

35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前引書，頁189。蕭華住到旅店裡去此舉，後來給他帶來不少麻煩，參見蕭雲，前引書，頁362。

36 魯彤、馮來剛，《劉少奇在建國後的二十年》，瀋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頁437。

37 有關譚震林孩子們的情形，參見朱和平，前引書，頁182；有關鄧小平子女，參見石翔，前引書，頁163。在許多例子裡，父母仍繼續住在中南海，而子女卻被趕了出去，鄧小平和他妻子1967-1968年就仍被留在中南海生活，而身邊卻沒有服務人員或子女，參見于俊道，前引書，頁181。

38 《百年潮》，2008年第10期，頁34。

39 這樣他們就接續了父親那一輩的關係，參見牛漢、季羨林，《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頁6；陳丕顯，前引書，頁152及以後。

40 2005年1月在北京蒐集到的資料；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51。這段經過最後促成賀龍的女兒嫁給廖承志次子，成就一段佳話，同前注。

41 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後來偷渡緬甸時在邊界被捕，監禁兩年，同前注，頁481。

42 同前注，頁682；石翔，前引書，頁223-224。

43 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前引書。頁562。

44 石翔，前引書，頁70；蕭偉俐，前引書，頁351；陳人康，前引書，頁20；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67；張黎明，前引書，頁93；朱和平，前引書，頁182；《百年潮》，2008年第10期，頁33及以後；羅點點，前引書，頁271；*Financial Times*, 22 July 2012。有關另一個勞改營的情形，參見朱和平，前引書，頁182；另外有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鎮壓手段的演變情形，參見杜明，*Chine, l'archipel oublié, Paris, Fayard*, 1992, p. 259。

45 《中共黨史資料》，2009年第10期。

46 像是彭真的兒子隨後就成為一名小幹部，還有羅瑞卿的三個孩子也是，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49-350；另外幾例可參見前注，頁436；羅點點，前引書，頁271；于若木，前引書，頁44。

47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pp. 112-113.

48 像喬冠華女兒的例子，參見劉愛琴，《我的父親母親》，前引書，頁181。

49 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例子，參見王凡，《知情者說第三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192及以後。

50 石翔，前引書，頁349-350。這股投向現代化武器和先進軍事工業領域的潮流是延續自1950年代末那陣熱潮，參見杜明，*Mao, sa cour...*, op. cit., p. 367。

51 Michel Bonnin, *Génération perdue—Le mouvement d'envoi des jeunes instruits à la campagne en Chine*, Paris, Editions de l'Ecome des haute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4, p. 39 et p. 231.

52 《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17。有關彭真兒女流離四散的情形，參見余瑋、吳志菲，前引書，頁8。

53 Agnès Andrés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78.

5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56-257。薄一波的所有兒子都曾有一陣子被關押過，同前注，頁666。

55 同前注，頁435、495。

56 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127。

57 參見聶榮臻女兒聶力的回憶錄，前引書，頁344。

58 劉少奇被下放的子女都曾收到過對他們表達同情的匿名信。參見王光美、劉源，前引書，頁208。

59 劉金田，《圖說陳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8，頁149。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前引書，頁135。

60 危仁晟，前引書，頁126及以後；Ezra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51；《百年潮》，2003年第1期，頁47。

61 《百年潮》，2012年第6期，頁68；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10卷《毛澤東的秘書們》，前引書，頁213；張黎明，前引書，頁88。

62 王光美、劉源，前引書，頁208。

63 John Woodruff, *Chin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pp. 142-143.

64 石翔，前引書，頁265；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67。其他類似的例子，請參見Zhang Yi, Chen Weizhong, Huang Honglan，頁65；于石坪，前引書，頁207、455；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207；于若木，前引書，頁63。

65 石翔，前引書，頁265；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67。有關劉少奇家人們掙扎求生的經歷，參見王光美、劉源，前引書，頁208。其他類似的例子，請參見Zhang Yi, Chen Weizhong, Huang Honglan，前引書，頁65；于石坪，前引書，頁207及455；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207；于若木，前引書，頁63。

66 《炎黃春秋》，2012年第5期，頁78。

67 祝庭勛，《李德生在動亂歲月：從軍長到中央副主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頁109；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前引書，頁550；江波、黎青，《林彪1959年以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頁321。有關邱會作長子婚姻的政治安排，參見邱會作，前引書，頁591。他認為黃永勝的太太操作要讓他兒子娶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參見焦燁，前引書，頁223-228。

68 還有邱會作的一個兒子，因為攀爬中南海的圍牆而被眾人議論。參見李作鵬，（2011），前引書，頁692；鄔吉成、王凡，《紅牆警衛》，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頁236；《炎黃春秋》，2013年第9期，頁39、43。

69 參見杜明，*Mao, sa cour...*, op. cit。

70 鄔吉成、王凡，前引書。頁124及以後；《百年潮》，2004年第12期，頁34及以後，以及2008年第12期，頁33。

71 董保存，《走進懷仁堂》，前引書，頁304-305。

72 有關兩人的事情應該不會是空穴來風，有關情形在焦燁（前引書）中多處可見。

73 石翔，前引書，頁388及以後；羅點點，前引書，頁159、287；邱會作，前引書，頁805；焦燁，前引書，頁259及以後；以及杜明，*Mao, sa cour...*, op. cit., p. 461。

74 Jung Chang, Jon Halliday, op. cit., p. 577；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243。

75 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前引書，頁662及以後；少華、游胡，《林彪的這一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392；吳法憲，前引書，頁709及頁768以後。

76 吳法憲，前引書，頁768及以後；石翔，前引書，頁341及以後。

77 尹家民，前引書，頁862及以後。

第五章　重整旗鼓（**1971－1976**）

01 Marie Holzman,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125.

02 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北京：華文出版社，2002，頁343。

03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前引書，頁522。

0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5及以後。

05 《老照片》，第42期，頁7；《炎黃春秋》，2008年第9期，頁36及以後。

06 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140；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5。

07 石翔，前引書，頁293；滿妹，前引書，頁165。

08 一個有關王震對張聞天提供協助的具體事例，請參見《今古傳奇》，2004，頁196；王林育，《張聞天與劉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242；劉英，《我與張聞天命運與共的歷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263；有關胡耀邦的作為，請參見《百年潮》，2008年第9期，頁36及以後。

09 杜明，*Mao, sa cour...*, op. cit., pp. 384-386。劉復之在他自己的回憶錄人記載著有關公安機關沿革的重要細節，參見劉復之，《劉復之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

10 例如任弼時的長女，參見羅點點，前引書，頁298；京夫子，《中南海恩仇錄》，前引書，頁428；王光美、劉源，前引書，

頁210及以後；伍修權，《伍修權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頁313；于若木，前引書，頁77；《百年潮》，2008年第10期，頁24。

11 有關賀龍的兒女探視他們媽媽的情形，請參見石翔，前引書，頁224；而習仲勛獲得探視的過程，請參見《百年潮》，2008年第10期，頁8。有關任弼時女兒之事，參見前注，頁138-139。

12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 166.

13 林利，《往事瑣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129。

14 王稼祥和高崗兒子也就此不知所蹤，參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

15 引自S. Balme, op. cit. p. 17；陳丕顯，前引書，頁252及以後，描述他的孩子為了爭取讓他獲釋和平反的漫長過程。

16 張耀祠，《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前引書，頁212。

17 左派的有謝富治，靠右的這一邊有曾山和陳正人。

18 王年一，前引書，頁377及以後。

19 山嵐，前引書，頁75。

20 李志綏，前引書，頁599。

21 張佐良，前引書，頁243。

22 張黎明，前引書，頁209。

23 陳丹淮，前引書，頁128；張黎明，前引書，頁171；王昊、王紀一，前引書，頁48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論——從遵

義會議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41。

24 沈葵，《王稼祥家事、情感、品格》，濟南：濟南出版社，2001，頁191；范碩，前引書，頁609；《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頁48；朱和平，前引書，頁245。之後在301醫院住院的老將之間發展出一項真正屬於他們的活動。

25 Marie Holzman,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155.

26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21及以後

27 曾志，前引書，頁511。

28 鄧榕，前引書，頁124、178；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72、496；于石坪，前引書，頁211。

29 朱和平，前引書，頁225；吳法憲，前引書，頁708及以後。

30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37。

31 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6卷《姚文元傳》，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413。

32 石翔，前引書，頁269。

33 在1976年4月的事件隔日，他寫給他兒子：「我曾經親眼看過在匈牙利發生過同樣的事。」參見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4卷《張春橋傳》，前引書，頁342。

34 《百年潮》，2004年第6期，頁19；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頁119。

35 董保存，《知情者說》，第3輯之8，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頁265。這種朋友之間互相幫忙安插工作的做法，是權貴集團重整旗鼓和太子黨之間彼此認同重要因素之一，值得一書。

36 Ezra Vogel, op. cit., p. 56；羅東進，前引書，頁358；陳丹淮、葉葳葳，前引書，頁133。

37 《故事報》，第846期，頁5；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頁536。

3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6。

39 于石坪，前引書，頁266。

40 高曉，前引書，頁172。

41 《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頁47。

42 羅點點，前引書，頁296-297。

43 《炎黃春秋》，2011年第4期，頁48。

44 于石坪，前引書，頁384-385；山嵐，前引書，頁314、388；石翔，前引書；蕭偉俐，前引書，頁254；顧保孜、董保存、尹家民，前引書，頁819；《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78；張黎明，前引書，頁171；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11、209、351、395；鄧榕，前引書，頁195。

45 《紅星照耀的家庭》，前引書，頁178。

46 鄧榕，前引書，頁195；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23。

47 Marie Holzman, Bernard Debord, op. cit., p. 139；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74。

48 杜魏華，前引書，頁668。

4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95。

50 同前注，頁395、209。

51 有關李敏，參見李敏，前引書，頁302；李穎、程美東，《與毛澤東一起感受歷史》，第2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269-270；有關李訥，參見馬社香，前引書，頁240；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前引書，頁289；徐景賢，前引書，頁110。

52 石翔，前引書，頁376。

53 山嵐，前引書，頁75；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11卷《葉永烈採訪手記》，前引書，頁316。

54 陳丕顯，前引書，頁252及以後；朱和平，前引書，頁273；石翔，前引書，頁216；高文謙，《晚年周恩來》，前引書，頁512。

55 鄧小平，前引書，頁152。

56 范碩，前引書，頁609。

57 朱玉、程振聲、何光耀，《李先念的非常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221。

58 《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頁4。熊向暉的兒子同樣也參與其中。

59 同前注，頁6。

60 劉金田，前引書，頁160。

61 陳丕顯，前引書，頁298；鄧榕，前引書，頁440。

62 《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頁94。

63 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26。

64 葉永烈，《葉永烈紀實文集》第2卷《反右派始末》，前引書，頁352。

65 于石坪，前引書，頁163。

第六章　邁向接班（**1977－1989**）

01 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12、70。

02 同前注，見書中各處，尤其是鄧樸方曾在1980年及1981年兩度前往加拿大接受手術。手術雖然沒有成功，但也使傷害的惡化不再繼續，也讓他看到了西方的先進。參見石翔，前引書，頁144-145。

03 這些平反都需要經過老練的操作，透過不少的客套往來才能達成。例如楊尚昆和他妻子就曾經慎重的去拜訪胡耀邦，對他的出手相助表達感謝。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彭真回復權力時曾有約百名高幹向他致意。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40。

04 在這裡工作時，他女兒從旁協助。高曉，前引書，頁189及以後；《百年潮》，2014年第5期，頁29。

05 依據傅高義（Ezra Vogel）表示，上山下鄉運動中有1,700萬青年被送往農村，在1979年以前只有700萬獲准返回城市，也就是高幹子弟才有的特權。

06 于石坪，前引書，頁229。值得注意的是高幹子弟間會互相幫忙找工作。

07 然而，依據資料（這是個特例），實際上雙方私下衝突仍延續到1986年或是1989年。

08 同前注，頁190-194、453-454。

09 Ezra Vogel, op. cit., p. 206.

10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520。

11 同前注，于石坪，前引書，頁75及以後，及頁269；石翔，前引書，頁73。

12 John Woodruff, op. cit., p. 132; Marie Holzman, *Avec les chinois*, Paris, Flammarion, 1981, p. 23.

13 于石坪，前引書，頁79；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97。

14 于石坪，前引書，頁30；盧弘，前引書，頁192；顧保孜，《紅牆秘聞》，前引書，頁96及以後；《百年潮》，2009年第10期，頁48。

15 于石坪，前引書，頁205-206。

16 湖南電視台，前引書；尹家民，前引書，頁239；許農合，前引書，頁138。

17 *Financial Times*, 21-22 July, 2012. 谷開來因為殺害一名成為她先生絆腳石的英國人而名噪一時，後來在2012年8月被判死緩。

18 私人提供記憶內容，昆明，1978年7月。

19 Ezra Vogel, op. cit., p. 221.

20 Ibid, p. 266, 218; 私人提供資料。

21 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32；私人於北京出差時的記憶內容，1978-1981年。

22 杜明與 Philipe Richer, *La Chine*, Paris, Seuil, 1995, p. 412.

23 David S. G. Goodman, *Beijing Street Voices*,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1981, p. 151; 私人提供記憶內容。最好的見證是Marie Holzman, *Avec les Chinois*, op. cit。由於Claude Widor 將所蒐集到的文件和報導集結出版（1989），使得中國通們得以窺見在運動中的多種面貌。

24 這在1979年被貼出的一篇大字報內容所揭露，這篇大字報被蒐集進了 Victor Sidane, *Le Primtemps de Pékin : Oppositions*

démocratiques en Chine, novembre 1978-mars 1980, Paris, Callimard, 1980, pp. 235-236。

25 Zhang Lijia, Calum MacLeod, *China remembers*, Oxfore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16-218.

26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op. cit. 魏京生的父親魏梓林曾是新四軍備受敬重的幹部，但後來在中國民航卻因為不知道保護自己而失去了副局長的職位。他的職位不過是中高階，他家卻仍享有權貴集團所有的好處，尤其是教育安排上。

27 Ezra Vogel, op. cit., p. 229, p. 248.

2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86。

29 于石坪，前引書，頁79。

30 于若木，前引書，頁86；石翔，前引書，頁117、124；何頻、高新，前引書，頁521。

31 于石坪，前引書，頁81；*Financial Times*, 14 November, 2012.

32 蕭偉俐，前引書，頁186、300；黃祖琳，前引書，頁298；于石坪，前引書，頁148；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95。劉少奇的長女在美國食品產業工作，次女在中國參與一家企業的籌備工作，參見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56-57.

33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16。

34 同前注，頁305。

35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13 November, 2013; John Woodruff, op. cit., p. 139.

36 水靜，前引書，頁250。

37 于石坪，前引書，頁306。孔丹剛開始工作時是當時在經濟事務

方面極有權力的張勁夫身邊擔任秘書，在這段期間所獲得的經驗在後來他到私人企業工作時幫助極大。

38 杜明與蕭小紅， *Les Nouvelles sources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première Chine populaire» (1949-1976) : bilan provisoire,* «Qestions de recherche», CERI, n°37, septembre 2011. 饒漱石的女兒是在撰寫一本有關劉少奇的回憶錄時，才得知其父死於獄中的確切日期。

39 我們在陳丹淮、葉葳葳所著書中找到許多例子，參見陳丹淮、葉葳葳，前引書，頁265、383；有關前往中共視為革命聖地的參訪情況，參見水靜，前引書，頁268；師哲，《中蘇關係見證錄》，北京：當代出版社，2005，頁59；《江華傳》編委員會，2007，頁344。

40 John Woodruff, op. cit., p. 128。

41 王光美、劉源，前引書，頁89。

42 周秉德，前引書，頁71。

43 但隨後卻舉辦了另一場追思會，參見《百年潮》，2014年第10期，頁72-73；同前注，頁314。

44 湖南電視台，前引書，頁17。

45 同前注，頁26。

46 參見何頻和高新的分析，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48，他們強調鄧對習近平之父習仲勛的疏遠。另一個事情常被大家忽略，就是鄧小平和陳雲曾否決胡耀邦撤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建議，這個建議有可能會引發當地的動盪，同前注，頁36。

47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55.

48 Ibid., p. 52; Kerry Brown, op. cit., p. 17.

49 可以在曾任司法部部長劉復之的著作中找到具體的案例，參見劉復之，前引書，頁334。

50 Mathieu Duchâtel et Joris Zylberman, *Les nouveaux communistes chinois*, Paris, Albin Michel, 2012, p. 42.

51 Ezra Vogel, op. cit., p. 355.

52 石翔，前引書，頁105-106。

53 同前注，頁313。

54 同前注，頁232及以後。

55 同前注，頁399。

56 滕敘兗，前引書，頁20；石翔，前引書，頁339；*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 October, 2010.

57 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140。

58 于石坪，前引書，頁89；石翔，前引書，頁77及以後；陳昊蘇、陳丹淮、陳小魯、陳珊珊，前引書，頁9。

59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60. 有關陳昊蘇，請參考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23。

60 Ezra Vogel, op. cit., p. 565.

61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84。

62 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338；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30。

63 所指為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彭真、薄一波、王震。

64 同前注，頁140-141。

65 同前注，頁128-129。

66 *Voice of America*, 8 March 2013; *Le Monde*, 23 Janvier 2014.

67 有關案例可參見John Woodruff, op. cit., p. 139; 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Routledge, 2006, pp. 275-276。

68 Jean-Philipe Béja, Michel Bonnin, Alain Peyraube,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ékin*, Paris, Gallimard, 1991, p. 62.

69 1979-1989年於中國旅行的個人回憶內容。

70 個人回憶內容，北京，1988年6月。

71 石翔，前引書，頁218。

72 《作家文摘》，2009年7月31日。

73 高曉，前引書，頁548。

74 於1980年於中國出差時所蒐集到的許多佐證，均說明了相關情況。

75 例如熊向暉，曾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就是個熟稔政治的情報頭子，以及擔任副總經理的米國鈞（那時孔原的兒子孔丹正扮演重要角色），和在榮毅仁之後接掌中信的王震兒子王軍，王軍本身也出身於情報機構。參見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83。

76 同前注，頁170、183；《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頁11；于石坪，前引書，頁255；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338。

77 石翔，前引書，頁224；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82。

7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95；Roger Faligot, *Les Serviveces secrets chinois, de Mao aux JO, Paris, Edition du Nouveau Monde*, 2008, p. 222；私人資料，北京，2002-2007。

79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2012，前引書，頁201；鄧榕，前引書，頁175；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375.

80 Li Cheng,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Reform Era,” in Shiping Hua (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E Sharpo, 2001, p. 230；個人回憶內容。另參見 Richard Baum, op. cit., p. 2.

81 《南華早報》，2013年12月15日。

82 于石坪，前引書，頁40。

83 參見 *Voice of America*, 8 March, 2013，一篇清晰且重要的分析。

84 私人提供資料，巴黎，2008。

85 另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592；李炎唐、蕭思科，前引書，頁19。

86 另參見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239；Laudre de Charrette, Marion Zipfel, *Les nouveaux milliardaires rouges*, Pris, L’Archipel, 2013, p. 197；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71及以後。

87 這段描述的作者曾和胡耀邦參加過兩次小型的午餐聚會，得以就近觀察他的待人接物，也得以和另一位時常有接觸的政治人物——喬石——作對比，喬石和胡耀邦基本上相似，都是對事物在理性上保持著開放態度的人。然而有關胡耀邦的資料，無論中外都不是很詳細，很有可能是對研究中共的歷史研究者而言，胡這個人很難理解。對胡耀邦的具體資料，可參考何頻、高新，前引書，頁111及以後；張黎明，前引書，以及他女兒滿妹所寫的回憶錄。

88 水靜，前引書，書中隨處可見相關情節。

89 參見第九章。

90 Ursula Gauthier, *Le Volcan chinois :dans les entrailles du Grand Dragon*, Paris, Denoël, 1998, p. 172.

91 蕭偉俐，前引書，頁339，尤其在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13及以後，將許多資料來源彙整得很好。

92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99-706。

93 私人提供之資料，北京，2005。

94 人民日報，1986年2月21日；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o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 238.

95 Shen Tong, op. cit., p. 159.

96 Francis Deron, *Cinquant jours de Pékin*,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89, pp. 137, 283.

97 *Le Monde*, 23 janvier 2014; Francis Deron, op. cit., pp. 93, 137, 283; 在場親眼所見者提供之私人資料內容，1989年12月。

98 李鐵映始終保持著較曖昧的態度。參見 Shen Tong, op. cit., p. 307.

9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93、725；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374；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86；有關陳小魯及李勇的資料由蕭小紅（Xiaohong Xiao-Planes）提供。

100 Zhang Lijia, Calum Mac Leod, op. cit., p. 216, 221.

101 于石坪，前引書，頁473。

102 同前注，頁11、299。

103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19。

第七章　權力在望（**1989－2012**）

01 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概要說明，就是有名的《天安門文件》，張良著，參見英文版：Andrew Nathan, Perry Link,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 Affaires, 2006.

02 Francis Deron, op. cit., p. 215.

03 Richard Baum, *Bur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28.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87.

0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46。

05 同前注，頁419。

06 Ezra Vogel, op. cit., p. 677.

07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59。

08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122.

09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90.

10 于石坪，前引書，頁321。

11 同前注，頁17及以後；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22及以後；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63。

12 François Godement, *Que veut la Chine ? De Mao au capitalisme*, Paris, Odile Jacob, 2012, p. 22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71、676。

13 于若木，前引書，頁58、136；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93-97。

14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8 ; Li Cheng, op. cit., p. 230.

15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85；于石坪，前引書，頁262。

16 Kerry Brown, op. cit., p. 328.

17 Ursula Gauthier, op. cit., p. 140;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p. 18, 132;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257, 294.

18 Ibid., p. 294;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18.

19 Ibid., p. 164.

20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338.

21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18, 193, 194.

22 *The Economist*, March 17, 2012.

23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90.

24 高曉，前引書，頁312。

25 *Financial Times*, March 5, 2016.

26 水靜，前引書，頁174、286、334。

27 參見盧弘書中刊出的相片。盧弘，前引書，頁196。

28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100, 138.

2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37。

30 Ezra Vogel, op. cit., p. 565.

31 Zhang Lijia, Calum MacLeod, op. cit., p. 217; Beijing Review, October 3, 2013.

32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93.

33 Ursula Gauthier, op. cit., p. 136.

34 *VOA*, March 8. 2013; 于石坪，前引書，頁30；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p. 146, 149, 336 ; Willy Wo-Lap Lam, op.

cit., p. 190。

35 *The Economist*, March 17, 2012.

36 Ibid., p. 18.

37 例證可參見于石坪，前引書，頁394、255。

38 *VOA*, March 8, 2013.

39 Ibid., p. 491.

40 于石坪，前引書，頁255。

41 宗海仁，前引書，頁85。

42 Agnès Andrésy, Who's Hu, op. cit., p. 30.

43 有關俞正聲，請參考 Kerry Brown (2014), p. 158 sqq.

44 *The Economist*, April 16, 2011;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39.

45 艾仰樺、陳曉銘，《共青團勢力》，香港：明鏡出版社，2009，頁96及以後。

46 有關溫家寶，參見 *Aujourd'hui la Chine*, 7 octobre 2010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6, 2012; Le Monde, 16 mai 2008。

47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47.

48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4, 2009.

49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1, 2009.

50 參見報導 *Le Monde*, 4 septembre 2009 ; *Aujourd'hui la Chine*, 7 octobre 2010。

51 2014年4月所獲私人資料。

52 Li Cheng, op. cit., p. 225; Kerry Brown, op. cit., pp. 66, 218.

53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April 25, November 14, 2012.

54 Agnès Andrésy, *Who's Hu*, op. cit., p. 60 sqq.

55 *News Week*, December 14, 2009;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p. 152-153. 相關引述內容的作者有幸在2008年聽到李光耀親口誇耀他對中國領導人所做的「指教」。

56 有關李克強和他家庭，參見艾仰樺、陳曉銘，前引書，頁143-144；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43；*Financial Times*, March 5-6, 2011。

57 宗海仁，《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頁132（編注：原書注釋僅標示著者宗海仁［Zong Hairen］，但並未標示引用的是中文還是英文版，在此附上英文版書籍資訊以供讀者參考：Bruce Gilley, Andrew Nathan, *China: China's New Rulers, The Secret Files*〔「宗海仁」為化名〕）；*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6, 2011 (article of Willy Lam)。

58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01.

59 于石坪，前引書，頁174及以後；*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8-29, May 8, 2012. 有關內容的作者有機會在2006年1月，藉法國國會議員華雅爾（Ségolène Royal）訪問中國之際，在北京聽到一段薄熙來的精采談話。對於這段談話的主要目的是什麼已不得而知，但當時薄熙來表現出當時中國無人能出其右的口語表達和說服力。

60 François Godment對這段爭論曾作過一些精采的整理，參見François Godment, op. cit。

61 *Libération*, 27 août 2013.

第八章　習近平和習派人馬

01 然而這方面卻又可能會讓一些心理保持男性優越感的菁英階層感到不快……。

02 于石坪，前引書，頁94；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p. 17；吳鳴，前引書，頁19；《炎黃春秋》，2007年第10期，頁32　及以後。

03 童小鵬，《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北京：華文出版社，2007，頁503；《百年潮》，2008年第6期，頁39-45。

04 可參考《中共黨史資料》，2001年第3期，頁108。

05 Evan Osnos, op. cit., p. 28；京夫子，《毛澤東和他的女人們》，前引書，頁261；《炎黃春秋》，2011年第1期，頁6及以後；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52。

06 Agnès Andrésy, op. cit., p. 79；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54-255。1979年，曾發生大批難民逃往香港的事件。習仲勛在當年1月，由於知道被關押的偷渡犯是因為要逃難才偷渡往香港，就將這些人全部釋放。這在當時也是罕見的例子。參見高曉，前引書，頁198及以後。

07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22.

08 吳鳴，前引書，頁25。

09 高曉，前引書，頁162及以後；私人提供資料。

10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21.

11 同前注，頁123；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61。

12 Kerry Brown, op. cit., p. 118.

13 私人提供資料，北京，2006。

14 *Le monde*, 18 octobre 2013, 23 janvier 2014.

15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26.

16 本書作者曾有幸於2014年3月25日參加當時法國總統歐蘭德（François Hollande）邀請習近平的正式晚宴，並和習本人閒話家常。

17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p. 129-130.

1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56-257；高曉，前引書，頁162及以後；于石坪，前引書，頁108。

19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57。

20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p. 110-111.

21 我們在2012年10月1日的《紐約時報》國際版找到很有意思的報導，是有關習近平到河北省正定縣駐點停留的調查。習近平以往在正定縣工作時，曾推動一些在當時既重要且「現代」的措施。

22 高曉（2010），頁280及以後。

23 高曉，前引書，頁287及以後。

24 于石坪，前引書，頁131；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83.

25 Laudre de Charrette, Marion Zipfel, op. cit., p. 187.

26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18.

27 就像Kerry Brown描述的一樣貼切，參見Kerry Brown, op. cit., p. 119。

28 還有張海陽，為張震上將之子。張震在高齡仍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職，成為軍方重要領導人之一。*Financial Times*, 23, 24 October

2010;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p. 177-179.

29 同前注，頁92、123-124。張德江曾留學北韓，參見Kerry Brown(2014), p. 173，以及*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3), p. 70。

30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4 September 2012.

31 *Le Monde*, 16 avril 2015.

32 *Financial Times*, 12 December 2012.

33 *Le Monde*, 11 octobre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5 January 2015; *The Economist*, 28 February 2015.

34 *Le Monde*, 29 avril 2015; *Financial Times*, 5 May 2015.

35 *China Analysis*, February 2014, pp. 24, 27.

36 Ibid., pp. 24-25.

37 *China Analysis*, February 2014, p. 2（François Godement顧德明的評論）.

38 *Le Monde*, 13 juin 2015.

39 *Le Monde*, 5-6 avril 2015.

40 *Financial Times*, 6, 27 February 2015.

41 參見第九章。

42 還有一份涉及更多人的名單也已被公布，參見于石坪，前引書，頁30；*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3 March 2015; Le Monde, 17 mars 2015。

43 Evan Osnos, op. cit., p. 40.

44 *The Economist*, 28 March 2015; *Financial Times*, 19 May 2015; *China News Analysis*, April 2014.

45 *Financial Times*, 30 January 2015.

46 *Nikkei Asian Review*, 12 March 2015.

47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7-28 December 2014（Jeffrey N. Wasserstrom 的文章）。

48 *The Economist*, 24 January 2015.

49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3-25 January 2015.

50 *Nikkei Asian Review*, 19 March 2015;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7 April 2015.

51 *China News Analysis*, 2014, no 2. 有關中國新的對外政策，可以參考 Alice Ekman 一篇精采文章〈亞太地區：中國外交政策首要之務〉，刊登於 *Politique étrangère*, automne 2014, pp. 11-22.

第九章　權貴集團

01 這個數目和Kerry　Brown所引用的「高層領導幹部」有2,562人很接近。Kerry Brown, op. cit., p. 20。

02 還有一位相當高階的軍職將領曾在2011年列為中央軍委備選對象，他的父親也是一位勉強算得上重要的幹部（地區副領導職，地區在行政區劃上較縣高一階，但副領導職比起縣長也沒高多少），參考《外參》編輯部（2011），頁135。

03 有關這件事，還要提到當初中共這批領導人並不具備能匹配他們領導職務的學識及涵養，但他們也很懂得運用秘書來增加他們的能力和社會聲望。這也是為什麼曾當過毛澤東秘書的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還有劉少奇，甚至鄧力群，也都在政治上扮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而周恩來的國務院，更是高層幹部特別的養成

班。

04 相關案例請參見王凡、東平，《紅牆記憶》，前引書，頁39、135、304；于石坪，前引書，頁383。

05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18.

06 當鄧小平下放到江西時，王瑞林還曾到他那裡待過幾天。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76。

07 *The Economist*, 10 May 2012；杜菲，《中國部委高官》，紐約：明鏡出版社2012，頁135；*Financial Times*, 8 May 2012；王凡、東平，《紅牆記憶》，頁39。

08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 op. cit., p. 108.

09 大家都知道，像李鐵映，與其說是政治領導人，不如說更像是見習指導老師。參見宗海仁，前引書，頁468。

10 *The Economist*, 10 May 2012.

11 王凡、東平，《紅牆往事》，前引書，頁182。

12 參見杜明，*Mao, sa cour* …, op. cit., p. 364.

13 有關吳法憲的子女，請參考《紅黑檔案》，2005年5月，頁87；邱會作的子女，參考石翔，前引書，頁348；陳永貴的子女似乎在地方上事業經營得不錯，參見顧保孜，《中南海人物春秋》，前引書，頁422。相對的，華國鋒的孩子雖然沒有坐上顯赫的職位，但在軍中和民航總局也各有發展，參見《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頁39。

14 除了人物誌詞典外，另再參見石翔，前引書，頁268、271、276；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71；張黎明，前引書，頁418。

15 盧弘，前引書，頁197。

16 來自於傅高義（Ezra Vogel）有關鄧小平的厚重著作中所引用的珍貴資料，Ezra Vogel, *op. cit.*, *p.* 764, 780, 847。

17 這段經過是整理自2000年以來多次接觸的談話內容。

18 劉少奇子女中只有一人經商，參見劉愛琴，《我的父親母親》，前引書，頁216。

19 Agnès Andrésy曾提到過兩位習近平家族的舊識，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82；以及香港《動向》雜誌2013年5號南匈奴的一篇文章。

20 但葉挺的後代就似乎沒有發展得很好。參見余湘（1994），頁331；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39。

21 于石坪，前引書，頁111。

22 Stéphanie Balme, op. cit., p. 134.

23 彭湃的孫女彭伊娜就曾經被派往澳門，她後來成為廣東一份風格較自由的雜誌《南方周末》創辦人。

2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39、543。

25 于石坪，前引書，頁1。李訥自己仍然持續紀念毛澤東的生日，盧弘（2010），頁183。

26 同前注，頁272及以後；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83；劉愛琴，《我的父親母親》，前引書，頁180；陳曉農（2005），頁145。

27 有關董必武，參見石翔，前引書，頁178。

2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37。

29 有關習仲勛，參見高曉，前引書，頁523，以及《百年潮》，2013年第11期，頁4。曾慶紅則曾經連著幾年都到井岡山紅色根

據地視察，參見Agnès Andrésy, *Who's Hu*, op. cit., p. 138。2006年7月時，黃克誠的幾位老戰友曾經一起回訪當年長征的最後一段路程，參見湖南電視台，前引書，貝39。

30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4 November 2012;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23.

31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78、244。

32 同前注，頁351。

33 同前注，204。

34 私人資料；François Godement, op. cit., p. 215. 上將張震的兒子娶的媳婦就是在商界發展的香港公民，參見石翔，前引書，頁52-53。

35 高曉，前引書，頁371；私人資料，北京，2005、2006及2011。有興趣的觀光客可以在北京什剎海看到鄧小平的故居，它就位在湖南岸，因為有許多豪華轎車進進出出而特別引人注意。

36 *Financial Times*, 27 April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28-29 April 2012; *Le Monde*, 2 octobre 2012.

37 于若木，前引書，頁151；《百年潮》，2013年第11期，頁4。

38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699；張黎明，前引書，頁262。

39 在這些於軍界發展的人中，我們還特別注意到彭德懷的姪女也在其間，參見蕭偉俐，前引書，頁95。在省級政府中，有烏蘭夫女兒在其父以往掌理的內蒙自治區政府工作，劉志丹的女兒在陝西省人大工作，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33、741。還有一位領導人女兒也曾在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工作過，但卻沒有留下太多的回憶。另外李先念以及伍修權的女兒都曾擔任過較高級別

的幹部，參見張黎明，前引書，頁108。「情報頭子」李克農的女兒是少數擔任公安單位女性負責人之一，但工作地點卻在偏遠貧瘠的山西省，參見《知情者說》，第3輯，頁130。王首道的女兒在警界的階級也相當高（私人資料）。

40 《百年潮》，第4期，頁71。

41 參見于若木，前引書，頁116。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曾經寫過許多回憶錄，在多年於醫界工作後，和陳毅的兒子陳小魯合作設立一個推廣選擇尊嚴死的網站「選擇與尊嚴」，參見 *Beijing Review*, 3 October 2013, p. 22。

42 來自於蕭小紅（Xiaohong Xiao Planes）（2013）女士處的資料；蕭偉俐，前引書，頁359；于石坪，前引書，頁201；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17。劉少奇的女兒劉濤也曾在媒體上發表過一些自己的詩作，參見劉愛琴，《我的父親母親》，前引書，頁266。

43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22 August 2013.

4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445、706。

45 在人物誌詞典外，另參見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44 ；于石坪，前引書，頁289、296；*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11。

46 這段文字為作者整理有關父親亦為高階軍職的50多名少將的公開資料所得。

47 于石坪，前引書，頁417、41、355、397、443；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30。

48 于石坪，前引書，頁48-49。

49 《紅黑檔案》，2005年5月，頁87。

50 所指的是彭雪楓、羅榮桓和楊成武的兒子，參見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42 及 *Who's Hu*, op. cit., p. 124；于石坪，前引書，頁346。另外還有張愛萍、張震的兒子及彭真的女兒也都在軍中其他的重要單位發展。

51 依據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46 及于石坪，前引書，頁336所提及的許多公司都和軍方單位有關聯。

52 同前注，頁134。

53 私人資料，2013年1月；于石坪，前引書，頁220及以後。

54 何頻、高新，前引書，頁378及以後。

55 *Voice of America*, 8 March 2013.

56 Kerry Brown, op. cit., p. 39.

57 于石坪，前引書，頁166-167。

58 *Le Monde*, 23 janvier 2014.

59 *Le Monde*, 4 septembre 2009.

60 Li Cheng, op. cit., p. 196-197; *VOA*, 8 March 2013; 于石坪，前引書，頁245及以後。

61 *Le Monde*, 23 janvier 2014.

62 同前注，頁52；Marie-Claire Bergère, *Chine-le nouveau capitalisme d'Etat*, Paris, Fayard, 2013, chap II, p. 12。

63 Agnès Andrésy, *Who's Hu*, op. cit., p. 133 ; *Financial Times*, 30 March 2010.

64 Kerry Brown, op. cit., p. 40.

65 此處所述觀點來自於Philippe Massonnet, *Pour en finir avec le*

miracle chinois, Arles, Philippe Picquier, 2008, p. 148.

66 來自於*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9 March 2013 所做的一項令人印象深刻的調查結果。

67 *The Economist*, 21 September 2012.

68 于石坪，前引書，頁419。

69 引述*Libération*, 29 octobre 2012 所分析一項由《紐約時報》 所作的調查。

70 François Godement, op. cit., p. 33.

71 上海一家報紙於2009年訪問過3,000名所持資產超過1,000萬元人民幣的人之後所指出，被訪問者中有2,932人父母有某些背景。參見 *Global Times*, 26 November 2009。

72 最後一次下達有關指示是在2010年。參見*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20 May 2012。最近似乎又再重申。

73 習近平在2014年發起的反腐運動確實收到了遏制貪腐的效果，但似乎也有不少太子黨遭到打擊。

74 高曉，前引書，頁275。

75 Judith Bout, *Les confessions de maître Zhang, L'avocat de la Bande des Quatre et des dissidents chinois*, Paris, François Bourin, 2013, p. 512.

76 例如，這段文字的轉述者在鄧小平舊居大門前，就不曾聽過一句批評的話。

77 經由這個廠牌就可以標識出高級領導人的座車，因為這款車的銷售大部分都是依靠高級公務機關的採購。參見Le Monde, 20 mars 2012, 6 septembre 2012 ; *Financial Times*, 26 June 2012。

78 早在1990年代末，王震的兒子王軍就已經主導中國的高爾夫球運動。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24。

79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5-6 November 2011.

80 這就不得不必須提到在這些地區的許多理容小姐，她們對於上過門的男顧客過目不忘。

81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11 August 2011.

82 也有人說李鵬的兒子有好幾次因為酒醉鬧事被拘留。參見 Judith Bout, op. cit., p. 513.

83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202 ; Ursula Gauthier, op. cit., p. 136.

84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64.

85 Ibid., p. 123

86 于石坪，前引書，頁52-53、411。

87 可參見何頻、高新，前引書，頁732。

88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99.

89 Agnès Andrésy, *Xi Jinping*, *op.* cit., p. 155；于石坪，前引書，頁194。

90 私人資料。

91 于石坪，前引書，頁299；*Voice of America*, 8 March 2013。

92 *Financial Times*, 27 April 2011；于石坪，前引書，頁67 及以後。

93 Ibid., p. 210.

94 Kerry Brown, op. cit., p. 39.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202 曾經透有75,000個「太子黨」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工作，這個數字很讓人難以相信，這個數字應該還包含很多低階幹

部的子弟，它對於這個趨勢的廣度並不能增加說明什麼。

95 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96.

96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2 August 2013.

97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4 March 2015.

98 Phillipe Le Corre et Alain Sepulchre, L'*offensive chinoise en Europe*, Paris, Fayard, 2014, p. 153 ; *Le Monde*, 23, 24 janvier 2014.

99 于石坪，前引書，頁159；Agnès Andrésy, *Princes rouges…*, op. cit., p. 147; *Le Monde*, 25 janvier 2014 ; *Financial Times*, 28 November 2013;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2 August 2013.

100 *Le Monde*, 25 janvier 2014; *Libération*, 2 août 2011; *The New York Times International Edition*, 28 January 2013; *Le Monde* 17-18 juillet 2011; *The Economist*, 19 April 2014; *Voice of America*, 8 March 2013.

參考資料

AJ. Yangbua, CHEN Xiaoming, *Gongqingtian shili* [Le pouvoir de Ia Ligue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Hong Kong, Ming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u miroir).

Stephanie BALME, Entre soi, *L'elite du pouvoir dans Ia Chine contemporaine*, Paris, Fayard, 2004.

Geremie R. BARME, *The Forbidden City*, Londres, P rofile Books, 2009.

Richard BAUM, *Burrying Mao :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Jean-Philippe BEJA, Michel BoNNIN, Alain PEYRAUBE, *Le tremblement de terre de Pekin*, Paris, Gallima rd, 1991.

Marie-C laire BERGERE, *Chine, le nouveau capitalisme d'Etat*, Paris, Fayard, 2013.

Sergo BERIA, *Beria mon pere. Au coeur du pouvoir stalinien*, Paris, Pion, 1999.

Lucien BIANCO, *Les Origines de Ia revolution chinoise*, Paris, Gallimard, 2007.

Bo Yibo, *Ruogan zhongda juece yu shijian de huigu* [Retou r sur quelques decisions et quelques evenemenrs d 'importance],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1997.

Judith Bour, *Les confessions de maitre Zhang, L'avocat de Ia Bande des Quatre et des dissidents chinois*. Paris, Fran~ois Bourin, 2013.

Kerry BROWN, *The New Emperors: Power and Princelings in China*,

Londres et New York, I. B. Tauris, 2014.

John BYRON et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Simon & Schuster, 1992 .

CHANG Jung,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History*, Lond.res,J on a than Cape, 2005.

Laure de CHARRETTE, Marion ZIPFEL, *Les nouveaux milliardaires rouges*, Paris, L' Archipd, 2013.

CHEN Danzhun, YE Weiwei, *Sange Xinsijun nuling de duocai rensheng* [Trois servantes de Ia quatrieme armee nouvdle dotees de nombreux talents!], Pekin, Renmin chubanshe, 2011.

CHEN Haosu, CHEN Zhouzhou, CHEN Xiaolu, CHEN Shanshan, *Huiyi fuqin Chen Yi* [En l'honn eur de notre pere Chen Yi], Pekin , Huawia chubanshe, 2001.

CHEN Qingquan et SONG Guangwei, *Lu Dingyichuan* [Biographie de Lu Dingyi], Pekin, Zhonggong danshi chuban 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 CC), 1999 .

CHEN Jin, *Wenqing Mao Zedong* [Un Mao affectueux],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iaoning), 2005.

CHEN Pixian , *Zai « yiyue /engbao » de zhongxin, Chen Pixian huiyilu* [Au cceur de Ia «tern pete de janvier», les memoires de Chen Pixian],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e Shanghai), 2005.

CHEN Qingquan, SONG Guangwei, *Lu Dingyi zhuan* [Biographie de Lu Dingyi],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hi storiques

du PCC), 1999.

CHEN Renkang, *Yishengjinsui Mao Zedong, Huiyi wode fuqin kaiguo jiangjun Chen shiqu* [Une vie en suivant de pres Mao Zedong, souvenirs sur mon pere Chen Shi qu, l'un des generaux fondateurs du regime],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2007.

CHEN Shouxin, *Zhongnanhaide jishi* [Histoires de Zhongnanhai] Pekin, Xiwande chubanshe (Editions du Pare de I'Ouest), 2002.

CHEN Xiaonong , *Chen Bodazuihou koushu huiyi* [Les Ultimes memoires orales de Chen Boda] , Hong Kong, Yangguang huanqiu chuban youxian gongsi (Compagnie d'edition de Ia planete), 2005.

CHENG Hua, *Zhou Enlai he tade mishumen* [Zhou Enlai et ses secretaires], Pekin, Zhongguo guangbodianshe chuban she (Editions de Ia radio et de la television chinoises), 1992.

CHENG Yingxiang, *Idylle sino-cubaine, trouble sino-sovietique*, Paris, Armand Colin, 1973.

CHENG Zhongyua n, XIA Xingzhen, *Lishi zhuanzhi lun, Cong zunyi huiyi dao shiyijie sanzhong quanhui* [Les tournants de l'histoire, de la reunion de Zunyi a la troisieme session du onzieme Comite central], Pekin, Renmin chubanshe CEcl.itions populaires), 2002 .

CHENG Zh ongyuan, *Zhang Wentian,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8.

Philippe LE CoRRE, Alain SEPULCRE, I.: offensive chinoise en Europe, Paris, Fayard, 2015.

DAI Maolin, ZHAO Xiaoguang, *Gao Gang zhuan* [Biographie de Gao

Gang], Xi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Shanxi), 201 1.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ekin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2 .

DENG Xiaoping, *Deng Xiaoping zishu* [Deng Xiaoping par lui-meme], Pekin,Jiefangjun chuban she (Editions de l 'armee de liberation) , 2005 .

Francis DERON, *Cinquantejours de Pekin*,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1989.

DI Yansheng , *Lishide zhen yan, Li Yinqiao zai Mao Zedong shenbian gongzuo jishi* [Paroles de verite sur l' histoire, les souvenirs de Li Yinqiao sur son travail au cote de Mao Zedong], Xinhua chubanshe (E ditions de la nouvelle Chine), 2000.

DI Yansheng, *DI Jiangnan , Mao Zedong yu tade erniimen* [Mao Zedong et ses enfams], Pekin, Renmin chubanshe, 20 11.

Jean-Luc DOMENACH, *Aux origines du Grand Bond en avant, le cas d'une province chinoise*,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et Editions de I'EHESS, 1982.

Jean-Luc DoMENACH, HuA Chang-ming, *Le Mariag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de Sciences Po , 1987.

Jean-Luc DoMENACH, Philippe RICHER, *La Chine*, Paris, Se uil, 1995.

Jean-Luc DOMENACH, *Chine, l'archipel oublie*, Paris , Fayard , 1992.

Jean-Luc DoMENACH, «Chine, Ia succession et le successeur», Polirique internarionale, printemps 2011.

Jean-Luc DOMENA CH et Xiaohong XIAO-PLANES, *Les Nouvelles sources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premiere Chine populaire» (1949-1976): bilan provisoire,* «Questions de recherche», CERl, n° 37, septembre 2011.

Jean-Luc DoMENACH, *Mao, sa cour et ses complots,* Paris, Fayard, 2012.

DONG Baocun, in *Zhiqingzhe shuo* [Ce ux qui savent, parlent] , III, 8, Pekin,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jeunesse chinoise), 2004.

DONG Baocun, *Zoujin Huairentang* [En entrant au Huairentang], Z 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historiques du Comite central du PCC), 2005.

DONG Bian, CAI Asong , TAN Deshan , *Women haodajie Cai Chang* [Cai Chang, Ia grande dame que no us aimons], Pekin, Zhongyang wen xi 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1992.

DONG Bian, TAN Deshan, ZENG Zi , *Mao Zedong he tade mishu Tian Jiaying* [Mao Zedong et son secretaire TianJiaying],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1996.

Du Fei, *Zhongguo buwei gaoguan* [Les hauts fonctionnaires des ministeres et comites chinois], Hong Kong, Ming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u miroir brillant), 2012.

Du Weihua, *Zai sulian zhangdade hongse houdai* [La Fosterite rouge qui a grandi en URSS], Pekin, Shijie zhishi chubanshe (Editions

connaissance du monde), 2000.

Du Xiuxian (avec Gu Baozi), *Lishide jianzheng* [Les Preuves de l'histoire], Changchun, Jilin sheying chubanshe (Editions photographiques duJilin), 2004.

J oseph ESHERICK , «The Ye Family in New China», in Jeremy BROWN etPaul G. Pl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RC,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thieu DUCHATEL et Joris ZYLBERMAN, *Les nouveaux communistes chinois*, Paris, Albin Michel, 2012.

Roger FALJGOT, *Les Services secrets chinois, de Mao aux JO*, Paris, Editions du Nouveau Monde, 2008.

Roger FALIGOT, Remi KAUFFER, *Kang Sheng, le maitre espion de Mao*, Paris, Tempus, 2014.

FAN Shuo, *Ye Jianying zai feichang shiqi* [YeJianying dans un temps extraordinaire], Huawen chubanshe ('Editions culturelles de Chine), 2002.

GAO Wenqian, *Wannian Zhou Enlai* [Les Dernieres Annees de Zhou Enlai], Hong Kong, Ming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u miroir brillant), 2003.

GAO Wenqian, *Zhou Enlai, l'ombre de Mao* (traduit de I'anglais par Michel Bessieres), Paris, Perrin, 2010.

GAO Xiao, *Tajiang lingdao zhongguo, Xi Jinpingchuan* [Il va gouverner Ia C hine, biographie de XiJinping], Hong Kong, Ming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 u mi roir brillant), 2010.

Ursula GAUTHJER, *Le Volcan chinois: dans les entrailles du Grand Dragon*, Paris, Denoel, 1998.

GU Baozi (ed.), *Hongqiang miwen* [Informations secretes sur les Murs rouges], Canton, Guangzhou huacheng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vill e chinoise de Canton), 2004.

GU Baozi, *Zhongnanhai renwu chunqiu* [Biographies des personnalites de Zhongnanhai], Pekin, Zhonggong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2009.

GU Baozi, DoNG Baocun, Y IN Jiamin, *Texie Zhongnanhai* [Ecrits sur Zhongnanhai], Pekin, Zhon 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jeunesse chinoise), 2004.

GU Baozi , Du Xiuxian, *Zhongnanhai renwu chunqiu* [Printemps et automn es des personnalites de Zhongnanhai],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 e (Editions historiques du PCC), 2009.

GUO Sirnin, TIAN Yu, *Wo Yanzhongde Liu Shaoqi* [Mes souveni rs de Liu Shaoqi], Shijiazhuang, H ebe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Hebei), 1992.

HE Husheng, Mao *Zedong chujin Zhongnanhai* [Quand Mao Zedong entra pour Ia premiere fois dans Zhongnanhai],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2008.

HE Pin, GAO Xin, *Zhonggong «Taizi dang»* [Le «Pard des princes» en Chine communiste], Hong Kong, Ming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u miroir brillant), 1999.

Marie HOLZMAN, *Avec les Chinois*, Paris, Flammarion, 1981.

Marie HOLZMAN et Bernard DEBORD, *Wei Jingsheng, un Chinois inflexible*, Paris, Bleu de Chine, 2005.

Hongqiang mishi [Histoire secrete des Murs rouges], Pekin, Zuojia wenxue chubanshe (Editions litteraires des ecrivains), 2004.

HONG YUNG Lee,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Party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HU Shaoan.*Jingbei renmin* [Respecter le peuple], Hong Kong, Tiand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univers), 2004.

HUA Chang-ming, *LA Condition feminine et les communistes chinois en action*,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1981.

HUANG Zulin, *Liu Shaoqijiashi* [Liu shaoqi en famille],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e Shanghai), 2009.

JIANG Bo, Li Qing, *Lin Biao 1959 nian yihou* [Lin Biao apres l'annee 1959], Chengdu, Sichuan renmin chubanshe, 1998.

JIAO Ye, *Ye Qun zhi mi* (L'enigme de Ye Qun] , Hong Kong, Tiandi tushuguan (Librairie de l'univers), 1994.

JING Fuzi, *Zhongnanhai enchou lu* [Les Bons et les mechants a Zhongnanhai] , Taibei, Lianjing chubanshe (editions Lianjing), 2004.

JING Fuzi, *Mao Zedong he tade niirenmen* [Mao Zedong et ses femmes], Taibei, Lianjing chubanshe (editions Lianjing), 2005.

JING Yuchuan, *Rao Shushi*, Hong Kong, Shidai guoji chuban youxian gongsi (Societe d'edition internationale de l'epoque), 2010.

JUNG Chang, *Wild Swans :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 Anchor Books, 1992.

KANG Keqing, *Kang Keqing huiyilu* [Memoires de Kang Keqing], Pekin, Jiefangju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populaire de liberation), 1993.

WILLY Wo-Lap LAM,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Hu Jintao Era*, Routledge, 2006.

LI Cheng,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Reforme Era», in Shiping Hua (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ME Sharpe, 2001.

LI Jiaji, YANG Qingwang, *Lingxiu shenbian shisannian* (Treize ans aux cotes des dirigeants],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rnite central), 2007.

LI Mengwen, *Shenghuozhongde Chen Yun* [Comment vivait Chen Yun], Pekin,Jiefangju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populaire), 1999.

LI Min, *Wodefuqin Mao Zedong* [Mon pere Mao Zedong],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2009.

LI Yankang, Xl.Ao Sike, *Nanlou wangshi* (Jours passes au pavilion du sud],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2008.

LI Yinqiao, HAN Guixin, *Mao Zedong he tade weishizhang* [Mao Zedong et ses chefs des gardes], Pekin, Jiefangju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de liberation), 2002.

LI Ying, CHENG Meidong, *Yu Mao Zedong yiqi ganshou lishi* [L'Histoire que nous avons vecue avec Mao Zedong], tome 2, Wuhan, Hube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Hubei), 2003.

LI Yuan, *Zhi weishi, Yan Hongyan shangjiang wangshi* [Seulle red compte, en suivant Ia trace du general Yan Hongyan], Kunming, Yunna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Yunnan), 2003.

LI Zhisui, *La Vie privee du president Mao*, Paris, Pion, 1994.

LIANG Zhang, Andrew J. NATHAN et Perry LINK, *The Tiananmen papers*, PublicAffairs, 2006.

LIANG Zhu, HE Xinhui, *Shengsi juelian, Li Sha yu Li Lis an* [Un amour a Ia vie a Ia mort, Li Sha et Li Lisa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2008.

Kenneth LIEBERTHAL,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 W. W. Norton & Companyp., 2003.

LIN Li, *Wangshi suoji* [Notes du passe],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rnite central), 2006.

Lru Aiqin, *Wode fuqin Liu Shaoqi* [Mon pere Liu Shaoqi],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iaoning), 2001.

Lru Fuzhl, *Liu Fuzhihuiyilu* [Les souvenirs de Liu Fuzhi],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10.

LIU Hongqing, *Zuo Quan, Yituan bentude duo* [Zuo Quan, un peu eclatant], Pekin, Jiefangju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populaire de liberation), 2005.

LIU Jintian, *Tushuo Chen Yun* [Chen Yun en images et en paroles], Pekin, Huaxia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Chine), 2008.

LIU Shousen, *Niangqingshi de Zhou Ziyang* [La jeunesse de Zhou

Ziyang], Hong Kong, Taipingyang shlji chubanshe (Editions du siecle du Pacifique), 2006.

LIU Xiaonong, *Hongse aiqing, Zhongguo geming qianbeide hunlian gushi* [Amours rouges, les histoires d' amour de Ia premiere generation revolutionnaire], Nanchang,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Jiangxi), 2009.

LIU Ying, *Wo de he Zhang Wentian mingyun yugong de licheng* [Mon destin avec Zhang Wentian],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1997.

LIU Ying, *Wo he Zhang Wentian mingyun yugang*, Pekin, Zhonggong dangshl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lstoire du PCC), 2005.

LIU Zhende, *Wo wei Liu Shaoqi dang mishu* (J'ai ete secretaire de Liu Shaoqi],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3.

LU Hong, *«Hong taiyang » de yingzi* [Les Ombres du «soleil rouge»], Hong Kong, Qixing shushe (Editions La pleiade), 2010.

LU Tong, F ENG Laigang, *Liu Shaoqi zai jianguohoude ershinian* [Liu Shaoqi durant les vingt annees qui ont sui vi Ia fondation de Ia Republique populaire],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aoning), 2002.

LUO Diandian, *Hongsejiazu dangan* [Le Dossier d'une famille rouge], Haikou, Nanhai chubanshe (Editions des mers du sud), 1999.

Luo Dongjin, *Wode fuqin Luo Ronghuan* [Mon pere Luo Ronghuan], Shenyang, Liaoning renrn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iaoning), 2003.

Luo Yu, *Gaobie zong can mou bu* [Au revoir a un departement de l'Etat-Major general], Hong Kong, Open Books, 2015.

MA Shexiang, *Yige niigemingzhede lishijianzheng* [Le Temoignage historique d'une revolutionnaire],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2004.

MAN Mei, *Huiyi Fuqin Hu Yaobang* [Souvenirs sur mon pere Hu Yaobang], Pekin, Bei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e Pekin), 2005.

Philippe MASSONNET, *Pour en finir avec le miracle chinois*, Aries, Philippe Picquier, 2008.

NIE Li, *Shan Gao, Shui Chang, Huiyi Fuqin Nie Rongzhen* [La montagne est haute, les eaux vont loin, Souvenirs sur mon pere Nie Rongzhen],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Editions culturelles et artistiques de Shanghai), 2006.

NIU Han, *DENG Jiuping, \Vomen dou jingliguo de rizi* [Ces jours que nous avons tous vecus], Pekin, Beijing Shiyue Wenyi chubanshe (Editions litteraires d'octobre a Pekin), 2001.

PANG Xianzhi, JIN Chongji, *Mao Zedong Zhuan* [Biographie de Mao Zedong],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rnice central), 2003.

QuAN Yanchi, *Mao intime* (traduction du chinois par Roger Darrobers), Paris, Editions du rocher, 1991.

QuAN Yanchi, *Yang Chengwu jianzheng wenge* [Yang Chengwu temoigne de Ia Revolution culturelle], Pekin, Guangming ribao chubanshe

(Editions du quotidien La Clarte), 2004.

Qru Huizuo, *Qiu Huizuo huiyilu*, Hong Kong, Xinshiyi chubanshe (Editions du nouveau siecle), 2011.

REN Yuanzhi, *Wade fuqin Ren Bishi* [Mon pere Ren Bishi],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iaoning), 1997.

Alain Roux, *Le Singe et le tigre, Mao, un destin chinois*, Paris, Larousse, 2009.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e, le cceur du tsar rouge*, Paris, Editions des Syrtes, 2005.

SHAN Feng, *Hongqiang neide ziniimen* [Les Enfants aux Murs rouges], Yanji, Yanbian daxue chubanshe (Presses de l'universite de Yanbian), 1998.

SHAO Hua, You Hu, *Lin Biaode zheyisheng* [Telle fut Ia vie de Lin Biao], Wuhan, Hubei, renrn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Hubei), 2003.

SHEN Kui, *Wang Jiaxiang. jiashi, qinggan, pinke* [Wang Jiaxiang, famille, affections, morale], Jinan, Jin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Jinan) 2001.

SHEN Tong, *Presque une revolution*,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0.

SHI Lan, *Wo yu Shu Tong sishinian* [Mes quarante ans avec Shu Tong], Xian,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Shanxi), 1997.

SHI Xiang, *Zhongguo Gaogan zinii chenfu lu* [Les vicissitudes des fils des princes chinois], Jil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Jilin), 1994.

SHI Zhe, *Wade yisheng* [Ma vie],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2001.

SHJ Zhe, *Zhongsu guanxi jianzhenglu* [Temoignages vecus sur les rdations sino-sovietiques], Pekin, Dangdai chubanshe (Editions du present), 2005.

SHUI Jing, *Tezhu jiaowang* [Des relations particulieres],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rn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5.

Victor SIDANE, *Le Printemps de Pekin : Oppositions democratiques en Chine, novembre 1978-mars 1980*, Paris, Gallimard, 1980.

SONG Yongyi, *Les Massacres de Ia Revolution culturelle*, Paris, Buchet Chastd, 2008.

SU Duoshou, LIU Mianyu, *Zeng Shan Chuan* [Biographie de Zeng Shan], Nanchang, Jiangx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Jiangxi), 2003.

TENG Xuyan, *Fengyu Pengmen : Peng Dehuaijiafengjiashi* [Une famille dans Ia tempete: Ia vie et le quotidien en famille de Peng Dehuai], Pekin, Wenhua yishu chubanshe (Editions culturelles et artistiques), 2006.

Ross TERRILL, *Madame Mao, The white-boned dem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ul THOREZ, *Les enfants modeles*, Paris, Folio, 1983.

ToNG Danning, *XiiJUating haizimende huainian* [En souvenir des enfants de Xihuating], Pekin,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Chine du present), 2008.

Ezra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et Londre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G Fan, *Zhiqingzhe shuo* [Ceux qui savent parlent] III, 7,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 jeunesse chinoise), 2004.

WANG Fan, DONG Ping, *Wo jia zhu wi zhongnanhai, Hongqiang tonghua* [Ma famille habite Zhongnanhai, Paroles d'enfants des Murs rouges], Pekin, Zuojia chubanshe (Editions des ecrivainsl, 2003.

WANG Fan, DONG Ping, *Wo zai buxunchang niandaide tebie jingli* [Ce que j'ai vecu de particulier dans une periode peu ordinaire],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2006.

WANG Fan, DONG Ping, *Hongqiangjiyi* [Souvenirs des Murs rouges],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Chine actuelle), 2007.

WANG Fan, DONG Ping, *Hong Qiang Wangshi, Ji yidai hongdan hexin de mishumen* [Histoire des Murs rouges, les secretaires irnportants de Ia premiere generation de dirigeants], Pekin,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jeunesse de Chine), 2012.

WANG Guangmei, *Wang Guangmei fangtan lu* [Interview de Wang Guangmei],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6.

WANG Guangmei, LIU Yuan, *Ni suo bu zhidaode Liu Shaoqi* [Liu Shaoqi td que vous ne le connaissez pas], Zhengzhou, Henan renmin chubanshe C&iitions populaires du Henan), 2000.

WANG Hao, WANG Jiyi, *Kaiguo shangjiang Ye Fei* [Un general fondateur du regime, Ye Fei],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4.

WANG Hebin, *Zai weiren shenbiande rizi* [Les J ours passes aux cotes des grands hommes], Pekin,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jeunesse chinoise), 2003.

WANG Li, *Wang Li fansilu* [Les Meditations de Wang Li], Hong Kong, Xianggang beixing chubanshe (Les editions de I' etoile polaire a Hong Kong), 2001.

WANG Linyu, *Zhang Wentian yu Liu Ying* [Zhang Wentian et Liu Ying],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0.

WANG Meng, *Le papillon*, Pekin, Litterature chinoise, 1984.

WANG Ming, *Zhonggong 50 nian* [Les Cinquante ans du PCC], Pekin, Dongfang chubanshe (Editions de l'Orient), 2004.

WANG Nianyi, *Da dongluande niandai* [Les Annees de la grande turbulence], Zhengzhou, Henan renrnin chubanshe, 2005.

Nora WANG, *Mao Zedong. Enfance et adolescence*, Paris, Autrement, 1999.

WANG Pei, LENG Xinyu, ZHU Jianbang, Lru Yanbing, *Hongsezhi lian* [Des amours de couleur rouge], Pekin, Huawe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 culture chinoise).

WANG Zhenyu, *Zai Mao Zedongde shenbian* [Aux cotes de Mao Zedong)'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du peuple), 2009.

WEI Renzheng, *Deng Xiaoping zai Jiangxide rizi* [Le Sejour de Deng Xiaoping auJiangxi],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1997.

Claude WIDOR, «Documents sur le mouvement democratique, 1978-1980», in *Revues paralleles et journaux muraux*, t. II, 1995.

John WOODRUFF, *China in Search of its Fu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9.

WU Faxian, *Wu Faxian huiyilu* [Memoires de Wu Faxian], Hong Kong, beixing chubanshe (Editions de l'etoile polaire), 2007.

WU Guang, *Bu shi meng* [Ce n'est pas un reve],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E), 2000.

WU Jicheng, *Hongse jingwei* [La Garde des Murs rouges], Pekin,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Chine actuelle), 2003.

WU Jiang, *Hongxing zhaoyao de jiating, Gongheguo kaizhuangzhe jiashi* [Des families eclairees par l'etoile rouge, Souvenirs sur les affaires domestiques des fondateurs du regime],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2008.

Wu Ming, *Xi Jingping zhuan* [Biographie de Xi Jinping], Xianggang wenhua yishu chubanshe (editions litteraires et culturelles de Hong Kong), 2008.

Wu Zhifei, *Yu Wei, Hongse zhi lion* [Un amour rouge],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E), 2006.

Xu XIANGQIAN, *Lishide Luigu* [Souvenirs historiques], Pekin, Jiafangjun chun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populaire de liberation),

1988.

XI Xuan, JiN Chunming, *Wenhua dagemingjianshi* [Breve histoire de Ia Revolution culturelle], Pekin, Zhonggong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 histoire du PCC), 1996.

XIAO Weill, *Shuaifu jiafeng* [Chez les dirigeants],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2007.

XlAo Yun, *Wode muqin, Changzheng zhong zuixiaode nu hongjun* [Ma mere, Ia plus jeune soldate de l'Armee rouge durant Ia Longue marche],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3.

XIONG Xianghui, *Wode qingbao yu waijiao shengya* [Ma carriere dans le renseignement et Ia diplomatie],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histoire du PCC), edition augmentee, 2005.

Xu Jingxian, *Shinian Yimeng* [Dix annees pour un reve], Hong Kong, Shidai guoji chuban youxian gongsi (Societe de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e de 1' epoque), 2004.

Xu Linxiang, ZHu Yu, *Li Kenong Chuan* [Biographie de Li Kenong], Hefei, Anhu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e I' Anhui), 2003.

Xu Nonghe, *Kaiguo yuanshuaide wannian suiyue* [Les Dernieres Annees des marechaux qui avaient fonde le regime], Pekin, Beijing chubanshe, 2001.

XuE Qingzhao, LI Jinglin, XuE Zhizhao, *Di yidai lingdao jiti de xingcheng* [La Formation de Ia premiere communaute de dirigeants

centraux], Pekin, Qunzhong chunbanshe (Editions des masses), 2001.

YAN Changgui, WANG Guangyu, *Wenshi laixinji* [Recueil de lettres adressees a l'histoire], Pekin, Hongqi chubanshe (Editions du drapeau rouge), 2009.

YANG Fan, *Mengyuan ershiwu niande gonganjuzhang* [Un directeur de Ia Securite qui a ete maltraite a tort durant vingt-cinq ans], Pekin, Qunzhong chubanshe (Editions des masses), 2001.

YANG Jun, *Gongheguo buzhang dangan* [Les Dossiers des ministres de Ia Republique], Wulumuqi, Xinjiang qingshao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s jeunes et des enfants du Xinjiang), 1998.

ZHANG Mingyuan , *Wode Huiyi* [Mes souvenirs) , Pekin , Zhongong danshi c hubanshe Cfulitions d'histoire du PCC), 2004.

ZHANG Shujun, *Da zhuanzhe* [LeGrand Toumant), Hangzhou, Zhejiang renrn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Zhejiang), 1998.

ZHANG Suhua, *Bianju, qi qian ren hui shimo* [Urgence, l'histoire de Ia conferen ce des sept mille) , Zhongguo qingnian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jeunesse chinoise), 2006.

ZHANG Wenhe, *Shenghuozhongde Zhou Enfai* [Comment vivait Zhou Enla i), Pekin, Jiefangjun chubanshe (Editions de l'armee populaire de libera tion), 2000.

ZHANG Wenqiu, *Zhang Wenqiu huiyifu* [Memoi res de Zhang Wenqiu), Canton, Guangdong jiaoyu chubanshe (Editions educatives du Guangdong), 2002 .

ZHANG Yaoci , *Zhongyangjingweit uan tuanzhang huiyi Mao Zedcng* [Le

Commandant de Ia garde du Comite central se souvient de Mao Zedong) , Pekin, Qunzhong chubanshe (Editions des masses), 2001.

ZHANG Yaoci , *Huiyilu, Zai Maozhuxi shenbie andrizi* [Memoires, Les jouts passes aux cotes de Mao Zedong],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2008.

ZHANG Xiao, *Hongse fengyun* [Dans le rouge) , Pekin ,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 s d'histoire du PCC) , 2004.

ZHANG Xiushan, *Wode bashiwun ian cong xibei dao dongbei* [Mes quatre vin gt-cinq ans, du nord·ouest au nord-est).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s d 'histoire du PCC), 2007.

ZHANG Yun sheng, *Maojiawan jishi, Lin Biao mishu huiyilu* [Recits sur Maojiawan, Les memoires d'un secretaire de Lin Biao), Pekin, Editions printemps et automne, 1988.

ZHAo Zhichao, *Mao Zedong shierci nanxun* [Les Douze Tournees dans le Sud de Mao Zedong], Pekin, Zho 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Edition s d' histoire du PCC), 2000.

ZHANG Yihe, *Wangshi bu ru yan* [Le Passe n'est pas comme de Ia fumee] , Pekin,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Editions d e litterature populaire), 2004 .

ZHANG Yun , *Pan Hannian zhuan* [Biographie de Pan Hannian] , Shanghai, Shan ghai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e Shanghai), 2006.

ZHANG Yuwen , *Siwang lianmeng. Gao Rao shijian shimo* [Une alliance mortelle, l'affaire Gao-Rao tout au long], Pekin, Beijing chubanshe

(Editions de Pekin), 2004.

ZHANG Zuoliang, *Zhou Enfaide xuihou shinian, Yiwei baojian yishengde huiyi* [Les Dix dernieres annees de Zhou Enlai, les memoires d'un medecin personnel],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7.

ZHAO Jialiang, ZHANG Xiaoji, *Gao Gang x.ai beijing* [Gao Gang a Pekin] , Hong Kong, Dafeng chubanshe (Edition s du grand vent), 2008.

ZHONGGONG JIANGSU SHENGDANGSHI GONGZUO BANGONGSfU, JIANGSU SHENG DANGANGUAN (Bureau d 'histoire du PCC du comite du Parti et Archives de Ia province du J iangsu), *Sanfan, wufan yundong jiangsu juan* [Les Mouvements des Trois Anti et des Cinq Anti, rouleaux du Jiangs u],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 she (Editions du PCC), 2003.

ZHONGGONG JIANGSU SHENGWEI DANGSHIGONGZUO BANGONGSHI (Bureau d' histoire du Parti du comite du PCC duJiangsu), *Chen Pixian zai sunan* [Chen P ixian dans le sud duJiangsu], Pekin, Zhonggong dangshi chubanshe, 1998.

ZHONGGONG ZHONGYANG DANGSfU YANJIUSfU, HEBEI SHENGWEI (Service central d'etude de l'histoire du PCC, comi te du H ebei), *Zhongyang zai xibaibo* [Quand le Comite central etait a Xibaibo],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du peuple) , 2003.

ZHONGGONG ZHONGYANG WENXIAN YA NJIUSfU JI ER BIENYANBU (Deuxieme departement d'edition et de recherche du 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du Co mite central), Deng dajie [Dame

Deng], Chongqing, Chongqing chubanshe, 2004.

ZHONGGONGZHONGYANG WENXIAN YANJIUSHI (Centre de recherches documentai res du Comite central du PCC), Editions 1 Chongqing, 2004.

ZHOU Bingde , *Wode bofu Zhou Enlai* [Mon oncle Zhou Enlai],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du Liaoning) 2001.

ZHOU Ming (ed.), *Lishi zai zheli chensi (1966-1976 jishi)* [Ace point, l'histoire donne ii mediter, recits sur les annees 1966-1976], 2 tomes , Pekin, Huaxia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Chine), 2003.

ZHOU Weiren , *Jia Tuofu Chuan* [Biographie de Jia Tuofu], Pekin, Zhonggon g dan gshi chuban she (Editions de l'histoire du PCC), 1993.

ZHU Heping, *Yongjiude jiyi* [Des souvenirs pour toujours], Pekin, Dangdai zhongguo chubanshe (Editions de Ia Chine actuelle), 2004.

ZHU Hongzhao, *Yanan richang shenguo de lishi, 1937-1947* (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 a Yanan),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Editions de l'universite normale du Guangxi), 2007.

ZHu Min, *Wode fuqin Zhu De* [Mon pere Zhu De],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ses), 1989.

ZHU Tingxun, *Li Desheng ZPi dongluan siyue, congjunzhang dao zhongyang/uzhuxi* [Li Desheng dans les turbulences, un general devenu vice-president du Comite central],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ses du Comite central), 2007.

ZHU Yu, CHEN Zhensheng, HE Guangyao, *Li Xianniande feichangzhi lu* [LaVoie extraordinaire deLi Xiannian], Pekin, Renm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s), 2001.

ZHUO Lin et al., *Yongyuan de Deng Xiaoping* [L'eternel Deng xiaoping], Sichuan renrnin chubanshe (Editions populaire du Sichuan), 2004.

ZI Ding, *Li Qiang zhuan* [Biographie deLi Qiang], Pekin, Renrnin chubanshe, 2004.

Zou Yan, *Zhou Enlai he tade weishimen* [Zhou Enlai et ses gardes], Pekin, Zhongyang wenxian chubanshe (Editions documentaires du Comite central), 2001.

▪史大講堂

主宰中國的太子黨

著者：Jean-Luc Domenach

譯者：何啟仁

總編輯：胡金倫

總經理：陳芝宇

社長：羅國俊

發行人：林載爵

編輯主任：陳逸華

叢書主編：鄒恆月

校對：吳淑芳

封面設計：許晉維

出版者：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出版日期：2018 年 10 月　初版

電子書製作日期：2018 年 9 月

電子書製作：王聖淵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ISBN：978-957-08-5180-9

« LES FILS DE PRINCES » by Jean-Louis Domenach

©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16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各界讚譽

這本書梳理了豐富的史料，也提供了解「王子們」如何崛起的關鍵，和他們又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習得了在適應當今世界的同時，效忠自己國家與政黨的「雙重天賦」。

——《外交政策季刊》（*Politique étrangère*）

杜明精闢分析了共產黨革命領導人孩子們的歷史，這讓我們得以更進一步了解當今中國的變異。

——*NPA*

FB搜尋

聯經出版 聯合文學雜誌 聯經思想

聯經出版官網 www.linkingbooks.com.tw

Les fils de princes

太子黨：中國的主宰

1912年末代皇帝溥儀宣布退位後，中國不再有皇帝，然而卻有另一個新興貴族階層依附著中國共產黨壯大起來，直至今日仍居要位。

要了解這個權貴階層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到了今天還盤據在中國經濟、政治的山巔？我們要回頭看看國共內戰時期。肅清共產黨的措施和戰時的紛亂，讓許多共產黨員為保護子女安危，將他們送至蘇聯或託付給親戚、朋友。

這批離開父母、受盡磨難的孩子們，便是赤色王朝的第一代接班人。他們是延續權力的血脈，也是未來太子黨的雛形。後來，黨日趨重視這些革命要員與先烈的後人，這些紅二代、三代享有教育、事業上的優勢，如此一來當他們的父母凋萎，其手握的要權便有了移轉的對象。

這些承繼前代權勢的太子黨成員，挾優於一般老百姓的教育環境、經濟條件、政治威權，逐漸發展成新中國的新貴族階層。他們擔任各機關要員、血脈遍布政商界，是煽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推力，也是長期殘酷政爭角鬥場上的熟面孔，發展至今，甚至出現了一批習慣坐擁財富的人，以炫富形象為世人周知。

Une génération au pouvoir en Chine

中國的命運被誰掌控了？

領導人的家族網路，
織出了一張籠罩中國的經濟、政治權力大網。

ISBN 978-957-08-5180-9 00360

建議分類：社會科學／政治／中國研究